你不可能是漢族

百年民族魔咒大破解



吳銳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你不可能是漢族

百年民族魔咒大破解

吳銳 著

你不可能是漢族

百年民族魔咒大破解



吳銳 著

自序

二〇〇六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許多學者在網上發現他們的學術著作遭北京超星公司盜版，遂推舉本人為召集人，一同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公證到一千多人遭超星盜版，準備起訴的有四百多人，於二〇〇七年二月開始到海淀法院狀告超星公司盜版侵權，《人民日報》、《方圓法治》（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上海《每日經濟新聞》等二十多家媒體廣泛報導，新聞界把這次大規模群眾性維權活動稱之為「四百專家訴超星」。超星盜版的受害者遍布中國、香港、台灣、美國、日本、新加坡，「四百專家訴超星」被評為二〇〇七年度中國八大出版熱點之一（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華讀書報》）。

海淀法院的一系列判決十分荒唐，在通過一審判決的十多個案子中，除兩個案例外，其他所有案例都是法院判決超星侵權盜版事實成立，但判決的賠償金額不足以支付律師費、公證費、調查費等合理支出。專家們上訴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均維持原判。其中一個法官把我們的律師當成了被告的律師，給我們的律師出主意，如何規避責任。我作為「四百專家訴超星」的負責人，身邊聚集了一些記者，應他們的要求，我也談過中國的民族問題，包括漢族人口造假，談話內容就發布在中國的網路上，沒有遭到刪除，可見還是合法的。由於自己有親身經歷（見本書第一章），我在一九八二年上高中時就知道漢族人口的水分很大。

轉眼十多年過去了，現在才將我三十多年前的疑問寫成專書，依然唯恐成為多如牛毛的「辱華」事件的主角。本人無意充當歷史警察，本書也不是裁判書，凡是感覺受到冒犯的漢族人，大可自行高喊一聲：「我就是漢族！」沒人會攔著你，沒人能夠改變你的民族成分。歷史學家只是力圖找出歷史的真相而已，對於找出的結果，或者引起的後果，是沒有義務承擔的。這好比醫生給患者診斷出癌症，患者不能遷怒於醫生。

如果對自己的民族成分不放心，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些研究，大可不必氣急敗壞地謾罵。排滿革命黨特別推崇明國，他們號召以朱元璋排元為榜樣，繼續漢族復國的鬥爭。剛好最近幾年有關明史的書還很流行，

如果關心自身是不是漢族，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深入研究一下排元排滿運動，把漢族的來源弄個水落石出。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九日，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老前輩劉起釪先生（1917–2012），從南京給我寫了一封一萬多字的信，囑咐我承擔起光大古史辨學派的重任。後來他回到北京我們見面的時候，劉先生告訴我，他已經八十四歲，也不知道還能活多久，這封信等於是遺囑，其中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遭受打壓的一些細節是首次披露，但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顧頡剛（1893–1980）先生開創的古史辨學派傳承下去。我聽了之後真是誠惶誠恐。我自己才疏學淺，根本考慮不到什麼學派的問題。而且此時中國的社會風氣已經到了老年人摔倒在地下沒人敢扶的地步，假如有人去扶，整個社會都這樣想：「老人與你非親非故，你為什麼會扶呢？一定是你撞到了老人。」中國的法官就是根據這樣的思路，判決好幾個扶起老人的熱心人有罪，如二〇〇六年彭宇案。同時，也出現了以訛詐為職業的老年人「碰瓷」團夥。因而使我感到劉先生的遺囑信，我是不能接受這個重任的。網友的期待，也只好辜負了。作為紀念，劉先生的這封信，我將在下一部書《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學和史學家》裡公布。劉先生窮一生之力，完成《尚書校釋譯論》，我幫助他找資料，光校對就花了六年。一出版就被盜了個精光。有的盜版賊一邊盜版還一邊在網上說：「劉先生被扔到簡陋的托老所，太可憐了，我們去看看他吧。」劉先生一生研究的是《尚書》絕學，絕學未必絕對沒有市場。如果劉先生生活在古史辨時代，他自己印書，同時在國立或私立學校任教，他可以過得很寬裕，根本不需要任何領導批示關懷。

但由於多年來我和楊向奎先生、劉起釪先生、王煦華先生太親密，他們三位恰恰是顧先生早、中、晚期指導的學生。加之我在二〇〇三年編了套書叫《古史考》，反駁了強加給古史辨學派的種種不實之詞，給人以學派鬥爭的錯覺，所以大家更加一齊稱我為疑古派、疑古派後學、疑古派餘孽、最後的疑古派、疑古新軍領袖，意思都是與古史辨派有關係，也有稱我為新疑古派的。我認為，疑古的人不是後腦勺長有反骨的怪胎，而是人人可以疑古。如果擔心疑古不知道從哪裡下手，我主張可以從常識下手。本書涉及的漢族問題，就是一個常識問題，也與大多數中國人有關。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又是這麼重大的問題，僅僅一九五七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這不是很可疑

嗎？這麼好的題目，為什麼六十多年來沒有人著手呢？特別是現在有了互聯網。

一九二三年，初出茅廬的顧頡剛先生懷疑禹和夏最初互不相干，引發「疑古」運動，因為「禹是一條蟲」的誤傳，成為大家的笑料，把顧先生弄得灰頭土臉。我現在鬥膽冒天下之大不韙，再次提出漢族的識別問題。這次的民族疑古，沒有領袖，沒有脫漢入夷、脫夷入歐之類的口號，只有好奇心的驅動，因為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是永恆的哲學問題，歷史學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由於Google、Facebook、Twitter 、YouTube等大批世界主流網路在中國是禁止的，催生了百度、騰訊、華為之類的沒有競爭對手的明星企業。但即使在這樣有限的「中國局域網」內，研究歷史問題的條件不知比古史辨學派先輩好了多少倍。特別是不需要進入研究機構或者大學的體制之類，照樣可以從事研究。我主張每個人從自己的家譜開始研究，一定會有驚人的發現。同時也將證明，疑古永遠不會過時。「疑古」不單純是一個量的問題，不是說你懷疑百分之六十就屬於疑古派、相信百分之六十就屬於信古派，而是如何證明的問題。

在目前的體制之下，中國不光是造不出高精尖的芯片，人文學科的複雜問題，照樣解決不了。因此，大家對體制內的專家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他們的歷史「常識」，並不比普通人高明多少。例如：專家們異口同聲地說漢族形成於漢朝（漢國），可是秦朝（秦國）才是第一個統一王朝，而且率先實行郡縣制，國家權力從中央到地方一竿子插到底。如果按照專家的思路，應該形成一個統一的秦族，包含秦國大部分人口。但是秦到漢只有短短十五年，難道這個龐大的秦族轉眼之間就變成了漢族？

疑古，可以從常識開始！

再說，讀者既想看到好的作品，又戒不掉盜版癮，等於殺雞取卵。我的書，不僅有超星之類的公司盜版，還有大量的個人在網上盜版。他們採取傳銷的盜版手段，你想看到盜版書，你需要先上傳盜版書到網路提供給別人盜，這樣才能獲得一定積分。積分越高，你看到盜版書的機會也越多。有的網站甚至呼籲成立盜版敢死隊。

二〇一四年，我修訂劉起釪先生的名著《尚書學史》，寫了個後記，痛斥中國盜版，就是這樣一篇痛斥盜版的文字，依然被盜版賊發布在中國頗有名氣的豆瓣網站[1]，盜賊的網名叫「永公街的街長（南

京）」，盜版時間是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二〇一九年，中國依然是全世界公認的最大盜版國。德國「金鼻子剽竊獎」自一九七七年舉辦以來，中國企業生產的產品每年都獲得剽竊獎，二〇一九年再次包攬頭三名。從手電筒、日用品到動力鋸，幾乎所有的產品都會看到中國的冒牌貨。二〇一九年美國聖誕購物季，中國假貨比往年多，連新款iPhone11手機也有仿冒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中國山寨版無印良品狀告日本無印良品侵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最終判決，日本無印良品不但敗訴，還要賠償「北京無印良品」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共人民幣六十二點六萬元。這說明中國人絕非不懂版權，反而非常善於利用版權謀利。不愧是厲害國，神奇的土地，神奇的人民。

二〇一八年，我還在國外，我太太在北京接到台灣人的電話，訴說自己遭中國盜版的苦惱（這裡的「中國」是台灣人自己說的，不服氣的找他算帳，與我無關）。我很同情，除非國際制裁，在中國是沒有辦法的。現在中國官方將人權解釋為生存權，盜版起碼侵犯了創作者的生存權吧。這位台灣朋友研究一下，如果能夠引入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對中國盜版賊實施制裁，才能起到震懾作用。中國盜版賊之多，可以用「駭人聽聞，不可思議」八個字形容。我也在想，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民族？是什麼特殊材料製成的？已經到了不盜版就手癢、不盜版不能活的地步。你們為什麼不單獨成為一個民族？為什麼不單獨建立一個盜版共和國？我要告訴中國的盜版賊，本書沒有、也不可能在中國申請到科研經費，同樣不可能在中國出版，希望你們的盜版黑手不要伸向寶島台灣，我相信你們已經盜版的，這輩子都讀不完，因此請高抬貴手，放過本書，不要逼我二次出山。

一九五三年中國進行人口普查時，非漢民族（官方的提法是「少數民族」，我主張用「四夷」取代）自報的民族成分有四百多個，資料應該還在。民族認定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認同。老百姓自報民族成分，就表明了文化認同的態度。如果能夠撥亂反正，把這些民族都恢復起來，萬物並育，對任何人都沒有壞處。如果各民族都制定族規，將盜竊成性的族人驅逐出本族，不失為一個打擊盜版的方法。這也是我忍著腰痛，咬緊牙關，奮力完成本書的一個動因。

在中國，做人文學科方面的研究不僅清苦，而且動輒得咎，風險很大。幸得有老師碩儒鼓勵指點，才不致太孤寂。謹記下最近幾年謝世的

前輩，永誌不忘。他們是：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方立天所長（1933–2014），華中科技大學建築學家張良皋教授（1923–2015），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葉秀山研究員（1935–2016），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梁存秀研究員（1931–2018）。

本書初稿承福建師範大學簡逸光博士校對，並提出修改意見。我本來想減少引文，刪除注釋，使本書通俗一點，但是多年養成的職業習慣，哪怕少一個出處自己就感到罪過，通俗的目標估計還沒達到。好在本書只是拋磚引玉，希望將來有更好的民族、姓氏方面的作品問世。

吳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於北京

---

1. 〈吳銳：2014年重印後記〉，豆瓣讀書，網址連結：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930341/discussion/616406195/

第壹章

百年來形成的民族魔咒



戰國時期的楚國帛畫《龍鳳仕女圖》，是至今為止發現的兩幅戰國帛畫之一。帛畫的構圖中心為雙手合十的女性及高飛的鳳鳥，蜿蜒的夔龍則被擠壓到畫面的左方。

壹從六十七萬穿青族的消失說起

中共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伊始，就發動了三大政治運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朝鮮戰爭（官方稱為「抗美援朝」）。一九五〇年開始「鎮反運動」，鎮壓了百萬反革命。同時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整肅知識界。一九五三年進行人口普查，此時少數民族自報民族成分有四百多個，直到一九七九年，這四百多個與漢族有不同身分認同的群體，以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結果收場。而代表少數民族的數目，至今不增也不減──仍是「五十五」。從四百多到五十五個，這是怎麼變化的？考察穿青人的消失，或可為這個疑問提供一種答案。

二〇〇〇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記，貴州省全省總人口三千七百五十五點七二萬人，自報填寫「穿青人」的人數約六十七萬，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點七。畢節地區約五十四萬人，安順市約八萬人，六盤水市約二萬人，其他地區，包括織金、納雍、大方、黔西、金沙、畢節、赫章、威寧、六枝特區、盤縣、水城、清鎮、平壩、安順、普定、關嶺、鎮寧、紫雲、興義、興仁、晴隆、安龍、普安、長順、冊亨、望謨、貞豐、龍里、貴定、福泉、施秉、鎮遠、黃平等三十多個縣（市、特區）共約三萬人。其中，織金和納雍兩縣穿青人最多。

在以上六十七萬人之外，實際上還有不少沒有申報的穿青人。一方面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盡力宣傳民族融合，穿青人對自己的民族意識已經不強烈；還有一部分人已經失根了，壓根不知道自己是穿青人。

關於穿青人的族群性質，有以下三種觀點。

1. 土著說

認為穿青人和歷史上的僚人一樣，發源於貴州的原生民族。這種觀點以貴州民族研究專家為代表，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穿青人也持此觀點。

2. 分支說

認為穿青人是漢族的一支，為明國征討雲南時遷移到貴州的隨軍漢人，由於地理隔絕等諸多因素形成的一個集團。持這種觀點的為以社會學專家費孝通（1910–2005）為代表的部分學者。

3. 混合群體說

認為穿青人是明國（明代）漢族移民與當地土人（即漢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少數民族）互相通婚融合後形成，處於漢族社會與少數民族社會之間。這是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央民族大學部分學者的觀點。

這裡先反駁第二種說法—分支說。分支說的唯一依據是穿青人的某些祖先是從江西吉安移民過來的，理所當然地把這些移民認定為漢人。這是典型的「非少即漢」（如果不是少數民族那就必然是漢族）、「非漢即少」（如果不是漢族那就必然是少數民族）的二元論思維，是本書將要反駁的重點。本書認為，在漢族和少數民族之外，還存在相當大數

量的「未定族」，這些「未定族」從中華民國成立以來，被裹脅為漢族。例如江西吉安土著因為反抗官府，被趕出故鄉，流落到貴州等地。這些土著即為當地的非漢民族，歷史上有百越、峒、佘、徭、蠻、獠、土夷等不同稱呼。把所有從內地來到貴州的人都劃為漢族，而且是官方移民戍邊的安排，只是想當然而已。

據明國史志記載，穿青人過去叫「土人」，又叫「里民子」。里即俚，與僚、苗一樣，經常作為對西南族群的泛稱。據研究，「穿青人」最早見於乾隆《威寧州志》，繼後是光緒《平遠州續志》和民國《大定縣誌》、《鎮寧縣誌》、《平壩縣誌》。《平遠州續志》和《大定縣誌》是在記述同治初年民變時提到的，是因其「衣尚青」，「尚」是喜歡的意思，所以「又曰穿青」。古代對不同的民族很難作準確的區分，這裡從衣服上將這一族群區分為「穿青」，是簡便的法則。謝天謝地，漢族婦女的裹腳文化沒有傳染到穿青人。



穿青人信仰「五顯神」，每年九月秋收後，會舉行祭典，以「跳儺戲」，又稱「跳菩薩」的儀式性表演，慶祝當年的豐收。

在民國《鎮寧縣誌》，把「穿青」作為該縣的獨立民族載入史冊；在民間記載方面，清康熙三年（1664），吳三桂平定水西之後，流傳於民間的木刻唱本《水西傳》提到「穿青」這個民族，並與水西境內的彝族、苗族、仡佬族、龍家人、蔡家人、羿人、白族、仲家（布依族的一支）等八個民族並列，統稱「九種夷蠻」。據此可見，穿青人並非漢民族。穿青人還有自己獨特的圖騰──山魈，山魈是猴的一種，穿青人的宗

教活動「慶五顯壇」（簡稱「慶壇」，俗稱「跳菩薩」）也與山魈有關。

一九五五年，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後面簡稱民委）派人來到貴州，由省、地、縣三級行政部門抽調五十多人，對穿青人的民族成分問題進行調查。調查範圍主要是畢節、安順兩地區。在畢節又分為大定、納雍、織金、水城四個組，四個多月結束。這次調查以費孝通教授為首，其結論是穿青是漢人而不是少數民族，形成《貴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調查報告》。當時的調查報告沒有公開，但是國家有關部門在制訂和執行政策的時候按照這個結論為參考。費孝通雖然是著名社會學家，後來官拜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他對民族的認識，和老百姓沒有兩樣，無非是「非少即漢」，或者「非漢即少」。

一九八一年，貴州省人民政府發出文件，開展了對該省未定民族的識別工作。織金、納雍、大方三縣的民族事務委員會牽頭組成了一支數十人的工作組，對穿青人的民族成分問題進行第二次調查。張成坤、王殿華均是當年工作組成員，至今健在。張成坤說，工作組採用查閱歷史文獻、家譜、實地考察、走訪老年人等方式，搜集分析了穿青人的歷史源流、遷徙歷程、文化特徵、民風民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資料。一九八四年一月，貴州省民族識別辦公室決定由織金、納雍兩縣的調查人員分工撰寫出《貴州穿青人民族成分問題重新調查報告》，結論是：穿青人是以貴州土著民族為主，並在漫長歷史中與外籍遷入人口融合而生的一個少數民族。一九八五年三月，貴州省民委有關人員帶著四公斤重的報告和附加資料向國家民委匯報，要求將穿青人識別為單一少數民族，被中央否定。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中國的公安部、國家民委聯合下發了《關於居民身分證使用民族文字和民族成分填寫問題的通知》，其中第三條規定，居民身分證民族項，應按照國家認定的民族名稱填寫全稱。對四種情況可以採取適當的措施解決，第三種情況特別指出：已定漢族（如穿青人）而本人有意見，仍應填寫為「漢族」，也就是說，已經被認定為漢族的穿青人，再也沒有改正的機會。然而該文件到了貴州以後，貴州省有關部門沒有下發執行。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貴州省委常委辦公會議聽取省民委黨組關於民族識別工作的匯報之後，下發了《中共貴州省委常委辦公會議紀要》（1986）二十九號文件，明確指示在穿青、蔡家等八個集團的

民族成分問題：「沒有明確解決之前，先維持現狀，即：凡已經按少數民族對待的，仍按少數民族對待，填寫民族成分時，原來怎麼填寫仍然怎麼填寫。」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國家民委黨組向習仲勛並中央書記處報告（即國家民委[八十六]民政字第二十五號）：「我國民族識別的任務在五十年代已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分的問題，現已基本解決。」同時提出了幾條原則，其中第四條說：「對於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團......盡可能地相互合為一體，認定為同一民族。」獲得習仲勛並中央書記處同意。

二〇〇三年五月，公安部針對穿青人民族成分的填法時提出填「漢族」的意見，並命令各級公安派出機構具體執行，這一命令在穿青人當中激起了很大的反響，穿青代表通過織金縣民委向貴州省民委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貴州省民委聯合省公安廳將問題反映到國家民委乃至國務院。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安部發出「公治（2003）一一八號文件」《關於對貴州省革家人和穿青人居民身分證民族項目內容填寫問題的批覆》，意見為「為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大局，對你省革家人、穿青人按照『凡已按照少數民族對待的仍按少數民族對待，填寫民族成分時原來怎麼填寫仍怎麼填寫』的原則，在辦理居民身分證時，採取一種過渡辦法，可填寫為『革家人』、『穿青人』」。

可是在二〇〇四年中國換二代身分證時，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原本的「穿青人」統統變成了「漢族」。

二〇〇三年，織金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纂了二百四十九頁的內部資料《穿青人歷史與文化》，算是對穿青人民族歷史的哀悼。

由於中國的民族代碼標準中沒有「穿青人」一項，當穿青人離開貴州到外省求學、工作時，他們往往會因為找不到對應的民族代碼，而遭遇到難以辦理身分證、戶口遷徙之類的困擾。

除了上面提到的「革家人」、「穿青人」，還有很多族群也稀里糊塗地定性為漢族。如蜑家人（「蜑」有時候寫作「疍」），生活在南方的水面上，船就是他們的家，以打魚為生。還有如摩梭人，被定為納西族，摩梭人自己不承認[1]。


著傳統服飾的摩梭族女性。

類似的情況，不勝枚舉。

此外，中國的老百姓掙扎在貧困線上，對自己的民族成分並不是很關心。許多人想當然自認為是漢族，其實應該是少數民族。

貳自己的親身經歷

一九八二年，我從農村初中畢業，到縣城讀高中，時逢政府發文件，規定三代以內直系親屬是八大姓者，民族成分認定為土家族，這八大姓是：覃、田、譚、鄧、陳、柳、鄭、向。我祖母姓譚，因而我的民族成分由漢族改為土家族，而我父母及以下的家族十幾口，至今還是原封不動的漢族，原因是農村老家的派出所只有三四個人，主要管治安，不可能有專門的戶籍民警，而且管轄十萬人左右，不僅居民住得分散，還有的住在深山老林，派出所的人根本不可能下鄉入戶調查，因此他們在登記轄區戶口名簿以及後來辦理身分證的時候，百分之百地登記為漢族。他們是憑感覺和常識辦公，不能責怪他們，因為這種「感覺」和「常識」來自百年前的排滿復仇者（自稱「革命黨」），他們無力擺脫，這也是本書寫作的主旨所在。因此從一九八二年起，我就親身體會

到，漢族的人口數量一定是大量摻水，不可信。

土家族的前身是巴人，是一九五○年代潘光旦先生識別出來的，得到了官方的承認。

關於巴人的發祥地，無論是古代人的研究還是現代人的研究，大多認為在今天的重慶。民國初年楊守敬（1839–1915）完成的劃時代巨著《歷代輿地沿革圖》，集中國古代歷史地理研究之大成，將春秋時期的巴國都定在今天的重慶。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集全國之力、由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圖集》八冊，代表了現代學者用現代研究方法整理中國歷史地理的最高成就，沿襲了楊守敬的說法，將西周、春秋時期的巴國都定在今天的重慶，正當嘉陵江入長江口。

我主張另闢蹊徑，從相傳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夏（夏國）的興起地，側面推測巴人的興起地。《山海經》是古代的神話典籍，現存十八篇。卓越的巴文化研究者呂子方（1895–1964）先生認為《山海經》是南方產品。他根據《山海經．海外東經》所載「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的記載，指出《山海經》是以十萬為億，和中原傳統以萬萬為億者在記數方法上不同[2]。蒙文通先生（他是楊向奎先生的老師輩）早在一九六二年指出，《山海經》裡《五藏山經》所謂的「中」也是包括了古豫、荊二州的西部、南部和整個梁州地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古巴、蜀、荊楚之地都作為天下之中來看待[3]。這再次提醒我們，《山海經》是不同於中國的文化系統，例如它特別尊崇崑崙，學術界都以為崑崙在很偏西的地方，甚至在中東，實際上它在漢水流域。



《海內南經》記載的「巴蛇食象」，圖收錄於《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山海經》時代有先有後，其中的《海內南經》，記載夏國國王啟手下的大臣孟塗是巴地的司法神，住在山上，在丹山西。這是有關巴人的最早文獻記載。郭璞注《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歷代認為即

今長江三峽中的秭歸縣或巫山縣，這是很大的誤解。中國的河流大多向東流，古人將河流北面稱為「陽」，所謂「丹陽」，必然是丹水北面的地名。丹山在丹陽南，可能就在今天陝西東南、湖北西北的丹江流域。孟塗這類人，即今天巴東尚存的端公（巫師）。夏國呢，按本人的研究，發祥於渭水流域。在距今七千至五千年以魚為圖騰的仰韶文化的先民，經過漫長的發展，分化出一支崇拜黿的玄黿族，即夏族，進而建立了夏國。夏國的締造者是禹，禹的父親是鯀，又寫作「鮌」，可以看作是玄、魚二字的合文。最早的國家都是小國寡民，啟的大臣孟塗到巴地，巴地不會離夏國的統治中心渭水流域很遠。河水、赤水、弱水、洋水傳說是上帝的四條「神泉」（見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編著的《淮南子》一書），河水是黃河、洋水是漢水，沒有爭議，赤水、弱水就眾說紛紜了。我主張赤水就是現在陝西省東南的丹江，弱水可能是淅水，在丹江下游的東邊，是丹江的支流。丹江雖然不是特別大的河流（只有八十多公里長），可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丹江名列上帝的神泉，必然是發祥於丹江的民族誇耀他們的身世而形成的神話，生活在丹江流域的巴人理所當然尊丹江為聖水。現在北京的飲用水，就是通過南水北調工程，從丹江口水庫抽來的。

巴人以販鹽知名，「巴」的本義就是鹽，我們至今稱呼鹽為「鹽巴」。巴人的分布地與鹽資源高度重合。還有一條發源於神農架的河，過去叫沿渡河，現在叫神農溪。河邊懸崖上用木板搭的棧道依稀尚存，這是古人為了躲避官府徵稅，冒著生命危險，販賣私鹽。春秋時期的超級大國楚國，最早的首都叫丹陽，位於丹江之北。後來向南發展，先後在漢水之濱和長江之濱建立首都鄢（今湖北宜城）和郢（傳統上認為在今湖北荊州市）。戰國晚期，夾在秦、楚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巴人逐漸向南遷徙，進入川東、鄂西地區。秦、楚爭奪巴國鹽資源是造成巴人遷徙的重要原因。清江是長江的重要支流、鄂西南的主要航道，從此成為巴人的新大陸，被譽為湖北土家族的母親河。

藏學前輩任乃強（1894–1989）先生也是巴文化研究的功臣，他校注成漢時期常璩（約291–361）的《華陽國志》早已成為經典。任先生在書中特別重視鹽的發現對各民族的重要性。他認為甲骨文已經有「鹵」這個字，就像裝鹽的器皿。巴人首先發明了採鹽術，從長江三峽到整個四川盆地，都有他們行鹽的腳跡，因此能夠建立巴國，也引起楚、秦兩個大國都拼命爭奪巴國的鹽資源[4]。

《說文解字》解釋「鹵」字說：「西方鹹地也。……像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至今羌番人將鹽讀成「擦」。青海的茶卡鹽池，就是《漢書．地理志》隴西臨羌縣的「西海鹽池」，今作「茶卡」，就是「擦」的音。《禮記》「鹽曰鹹鹺」，「鹺」其實就是羌語稱鹽為「擦」的譯音字。臨羌縣，西漢末年王莽篡權後改為「鹽羌」，正好說明「臨」字是古代食鹽的代稱。臨羌縣即今青海省的興海縣，在青海湖的正南方向，青海湖西邊不遠就是茶卡鹽池。古代羌人用牛皮將鹽馱到隴西地區交易，因此秦漢在此置縣，取名「臨羌」。可見食鹽最早成為商品的地區在青藏高原。其他如宓、監、鹽、鹺等字，都與鹽有關。

從四川盆地到漢水流域、長江中游，巴人的分布地與鹽資源高度吻合。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軍封鎖沿海，海鹽運輸的通道被阻斷，全國陷入食鹽恐慌，幸虧還有四川自貢古老的井鹽，緩解了燃眉之急，國民黨政府還專門拍攝了井鹽紀錄片。在我的家鄉湖北省巴東縣，至今有一股含鹽的溫泉，汩汩流淌，任何人可以在這裡用三個石頭支起一口鐵鍋，周圍都是山，柴火多得很，將鹽水熬成糊狀就可以背回家了。在一九五九年前後的大饑荒時代，老百姓將食物裡大量摻鹽，人吃了之後逼迫多喝水，緩解饑餓感。由於食鹽是國家專賣，這個溫泉現在改造成為賓館，以洗浴為行銷重點。

在中國的正史二十四史中，《後漢書》首次為南蠻立傳。從東漢第一個皇帝光武帝開始，蠻族的反叛十分密集，《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了二十次以上。這些蠻族包括武陵蠻、南郡潳山蠻、武陵澧中蠻、漊中蠻、巫蠻、長沙蠻、江夏蠻、板楯蠻，分布在今天四川、重慶、湖北、湖南，都是土家族的先驅。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傳》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武威將軍劉尚攻打「武陵五溪蠻夷」，全軍覆沒；名將馬援請戰，最後也是戰死。「武陵五溪蠻夷」可以省作「五溪蠻」，也是巴人在漢代以後的稱謂。

巴人至遲在東漢就與道教結緣，還利用道教發起暴動。東漢靈帝中平元年（184）二月爆發黃巾大暴動，也是利用道教，等於發動「聖戰」。同年七月，巴郡「妖巫」張脩揭竿而起。因加入他的教派需要交五斗米，因此叫「五斗米道」，被朝廷視為「米賊」。後來張魯襲殺張脩，成為巴郡、漢中郡的山大王。張魯自號「師君」，初學者叫「鬼

卒」，後號「祭酒」，「不治長吏，以祭酒為理」，這是典型的宗教政權。「師君」的「師」等於說精神領袖，「君」等於說行政領袖。張魯統治漢中近三十年，後來歸順曹操。漢中一度成為東方的「梵蒂岡」。

東晉時，廩君（土家族的祖先）巴人後裔李特、李雄父子建立的成漢政權（302–347）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就湖北一個省來說，土家族遠遠不止官方承認的八個姓，必然有大量的土家族和我的親兄弟姐妹一樣，至今身分證上還寫著漢族。



湘西土家族的傳統民俗舞蹈毛古斯舞。「毛古斯」意即「祖先的故事」，以帶有劇情的舞蹈表演原始時代的土家祖先生活。

參趙姓都是漢族嗎？

（一）先秦趙氏，聖鳥子民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是家喻戶曉的百家姓，趙姓是老大。百家姓編於宋國（宋代），宋的皇帝姓趙，趙姓就在百家姓裡面穩居第一。就好比現在發現一個幼小的孤兒，不知道姓名，乾脆給他姓「黨」，因為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生為中國人，都有愛國進而愛黨的義務。

姓和氏最初有嚴格區別，姓比氏大得多，一個姓之下可以有很多氏。例如趙、秦都是氏，都姓嬴。秦始皇叫嬴政不叫秦政。但是到了司馬遷等漢武帝時代的人，已經把姓和氏混為一談了。

中國姓趙的有二千六百萬人，比全台灣的人口還多出三百萬，真是

人多勢眾，因為趙宋政權的關係，貌似血統又高。但姓趙的都是漢族嗎？

說到趙，必須提到秦，秦、趙本是一家。《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

大戊，也寫作「太戊」，古代大、太相通。據《史記．殷本紀》，大戊是商國第九代國王。第八代國王雍己是大戊的哥哥，在他手上商國走下坡路了。到了大戊，任用賢人，商國又開始復興。御是駕車，車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發明。紂是商國的末代國王，被殺的年代是前一○二七年。

按照《史記》的體例，建立王朝者，列入本紀。趙也曾經建立起泱泱大國，位居戰國七雄，終因被秦國吞併，只好屈居《世家》，與孔子、陳勝一個檔次。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人的來源就詳細得多：「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諮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遊，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

顓頊相傳是黃帝之子，赫赫有名，很多民族都拉他當祖先。秦人的老祖母女脩據說也是他的後裔。她紡織的時候，有玄鳥掉下一個蛋，女脩吃了，生下兒子大業。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卵生傳說。新石器時代就有陶紡輪出土，女脩紡織大概可以相信。大業的兒子大費因為參與大禹治水，立下功勞，舜把女兒嫁給他，賜給他「嬴」的姓。大費還幫助舜馴服鳥獸，因此得了個「柏翳」的名字。柏翳和伯益同音，「大費」也就是益。

舜把「姚姓之玉女」嫁給大費，玉女可以理解為好女、美女。舜是姚姓，秦是嬴姓，似乎是通婚的兩個民族。《史記．趙世家》記載，晉國勸臣趙簡子（?-476 BC）生病，夢見到了上帝那裡，上帝告訴他：「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配而七世之孫。」舜又號有虞氏，所以經常合稱虞舜。上帝的意思是說，我想起舜的豐功偉績，將把舜的後代（姚姓之女）嫁給你的七世之孫。過了一百多年傳到趙武靈王，有

一夜他夢見美女鼓琴而歌，醒來之後回憶其狀，他的臣子吳廣聞之，因此進獻他女兒孟姚。《索隱》：「『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趙也是嬴姓，與姚姓有通婚的傳統。

益（前面提到的「大費」）是堯舜手下掌管山澤的官，和今天的林業局局長差不多，古書記載比較少，《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說的是堯之時，天下很不太平，洪水氾濫成災，草木長得太盛，禽獸繁殖太快，禽獸逼人，到處都是獸蹄、鳥跡，莊稼長不起來。堯派舜去整治，舜任用益，益放火燒山，趕走鳥獸。

《尚書》號稱是中國最早的史書，第一篇是《堯典》，記載帝舜咨詢誰可以管理草木、鳥獸？大家推薦益。帝曰：『俞，諮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說的也是益去做「虞」這個官，這個官職與草木、鳥獸相關。《周禮》是戰國時代帶有空想性的一部書，其中記載太宰的職掌之一是虞衡，也就是掌山澤之官。

「益」，有時也作「伯益」。《呂氏春秋．當染》：「禹染于皋陶、伯益。」染是染色，引申為受影響。皋陶相當於今天中國的政法委書記[5]，是偃姓。偃姓來自「鷃」圖騰，「鷃」是鳳的異名，當然也是鳥夷族。古史所謂「群舒」，就是舒族所建的多個國家，也是偃姓，廣泛分布在今安徽南部、江蘇北部。

值得注意的是，趙氏之祖中衍是「鳥身」。《史記．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桀，是傳說中的夏國之末代國王。費昌本來給桀駕車，後來投奔了商國，給國王湯駕車，成為功臣。鳴條，傳統上認為在陳留，在今河南開封市附近，也有很多人認為在山西。鳴條之戰之後，夏國就滅亡了。中衍不僅給國王駕車，還與商國的王室結親，成為

商國的左膀右臂。由中衍的「鳥身」，推測鳥俗氏必然與鳥崇拜有關。

文中的「中國」指西周各分封國，等於「華夏」。四夷，是古人機械地將異族與四方對應，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國學術界將華夏作為漢族的前身，乾脆將四夷當成少數民族。這種荒唐的歷史觀正是二十世紀初期的排滿運動造成的，是本書的研究主旨所在。



鴻山出土，春秋戰國時期越國貴族墓的玉玄鳥。

蜚廉，古書又寫作「飛廉」。《孟子．滕文公下》：「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飛廉就是《世本》中的蜚廉氏，是秦和趙的直系祖先。

西周初建，東方不服，接二連三地反叛。此時周武王去世，他的兒子成王年幼即位，武王的兄弟周公帶兵東征，花了三年時間才將反叛鎮壓下去。奄在今山東曲阜一帶。飛廉逃到東方海邊依然沒有逃過被戮的命運，他的子孫就必然被打得雞飛狗跳，只好向西部逃竄，於是山西就有了飛廉墓。《水經注．汾水》記載：「汾水又南（按朱謀本作『東』，全祖望、趙一清、戴震本均改『為南』），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嶽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上有飛廉墓。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以多力見知。周王伐紂，兼殺惡來。飛廉先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壇于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

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于霍太山。」

霍太山即霍山，是赫赫有名的五嶽之一，在汾河的東邊。也是《水經注》說的，霍山之山有霍山廟，靈得很啊！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

《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是北魏人（?–527），他搜集的傳說，飛廉「助紂為虐」，竟得善終。這一故事與孟子所說「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恰恰相反，為什麼呢？這必然是趙人諱言其祖先在東方被殺的屈辱歷史，就將他們的祖先安排在山西，因為山西是趙人的大本營。而且飛廉的葬具都是上帝所賜，真是無比的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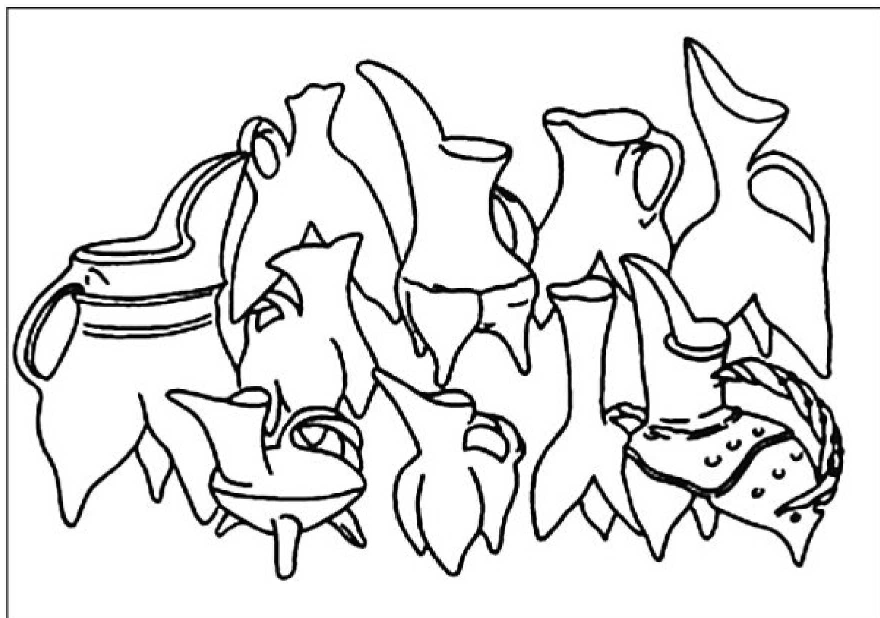
語言學家張永言說：「『飛廉』這個詞的內部形式是什麼，似乎還難以稽考。但是如果我們知道『飛廉』又是神話中最能奔馳的『風伯』，而『風』的前上古音正是『飛』、『廉』二字的合音，就可以推測『飛廉』當時形容此人能跑得像風一般快的綽號，詞的內部形式為『疾風』。」[6]這個推斷不準確。風和鳳相通，自甲骨文已然。飛廉為什麼跑得快（「善走」）？因為他就是鳥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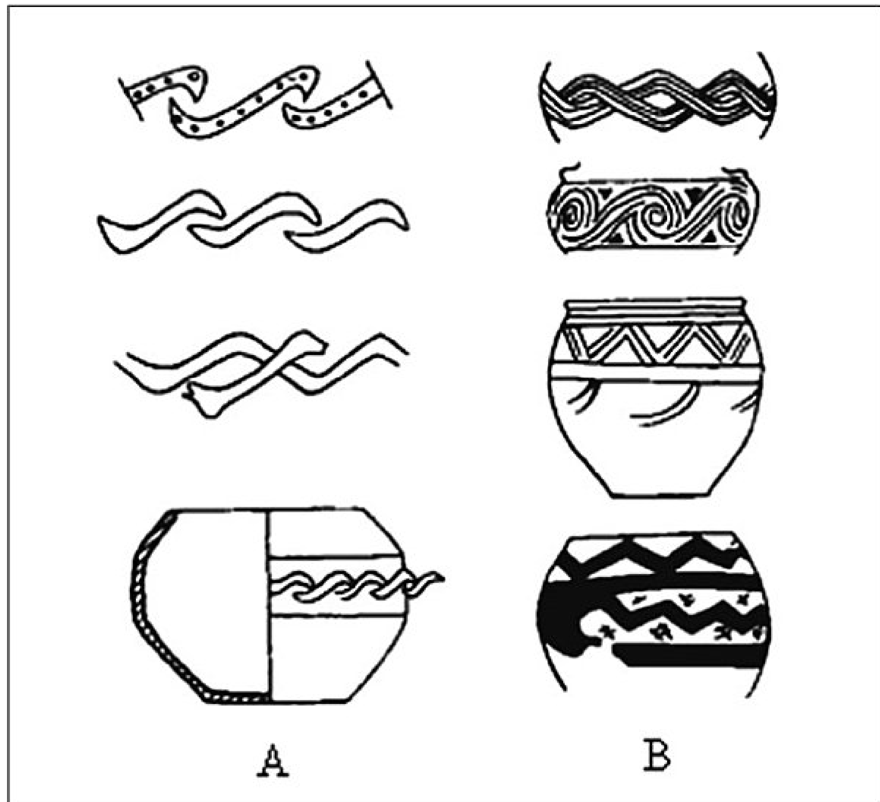
蜚廉又名為飛廉，為傳說中的風神。圖為漢代的蜚廉印章，蜚廉頭生雙腳，背生四翅，雙腿如鳥，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二）新石器時代的鳥夷族

成書於戰國（前第三世紀前期）的《尚書．禹貢》將天下分為九個州，即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其中冀州和揚州之下記載了兩處「島夷」，從版本源流研究，原本應該作「鳥夷」，是以鳥為圖騰的龐大部落，並非住在海島上。大汶口文化（4040–2240 BC）和良渚文化（3300–2200 BC）出土大量鳥形器物或豐富的鳥紋圖案[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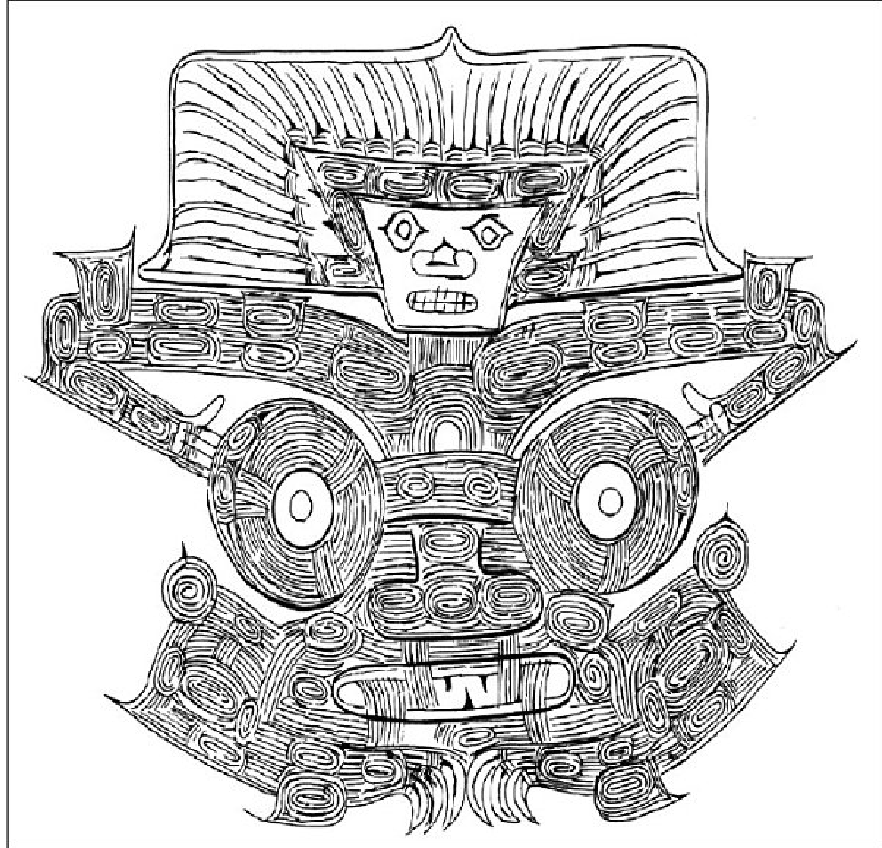


大汶口—龍山—良渚文化的鳥形陶器。



大汶口文化陶器紋飾。
A. 早期陶器上的刻劃紋。
B. 晚期的彩陶紋飾。

良渚文化以精美的玉器著稱。在沒有金屬工具的時代，良渚工匠在玉器上雕刻出複雜的紋飾。重達六點五公斤的反山「琮王」（M12：98），上面的紋飾被發掘者稱為「神徽」，底部有兩個三爪的鳥足（見下圖），表明良渚人崇拜的神就是鳥[8]。


反山「琮王」玉器上紋飾線圖。

紅山文化（4000–3000 BC）以發現於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後而得名，在內蒙古東部和遼寧省的遺址很多。遼寧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勾雲形玉器，其足部我主張是鳥的造型。遼寧東溝縣後窪遺址出土用滑石雕成的人像、人頭像三件。其中一件正面雕出人面像，背面刻一隻伏臥的鳥。已有學者指出這是象徵人鳥交合的形象，最富於圖騰特徵，後窪遺址的先民是以鳥為圖騰，也是以鳥為氏族成員的保護神。

類似的考古材料成千上萬，可以印證冀州鳥夷和揚州鳥夷的存在早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從環渤海到黃海、東海之濱以及大片內陸，都是鳥夷的活動範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權威石興邦先生指出，鳥崇拜和鳥生傳說，是中國東方沿海和東南地區、直至更遠些說，甚至是環太平洋地區的西北部的一個獨特的文化表徵，也是相當普遍的一種文化模式，其涵義可概括為三點：有關社會制度方面的圖騰崇拜；意識形態方面的巫術活動的靈物；與生產活動有關的祭禮犧牲或精靈。從地域而

言，東方和東北地區，以圖騰崇拜為主，部分精靈崇拜；山東半島和黃淮下游以圖騰崇拜為主；東南沿海及附近島嶼的稻作民族，卻與生產活動相聯繫的鳥的精靈崇拜密切。保護神的作用與生產活動中的精靈祭並行不悖，鳥生傳說與圖騰制度也緊密相連 。

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正好圍成一個龐大的鳥夷文化圈。古代神話相信，太陽裡有一種鳥叫三足烏，字面意思是三隻腳的鳥，當然不是普通的兩隻腳的鳥，而是神鳥。鳥崇拜和太陽崇拜就是這樣神奇地結合在一起[9]。

人類在自己的童年時代曾相信自己與許多動物有特殊的關係，鳥是其中的一種。古人把鳥作為獸的一種，見於《山海經》等書。傳統文獻有以鳥名官的記載，大家常引用《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的話：「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所謂扈，也是一種鳥。可見少昊氏族全以鳥為圖騰。這個龐大的鳥夷集團分出五鳥、五鳩、五雉、九扈等二十四個支族，分別以二十四種鳥為圖騰。郯的故城在今山東郯城縣西南，東方正是鳥夷族的大本營，古書籠統地稱為東夷。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羊部》在解釋「羌」這個民族之後，又比較了東夷：「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東方夷族的風俗是「仁」，仁有仁愛、生長等多種意思，難怪孔子在遭受人生挫折之後，幻想到東方去碰碰運氣。《後漢書．東夷列傳》也指出：「《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王制》是《禮記》中的一篇，《禮記》編纂於漢代。君子之國簡直就是共產主義社會，有一個標誌性的動物，那就是鳳凰。

鳳鳥是天下太平的象徵，在《山海經》出現多次。《山海經．海內經》：「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另外，《鶡冠子．度萬》也說：「鳳皇者，淳火之禽，陽之精也。」孔子曾經感歎：鳳鳥不來了，黃河裡不再

出圖了，大概我快完了吧。《說文解字．鳥部》：「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虎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這裡明確將鳳作為東方君子國的標誌，好比現在一提到熊貓就聯想到中國、一提到袋鼠就聯想到澳洲一樣。

《韓詩外傳》是西漢初年韓嬰一派解釋《詩經》的著作，今傳本已經不是原書的原貌。其中第八卷記黃帝即位，施行仁政，天下和平，但是鳳凰沒有出現，於是黃帝向天老諮詢，天老回答說：「夫鳳之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啄，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






「鳳」字在商代、周代到戰國時期的不同字形。

為什麼鳳凰難得一見呢？因為人類社會亂世多，治世少，千年等一回。古人很早就發出「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感歎，因為相傳只有黃河的水變清以後，天下才會太平。而實際上，人的壽命不可能等到這一天。

二帝三王是後世追溯中國文明開創時期而確認的前仆後繼的五大聖人。二帝指堯、舜，三王指夏國的締造者禹、商國的締造者湯、周國的締造者武王。堯舜二帝和湯王都是鳥夷族。

堯的兒子叫「丹朱」，又作「鴅鴸」，字形均從「鳥」，説明是崇拜鳥的民族。

《國語．魯語上》：「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契是商族

的實際祖先，十四世傳到湯，舜是商人的傳說祖先，因此「商人禘舜而祖契」。商族為鳥夷，他們的祖先舜當然也是鳥夷。

商族為鳥夷，最直接的證據就是《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族的先祖是契，有「玄王」的美譽。商族第七代首領叫王亥，他的名字也見於甲骨文，而且還點綴以鳥的形狀。

一九九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花園莊東地發掘出甲骨文，其中一字為「玄鳥」二字的合文。另外，著錄於《西清古鑒》十九．十四的傳世青銅器《玄鳥婦壺》，也載有「玄鳥」合文：
。

朝鮮半島韓民族的圖騰也是鳥，中國的史書記載很多，吉林省集安市還有好太王碑（414），本人為此寫了專著《동북아 민족문화의 재발견》（《東北亞民族文化的再發現》），已經在韓國出版。

建立大清國的滿洲人，按照他們自己的神話，也是卵生的，頑強地保留了鳥夷文化傳統，見《太祖武皇帝實錄》、《欽定滿洲源流考》和《皇清開國方略》諸書。

中國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這是因文字刻在龜甲或牛肩胛骨而得名，是殷人發明的，該稱為「殷字」，甲骨文也主要出土於殷人的老根據地安陽。在周人的發祥地周原（今陝西省岐山縣）也出土了甲骨文，其刻寫繫統與「殷字」一脈相承。周族雖然征服了殷族，建立西周（1027–771 BC），但不得不承認「惟殷先人，有冊有典」[10]，「殷字」想必是用來記錄殷族的語言，才能夠變成殷族的典冊。後世所謂「漢字」與「殷字」一脈相承，可見「漢字」絕非漢族的發明，應該正名為「殷字」。漢語追溯其源頭，可能是「殷語」。

鳥夷族的殷人發明了文字，意義非同小可。殷語在春秋時發展為「雅言」，因為在各國通行，被尊奉為「雅」，起著類似今天中國普通話交流的作用。秦始皇 「書同文」，對「殷字」進行了大整頓，秦族也是鳥夷族。此後日本、朝鮮和中國的交往，也採用殷字和「雅言」。殷字和「雅言」成為溝通東亞的紐帶，可以看成是東亞文化的「軟體」。

從歷史來看，鳥夷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從文化聖人的發明文字來看，鳥夷族是文明水準最高的。從龐大的支系來看，沒有其他民族能相提並論，鳥夷族的人口數量必然是最多的。鳥夷族叫玄鳥族可以，叫鳳凰族也可以，本書統一稱為「鳳族」。

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先生在比較中國和西方文明起源的

路徑時，提出中國文明的「早熟性」，指的是國家是進入文明的標誌，中國即使邁入國家的門檻，依然保留以前的氏族社會的血緣關係。而古希臘進入文明期就打破了血緣關係，屬於「正常」的文明。四夷因為相貌、語言等特徵太鮮明，反而最早形成「族類」，可以說也是「早熟」。比如匈奴，無論遊牧還是打仗，都是整個族群一起行動，容易形成一個民族。而同時代的秦、漢，就不可能這樣。近現代中國政治家和學者連篇累牘批判中國是一盤散沙，原因就在這裡。

（三）趙氏西遷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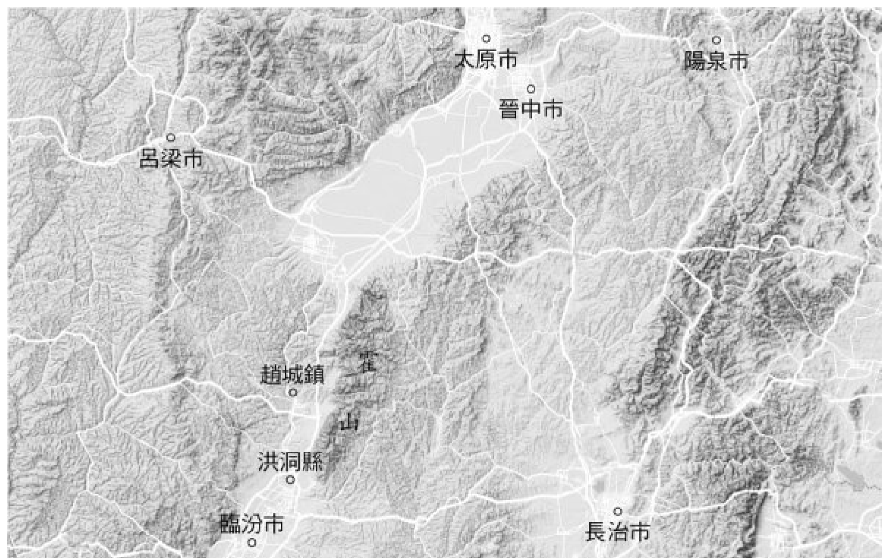
趙、秦、梁都是東方鳥夷民族，《春秋》和《左傳》裡都有地名「嬴」，古代屬泰山嬴縣。《春秋》裡還有地名「秦」，在魯國西境。西周建立以後，東方鳥夷諸族奮起反抗，周公東征，用了三年才鎮壓下去，趙、秦被迫西遷。

《史記．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晉獻公賜趙夙耿」。

趙人不愧是駕車世家，夏商周三代，都給國王駕車。趙氏的祖先造父，他為周穆王管馬和御車，親身參加了伐徐偃王之役，周穆王就以趙城封造父。《括地志》云：「趙城，今晉州趙城縣是，本彘縣地，後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今在臨汾市洪洞縣境。這是西周末期的事。

周幽王是西周的末代國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講的就是他。在西周行將滅亡之時，趙氏去晉國安了家。

西周建立之初，實行大分封，已經搶到手的地盤，如商國首都一帶，就建立衛國；沒有搶到手的，就鼓勵武裝殖民，去搶。至於能夠搶到多大的地盤，就要看各人的本事了。反正有周王室在背後撐腰，搶多少都是合法的。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兒子，指給他的地盤就是今天山西省的地方，這裡本來是戎、狄等族的聚居地，過去叫「唐」，上古大聖人堯，又叫「陶唐氏」。叔虞在這裡建立晉國，統治中心在今天的山西省南端。現在的山西省簡稱「晉」，就是這麼來的。



趙城鎮，在今山西省洪洞縣北端，東靠霍山，西鄰汾河。

西周因為首都在偏西的豐、鎬而得名，豐、鎬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至今還有一條灃河。西周遭受犬戎等西北異族的攻擊而滅亡，王室向東方逃竄，在洛陽重新立國，因為洛陽偏東，所以歷史上稱為東周（770–221 BC）。東周分春秋、戰國兩個階段。春秋（770–476 BC）階段，周王室還有一定權威，各國分封國經常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與異族開戰，尊王就是尊周王。到了戰國（475–221 BC）階段，周王室就徒有空名了。

春秋時期，晉國不幸發生內亂，公子重耳出逃到翟國，開始了流亡生涯，保駕的是趙衰。翟也就是狄，正是中國人用現在的少數民族觀念倒推回去的「少數民族」。翟國攻打廧咎如（「廧咎如」這類奇怪的名字顯然是用商字記錄異族的發音），俘獲了廧咎如兩個女子，翟國國王做主，將廧咎如的次女賞給重耳，長女賞給趙衰。趙氏在晉國權傾一時，其根源就在保駕之功。而且趙衰與重耳都娶了廧咎如之女，成了連襟。重耳後來回到晉國，登上國王的寶座，就是歷史上的晉文公（636–628 BC在位），晉國也在他手上壯大為春秋五霸之一。《史記．趙世家》說：「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也就在這個時候，「始建趙氏于晉國」。趙衰娶於廧咎如，可見趙氏血統一開始就不純。

趙氏作為晉國開國元勛，晉國每一次政治動盪，都波及到趙氏家族，著名的「趙氏孤兒」故事就是取材於春秋時期的趙氏。等到趙氏足夠強大，就與韓氏、魏氏架空了晉國，史稱「三家分晉」，此時是前三

七五年。前四〇三年，這三家派使者去見周威烈王，讓周天子把他們三家封為諸侯。周王室此時已經徒有虛名，周威烈王只好承認既成事實，封這三家為諸侯，實際上就是三個獨立國家。北宋司馬光認為三家分晉是禮崩樂壞的開端，是對君臣之禮的破壞，所以司馬光把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鑒》的開篇。現代史學一般以前四七五年作為戰國的開始。

趙國興起以後，西邊的強國是秦。趙武靈王即位後，聯合韓、魏攻秦，遭到慘敗，被秦軍斬首八萬，還丟失了一些國土。這次慘敗使趙武靈王痛定思痛，加上趙國周圍有中山、燕、胡、林胡、樓煩、秦、韓，對趙國虎視眈眈，趙武靈王於是決心向北方的遊牧民族學習，實行「變胡騎射」，變胡就是改穿胡族簡便的衣服，騎射就是訓練騎兵。古代的騎兵部隊相當於現代部隊的坦克。趙武靈王就運用這支騎兵，用了十多年時間，破林胡，滅樓煩、中山（今山西東北、河北西北），開拓疆土千餘里，趙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趙孝成王七年（260 BC），趙國出現了一位紙上談兵的趙括，導致長平之戰慘敗（長平在今山西省晉城高平市西北），趙軍四十萬被秦國坑殺，趙國由盛轉衰，最終被秦國滅了。

（四）宋對趙氏、聖益的追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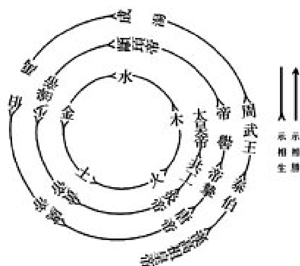
前二二八年，秦國俘獲趙王遷，標志著趙國滅亡。趙公子嘉出奔代，自立為代王，於前二二二年被俘虜，趙國徹底滅亡。趙國存在了二百八十一年。

哪知一一八三年後，趙氏再次鹹魚翻身。後周（951–960）的武將趙匡胤發動兵變，建立了宋國，時為九六〇年。

趙匡胤祖籍涿州，出生於洛陽。趙匡胤的爺爺當過營州、薊州、涿州三地刺史。此前，涿州有一個賣草鞋的名人──劉備，《三國演義》把他形容為血統高貴的劉皇叔。趙匡胤的父親是後周的軍官，執掌禁軍。由此看來，趙匡胤的家世不算特別顯赫，但總比劉邦強很多。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連劉邦父母的名字都寫不出來，這是多麼尷尬的事情啊！劉邦出身底層，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先生直接斥之為下等流氓。劉邦公然把儒生的帽子扒下來撒尿，的確是痞子一類的傢伙。

從秦到宋，官方論證國家合法性的理論，叫「五德終始說」，五德就是五行，終始是循環往復地運行的意思。在商、周兩國，國王聲稱他們得到了天命，因而得以建立國家，天命就是他們的政權合法性理論。

到了戰國末年，齊國空想家鄒衍發明「五德終始說」。按照這種理論，黃帝以來的帝王之所以興起，都是得到了木、火、土、金、水五德中的某一德。秦國建立，自居水德，第一個將鄒衍的空想變成了現實。西漢初年，沿用秦國的水德。文帝時賈誼提出漢國應當是土德，因為人微言輕，沒有被朝廷採納。後來，為了解決劉邦出身卑微的問題，「漢為堯後」的呼聲日益高漲，漢昭帝時偽造了「漢為堯後」的說法，劉氏的祖先上溯到堯舜禹三大聖人之首。在五德終始體系裡，堯是火德。漢作為堯的繼承人，也不得不是火德了。顧頡剛先生曾經圖示炎帝－堯－漢高祖的火德如下[11]：



帝王對應的五德。

五行說本來有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勝兩個系統，後來五行相生占了上風。五行如何相生呢？隋國蕭吉《五行大義》引用東漢的《白虎通》（白虎是皇宮的名字），這樣解釋：為什麼說木生火？因為木性溫，暖伏其中，鑽灼木頭的時候，火就出來了。為什麼說火生土？因為火熱能夠燃燒木頭，木頭燃燒之後變成灰，灰即土，因此說火生土。為什麼說土生金？因為金在石頭裡面，依山津潤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所以說土生金。為什麼說金生水？因為少陰之氣溫潤流澤，金融化之後變成水。為什麼說水生木？因水潤而生，所以說水生木。

這樣的解釋可以說令人哭笑不得。因為五行的金、木、水、火、土都是抽象的，難以用具體的物質解說。好比你屬豬，這個「豬」是抽象的，不能因為你屬豬，就推論你豬裡豬氣，特別能吃等特點。假如我屬蛇，你也不能據此說我心如蛇蠍。然而古人就是要用抽象的五行，解釋具體的王朝。

宋國建立的時候，因為趙匡胤是接受後周的禪讓，按照五德終始說，周是木德；再按照五行相生說，木生火，因此，宋只能是火德，可

以說是「命中注定」，不能更改。宋國也確實如此操作，祭祀赤帝，赤象徵火。這樣對付了二十五年之久。

宋太宗是宋國第二個皇帝，趙匡胤的兄弟。雍熙元年（984），不同聲音出現了。平民趙垂慶上書，主張宋是金德，也就是宋越過五代，直接繼承唐的金德。尚書省討論趙垂慶的提議，都持反對態度。理由之一是五德運轉，間不容髮，怎麼能超過好幾個國家，繼承百年之前的德運呢？再說之前的王朝也有類似已經失敗的例子。

這個失敗的例子指的是唐玄宗天寶九年（750）時，崔昌獻議：「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他提議大唐應該遠繼漢統，立周、漢兩朝的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三恪」是古代征服者不將被征服者趕盡殺絕，反而封賞他們，給一塊地方讓他們保持以前的傳統，如擁有自己的正朔（時間）、自己的旗幟等等。唐玄宗的朝臣就此討論，一半贊同一半反對。最後集賢學士衛包和李林甫採納了這個建議。但是李林甫卒後，政府再一次以魏、周、隋三朝的後代為三恪，也就是承認魏、周、隋三朝的正統地位，否定了崔昌的提議，崔昌、衛包都被貶到遠方。

天禧四年（1020）五月，光祿寺丞謝絳與大理寺丞董行父又上書，請重議德運。唐國是土德，這是已經確定的，不同的是，謝絳主張唐國的土德仍未中斷，大宋加以繼承，應該繼續土德，也就是主張宋為土德；更何況黃帝為土德也是確定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真宗（宋國第三位皇帝）追崇神人趙玄朗為始祖，尊號「聖祖」，謂其為軒轅黃帝降生，於是黃帝成為趙室的聖祖，這就增加了大宋為土德的分量。黃帝為軒轅，出自《山海經》。

董行父則認為，根據三統說（黑統、白統、赤統，分別對應夏、商、周等朝代），唐續漢為地統。根據五行相生說，唐為土德，土以生金，宋當然是金德。因此，他勸皇帝順應天意，彰明統緒，「顯黃帝之嫡緒，章聖益之丕烈」。這是《宋會要》的記載。《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其事而未及「彰聖益之丕烈」數字。我讀的是《宋史》卷七十《律曆志三》，查中華書局版《宋史》第五冊第一千六百頁，「聖益」作「聖祖」。我請教著名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承先生指點：趙姓起源，一說出於伯益（即嬴秦始祖），宋人所知，故云「彰聖益之丕烈」；元人修《宋史》，或不明其義，又因真宗時崇趙玄朗，以為「聖益」為「聖祖」之誤，徑改之，反而致誤。元史官草率，一般說，應是摘抄宋三朝

國史，說抄錄並改會要文字，缺乏依據。按校勘規則，《宋史》和《會要》可互出異同校，不改字。

我感覺作「聖益」意義更勝。如果按《宋史》「顯黃帝之嫡緒，章聖祖之丕烈」（凸顯我們大宋是黃帝的真傳，表彰聖祖益的豐功偉績），聖祖指黃帝，與前面一句的「黃帝」豈不重複了嗎？「益」這輩古人直到《孟子》、《尚書》還有記載，後世早已忘記，沒想到時來運轉，宋國還將它翻出來，董行父後面還提議，國家應該「冊聖益以帝稱，郊祀黃帝以配天。太祖作主以侑神，宗祀聖益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前益只是給帝舜打下手管理林業，現在要提高到「帝」的帝位。「帝」不是皇帝，是比皇帝還尊貴的聖王，通常專指帝堯和帝舜兩國大聖人。

董行父還真是歪打正著，益確實是趙氏的老祖宗。而且在歷史上，益被抬高到這樣的高度，是唯一的一次。

至於趙氏與黃帝的關係，完全不可信，見本書以後的章節。

尊崇黃帝、聖益之後，董行父還提議，「然後封造父以王爵，建原廟於趙城，祀白帝於西畤，表福地於雍京。」造父是趙氏祖先，周穆王時人，相當於西周末期。「始建趙氏於晉國」的關鍵人物趙衰，他在「原」這個地方當過大夫，「原」在趙城，可以說是趙氏的發祥地，當然要建廟。趙氏從東方遷徙到西方，在汾水流域扎根之後，逐漸淡忘了東方故土。在五行體系裡面，金對應的方位是西方。在《禹貢》九州體系裡，陝西及以西屬雍州。趙氏的同理連枝秦人，大本營就在雍州。

以上董行父追溯的皇家趙氏與先秦趙氏的關係都很牽強。但民族的形成在於認同，宋朝的趙氏尋根到先秦趙氏，也無不可。本書第四章還要講趙宋與胡族的關係。

（五）趙氏輓歌

一個人的民族屬性是否終身不會變？宋恭帝趙□可以說是一個個案。一二七四年，宋度宗因酒色過度而死，趙□即位，年僅四歲。不到兩年，宋廷就投降了蒙古人。宋室江山是太祖趙匡胤從後周柴氏孤兒寡母手中奪得，最後又失於孤兒寡母之手。後人寫詩譏諷道：當日陳橋驛里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

這是明人筆記《識小錄》記載的孽報故事。陳橋驛在開封市東北陳橋鎮，過去屬封丘縣。一九八六年，封丘縣在陳橋立了個「宋太祖黃袍

加身處」碑。後周滅亡時，年號是「顯德」。宋恭帝的名字是繁體字「顯」的半邊，年號是「德佑」，加起來也有「顯德」二字，難怪滅亡，真是報應。這是事後諸葛亮的解釋。

趙□被元國政府封為瀛國公。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世祖忽必烈賞給十九歲的趙□許多錢財，讓他去西藏學佛。在漢人眼裡，這當然是苦差事。可是在有信仰人的眼裡，這是人生最好的歸宿。趙□在著名的薩迦寺出家，法號和尊。在格魯派興起之前，薩迦派是藏傳佛教最重要的派別，給忽必烈灌頂的八思巴就是薩迦派，受封為國師、帝師。趙□學會了藏文之後，將《百法明門論》、《因明入正理論》這兩部漢傳佛教著作翻譯為藏文，他還擔任過薩迦大寺的總持，終於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佛祖歷代通載》有這一句：「至治三年（1323）四月賜瀛國公合尊死於河西詔僧儒金書藏經。」多數人因此認為瀛國公是英宗至治三年被賜死於河西的。但「賜瀛國公」也可以理解為一句，獨立成義，那麼他就不是被賜死的。五十四歲的他終於解脫了。算下來，他在西藏定居了三十五年，其間再也沒有踏入中原。特別是從十九歲出家算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還是漢族嗎？


宋恭帝趙㬎，三歲時即位，五歲時於臨安（杭州）降元。

（六）其他民族的趙姓

歷史上賜姓的例子，數不勝數。統治者賜予異族皇家姓，表示嘉獎和寵幸。例如宋太祖賜黨項人李繼捧姓名曰趙保忠，賜李繼遷姓名曰趙保吉。李繼遷的孫子李元昊最初接受賜姓趙，後來與宋國關係惡化，恢復李姓。附帶說，李姓的人口在中國排數一數二，成分也很雜，其中很多不是漢族，李元昊家族就是很好的例子。前面已經指出，巴人李特將巴國復國，建立成漢這個獨立國家，李姓也是土家族大姓。

秦國末年，趙佗在今廣東一帶建立獨立王國—南越國。按照漢族形成於漢國的說法（反駁見本書第四章），趙佗不可能是漢族。

對於土家族這樣的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來說，土家族採用趙姓無非是用一個讀音差不多的漢字去記土家語的發言。同理，翻譯異族的時候也會出現趙姓。這些趙姓顯然都不是漢族。例如朝鮮在明國以前官方使用漢字，朝鮮的趙姓當然不屬於漢族。據徐鐵生編著的《中華姓氏源

流大辭典》[12]，使用趙姓的還有以下民族：匈奴、叟族、羌族、氐族、牂牁蠻（苗族先民）、廣源州蠻（壯族先民）、宇文氏、遼人、吐蕃、女真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彝族、壯族、布依族、朝鮮族、滿族、侗族、瑤族、白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台灣平埔族、東鄉族、納西族、景頗族、仫佬族、仡佬族、錫伯族、阿昌族、鄂倫春族、俄羅斯族、德昂族，還包括猶太人。

附帶說，「回歸以色列」至今共幫助了十九位河南開封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由於中國官方承認的五十六個民族沒有猶太人，這十九位開封人在移民之前，身分證上肯定寫的漢族。這再次說明在「漢族」名下，有多少人根本不是漢族！

（七）結語

本節以趙姓為例，說明趙姓並非都是漢族。由於篇幅有限，我們還只分析了「趙」這一個姓。如果按照這個辦法分析所有的姓，一定可以離析出海量的人群不是漢族。

具體就趙姓而論：

（一）真心相信國學的，仍然是漢族。本書第七章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說國學是漢族的，國學的核心是儒家思想，那麼不信仰國學的就不是漢族。

（二）九千萬中共黨員肯定有姓趙的，當過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1919–2005）就姓趙。黨員屬於紅族，理由見第七章。

（三）有宗教信仰的，大可不必留在漢族裡面，因為國學畢竟不是宗教。這群人可以另立新族，也可以認同別的民族。甚至可以自行宣布是教民，不屬於任何民族。

（四）除了以上三大人群，剩餘的可以成為「鳳族」的一部分。偉大的鳳族自古以來以「仁」著稱，具備與普世價值對接點。如果發揚優秀的民族傳統，不僅把自己尿遍全世界、偷遍全世界、全世界鑽空子、永遠不願排隊的中國人區別開來，而且還可以帶領其他民族建設文明的東方君子國。本人作為土家族，對鳳族抱有最大的期待。

肆漢族不需要識別嗎？

共產黨中國一成立，就開始了民族識別。這一政府行為，目的是識

別少數民族，漢族自認為是多數民族，是中國的主體，根本不需要識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之初，學術界討論了五個重大問題，借用電影的名字，稱為「五朵金花」，它們是：中國歷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和漢民族形成。前面四個問題持續討論的時間很長，只有關於漢民族形成的討論曇花一現。關於漢民族形成於何時，有的主張在秦、漢，有的主張在唐、宋，有的主張在明末清初，有的主張在鴉片戰爭以後，莫衷一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編輯部將一些討論文章結集為《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一九五七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也就是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官方對漢族的界定還沒有定黑白於一尊。

然而，中國的一切民族問題，都起源於這個自認為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主體民族—漢族。民族大混亂發生於辛亥革命前，距今不過百年出頭。當時的口頭禪「四萬萬皇漢民族」，好似一道魔咒，構成現今漢族人口的依據。「四萬萬皇漢民族」自己製造的祖先是來自巴比倫的征服者—黃帝。

那是一個復仇光榮、造反有理的時代，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尤其是造反派都以「革命」自居，占領道德高地，一切反對派都是反革命，不僅要從肉體上消滅，還要從思想上斬草除根。

「四萬萬皇漢民族」及其祖先黃帝，是認識中國民族問題的鎖鑰。這不過是百年前的事情，但真相已經被遺忘。

---

1. 由於摩梭人保留走婚習俗，竟然吸引了內地大批漢族流氓前來，準備占摩梭女人的便宜。↩
2. 呂子方，《中國科學技術史論文集》，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自然辯證法研究室整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3. 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蒙文通（1894–1968），四川鹽亭人，歷史學家和經學家。在先秦史、民族史、思想史等領域有較大成就。文革時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在牛棚裡寫作《越史叢考》。一九六八年被迫害致死。在古史研究方面，他提出海岱、河洛和江漢三個系統，在近代中國最早提出多元論。在思想史方面，他提出存在以孟子為宗合六經的鄒魯、以韓非為宗合《竹書紀年》的三晉和以屈原為宗合《山海經》的南方三個流派。在歷史觀方面，他提出「大勢變遷論」。在民族史方面，他嚴密考證了楚、越不同

祖的結論，駁斥了越南學術界的「越族江南說」。↩

4. 任乃強，〈說鹽〉，《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五二至五九。↩
5. 政法委是中共對中國各級司法機構進行領導的黨內機構，職能是指導、協調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等司法部門的工作，屬於中共控制國家司法的工具。↩
6. 張永言，〈關於詞的內部形式〉，《語文學論集》，語文出版社，1992年，頁一三六至一四七。↩
7. 石興邦，〈我國東方沿海和東南地區古代文化中鳥類圖像與鳥祖崇拜的有關問題〉，《古史考》第六卷，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工作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9. 石興邦，〈我國東方沿海和東南地區古代文化中鳥類圖像與鳥祖崇拜的有關問題〉。↩
10. 《尚書．多士》。↩
11.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二六五。↩
12. 徐鐵生，《中華姓氏源流大辭典》，中華書局，二〇一四年，頁七二五至七二七。↩

第貳章

以革命的名義偽造：皇漢民族的祖先是來自巴比倫征服者黃帝



軒轅黃帝，傳說中上古時代人物，為《史記》中的五帝之首，目前最早明確記載黃帝的文獻始於戰國時期。中國歷代皇帝多為黃帝設廟祭陵等以取得象徵的統治正當性，清末民初時則被革命黨人建構為中華民族的血親祖先。

前一〇二七年，發祥於西部渭水流域的周國，率領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聯軍向東挺進，攻入商國首都朝歌（今河南省淇縣），一舉消滅東方土著商國，建立起新的周國，因為首都在偏西的豐、鎬（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後世稱之為「西周」，以別於以洛陽為首都的東周。

周人把搶來的土地分封給王室貴族和他們的姻親。這些分封國結為同盟，以「諸夏」、「華夏」、「中國」自居，稱呼異族為「夷」。像這樣區分中國和蠻夷，有一個專門的詞，叫「夷夏之辨」，夷是四夷，包括戎狄蠻夷，夏是中國。

東周分春秋和戰國兩個階段，周王室在春秋時期已經「不絕如線」，齊桓公就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成為春秋五霸的第一霸主。「尊王」是尊周王室，以其為中國集團名義上的盟主；「攘夷」是打擊四夷，就是打擊中國集團以外的所有民族。但是，這樣的「高等」中國人只限於受封的貴族，數量一定很少。但從此成為中國文化誇大妄想狂的資本，那就是住在中原的平民百姓也自認為高人一等。

從春秋時代開始，每當異族和他們雜居，甚至異族入侵中國，各種夷夏之辨、正統之爭就如火山爆發。到了清末，造反的自稱「革命黨」，把這種誇大妄想狂發展到極致。因為這是繼蒙古人征服中國之後，滿洲人再次征服中國，而且是聯合蒙古人征服中國。如何才能擺脫異族的殖民統治？革命黨一方面連篇累牘地宣傳滿族是「犬羊賤種」，同時自吹自擂，標榜自己是先進的「皇漢民族」，還拉扯黃帝作祖先，因此又自稱「黃族」。這樣的皇漢民族有四億人之多，肯定能消滅五百萬人的滿洲殖民者。

一九〇七年，親眼目睹了排滿之狂熱的楊度，與梁啟超通信時感歎道：「此『排滿革命』四字，所以應於社會程度，而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也。」[1]當時楊度點出了這種不可思議的集體狂歡狀態。由排滿還產生了一門職業，從事此一職業的有一個高尚的名字──「革命家」。

據現存的文獻記載，我們可以試著揭露將中國人定調為以漢族為主的論述，是如何一步一步展開的。

壹黃人與黃帝

清國末年，知識界對種族的概念很模糊，簡單地把黃種與亞洲等同，把白種與歐洲等同。白種、黃種是優等民族，棕種、黑種是劣等民族。革命黨張口閉口自稱「黃人」[2]，認為黃人雖然沒有白人優秀，但總比黑種人優秀，也比滿洲之類的韃虜要文明。日本學者對此深有研究，如阪元弘子的《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觀．博覽會事件》，石川禎浩的《近代東アジア「文明圈」の成立とその共通言語──

梁啟超における「人種」を中心に》。

薛福成（1838–1894）當過駐外公使，是少數見過世面的大清人。他經過香港以後，歷觀西貢、新加坡、錫蘭島諸埠，這些地方雖然經過洋人的墾闢經營，貨物堆積如山，可是那些土民皆形狀醜陋，與鹿豬無異，顯得仍然沒有開化。越南、緬甸、印度、巫來由（馬來人）、阿剌伯各種之人，無不面目黝黑，短小粗蠢，回過頭來看中國人民之文秀，與歐洲各國之白皙魁健者，真是天壤之別。薛福成沒有想到的是，香港、印度、馬來西亞這些英國的殖民地，逐漸納入普世價值文化體系，人人享有投票權，香港還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而文秀的中國人民創造了世界最大盜版國，實在把美國盜瘋了，才發生貿易戰。

康有為（1858–1927）算得上清末第一流頭腦。他在《大同書》提出改良人種的方案，那就是獎勵優等民族與劣等民族雜交。凡是男子能與棕、黑人女子交，女子能與棕、黑人男子交者，都要特別地加以表彰，頒發徽章，徽章上大書「改良人種」四個大字。康有為認為，千數百年之後，棕、黑人遺種不會很多了，遍布大地的都是黃白之種。康有為也知道優等民族與劣等民族「雜婚」很難，白人和黃人才能、形狀相去不遠，可以平等。但是，「黑人之形狀，鐵面銀牙，斜頷若猪，直視若牛，滿胸長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要窈窕白女與之相親，同等同食，確實太難了。

怎麼辦呢？那也沒關係，還有根除黑人的辦法，康有為稱為「沙汰之法」，具體是用藥物以絕其種，防止繁衍。等到棕、黑種淘汰得差不多，黃種也進化為白種，世界就進入大同了。反之，種界不除，大同不至[3]。

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1873–1929）認為，主張黃種人不僅可以步白種人的後塵殖民美洲、澳洲，而且有可能征服歐洲。難怪現在這麼多中國人要解放全人類，基因好，文化傳統好。在中國的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諸如此類的表述：「連非洲人都不隨地吐痰，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做不到呢？我們可是優等民族啊。」

二〇一九年七月，山東大學為非洲留學生安排異性學伴的事件發酵，高等的黃種人竟然伺候低等的黑種人，再次刺痛了愛國人士的玻璃心。中國人至今不願承認人類都是起源於非洲，自認為高等的黃種人不應該起源於低等的黑種人，是重要的原因。

既然人種各有不同，必然會相互競爭。此時進化論在清國風行一

時，排滿家因而熱烈討論「種戰」，「種戰」大部分的語境等於說民族競爭。一九〇五年，天才青年宣傳家陳天華（1875–1905）所著《獅子吼》在《民報》連載，對「種戰」有一個很好的通俗解釋；這篇小說自稱「新中國之少年」，說是看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所著《天演論》，明白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大道理。人與人相互競爭，弱的敵不過強的，便想聯合伙伴；聯合他人，又不如聯合自己一族。於是把同祖先同姓氏的人叫做「同種」。把那不同祖先不同姓氏的人叫做「異種」。對於同種的人相親相愛，對於異種的人相賊相惡。

革命黨既然認定滿洲人是劣等民族，當然要宣傳漢族是高等民族，是黃種人裡的高等民族。既然漢族是黃種人，能不能找到一個與「黃」字沾邊的祖宗呢？

貳英國人拉庫伯里送來黃帝西來說

巧得很，此時，英國人拉庫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提出的黃帝來自巴比倫的西來說傳入日本。躲在日本的清國落魄文人看到日本的雜誌介紹老外的「西來說」，就如獲至寶，像抽了鴉片一樣興奮，迫不及待地販賣到國內，風靡一時，「黃帝」重新進入漢族的視野。

中國人從小被教育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現在也可以說：支那亡命一聲尖叫，給四萬萬中國人送來了巴比倫祖宗，而且是出口轉內銷。

拉庫伯里家族是康瓦爾人（Cornish people），這個已經消亡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今天英國東南的康瓦爾（Cornwall）。在十七世紀英國內戰時，拉庫伯里家族移民到法國諾曼第。他的父親是個商人，拉庫伯里在香港生活多年，對中國文明產生興趣。他於一八六七年開始發表著作，後來他的興趣轉移到巴比倫碑銘，以及中國文字與阿卡德（Akkadian）象形文字的相似性。一八七九年，他三十四歲，來到倫敦，成為皇家亞洲學會會員。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是《早期中國文明》（*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出版於一八八〇年。該書提出，漢語裡，「Hoang–ti」的最早讀音為「Kon–ti」，根據中國的歷史傳說，黃帝家族姓「Nai」（原本為Nan或Nak），來源於「Nakkon–

ti」，黃帝的名字與古埃蘭語（Elamite）文本中作為諸神之首的「Nakhunta」或「Nakhunte」之間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他發表了幾篇論文，認為最早的中國人的語言與阿卡德語最具可比性。他稱最早的中國人為「巴克部落」（Bak Tribes），發祥於美索不達米亞，也就是兩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這時，他還研究《周易》。一八八四年，他成為倫敦大學學院的印度 - 中國語言學教授。他還研究過中國錢幣。法國授予他一系列榮譽。一八九四年，拉庫伯里在《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一書中，進一步發揮了十多年前的觀點：前二二八二年，兩河流域的國王尼科黃特（Nakhunte）率領巴克部落從迦勒底亞出發，向東方遷徙，翻越崑崙山，輾轉來到中國西北部的黃河上游。此後，巴克族四處擴張，最終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基礎。巴克族為「百姓」（Bak Sing）轉音。這樣，被中國史書奉為文明初祖的黃帝原來裔出巴比倫，漢人的祖先原來是巴比倫人。這就是中國文明源於巴比倫的「西來說」。



提出「黃帝西來說」的東方學者拉庫伯里。

拉庫伯里提出的泛巴比倫說在歐洲沒有找到知音。歐洲中國學的大本營《通報》（*T'oung Pao*），還發表了批評拉庫伯里的論文。一八八六年，日本三宅米吉（1860–1929）赴英國留學，接觸到拉庫伯里的雜誌。他回國後，於一八九六年在《史學雜誌》上發表了《拉庫伯里關於支那古代開化起源之學說》（ラクウペリ氏が支那古代の開化の起源に就ての說）一文，詳細介紹了拉庫伯里「西來說」。 另有兩位日本業餘歷史學者白河次郎和國府種德，將拉庫伯里的泛巴比倫說吸收到《支那文明史》一書。此書一九〇三年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立即給排滿鬥士注入了興奮劑，像梁啟超、章太炎、黃節、蔣觀雲、劉師培、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無不如獲至寶。以下僅僅列舉三個人的說法。

蔣觀雲《中國人種考》：我種人於上古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車未興而超越千萬里高山、崩峕、沙漠出沒之長道，以開東方大國，是則我祖若宗志氣之偉大、性質之勇敢為何如。而其事業之雄奇又直為他人種之所無，足以鼓舞我後人之氣概者，抑又何如也。（《新民叢報》，第37期，1903年。）

吳銳按：「我種人」相當於革命黨掛在嘴邊的「皇漢民族」。「千萬里高山」必然包括皇漢民族之祖先黃帝來自的帕米爾高原。

劉師培《論中國對外思想之變遷》：蓋漢族入中國之初，處支那本部者為苗族。卒以民族競爭、優勝劣敗，四百州之山河遂悉舉而入漢族之手，則漢族經營中國之功，豈可一日忘耶。中國者，漢族之中國也。（《警鐘日報》，1904年6月20日。）

吳銳按：使用「支那本部」的不僅僅是劉師培一個人，後來國民黨的御用史學家指控「支那本部」是含有分裂中國的企圖，真是數典忘祖。劉師培承認支那本部的原住民是苗族，也承認漢族是外來征服者。只是經過了漢族的征服，中國才變成漢族的中國。

陶成章：西洋歷史中名譽赫赫之摩西，稱其率以色列族出埃及，建猶太國，為不可及之事。然夷考其績，徘徊四百一十年，卒不越紅海之濱，以視乎我祖之由西亞以達中亞，復由中亞以達東亞，逾絕大之高

嶺，渡絕大之沙漠者，其相去果何啻天壤哉。且我族祖先，非僅冒險遠略之毅力，為世所不可幾及也。其戰鬥之能力，亦舉世莫能尚。（《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1904年。）

吳銳按：「逾絕大之高嶺」指的是皇漢民族的祖先黃帝逾越帕米爾高原，不遠萬里，征服中國。和劉師培一樣，陶成章還特別強調，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什麼是中國人呢？就是漢人。中國歷史就是漢人的歷史。

蔣觀雲、劉師培、陶成章都到過日本，蔣智由和陶成章均為浙江省老鄉，東渡日本期間交往尤其親密。大抵可以看出他們相互影響的脈絡。以下是革命黨喉舌《民報》刊登的黃帝像。



清末刊物《民報》上的黃帝像。

一九〇三年，江蘇同鄉會主辦的《江蘇》雜誌刊載黃帝像，題辭如下：「帝作五兵，揮斥百族，時維我祖，我膺是服；億兆孫子，皇祖式滋，我疆我理，誓死復之。」

一九〇三年，軍國民教育會宣告成立，會員徽章的正面鐫黃帝像，背面小字為「帝作五兵，揮斥百族，時惟我祖，我膺是服」。（黃帝發明了兵器，征服眾多民族。佩服啊佩服，我們的祖先。）

一九〇三年，青年魯迅在東京寫了一首七言絕句，題贈許壽裳，詩曰：「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在中共建國之後升格為無產階級文化旗手，這首詩或被收入課

本，或被別人引用稱讚，每個「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小孩子都會背這首詩，筆者小時候在窮鄉僻壤也不例外。

一九〇四年，林懈以「白話道人」的筆名在《中國白話報》連載《國民意見書》，說：「原來我們中國漢種從前是住在西方帕米爾地方，崑崙山下。大家住在一塊，因起個混名，叫做『巴枯遜』民族。後來黃帝帶了許多子孫移居中國，這些民族還是叫做『巴枯遜』。」[4]

一九〇四年，梁啟超應亞雅音樂會之請，撰作《黃帝》樂曲四章，其第三章詞曰： 巍巍我祖名軒轅，明德一何遠。手辟亞洲第一國，布地金盈寸。山河錦繡爛其明，處處皆遺念。嗟我子孫！保持勿墜乃祖之光榮。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創刊號扉頁印的是黃帝像，稱為「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偉人黃帝」，圖像下注明：「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

一九〇五年，陳天華在《猛回頭》裡把黃帝喚作「始祖公公」，盼望他「給漢種速降下英雄」，擺脫滿族的統治：哭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叫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靈，能不憂恫？……哭一聲我的同胞兄弟，我和你都是一家骨肉，為什麼不相認，忘著所生，替他人殘同種？[5]

一九〇五年，宋教仁計劃採集黃帝以迄有明五千年間漢族對外史事，撰述《漢族侵略史》，第一篇發表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該文歌頌黃帝及其漢族東征西討的戰功，歌頌漢族的排外主義，準備連載，但後來沒有下文。附帶說，《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卷前所附黃帝的圖像，黃帝身披介胄，手執斧戟，完全是武裝殖民的帶頭大哥形象。



全身戎裝的黃帝像。

一九〇七年，鐵郎發表《論各省宜速響應湘贛革命家》，號召萬眾一心，同德協力，共逐白山之獸，追還我黃帝之魂[6]。白山之獸，指發源於長白山的畜生──滿洲。

一九〇七年，署名為「真」者，發表《祖宗革命》，引用某君在《民報》十號對黃帝的讚美：「以皇祖軒轅之靈，洋溢八表……白日有滅，星球有盡，種族神靈，遠大無極，敢昭告於爾丕顯皇祖軒轅，列祖金天、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漢、新、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聖帝，相我子孫，宣揚國光……我皇祖亦永有依歸。」[7]文中「某君」就是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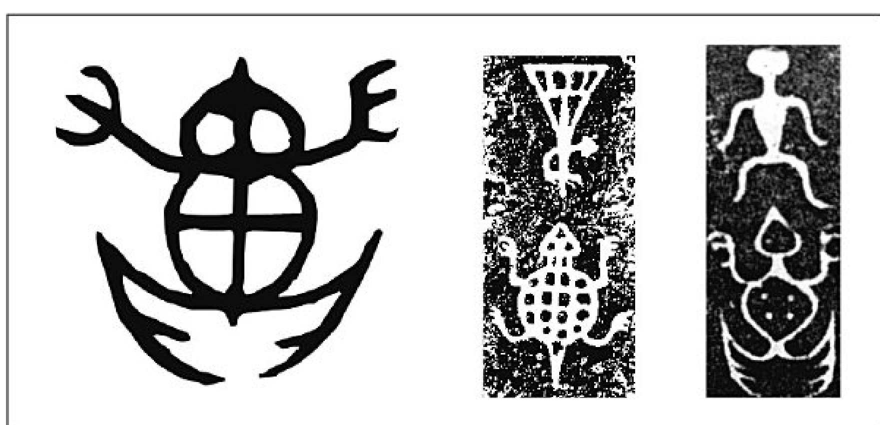
太炎。即使太陽滅了，星球完了，皇漢民族祖先軒轅黃帝的神靈也還在。這是排滿神學！金天、高陽、高辛都是傳說人物，陶唐是堯，有虞是舜。

一九〇七年，署名為「民」者，討論民族、民權、社三個主義的異同，他說：「漢人之鼻祖，據今言民族主義者，推為軒轅。」[8]可見黃帝為漢族祖先之說已經取得統治地位。金馬《雲南討滿洲檄》也說：「我雲南人民，本黃帝神靈之胄貴，為明代大勳閥之子孫。」雲南在元帝國時才納入中國版圖，此時也爭先恐後地去抱黃帝的大腿。

黃帝既然來自巴比倫，他要打仗，當然不可能是孤家寡人。認黃帝為祖宗，等於認為中國的人種都是西來的。這不是一般的人種，這是一個注定要主宰中國的高等人種。

不僅人種西來，祖宗西來，文化也西來。一九二八年，郭沫若（1892–1978）沿著清末革命黨的足跡，從中國跑到日本。他是個有政治野心的人，從抗戰直至共產黨新中國建立初期，前後有三十年光景一貫以黨外民主人士的身分出現，實際上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亡命日本是他的潛伏期，此時孤掌難鳴，只好老老實實以研究古文字打發時光。一九二九年寫成《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一九三二年由日本文求堂出版。公正地說，這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不過，此書仍然留有排滿運動的痕跡。

商周青銅器有一類帶「黽」字的銘文，明顯是烏龜的象形，在此字基礎上又有多種複雜的變化，如西周早期《獻侯鼎》銘文：「隹成王大，才（在）宗周，商（賞）獻侯顯貝，用乍（作）丁侯尊彝。。」大意是說，西周的成王（武王之子）在都城（宗周）舉行典禮，賞賜獻侯，獻侯引以為榮，就製造了一個銅鼎紀念。此引文末尾像蓋章一樣有一個字形，這種格式的文字，古文字學家稱之為族徽，和圖騰差不多意思。這個字的下半部分，好幾個古文字學名家說是「黽」，不是「龜」。



周代青銅器上金文，「黿」字的各種變化。

筆者曾到台灣故宮博物院觀賞此器，銘文最後的族徽清晰可見。郭沫若將此字釋為「天黿」，認為就是「軒轅」，也就是黃帝。天黿在古書裡有記載，最有名的是《國語．周語下》這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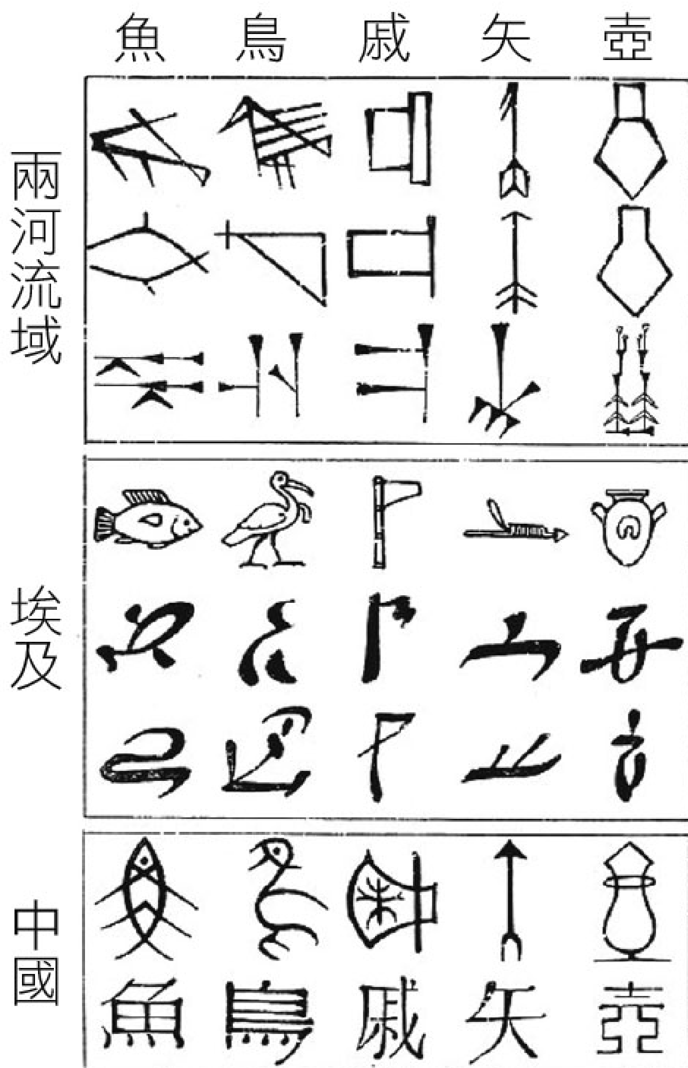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

「武王伐殷」就是西部周國聯盟攻打東部的商國，我主張是前一〇二七年。中國官方於一九九五年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結論還沒出來，已經被吹上了天。工程最終將武王伐殷的年代定為前一〇四六年，還是抄外國人的，有關討論見我與湖北民族學院編的《古史考》第九卷。《國語》這段話裡，鶉火、天駟、析木、辰、斗、天黿、建星、牽牛，統統是古代天文學術語。中國古代天文學把黃道帶分成十二個部分，稱之「十二次」。黃道帶天區自西向東劃分並依次命名為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

郭沫若認為，中國古代十二次的概念來自巴比倫。現在天文學發展了，我們知道，十二次與西方的黃道十二宮作用類似，但劃分界限有所不同。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科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一書認為：第一，兩者是不同源的。中國十二辰出自斗建，十二次出自歲星週期；而黃道十二宮出自太陽的周年視運動。第二，中國的十二辰—十二次體系，與巴比倫—希臘天文學的黃道十二宮，方法上也不一樣：我們

沿赤道劃分，他們沿黃道劃分。簡而言之，我們採用赤道座標，他們採用黃道座標。因而，我們便於標示天體的周日視運動和恆星的周年視運動；他們則便於標示太陽的周年視運動。兩種體系各有短長。如果不討論兩者坐標繫統是否有異的問題，黃道十二宮劃分的用意與中國十二次的劃分並無不同，這的確反映了人類在認識客觀世界時所體現的一定規律性。什麼是黃道呢？地球每年圍繞太陽公轉一周，從地球公轉軌道的不同位置觀察太陽，那麼太陽在天球上的投影位置也不相同。這種視位置的移動即稱太陽的視運動。古人未必通曉地球自轉兼圍繞太陽公轉的道理，但可以直觀地認識太陽周年視運動的軌跡，也就是地球的公轉軌道平面與天球相交的大圓圈，這就是黃道。

郭沫若認為中國古代十二次的概念來自巴比倫，除了二者確有一部分相似以外，清末革命黨鼓吹漢族的中國文明是從現今的巴比倫輸入，恐怕也是影響因素。郭沫若寫這本書的時候，距離排滿運動不過二三十年。



古代近東與中國地區文字之比較

參泛黃帝子孫

皇漢民族的祖先既然是來自巴比倫的黃帝，黃帝子孫當然只能是皇漢民族，這是順理成章的。

一九〇一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指出：「漢種，即我輩現時遍布於國中，所謂文明之胄，黃帝之子孫是也。」[9]漢種，也就是漢族的意思。文明之胄表明了高等人，而漢族的高等人是從高等祖先黃帝那裡遺傳下來的。

一九〇二年，康有為弟子歐榘甲說：「合中國漢族之始祖，黃帝也；合中國漢種各族姓所自出，黃帝之子孫也。」只有高等人漢族才是黃帝子孫，這是排滿運動的主流說法。這種說法就是要將作為異族的滿洲清除掉。

排滿革命既然成為了一種「無理由之宗教」，一切反對革命的都是反革命，以康有為、梁啟超師徒為代表的保皇黨，就是反革命勢力之一。革命黨主張推翻滿洲，以十八省為基本盤，建立一個漢族國家，蒙古、西藏、新疆等異族之地可以不要。保皇黨說：你這是「小民族主義」，丟掉那麼多土地多可惜，因此應該提倡「大民族主義」，保住了清國皇帝就保住了清國的疆域，因而主張君主立憲。

在對待黃帝的問題上，可以看出保皇黨與革命黨的差別。保皇黨將所有中國人說成是黃帝子孫，包括滿洲。革命黨則只將漢族說成是黃帝子孫。如一八九九年，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亡命國外，在加拿大華人社區發表演講，劈頭便說：「我國皆黃帝子孫，今各鄉里，實如同胞一家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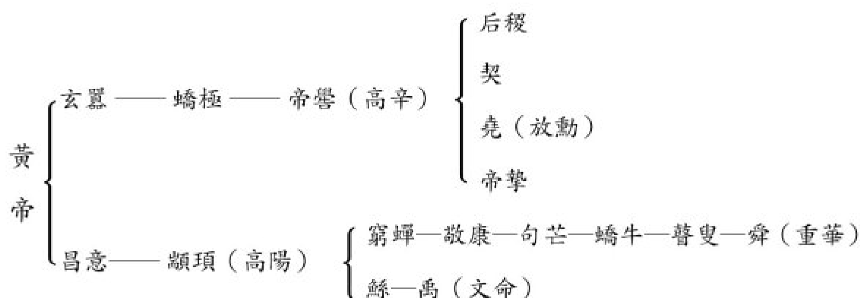
康有為的這種說法，可以稱之為「泛黃帝子孫論」，有很深的歷史傳統，叫「帝繫」。「帝繫」一詞，出自《世本》，也見於《大戴禮記》。《世本》大約成書於戰國，已經失傳。儒家以相禮為職業，有點像今天的司儀，特別擅長替別人家辦喪事。儒家五經中有禮經，指的是《儀禮》，此外還有「三禮」：《周禮》、《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地位比禮經要低。儒家聲稱西周的周公制禮作樂，因此《周禮》的地位高於《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這兩部《禮記》以西漢禮學家戴德、戴聖命名的禮學文集，由於戴聖是戴德的侄子，大戴、小戴之名遂淵源於此。二人均受業於西漢禮學大師後蒼。漢宣帝時，戴德當過信都王劉囂的太傅。由於東漢大儒如馬融、盧植、鄭玄都為《小戴禮記》作注，使《小戴禮記》名聲大振，《大戴禮記》逐漸走向沒落，以至後世提到「禮記」，均指《小戴禮記》。

《大戴禮記》是一部禮學彙編，可能為大戴學派的後學編輯而成，其成書時代晚於大戴所處的西漢。該書有《帝繫》和《五帝德》兩篇。「帝」不是秦漢以後的皇帝，而是古人心目中比「王」更神聖的聖王，如堯、舜。

《大戴禮記．五帝德》列舉的「五帝」是黃帝（軒轅）、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如此整齊劃一的帝繫編排，必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

過程，絕非古代歷史的真實。《史記．五帝本紀》採納的五帝也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文末太史公曰「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唐人司馬貞《索隱》解釋說：司馬遷用《春秋》、《國語》等古書博加考驗，進一步證明《大戴禮記．五帝德》的說法。司馬遷處於大一統呼聲很高的時代，他本人又服膺孔子，他的歷史觀深受儒家歷史觀的影響，因此「整齊百家雜語」，也就是統一各家各派的說法，著成《五帝本紀》和《三代本紀》，至今仍然被大多數歷史學家奉為古史的基本框架。因此康有為的說法頗具歷史傳統的支撐。

根據《大戴禮記．帝繫》所記，黃帝的譜系是：



這樣把虞、舜兩大聖人和夏商周三大國家都納入黃帝子孫之下，可以稱之為「黃帝一元」史觀，在戰國時代已經露出苗頭，到了西漢又被司馬遷寫入《史記》第一篇《五帝本紀》，此後兩千年，影響極大。我們歷史研究所的所長李學勤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時就說，為什麼說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呢？從黃帝算起就知道了。炎黃子孫這個詞和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回事。因為我們是炎黃子孫，所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他特別提到辛亥革命採用黃帝紀年。他說，大家如果到陝西的黃帝陵去看，那兒有很大的一塊匾，匾上寫著「人文初祖」。人文初祖，就是文明起源的意思。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這麼來的。

康有為的說法符合歷史傳統，但並不符合歷史實際，最明顯的堯、舜、契是以鳥為圖騰的鳥夷族，鯀、禹父子是夏族，相傳禹是夏國的開國之君，不過考古學家至今沒有確認夏文化。

中共建政以後，「泛黃帝子孫論」成為一種統戰工具。我們歷史所的前所長李學勤張口閉口就說中國人是黃帝子孫，依據不過就是《史記．五帝本紀》。即使《史記》所記是真，也只能保證夏商周等族是黃

帝子孫，與夏商周同時並存的蠻夷戎狄所謂「四夷」就不是黃帝子孫，當然也無法保證夏商周之後的國家和人民都是黃帝子孫，如秦族是鳥夷後裔，劉邦是南方社會底層，傅斯年先生斥為下等流氓者，更不用說後世鮮卑族、蒙古族各自建立的泱泱大國。滿族當然也不是黃帝子孫，在革命黨眼裡，也不配。

肆黃帝為漢族始祖

排滿者對黃帝的改造還沒停止，他們最終要將黃帝改造為漢族的始祖。



章炳麟，號太炎，清末民初思想家。

章炳麟（1869–1936），號太炎，浙江餘杭人，以博學自豪，可是一輩子寫不出通順的文字，坊間流傳的章太炎的白話文出自他弟子錢玄

同（1887–1939）。章太炎又以蠻橫著稱。早在後代，儒家經學有今文和古文之爭，章太炎自己是古文學家，等於同時代的今文學家如康有為、崔適（1852–1924），無不痛罵。

章太炎從小被灌輸了南宋遺民鄭思肖（1241–1318）和明國遺民顧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的故事。顧炎武原名絳，大明國滅亡之後改名炎武，章太炎崇拜顧炎武，因此改名絳，別號太炎。他二十三歲時，其父卒，遂去杭州詁經精舍受業，精舍為傳統書院，既是科舉考試學習班，也可以做點學問。精舍主持者為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是現代紅學家俞平伯（1900–1990）的曾祖父。章太炎出入精舍八年之久，後來投身排滿，嫌他的老師守舊，因而「謝本師」，不認老師了。他在一九〇〇出版了一本論文集《訄書》，請梁啟超題寫的書名。訄者，迫也。「訄書」等於說是不得不說的話，一言以蔽之就是排滿。

《訄書》裡有一篇《原人》，是討論種族的。他說古代本來不把戎狄這些民族列為人類，到了清代而諱言，因為滿洲也是戎狄一類。與戎狄相對應的是漢族。「觀於《黃書》，知吾民之皆出於軒轅。」[10]《黃書》的作者王夫之，正是排滿運動家的偶像，堪稱中國「憤青」的鼻祖。

《黃書》寫於一六五六年，王夫之三十七歲，正是憤青最佳年齡段。此時明國的流亡政權南明雖然還在苟延殘喘，但誰都明白大勢已去。早在順治元年（1644），清軍大舉入關，第二年就攻下南京。王夫之寫《黃書》的時候，已經是順治十三年。在《黃書》中，王夫之重彈《春秋》大義的老調，認為「中區之間」是軒轅所治，是華夏，也可以叫中夏，與異族戎狄存在天然的界線，不能越界，尤其不能讓異族插進來（「夷類間之」）。像宋國被女直（女真）、韃靼（蒙古）覆滅，是最可痛恨的。王夫之在《讀通鑒論》裡甚至說：「對於野蠻民族，誅殺他們的性命，不能稱之為不仁，奪取他們的財物，不能稱之為不義，用陰謀詭計欺騙他們，不能稱之為不信。」可是像王夫之這樣一個華夏高等人，為了防止清軍的追捕，不惜混入湖南瑤族之中，還曾經改用瑤族的姓名，他毫不嫌棄沾染上「夷類」的晦氣。瑤族、苗族等民族就生活在王夫之身邊，足以粉碎內地就是華夏、華夏就是漢族的說法。

《訄書．原人》之後，是《序種姓》。「種姓」一詞，在古書出現很早，與「種類」是一個意思，相當於今天所謂種族、民族。《序種

姓》不過是拾人牙慧，將黃帝西來說比附中國古書。章太炎說，「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見石刻，訂其出於加爾特亞；東踰葱嶺，與九黎、三苗戰，至禹然後得其志。徵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其後人文盛，自為一族，與加爾特亞漸別。」[11]對比後面的敘述，「科派利」無疑就是拉庫伯里。加爾特亞，章太炎自己說在小亞細亞南，又說屬於前巴比倫，即今安納托利亞，相當於今天土耳其的亞洲版圖，東南方就是古巴比倫。因為漢族的祖宗黃帝是從那裡來的，章太炎稱為「宗國」，等於說母邦。大家還記得西周的首都鎬京、東周的首都洛陽吧？他們都可以稱為「宗周」。



莎車以西的葱嶺。

葱嶺是古代對今帕米爾高原的統稱。漢武帝時的張騫於建元二年（39 BC）啟程，是第一批到達葱嶺的漢地人，號稱「鑿空」，也就是前無古人的壯舉。出發時有一百多人，回國時僅剩二人。魏收（505–572）所著《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記載莎車往西一百里就是葱嶺（圖七）。新疆喀什地區的莎車縣，就是因古代的莎車國而得名。帕米爾的雪水匯成一條大河，滋潤著莎車國。這條河今天叫葉爾羌河。葱嶺有海拔六七千米的雪山。在蘇聯解體之前，曾經被命名為史達林峰（海拔七千四百九十五米）、列寧峰（海拔七千一百三十四米），馬克思峰（海拔六千七百二十六米）。革命黨已經提到塔什庫爾幹河，上游正在莎車縣以西。莎車國以出玉知名，還產鐵，東漢班固《漢書．西域傳》有記載。莎車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至今連接西藏西部和新疆西南部的國道只有一條，即二一九國道。從西藏西部進入新疆的第一個大站是葉城縣，第二個大站就是莎車縣。二〇一五年四月初，筆者開車去考察，

這一帶還在下雪，路途異常艱險，我當時就想，革命黨張嘴閉嘴蔥嶺、帕米爾，也是紙上談兵，逞口舌之快，沒有哪一個人真正去過。

關於黃帝的這個母邦加爾特亞，章太炎拿它與《呂氏春秋》、《漢書》、《緯書》、《聖經》等書比附[12]：

宗國加爾特亞者，蓋古所謂葛天，（章氏自注：《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古今人表》，太皞氏後十九代，其一曰葛天氏。《御覽》七十八引《遁甲開山圖》，女媧氏沒後有十五代，皆襲庖犧之號，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皞以下諸氏，皆加爾特亞君長東來者，而一代獨得其名，上古稱號不齊之故。其實葛天為國名，歷代所公。加爾特亞者，爾、亞皆餘音，中國語簡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地直小亞細亞南。其人種初為葉開特亞，後與西米特科種合，生加爾特亞人。其《舊紀》曰：先鴻水有十王，凡四十三萬二千年；鴻水後八十六王，凡三萬三千九十一年；其次有米特亞僭主，八王，二百二十四年；其次十一王；其次為加爾特亞朝，四十九王，四百五十八年；其次為亞拉伯朝，九王，二百四十五年；其次四十五王，五百二十六年。（章氏自注：其書為巴比倫人披落沙所紀。披落沙，共和紀元五百八十年人。）然始統一加爾特亞者，為薩爾宮一世，當共和紀元以前二千九百六十年。（章氏自注：共和紀元與歐洲邪穌紀元相差八百四十一筭。）其後至亞拉伯朝，以巴比倫為京師，當共和紀元前七百四年。其後二百五十年，為小亞細亞滅之。

吳銳按：《呂氏春秋》是秦國丞相呂不韋集合門客編撰，成書於秦始皇統一中國（221 BC）前夕，多少還有些依據。《古今人表》是《漢書》中的一篇，將古往今來的人分為好人和壞人，好人和壞人又各有三六九等。《遁甲開山圖》之類的緯書，是西漢末年才偽造出來的，有的故作神秘的預言，有的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大字報差不多，總之是一點都不可信。章太炎拿它做論據，對於他國學大師身分，真是掉價。

大皞也就是太皞，和少皞一樣，都是鳥夷族大神。《舊紀》即《聖經．舊約》。鴻水即洪水，諾亞方舟的故事。章太炎愛用古字，炫耀淵博，一拆開也沒什麼乾貨。甚至連傳說中補天的女媧、畫八卦的庖犧（即伏羲、伏戲），都拿來作證。薩爾宮，現在通常作「薩爾貢」。薩爾貢一世（Sargon of Akkad）是古巴比倫時期阿卡德王朝的開國之君。

章太炎是以音韻學成為名家，音韻學界都捧「章黃之學」，「黃」就是章太炎的弟子黃侃。我們且看看章太炎的音韻學，他說薩爾宮就是中國古書裡的神農[13]：

　　薩爾宮者，神農也，（章氏自注：或稱薩爾宮為神農，古對音正合。）促其音曰石耳。（章氏自注：《御覽》七十八引《春秋命曆序》曰：有神人名石耳，號皇神農。）先薩爾宮有福巴夫者，伏戲也；後薩爾宮有尼科黃特者，黃帝也。其教授文字稱蒼格者，蒼頡也。其他部落，或王於循米爾，故曰循蜚；或王於因梯爾基，故曰因提；或王於丹通，故曰禪通。東來也，橫渡昆崙。昆崙者，譯言華（章氏自注：俗字花）土也，故建國曰華。昆崙直𢮿米爾高原，𢮿米爾者，波斯語，譯言「屋極」也。故曰：「天皇被跡於柱州之崑崙。」（章氏自注：《遁甲開山圖》語，極與柱，皆狀其山之高。）其旁行者自衛藏。衛藏昔言圖伯特，故曰：「人皇，出刑馬山提地之國。」（章氏自注：《遁甲開山圖》語。提地與圖伯特一音之轉。《華陽國志》謂巴、蜀本人皇苗裔，是人皇由衛藏入蜀也。二事皆元和汪榮寶說，義證塙鑿。特未知天皇、人皇，其時代於大皞前後何如？緯書或以伏戲、女媧、神農為三皇，如《保乾圖》言：天皇「斟元陳樞以立易威。」則天皇即大皞。如《命曆序》，人皇九頭紀以後有五龍紀，始漸及伏戲，則天皇非其人矣。古事芒昧，難盡明也。）君長四州，故有四嶽。長民十二，故有十二牧。民曰黑頭，故稱黔首。文字如楔，故作八卦。陶土為文，故植碑表。尊祀木星，故占得歲。異名紀月，（章氏自注：如《釋天》「正月為陬」以下十二名，巴比倫亦有之。）故貞孟陬。故曰，中國種姓之出加爾特亞者，此其徵也。





左：神農炎帝像。
右：薩爾恭青銅面具像，西元前二十三世紀。

吳銳按：《春秋命曆序》、《保乾圖》、《遁甲開山圖》、《命曆序》都是緯書，垃圾中的垃圾。《御覽》是《太平御覽》的簡稱，是北宋官修的類書，是照抄現有的古書，加以分類而已。《華陽國志》是關於土家族先驅巴國的史書。《華陽國志》明明是成漢獨立國家的史書，作者是成漢國史官常璩（約291–361），卻被漢族學者列為地方誌。《釋天》是字典《爾雅》中的一篇。圖伯特即西藏，也稱圖博。再怎麼說，提地是漢語，圖伯特是藏語的漢語音譯，章太炎居然運用漢語言音韻學讓二者通轉！西藏分三區，衛以日喀則地中心，藏以拉薩為中心，四川東部和青海稱安多。□米爾，今作「帕米爾」。大皞即太皞。十二牧就是十二個首長。章太炎張口閉口古音，居然考證出神農就是薩爾宮，也即薩爾貢，伏羲就是薩爾貢的前輩福巴夫，黃帝就是薩爾貢的繼承人尼克黃特（Nakhunte）。

以上章太炎的論證，和緯書差不多，實不可信。顧頡剛先生說西漢盡是方士化的儒生，我看章太炎就是方士化的國學家。但是他還喋喋不休：「自黃帝入中國，與土著君長蚩尤，戰於阪泉，夷其宗。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定之。當堯時，三苗不庭，遏絕其世，竄之三危，其遺種尚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義，『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夏禹伐之，三苗以亡。』自是俚、繇諸族，分保荊、粵至今。」[14]總算承認蚩尤是中國原住民，黃帝是來自萬里之遙的外來征服者。就這一點來說，比當今中國的愛國群眾強很多。現在河北省涿鹿縣和北京市延慶縣都在爭奪阪泉。九黎，字面意思似乎是多種黎民（九經常指多數），古人也有認為就是三苗的。三苗是苗族先驅。三危，古人所能想像的最西邊的地方，經常實指為敦煌，是流放三苗的地方。洞庭，主流看法認為就是雲夢澤，今天的湖南洞庭湖，彭蠡是鄱陽湖。只有武漢大學石泉（1918–2005）教授的考證是正確的，春秋戰國时的洞庭尚在今湖北省宜城市東南境、鍾祥市西北境之漢水西岸，朱堡埠西處[15]。彭蠡在豫章，「豫章」應指豫章大陂，遠古的豫章大陂並不在今天的江西，而在今湖北省襄樊市東北约四十里的唐河與白河之間近白河東岸處，亦即以新野以南、漢水以北的南阳盆地南部较低洼地带[16]。三苗和巴人一樣都是漢水流域的民族，受外來力量的壓迫，逐漸南遷。三苗先是安裝上種種罪名，然後進行軍事打擊。

以上是《序種姓》上篇的主要內容。這一篇在一九〇〇年《訄書》木刻原刊本還沒有，原刊本印出來之後，章太炎親自做了校訂，是校在《訄書》原刊本上，藏於上海圖書館，前面有章太炎親筆重擬的目錄，增加了《序種姓》上篇[17]。一九〇二年，章太炎將《訄書》刪革重編，一九〇四年在日本鉛印初版。如前所述，一九〇〇年正是兩位日本業餘歷史學者白河次郎和國府種德將拉庫伯里的泛巴比倫說吸收到《支那文明史》一書之年。清國人最容易去的國家就是日本，清國人吸收西方學術也是通過日本。這一年章太炎在上海，他風聞了拉庫伯里的新奇之論，居為奇貨，迫不及待與中國古書拉扯起來，連一般人不屑一顧的緯書，章太炎都如獲至寶。學術為政治服務，公正地說，不是共產黨才發明的。

伍黃帝紀年

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

中國紀年。無劃一之法。自竹書紀年以降。編年之史。無一不複雜者。今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將黃帝降生後之大事。列表如左。

降生後年代	中國大事紀
十一年	黃帝即位
三百五十年	唐堯即位
四百九十八年	夏禹即位
九百四十年	商湯即位
一千五百八十六年	周武即位
一千八百六十年	周民逐厲王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周避犬戎東遷
二千一百四十年	大哲學家孔子生
二千四百八十八年	秦始皇即帝位
二千五百三年	陳涉起革命軍
二千六百五年	晉避五胡南遷
三千三百年	隋文帝一統南北
三千六百三十八年	沙陀夷李克用主中國
三千八百四十二年	金虜陷宋京師宋南遷
三千九百九十三年	蒙古夷滅宋主中國
四千八十一年	明太祖排斥蒙古
四千三百五十九年	滿洲入關
四千五百六十年	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四千六百九年	光緒帝變政
四千六百十一年	聯軍入北京

黃帝紀年大事表，出自一九〇四年的《國民日日新報》。

《民報》創辦之初，不用大清國正朔，採用日本明治年號。革命黨也堅決不承認是中國人，只承認是支那人。如果今天哪個中國人寫文章膽敢用日本天皇紀年，不僅會遭到政府的跨省追捕，而且單就愛國人士

的唾沫口水，足以將他淹死。「精日」（精神上如同日本）已經構成一種刑事罪名，中國已經有多起「精日」遭逮捕的案例。至於遭愛國群眾的毆打，還算是輕的。但愛國人士會對一種人網開一面，那就是革命者。只要能與革命沾邊，委曲求全可以，曲線救國可以，造假可以，盜版可以，總之無往而不利。

一九〇三年，劉光漢（1884–1919）寫就《攘書》，出版之前《俄事警聞》四十八號（1904年1月31日）登有廣告，稱為「空前傑著」。劉光漢自己解釋「攘」即攘夷之「攘」，等於說趕走。尊王攘夷本是春秋時期華夏集團對付身邊異族提出的口號。劉光漢本名劉師培，出生於江蘇儀徵一個窮讀書人家庭，祖上三代人專攻《左傳》。他不屑於延續家學，改名「光漢」，即光復漢家的意思，投入到排滿怒潮中去，光漢與排滿是同一事情的不同階段而已。《攘書》由十六篇組成，第一篇是《華夏篇》，開宗明義地說「漢族初興，肇基西土。而崑崙蛾峨，實為巴科民族所發跡。」他解釋說，崑崙就是帕米爾高原，即今喀什噶耳河。又說：「西書稱中國民族為巴科民族，即盤古一音之轉。」[18]他所說的西書，就是拉庫伯里的書。

一九〇三年，劉師培還有一個重大發明，就是帶頭鼓吹黃帝紀年。他在《攘書》之《胡史篇》已提出仿照西國紀年，以黃帝降生為紀元。又專門撰寫《黃帝紀元說》，認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而黃帝者乃是「四百兆漢種之鼻祖」，「乃製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因此，如果要紹繼黃帝之業，應當從採用黃帝紀年開始。再看日本立國，以神武天皇紀年。中國之有黃帝，好比日本有神武天皇。取法日本，擇善而從，自然應該採用黃帝紀年[19]。自此說一出，各方回應。傾向革命的各類雜誌如《江蘇》、《黃帝魂》、《二十世紀之支那》、《洞庭波》、《漢幟》等等，紛紛改為黃帝紀年之標準；一時之間，黃帝紀年，蔚為時尚，幾為世人所共循。

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起義，各省相繼反正，軍政府一切文告最後都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一直用到本年陰曆十一月十二日，即陽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翌日，中華民國於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旦，這才結束了中國近代史上黃帝紀年的使用。

於此可見，劉師培創新的「黃帝紀年說」既受了拉庫伯里的影響，也受了日本的影響，目的是排滿。劉師培強調，黃帝是漢族的黃帝，黃

帝紀年可以發揚漢族民族之感覺[20]。針對當時康有為提倡的孔子紀年，劉師培一針見血地指出他與康有為的立場不同：「彼等借保教為口實，故用孔子降生為紀年；吾輩以保種為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為紀年。」保教就是保儒教，保種就是保漢種（漢族）。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位「光漢」大將後來投靠端方，充當清國的密探。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又參與籌安會，公開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劉師培身敗名裂之後，蔡元培不計前嫌，網羅他到北京大學教書。劉師培死的時候才三十六歲。他的悍妻何震也曾經是一位激烈的排滿分子。讀蔣逸雪（1902–1985）前輩《南谷類稿》，才知道劉師培可能是被他老婆害死的。一顆排滿流星，就這樣在民國殞落。

陸祭祀黃帝

一九〇八年，同盟會陝西分會會長李仲特與井勿幕、郭希仁等人組織同盟會員在重陽節祭掃軒轅黃帝陵。重陽節那天，會員們假扮成延長油礦考察員、商人、獵戶等，紛紛趕往黃陵。最後到達黃陵參祭的共有三十人。祭陵儀式莊重儉樸，參祭者在黃帝陵前宣誓：「驅除韃虜，光復故物，掃除專制政權，建立共和國體……以紓民生之苦，以復漢族之業。」[21]韃虜，過去指蒙古人，這裡指滿族人。同年，同盟會於東京遙祭黃陵，稱黃帝為皇祖，回顧歷史，「我民族屢蹶屢振，既僕復興，卒能重整金甌澄清玉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靈，有以默相而佑啟之也。」現在「驅除韃虜，光復舊物」，「本眾志成城之古訓，建九州復仇之義師」，乞求皇祖保佑，以復漢族之業。[22]

一九〇八年，章太炎發表《排滿平議》，認為大地形成之初，被水包圍，因此人類必須住在中央高原，才能躲避水患。漢族自波謎羅來，雖然沒有史籍根據，其由不誣。波謎羅是《大唐西域記》的譯法，現在譯作「帕米爾」。[23]

一九三五年，中國國民黨中央推派委員張繼、邵元沖，「致祭於中華民族始祖黃帝轅軒氏之靈」，追懷先祖「創業之耿光大烈」，現在又面臨異族日本入侵，誓言「力排艱險，以復我疆圜，保我族類」，以慰我元祖之靈[24]。同年，國民政府也派代表致祭橋陵。


民族掃墓節，國民黨元老張繼向黃帝陵獻花。

共產黨也不甘示弱，加入祭祀黃帝的爭奪戰。一九三七年，中共陝西蘇維埃政府遣派林祖涵代表蘇區人民，致祭黃陵，並宣讀蘇區主席毛澤東、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所撰祭文，文曰：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嶽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25]

一九四七年，國民黨政府以殖民者的姿態槍殺數千名手無寸鐵的台灣本地人，釀成「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實行戒嚴，採用「法東斯」手段統治這塊殖民地。和東晉、南宋等小朝廷一樣，中華民國小朝廷也以中國文化的正統自命。國民黨是直接從清國末年的排滿運動中起家，黃帝是他們宣傳出來的偶像。即使敗退到孤島上，也念念不忘黃帝。二〇〇〇年，台灣人民首次用選票將國民黨趕下台，實現了第一次政黨輪替。國民黨淪為在野黨之後，黨主席吳伯雄訪問北京之前，先奔向黃帝陵。宋楚瑜原來是國民黨，後來脫離國民黨，成立親民黨，也愛往黃帝陵跑。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在台北市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隆重舉行遙祭黃帝陵典禮，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主祭，這是馬總統任內第六度參加遙祭黃帝陵典禮，表達對中華傳統文化尊宗敬祖的重視，彰顯慎終追遠的意涵。沒過多久，台灣人民就用他們手中的選票，第二次將馬英九及國民黨趕下台，至今沒有翻身。

至於中國官方和民間祭拜黃帝陵，實在太多了，就不一一列舉[26]。河南省和陝西省為爭奪黃帝的祭祀權，公開打架。當今兩岸勢如水火，如是爭先恐後，搶著拜黃帝，也真是天下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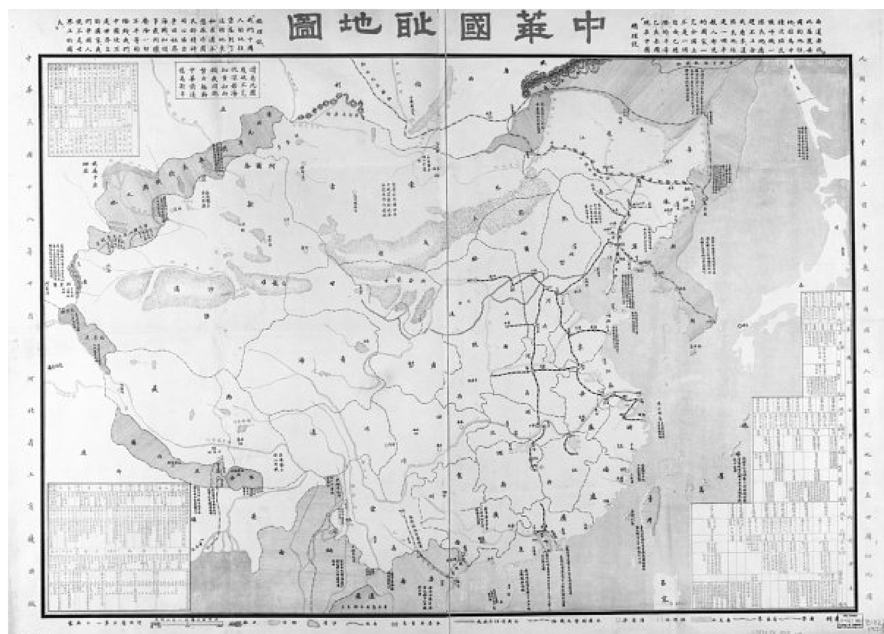
---

1.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三九八。
2. 如一九〇四年《江蘇》第七、八期刊登的《民族精神論》，就說「黃人命運之所至，究輸白人一著也」。詳見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六〇年，頁八四一。
3. 康有為，《大同書》，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四年，頁一二一至一二五。
4.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頁八九二。
5. 陳天華，〈猛回頭．黃帝肖像後題〉（一九〇四），載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上海：經世書局，一九八一年，頁一四二。
6.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冊》，頁八五三。
7.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冊》，頁九八一。
8.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冊》，頁一〇〇五。
9. 《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四五〇。
10. 徐復，《訄書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二—三。
11. 徐復，《訄書詳注》，頁二一七。
12. 徐復，《訄書詳注》，頁二二七。
13. 徐復，《訄書詳注》，頁二二八至二二九。
14. 徐復，《訄書詳注》，頁二三五。
15. 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續集》，武漢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二一九至二二一。
16. 《古代荊楚地理新探續集》，頁三六〇。
17. 關於《訄書》目錄的變化，詳見湯志均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頁七六、頁一一一至一一四、頁一四三至一四八。
18. 朱維錚，《劉師培辛亥前文選》，載於錢鍾書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頁九至一〇，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
19. 同上書，頁三—四。
20. 同上書，頁三—四。
21. 柏明、李穎科編：《黃帝與黃帝陵》，西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一三四。
22. 張豈之等編，《五千年血脈—黃帝及黃帝陵史料彙編》，西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二九至一三〇。
23.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第三卷》，頁四五。
24. 《五千年血脈—黃帝及黃帝陵史料彙編》，頁一三〇至一三一。
25. 《五千年血脈—黃帝及黃帝陵史料彙編》，頁一三二至一三三。

26. 詳見黃帝陵官方網站的相關報導，網址連結：http://www.sxlib.org.cn/dfzy/sxdwljgb/hdl/jshd/ylbd/201704/t20170426_698634.html

第參章

皇漢民族復國：從民族主義到民族帝國主義



一九二九年由中華民國河北省工商廳出版的《中華國恥地圖》，圖中標示列強侵占之領土，包括馬關條約割讓之台灣，以及清朝舊有的藩屬國，如朝鮮、越南、緬甸、暹羅、尼泊爾、不丹等。

壹「法東斯」的前奏：赤裸裸鼓吹侵略同化

一八九五年，一向被中國視為蠻夷的日本，竟然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天朝大國。清政府動用一切力量，宣傳清國打敗了日本，各國哀求清國講和。此時，嚴復（1854–1921）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特別是他在翻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的同時，加入自己的評論，提煉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個字，迅速成為一句深入人心的口號。排滿復仇者心想：我黃種人雖然比不上白種人，但總比黑種人強，漢族總比蠻夷強；漢族不吞併蠻夷，早晚會被蠻夷吞併。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於是先下手為強，排滿復仇者立即將傳統的夷夏之辨和時髦的進化論結合，發展出一整套種族主義理論，並且在中華民國、特別是國民黨當權時期得到實施，堪稱東方法西斯，簡稱「法

東斯」。「法東斯」的提法不是本書的首創，而是中共。在國共兩黨爭奪天下的時候，國民黨說共產黨是赤匪，共產黨說國民黨是東方法西斯。連篇累牘，不勝枚舉。

這種法東斯理論，首先用於復仇，因而被賦予不容置疑的正當性和高尚的道德屬性。一九一一年，《民心》雜誌發表劍男《攘異篇》，「攘異」是打擊異族的意思，他稱讚黃族具有「先天的攘異特質」[1]：

嗟我黃族始祖，自帕米爾高原，迤邐東下，至黃帝南驅苗民、北逐獯鬻，建立帝國於中央。以此精神，貽傳子孫，故戰國時冠帶之國也……皆能攘胡開疆；秦皇漢武，威振絕域，赫然為中國開新紀元。自後歷代末運，腥風膻雨，亦嘗咄咄逼人，然……有一次之陸沉，即有一次之振作，一種先天的攘異特質，鬱鬱哉，蔥蔥哉，轟轟烈烈哉，置諸萬國民族賽珍會上應亦得頭等獎牌。

文中所說的黃族就是黃帝族，也就是皇漢民族。苗民，是苗族的祖先，古書又寫為「三苗」。獯鬻，又寫為「葷粥」，傳統上認為是西北方的遊牧民族，是匈奴的先驅，實際上是夏族。冠帶之國，等於說先進國家，因為遊牧民族不需要戴帽子、紮帶子。胡，本義是「大」，原本是褒義詞，成為北方民族的統稱之後，經常用作貶義詞，與「支那」一詞的命運相似。戰國時期的趙國，算是「冠帶之國」吧，為什麼要低三下四向胡族學習胡服騎射呢？

文中又提到「攘異特質」，其實就是武裝殖民。在舊有的黃帝傳說中—以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為代表，黃帝於得位之先，東征西討，最著名的是與炎帝的阪泉之戰，又擒殺戰神蚩尤，取代炎帝為天子；踐阼之後，復「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簡直和後世成吉思汗差不多。黃帝西至崆峒，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完全是征服者的形象。「西來說」傳入清國之後，排滿革命黨認定黃帝發祥於帕米爾高原，一路向東武裝殖民，征服中國的土著民族—苗族，建立帝國。

劉師培是革命黨中最有學問的人之一。他認為黃帝所率漢族先祖未入中國之前，中國本土已有土耳其種之玁狁與黑種之苗民分踞南北，乃黃帝入中國後，奮其神武，往來征討，最終能北定河朔、南平蚩尤，於是禹域河山，皆入於漢族之掌握，而苗土遺黎，悉淪賤族，遂有「百姓」、「黎民」之差等焉。

也就是說，隨著中國淪為殖民地，中國土地上的原住民淪為奴隸，因此產生「百姓」、「黎民」之類的卑賤的稱呼。給劉師培的說法找一個類比吧：歐洲的斯拉夫民族淪為奴隸之後，奴隸一詞（Slave）即因斯拉夫民族而產生。類似的說法蔚然成風，如一九〇三年《新民叢報》第三十一號所載，觀雲，《中國上古舊民族之史影》。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坦陳，原來我們中華民族，起初不過小小幾個部落，在山東、河南等處地方占得些根據地。幾千年間慢慢地長啊長啊，長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巨族，建設這泱泱雄風的大國。他長的方法有兩途：第一是把境內境外無數的異族叫他同化於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邊境移植，把領土擴大。黃帝既被轉化成中國的「征服者威廉」，黃帝苗裔的漢族與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的關係，當然只能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不對等關係；用劉師培所作的比喻來說：「要而論之，漢族初入中國時，猶之西班牙人入美洲也；異族之消滅，猶之南洋島族被化於歐人也；異族之遷徙，猶之蝦夷人種屏跡北海也。」這已經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十足的法東斯。提倡者心裡可能想：我殺你，你不能怪我，因為弱肉強食是自然規律。



黃帝的故事，出自一九三五年的《我的畫報》。

梁啟超的老鄉張蔭棠（1860–1935）是「粵黨」的重要成員，當過清政府的駐藏大臣，相當於清政府駐藏辦事處主任，這個辦事處不過幾十人，根本不可能實際統治西藏。張蔭棠親自在大昭寺宣講《天演論》，闡述天演物競、生存淘汰之說，大概想嚇唬藏民。須知大昭寺是藏民的聖殿，相當於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他認為西藏他日可資為中國殖民地，中國治西藏應該學習英國治印度。

許多革命黨人甚至引進阿利安人侵入印度，征服當地土著後所建立的「種姓制度」（Caste），作為規範漢族與少數民族之族群關係的理想模式。這是法東斯為將來的漢族中國設計的宏偉藍圖。當這群狂熱的清國塔利班建立中華民國之後，就是參照「種姓制度」作為規範漢族與少數民族之族群關係的。

中共建政以後，有意模糊民族界線，強調階級劃分，仍然有種姓制度的色彩。比如，同樣是汽車撞死人，如果被撞的人是農村戶口，所得賠償不足城市戶口的人一半。

貳滿洲是犬羊賤種，應該殺光

在排滿運動之前，各種諷刺滿洲為畜生的段子已經滿天飛，如《太平天國義軍奉天討清檄文》說：「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之風化。」[2]

為了加固滿族是異族的印象，革命黨或者把滿族打入通古斯族，屬於「犬羊賤種」[3]，或者說滿族是西伯利亞種，是披毛戴角的畜生[4]，或者說滿族是「五百萬膻種」、「遊牧野種」、「白山之獸」[5]。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滿洲人都是劣等民族，不能與高等漢族相提並論。如康有為的學生歐榘甲（1870–1911）說：「今所謂朝廷者，乃韃靼之種，其部落居於滿洲長白山之下，在萬里長城之外，本與我中國黃帝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6]

滿洲劣等到什麼程度呢？革命黨「考其種類，乃居我國之東北，種原韃子，國號滿洲，地極苦寒，不利五穀，無以活命，則同獵野獸，取其皮而衣之，取其肉而食之，無教化、無禮義，如生理家所謂原人之起居食息，舍衣食男女之外，無餘思想者是也。其野蠻不僅惟此，無禦風雨之宮室，如上古之穴居野處；無通書劄之文字，如老死不相往來；聚

則如蟻如蜂，散則鳥飛獸走，人各西東。將蓬蓬之頭髮，永不整理，惟四圍削去小許，使青絲一束，臭壓其頭，重拖其腦，分三股成一束，牽一髮而痛全身」，總之除了保留動物的本能，沒有任何思想可言，是「野蠻之異種」。最可恨的是，這些野蠻異種對待我們「神明漢種」，連胡虜奴隸還不如[7]。

實際上，這是狗眼看人低。滿族有著深厚的鳥夷文化傳統，屬於鳳族的一個支系，本書第一章已經講了。革命黨也不是不知道滿族的天女神話[8]。

滿族在大元蒙古國時代已經興起，擁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當明國建立的時候（1368），大元並沒有滅亡，只是丟失了中國這塊殖民地，向蒙古高原發祥地退縮。甚至在明國滅亡的時候，大元依然存在，只是勢力範圍進一步萎縮。新興的大清國強調明國是滅亡在李自成一夥流賊手裡，清軍入關占領北京，趕走李自成，是為明皇室報仇雪恨。當然，滿清也有自己的仇恨，那就是與朝鮮同為明國的殖民地，所受的侮辱比朝鮮更慘。滿人向明國屈服納貢的同時，還不得不向朝鮮納貢。「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是共產黨從小給我們的宣傳，忍無可忍的滿人終於以「七大恨」起兵，反抗他們的主子，並且一不做二不休，把主子的所有地盤即中國都搶來作為他們的殖民地，還開拓了新的殖民地—新疆。抗戰時期，著名愛國歷史學家傅斯年還承認，新疆本是我們侵略來的，現在該得放棄。

由於中國是滿清最大的一塊殖民地，幾乎所有的中國歷史學家都認為清國繼承的是明國。實際並非如此。清王室主動與蒙古貴族聯姻，形成滿蒙一體的格局，中國曾經是大元蒙古國的殖民地，既然滿蒙已經一體，滿清當然也就繼承了中國地盤。當清王室被迫退位時，蒙古族即根據這點於一九一一年宣告獨立，因為滿蒙一體的格局遭到了破壞，蒙古就沒有必要留在大清帝國裡。再看滿清與中國殖民地的關係，堅決禁止滿漢通婚，從血緣上維護殖民者的高貴性。同時也禁止漢人越過山海關向滿人的發祥地滿洲移民。

滿洲是異族賤種，不是中國人，是革命黨排滿的重要依據。「異族賤種」，這是清末以皇漢民族或者黃族自居者對滿洲人最頻繁的詛咒。也就是說，滿洲人是劣等民族。因為「滿洲入寇中國」，所以漢人必須復仇。既然滿洲是異種，「非種必鋤」，趕盡殺絕都是應該的。如後來成為國民黨元老的張繼（1882–1947）主張：「吾願殺盡滿洲人，以張

復仇主義，以養成復仇之壯烈國民。」甚有言「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云云者，這句話出自排滿熱血青年鄒容的代表作《革命軍》。翻譯成白話文就是：殺光五百多萬野蠻的滿族畜生！

即使是最溫和的排滿人士，也主張最起碼要把滿洲趕出山海關外。



漫畫「滿人之末路」，出自一九一三年的《之江畫報》。

對滿族的復仇，是滿洲罪有應得。當年明國撿元國的便宜，接管了大片異族地盤，順勢送個人情，在這些地方設置土司，容忍國中之國。到了清國就眼紅得看不下去了，強制改土歸流，滿洲壓迫非漢民族絲毫不比壓迫漢人手軟。現在革命黨膨脹了一個巨無霸漢族，對滿洲復仇不說，還連累了所有的非漢民族（四夷）。

參中國不革命，黃種且滅絕

滿洲既然如此低賤，膽敢奴役黃帝貴冑，因此革命勢在必行，不需要理由。連外人都說：「中國不革命，黃種且滅絕」，那我們還等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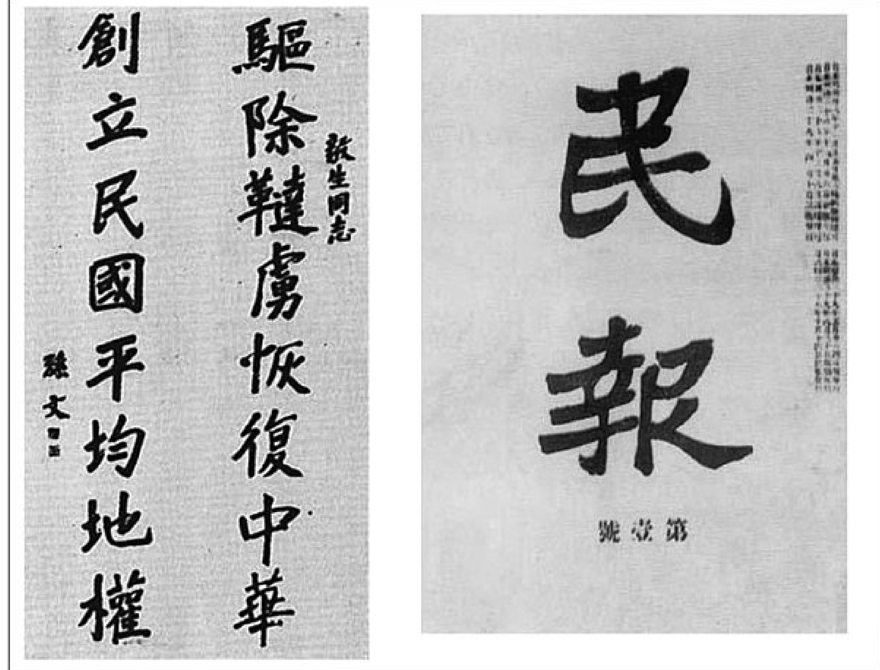
麼？「革命哉，革命哉！真今日我族存亡之一大關鍵哉！」革命黨呼籲：我黃人「萬眾一心，同德協力，共逐白山之獸，追還我黃帝之魂」[9]。 像這樣的煽動連篇累牘，足以編一本大書。

革命黨把中國看作是「漢族的中國」，提出要「建立漢族新國家」，「漢族萬歲，中華大帝國萬萬歲」的口號響徹雲霄，鄒容《革命軍》為「皇漢人種革命」之後建立的新國家想好了國名，那就是「中華共和國」，章太炎設想的國名是「中華民國」。



鄒容及其遺著《革命軍》。

這樣的宣傳也是很成功的，因為民族主義最容易煽動起來。接下來將要付諸行動。由於大清國已經腐爛透頂，辛亥（1911）武昌一起事，全國土崩瓦解，這就是國共兩黨共同推崇的辛亥革命，與中國歷史上的湯武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一樣，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正確性。革命黨「建立漢族新國家」的目標竟然達成，國民黨採納章太炎的想法，將國名取為「中華民國」，共產黨將國民黨趕走之後，採納鄒容的想法，將國名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國國名均與四夷無關。



《民報》創刊號封面與同盟會誓詞。

肆由「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北伐奪權

朱元璋當年就是打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打敗大元帝國。排滿革命黨人認為朱元璋將漢族地盤從蒙古異族手裡奪回來，現在漢族的地盤被滿族侵占，革命黨人的任務就是從滿族的手裡將漢族的地盤再次奪回來，因此同盟會的政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即效法朱元璋。《民報》第五號扉頁載有三幅照片，稱為「中國大民族革命偉人肖像」，分別是：朱元璋、洪秀全、孫逸仙。朱元璋、洪秀全都是當過皇帝的人，洪秀全登基之後頒布了一篇《祭明太祖文》，給孫中山樹立了榜樣。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說：

不肖子孫洪秀全，率領皇漢天國百官，謹祭於吾皇之靈曰：昔以漢族不幸，皇綱覆墜，亂臣賊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國，遂使大地陸沉、中原板蕩。朝堂之地，行省之間，非復吾有。異族因得以盤踞，靈秀之胄，雜以膻腥，種族淪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維良薄，不及早除異類，慰我先靈。今借吾皇在天之靈，默為呵護，群臣用命，百姓歸心，東南各省，次第收復。謹依吾皇遺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

敢居功？自以體吾皇之用心與天下託付之重，東南既定，指日北征，驅除滿洲異族，還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靈，下解從百姓倒懸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洪秀全忘記了，他的老家廣西，從來都是被中國人視為野蠻異種的巢穴，與滿洲不過半斤八兩。

孫逸仙野心更大。鴉片戰爭（1840–1842）之後，民間出現了一些地下組織，以反清復明相號召，通稱「會」，如天地會、哥老會等。孫中山起家的資本是一八九四年在美國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次年總部遷往香港。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政治綱領，成員多來自香港，並以香港為顛覆當時中國政府的基地。一九〇五年七月三十日，中國同盟會成立籌備會就是在東京黑龍會創始人內田良平家中召開的，內田良平、宮崎寅藏等一批黑龍會會員正式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包括後來日本法西斯主義教父的北一輝（1883–1937）。在中國經過審查的網路上，黑龍會被定性為以侵略中國為目的的反動組織。一九〇五年與黃興（1874–1916）等領導的華興會等團體聯合組成同盟會，成為國民黨的前身。

各種「會」都是推舉一個老大，實行家長制領導，組織結構和黑社會差不多。孫中山終其一生就是想從會黨的老大成為國家的老大，再通過以黨治國，建立新型的政教合一政權。他雖然也混出國外，但一點也沒有西方的民主意識。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緊接著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在十三日向參議院發出《辭臨時大總統文》和《推薦袁世凱文》；另一件是在十五日舉行「民國統一大典」。作為大典的一項內容，就是由孫中山親自率領「國務卿士、文武將吏」拜謁明太祖朱元璋的墓—孝陵。這次拜謁活動，以孫中山名義發表了兩個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謁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後一篇是「宣讀文」，兩件均已收入《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祭明太祖文》是這樣向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稱臣的：

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臨時大總統孫文，謹昭告於明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靈曰：

嗚呼！國家外患，振古有聞，趙宋末造，代於蒙古，神州陸沉，幾及百年。我高皇帝應時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復大義，昭示來茲。不幸季世俶擾，國力罷疲。滿清乘間入據中夏，嗟我邦人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於二百六十有八年。

嗚呼！我高皇帝時怨時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歲在辛亥八月，武漢軍興，建立民國。義聲所播，天下回應，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復十有七省，國民公議，立臨時政府於南京，文以薄德，被推為臨時總統。瞻顧西北，未盡昭蘇，負疚在躬，尚無以對我高皇帝在天之靈。邇者以全國軍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議，卒使清室幡然悔悟，於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從此中華民國完全統一，邦人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無已，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啟後人，成茲鴻業。文與全國同胞，至於今日，始敢告無罪於我高皇帝，敬於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國民，貢其歡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實鑒臨之。敬告。

孫中山名為祭祖，實為登基，他是多麼想成為漢族中國的太祖高皇帝啊！將孫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對比一下，可以發現它們驚人地相似，都是想過皇帝的癮。孫中山終其一生，不需要像「低端人口」那樣擺攤設點以糊口，革命就是他的職業，革命就是他的大生意。

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還發布了《臨時大總統布告全國同胞書》，「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為布告大漢同胞事……此必我黃帝烈聖在天之靈，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興漢之奇功，蓋可以決滿廷之必無噍類矣。」「今特布告我大漢同胞，共鑒前車，牢持來軫；再接再厲，全始全終。……自能唾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建立共和國，使異族俯首貼耳。」這哪裡是「告全國同胞書」，分明是「告大漢同胞書」！是打倒異族之後大漢同胞之間的狂歡，孫中山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地就是漢族的族長。黃帝是漢族的老祖宗，孫中山現在就是漢族的活祖宗。也許是因為太露骨了，這篇文章沒有收入《孫中山全集》，保留在國民黨國防研究院印行的《國父全書》裡。所謂「國父」，也是國民黨強加給中國所有民族的。



孫文著臨時大總統之戎裝，於南京祭祀明太祖朱元璋之紀念照。

武昌起義之時，孫中山根本不在國內。不過隨之成立的軍政府在閱馬場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大典」，昭示漢族光復大業成功，特告慰華夏始祖軒轅黃帝的在天之靈。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病死在北京，還沒有入土，遺體暫厝西山碧雲寺，等待南京修建中山陵。要求死後和蘇聯列寧那樣，保留遺體「供民眾瞻仰」。在他病故的第二天，當時還未能奪取政權的國民黨就與蘇聯共產黨爸爸聯繫，定制安葬列寧時使用的那種「水晶棺」。三月下旬，蘇聯共產黨用火車將「水晶棺」運來中國，因技術問題，最終未能使用。這才決定將孫中山埋葬在南京。為什麼非要埋在南京呢？因為他的太祖朱元璋也埋在南京。中山陵完全是按照皇帝的規格建造的。一九二九年春，中山陵主體工程完工，同年六月一日舉行了「奉安大典」。為迎接這具僵屍，全國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鐘，全國民眾一律停止工作，靜默三分鐘致哀。國民黨政府強迫全國人民天天要學《總理遺著》，總之孫中山死了還不安神，還要繼續禍害人民。

孫中山這人非常崇外，趕時髦信仰了基督教。連「中山」這個名字都是取自日本人的姓。從精神上講，孫中山完全脫離了中國人，屬於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中國共產黨供奉孫中山為先行者，以繼承孫中山的道統自居。每年十月一號國慶日，天安門廣場都要供奉孫中山的像，與天

安門城樓的毛澤東像遙遙相對。中國共產黨自豪地宣稱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孫中山確實已經先行。

由驅逐到暗殺再到屠殺，是造反派對付滿族的三個步驟。奉行復仇主義，鼓吹暗殺，這些東方塔利班歌頌「暗殺時代」。北京市五四大街原北京大學紅樓，現在改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展品有蔡元培的手槍，就是暗殺用的。

《湖北革命實錄長編》載：武昌首義之後，「是日（十月十一日），革軍遇旗人，不論老少皆殺。」在目睹了武昌城內屠殺滿人的慘境，梁鼎芬致書武昌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痛陳「萬國兵禍無此慘酷」，並質問他：「謂滿洲為異種人，西洋各國獨同種乎？何以於此則殺惟恐不盡，於彼則待之惟恐不親。媚人欺己，諂強凌弱，黃帝無此政教。」[10]如此藉革命之目，行屠殺之實，梁氏書正是鐵證。

伍孫中山自揭「五族共和」大騙局

等到辛亥革命勝利，排滿的任務僥倖提前完成，如果僅僅以黃帝作為漢種的祖先，中華民國將失去新疆、蒙古、西藏等大片領土。如果只要求光復漢族的中國本部，以外的地盤遠遠大於本部，這是革命黨不甘心的，於是有「五族共和」論出籠打圓場。

孫中山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發布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主張： 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族，是曰民族之統一。

合為一國也好，合為一族也好，徵求了滿、蒙、回、藏各族同意了嗎？問過所有漢族了嗎？清帝遜位三天後，二月十五日，孫中山即往謁明孝陵，發布兩篇祭文，完全站在「驅逐韃虜」的立場，抬出朱元璋，將民國法統之繼承對象，歸諸明國，又將清廷蔑稱為「東胡」、「滿虜」、「夷狄」。一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在電報中稱「兩會（指同盟會、光復會）欣戴宗國，同仇建虜」[11]，所謂「建虜」，等於說興起與建州的滿族野蠻人。既然這麼看不起這些野蠻人，為什麼還要與他們合為一國、合為一族呢？無非是貪圖野蠻人的土地。

一九一四年五月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就這樣寫著：「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有人一本正經地拿清國皇帝的退位詔書說事，認為既然滿清將政權交給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理所當然地

繼承清國的領土。但是我們都知道，要使簽約有效，必須保證雙方都有表達自己意願的自由。退位詔書那口氣正是假漢人天命論、人本論的混合，雖然至今找不到作者是誰，但肯定不是溥儀皇帝本人。因此，這樣的退位詔書只能是無效合同。

正如漢族作家茉莉指出的那樣，如果當今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不想割斷歷史，他們就應該承認，他們的前任──曾在大陸執政幾十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西藏等邊疆民族問題上所犯下的嚴重錯誤，其中包括：製造「五族共和」之泡沫，虛構「中華民族」之名義，不經邊疆民族同意，單方面宣示對他民族的主權，給後來武力攻占、強行行使國家主權提供了所謂的法理依據，從此釀成百年衝突，給邊疆民族帶來了百年厄運。所有的這一切，都根源於大漢族主義者的「大一統」觀念，歸因於強勢民族的利己主義[12]。

這裡順便解釋一下「大一統」[13]，目前已經成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前面多次說到，西元前一〇二七年西周建國之後，分封了一大批國家，形成「周盟」，他們以「華夏」標榜，後世遂誤認為在先秦形成了一個華夏民族，這是本書下一章反駁的主題。魯國因為是周公的封國，周公是西周的總設計師，相當於中共的鄧小平，得到王室的賞賜特別多，魯國從此將成為周文化的博物院。

孔子就是魯國人，對周公崇拜得五體投地。魯國有一部編年體史書叫《春秋》，儒家一直一口咬定是孔子編的，至今還有相當多的人信以為真。儒家說，孔子編這個書的時候，故意不把大道理說出來，這些大道理就叫「微言大義」，需要解釋，大家才能懂藏在字縫背後的意思。《春秋》是孔聖人編的，叫「經」。解釋經的，要低一個層次，叫「傳」。解釋《春秋》經的，形成了三大派，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公羊、穀梁、左都是儒生的姓，具體是誰，至今沒有定論。《春秋》因為殘缺不全，從魯隱公開始記載。假如齊全的話，應該從周公記起，對不對？至少要從伯禽記起，因為周公這麼重要的人物要留在王室日理萬機，魯國就交給他兒子伯禽實際治理。

《春秋》第一句話：「元年春王正月。」元年當然是魯國的隱年，王卻是周王，用現在的話說，「王」是中央，魯是地方。地方既然接受分封，就要採取中央的曆法，古書有個專門的詞，叫「正朔」。比如二〇一九年，在台灣叫中華民國一〇八年，這就是正朔，只能在台灣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不接受的。同理，中央研究院的人來大陸開

會，「中央研究院」一定會縮水為三個字「中研院」，作用和正朔差不多，就是絕不承認有兩個中央。

《公羊傳》解釋道：「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個「大」，是動詞，可以理解為表彰、彰顯。一統呢，就有點水分。第一，周王室的正朔僅僅通行於分封國，其他的泱泱大國如楚國，彈丸之地如邾國，必然不會買帳。第二，周王室對分封國的事物無權干預。到了春秋時期，王室自身難保，還要仰仗分封國保駕，「尊王攘夷」的口號就是這樣出籠的。

前面也講到，劉邦討厭儒生，漢國建立之初，窮得很，國家的意識形態是黃老之學，這是托名黃帝、老子的一種學說，主張無為而治，相當於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說的「不折騰」。到了漢武帝，國家有錢，他要折騰了。《公羊傳》還有一個思想，是鼓勵復仇。匈奴圍困過劉邦，羞辱過呂皇后，這還得了？復仇！復仇！這和革命黨鼓吹的「革命哉，革命哉」多像！因此，儒生公羊派就受到漢武帝的青睞，當的當官，講的講課，好不威風！穀梁派、左氏派的儒生只能流口水了。這和現在申報課題、套取科研經費不是一回事嗎？古史大師顧頡剛先生寫了一本極其通俗的《漢代的方士和儒生》，方士是裝神弄鬼的，儒生是啃經書的，目標一致，都是不願當低端人口，要吃輕鬆飯，別以為古人都是書呆子。因此，我們現代人為什麼要接受古代學術騙子「大一統」的騙術？如果真有漢族，這是你們的民族遺產，不妨信一信，四夷與儒學無關，沒有義務接受你們的教義。

革命黨對於中國丟失高麗這塊殖民地，痛心疾首，認為「高麗自明以來，已具藩服之形式於中國」應當永遠臣服於中國才好[14]。高麗是四夷的一支，革命黨已及之後掌權的革命黨一直覬覦四夷的土地，宗族論、邊政學……都是這樣應運而生的。

沒過幾年，孫中山拋棄五族共和論，對五族共和論深惡痛絕。他在一九一九年還有這樣的論述：「更有無知妄作者，於革命成功之初，創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官僚從而附和之，且以滿清之一品官員之五色旗，為我中華民國之國旗，以為五色者，代表漢、滿、蒙、回、藏也。而革命黨人亦多不察。」

可見孫中山反對五族共和論是發自內心深處。北洋政府時期的國旗為「五色旗」。紅黃藍白黑五色，象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稍後，國民黨時期的國旗，即「青天白日滿地紅」，以紅白藍三種色彩象徵自

由、平等、博愛，象徵三民主義，也是對五族共和的否定。孫中山骨子裡就是要用漢族強制同化其他所有民族，他毫不掩飾地說：「今日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滿、蒙、回、藏等）同化於我。」

韓國學者引用孫中山上面這段話之後指出，五族共和極有可能是面對周邊民族的獨立主張實施的一種懷柔和撫慰策略。事實上，孫中山在勸說蒙古方面取消獨立要求時，集中宣傳了五族共和的主張，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孫中山的五族共和主張被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融合政策所代替，例如：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演講「滿清雖然滅亡了，但是為了抵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民族主義仍需要繼續」，「現在停止五族共和，促進民族的融合，只有建立一個中華民族才能成就民族主義」[15]。

《民報》創立之初，第壹號自己標注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二十六日初版發行，十二月八日再版發行，有以下中外偉人的像：

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偉人黃帝（《民報》自注：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

世界第一之民權主義大家盧梭

世界第一之共和國建設者華盛頓

世界第一之平等博愛主義大家墨翟

這說明革命黨對民主思想家如盧梭，民主實踐者如華盛頓，以及中國本土的博愛思想家並不陌生，而他們供奉的祖先則是一個殺人如麻的征服者，他們偽造的四萬萬皇漢民族則是為了結集人數優勢，以吞併同化其他民族，爾後他們建立的共和國最終走向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黃帝是革命黨用來打人的手段，皇漢民族也是。革命黨並沒有得魚忘筌，一旦掌握權力，就要變本加厲地推行法東斯政策。

陸異族由漢族來「代表」

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以和平手段迫使清帝退位，於一九一二年三月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從一九一二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初。袁世凱根據《臨時約法》，在全國進行了國會（參議院、眾議院）議員選舉。第一屆參議員選舉，上海籍的漢人曹汝霖竟被選為蒙古代表，他本

人也不知情，原來蒙古議員，名為選舉，實則由總統指派，故蒙古議員中，滿、蒙、漢人都有。蒙古是滿洲的盟友，清國皇帝退位，同盟關係瓦解，蒙古於一九一一年自行宣布獨立，但仍然要遭到漢人政權的「被代表」。

又如，四川北部汶川縣，是一個偏僻的羌族聚居區。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這裡發生大地震，單是香港就捐款二百億。四川維權與環保人士譚作人，當年因調查學校豆腐渣工程，被四川當局以「煽顛罪」判刑五年。汶川當地為發展旅遊，鼓勵漢族裝扮成羌族，以吸引人們前來旅遊。

二〇〇八年，中國在北京舉辦了奧運會，耗資之大在奧運史上沒有先例，其中有盛大的歌舞表演，少數民族小孩子表演者全部由漢族裝扮。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柒由民族主義到民族帝國主義：國民黨推行民族強制同化政策

「帝國主義」一詞也是在排滿運動中熱炒起來的。革命黨一方面譴責西方列強對世界的侵略，一方面又羨慕他們搶來的地盤。除了表彰黃帝能征善戰，革命黨還表彰了一大批「嗜殺異種如命之偉人」，如岳飛、文天祥、鄭成功。這些「嗜殺異種如命之偉人」構築了「黃帝魂」。柳亞子所作《鄭成功傳》就說，假如鄭成功生在當代，「則所謂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者，方將出現於皇漢之歷史。」排滿家對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真是羨慕得要死啊！

一九〇五年，黃節為《國粹學報》作序，稱「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其為布帛菽粟，而無待於他求者，夥矣」。因此要研究國學，「期光復乎吾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已。」[16]「巴克」，拉庫伯里對最早的中國人的稱呼。發揚國粹、宣揚國光，也是配合排滿運動。同年，黃節於《國粹學報》分期發表《黃史》一書，於「總敘」中，呼籲提倡民族帝國主義[17]：

……柏林史學大會宣言曰：「提倡民族帝國主義，造新國民為歷史家第一要義，否則外族入霸，國恆亡。」黃史氏曰：悲夫吾國種族史之亡而社會無傳記也。……於戲！中國存亡，若絕若續，我生不辰，日月

告凶，痛乎夷夏羼雜而懼史亡則有國亡種亡之慘，乃取官書正史而讀之……時復訪及野乘、馳心異域，則竊有志乎黃史之作，條別宗法，統於黃帝，以迄今日，以述吾種人興替之跡。

「黃史」大致相當於黃種史，也就是漢族史。汪精衛的政治生涯也是從排滿起家，長期與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論戰。一九〇五年，他在《民報》第一期發表《民族的國民》，大聲疾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一民族為一國民。」也就是要將所有的國民同化為漢族，使中國成為單一的民族。他在《希望滿洲立憲者聽諸》一文列舉了各國實行民族主義的例子，主張民族主義既已達到目的之後，那些糅雜之民族，有的已經被趕走，有的已經被同化，無復軋轢不相下之現象，故政治現象無復扞格，滔然進行。在四處其他弱小民族之後，就需要再上一個新台階，「遂由民族主義一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民族主義是用來鞏固其本族的。民族帝國主義，則由本族既已鞏固，乃廣收其他民族以求膨脹，如侯官嚴復所云：「如封豕長蛇吞食鹿象，入其腹中。象鹿機關，至此盡成齏粉。徐徐轉變，化合新體。」彼英、德、法等國，正在盛行民族帝國主義，以廣拓殖民地，而民族主義棄置不道復者，其境遇實使之然。汪精衛斷言：「我中國實行民族主義之後，終有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一日。」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後，朝鮮這樣的老殖民地當然要奪回來，還向外擴張新的殖民地。

魏明經先生與我同在歷史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我一九九四年來歷史所的時候，他已經退休，因此至今沒有見過面。在一九五四年前後討論漢族形成問題的時候，他發表了一篇《論民族的產生及中國各民族的演變過程》，指出過去革命黨也曾宣傳「中華民族」，其目的是想以漢民族同化其他民族。魏先生所說的革命黨，正是辛亥革命前後的排滿運動家，包括孫中山在內。不過此時還處於排滿的輿論階段。一旦這夥中國的塔利班掌權，就要將民族帝國主義付諸實施。汪精衛的斷言沒錯。

果然，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不久下台，同盟會本部轉至南京，三月三日召開全體會員大會。三月四日，同盟會選舉孫中山為總理，通過十大政綱，其中第三條是實行種族同化，第十條是注重移民墾殖事業，第十條是為第一條服務的，因為漢地人滿為患，往哪移民呢？只有打非漢區的主意。此後這個民國時期官方和學術界所說的「邊政」，就是向四夷地區移民，把牧區開墾為農業區。

一九一二年，同盟會制定新章程，革命宗旨轉變為「鞏固中華民族，實行民生主義」，九條政綱第一條是「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第二條是「實行種族同化」。種族同化當然要由先進的漢族來完成。

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發表演說，系統闡述了國民黨的漢族同化政策：

什麼叫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那個時候滿虜正盤踞中原，革命家只致力於民族主義，而於民權、民生二主義都未置意。……

何以說民族主義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自從滿洲來到中國，我們漢族被他征服二百幾十年之久。今日滿虜雖被推翻，光復漢業，是吾民族尚未能自由獨立。這個原因，就是本黨只做了消極的功夫，沒做積極的功夫。自歐戰告終，世界局面一變，潮流所趨，都注重到民族自決。我中國尤為世界民族中底最大問題。在東亞底國家嚴格講起來，不過一個暹羅，一個日本，可稱是完全底獨立國。中國幅員廣大，人民眾多，比較他們兩國何止數十倍。但是幅員很大，人民雖多，只可稱個半獨立國罷了。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吾黨之錯誤。自光復之後，就有世襲底官僚，頑固的舊黨，復辟的宗社黨，湊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

中華民國建國都十年了，孫中山仍然張口「滿虜」閉口「滿虜」，證明他壓根沒有民族平等的觀念。他把五族共和定性為守舊復辟勢力所為，足見對五族共和的鄙視。那麼他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發布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主張「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族」，就證明是政客的演技了。

孫中山進一步痛批五族共和論：

豈知根本錯誤就在這個地方。講到五族的人數，藏人不過四五百萬，蒙古人不過百萬，滿人只數百萬，回教雖眾，大都漢人。講到他們的形勢，滿洲既處日人勢力之下，蒙古向為俄範圍，西藏亦幾成英國的囊中物，足見他們皆無自衛的能力，我們漢族應幫助他才是。漢族號稱四萬萬，或尚不止此數，而不能真正獨立組一完全漢族的國家，實是我們漢族莫大的羞恥，這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沒有成功。由此可知，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大

民族主義的國家。

孫中山主張漢族應該幫助五族，中國共產黨的術語叫「解放」。按照中共的說法，西藏實行的是奴隸制，由此才有一九五九年的解放西藏戰爭。台灣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制，當然要解放為人民代表制。至今中共的軍隊還叫解放軍，因為還有台灣沒解放。孫中山舉例：「試看彼美國，在今是號稱世界最強、最富的民族國家。他的民族結合，有黑種，有白種，幾不下數十種白種，為世界中民族最多的集合體。自美國國家成立，有英國人、荷蘭人、德國人、法國人，參加入他的組織中。美國全部人口一萬萬，德國人種在美國的約有二千萬，實占他的人口總數五分之一；其他英、荷、法各種人在美國的數也不少。何以美國不稱英、荷、法、德 、美，而稱美利堅呢？要知美利堅的新民族，乃合英、荷、法、德種人同化於美而成的名詞，亦適成其為美利堅民族，為美利堅民族，乃有今日光華燦爛的美國。看看民族的作用偉大不偉大？」孫中山認為美國的民族主義乃是積極的民族主義，由此中國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的民族主義」。也就是用漢族同化其他所有民族。他說[18]：

或有人說五族共和揭櫫已久，此時單講漢族，不慮滿、蒙、回、藏不願意嗎？此層兄弟以為可以不慮。彼滿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無自衛能力的表徵。然提撕振拔他們，仍賴我們漢族。兄弟現在想得一處調和的方法，即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並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的機會。仿美利堅民族的規模，將漢族儘管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民族主義國家，必有種種的關係因果，有歷史的關係，有地球的關係。如瑞士國，他那國家已成了一個完全的民組主義的國家。瑞士位於歐洲中部，他的國界，一面與法接壤，一面與德接壤，又一面與義大利接壤。但國土無論與何國交界，或與法國交界，或與德國交界，或與意國交界，其人民的語文、種族皆與相同，而又能組成一完全的瑞士民族的國家，是真難得。且瑞士為行使直接民權的國家，法國則為間接民權國家。全世界中行使直接的民權，以瑞士為第一，民權發達一臻極則，國內的政治及民族結合，與美國大致相同，真是我們一極好的先例。故將來無論何種民族參加於我中國，務今同化於我漢族。本

黨所持的民族主義，乃積極的民族主義。諸君不要忘記。

注意，孫中山說的中華民族就是漢族，不包括漢族以外的劣等民族。如果說孫中山因為死得早，還沒來得及大力推行漢族同化政策，繼任的蔣介石推動漢族同化可謂不遺餘力。馬鶴天是一位旅行家，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國民黨從事革命活動，當過甘肅教育廳廳長，到過漢人很少涉足的蒙古、康藏。他寫的《內外蒙古考察日記》於一九三二年出版，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為該書作序，其中說：「漢民族文化優於蒙古民族而中國建國之基本為漢民族之文化，故今後漢民族應努力以其文化化蒙古民族，而蒙古民族應努力接受漢民族之文化以復於上古同族同宗之本源，而造成真正統一之中華民國千載萬世，發展無窮，為人類文化之光。藏回諸族其理亦同。」劣等民族應該主動配合漢族的同化。好比別人強姦你，你必須配合強姦，否則就會攤上不配合強姦的罪行，中國已經有這樣的司法案例。同理，等於四夷，打你的時候，就說「驅逐韃虜」，同化你的時候，就說「同族同宗」。

捌中國本部與十八省建國

大清國把統治區域分為內地十八行省和滿洲、蒙古、新疆、西藏。因這一地區共有十八行省，而被命名為內地十八省。這十八個省分別為：直隸（首都所在行省，現為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江蘇、江西、浙江、福建、安徽。「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以中國本部的十八省作為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範圍。即使像劉師培、章太炎那樣的狂熱排滿健將，也承認東三省屬滿洲所有，不屬中國本部，任由滿洲自治。鄒容的《革命軍》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種」就說：「『中國人種，蔓延於中國本部，西藏及後印度一帶地方』，可分為三族，第一是漢族，據『中國本部』，第二是西藏族，第三是交趾支那族，自支那西南部，即雲南貴州諸省，二蔓延與安南暹羅等國。『此族在古代似占據中國本部，而為漢族所漸次驅逐者。[19]

武昌起義時，革命軍曾打出「十八星旗」。十八顆黃星，象徵「中國本部」十八省。這十八省，正是明國的版圖。自武昌首義，引起多米諾效應，排滿的任務僥倖提前完成，各地發布檄文，成立軍政府。四川

軍政府成立時，打出的旗幟是白底十八個圓圈，圍著一個「漢」字。十八個圓圈代表十八個省。

需要指出的是，大量的非漢民族就住在「中國本部」。《明史》卷三百一十起，設《土司傳》，記載了大量土司，計有：湖廣土司、四川土司、雲南土司、貴州土司、廣西土司，領土範圍極廣，如廣西土司之下包括廣東瓊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島。《土司傳》之後是《外國傳》，《外國傳》之後是《西域傳》，西域的範圍比今天的西藏、新疆加起來還要大。

前面講到，一九一二年二月一二日，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率領文武百官拜謁朱元璋的墓，還發表了兩個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謁明太祖陵文》，表示完成了「驅除韃虜」的任務，恢復了中國本部。英文裡將「中國本部」對譯為「China Proper」。孫中山也曾主張將滿洲之土地租讓與日本，因為滿洲無關中國本部之痛癢。劉師培早有長篇大論《滿洲非中國論》，從《民報》第十四號起（1907），在《民報》上連載，比汪精衛等人的論證更全面，贏得革命黨（如章太炎、胡漢民、汪精衛）的熱烈喝彩。

此後孫中山、毛澤東及其所屬的革命黨、共產黨都頻繁使用「中國本部」一詞。如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二年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本黨任務和奮鬥目標，其中之一就是「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發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20]，說「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盧溝橋中國軍隊的抗戰，是中國全國性抗戰的開始」。

中華民國建立之後，蒙古、西藏也宣告獨立，並互相承認。國民黨的宣傳部門開始不讓使用「中國本部」一詞。古史辨學派創始人顧頡剛先生草木皆兵，認為「華北」、「華中」、「華南」、「華西」都是外國人有意分裂中國。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敗退台灣。頗受蔣介石尊重的錢穆（1895–1990），他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四講「明代」中，指責「中國本部」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來做侵略的口實」。他說[21]：

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所謂本部非本部之別。秦代萬里長城早已東達大同江，遼河流域永遠在中國歷史圈之內，如何說它不是中國之本

部？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來做侵略的口實。此刻又有所謂華南、華中、華北等稱呼，試問中國政治區域上，有沒有這些分法呢？中國人不注意，大家跟著這樣叫，現在還沒有事，不要緊，十年二十年以後，說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發生問題。連我們的腦筋裡、觀念上，也會發生問題的。如想我們是華南，你們是華北，這些觀念，都會發生很大作用。這因講元代的行省，而牽連涉及。這都該值得我們警惕的。省區的省字，根本是一個不祥的名稱，最好以後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區域之劃分下把這字革除，再不沿襲。

錢先生這本書是一講演集，是先生五十年代在台灣戰略顧問委員會講的，明顯地懷著經世致用的苦心。「中國本部」本是辛亥革命狂熱分子掛在嘴邊的口頭禪，錢先生悍然否定，還嫁禍於外族，甚至反對華南、華中、華北等稱呼，曾經疑古的錢先生已經變得神經過敏。其實中國本部也並非只有漢族，明國大量設置的土司，就是原住民保護地。雖然在清國統治時遭到改土歸流，只改變了統治形式，原住民的結構並沒有改變。


錢穆，知名歷史學者及中研院院士，著有《國史大綱》。

玖中華民族宗族論

對於辛亥革命之後到國民黨統治的中國社會，同時代的韓國人有這樣的觀察[22]：

辛亥革命使中原回到漢民族手中已經二十六年。所謂革命，所謂民國，所謂訓政時期，所謂新生活運動，不管是什麼都停留在表面。如果要問在這四分之一世紀中支那的民眾得到了什麼實質性的好處，除了軍

閥的暴虐和黨部的專制之外，實際上沒有享受到一絲一毫的光明，這是全天下人有目共睹。

這個「黨部」是國民黨從蘇聯學來，以黨治國開啟了中國史無前例的白色恐怖時代。一九三七年，日本大舉入侵，為國民黨宣傳民族主義提供了極佳的藉口。民國二十八年（1939）二月九日，在雲南大學執教的顧頡剛先生，於昆明《益世報．邊疆週刊》發表一篇題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明確提出中國只存在一個「中華民族」，把中國的漢、滿、蒙、回、藏等群體都稱為「民族」，是帝國主義分化和瓦解中國的策略和陰謀，「偽滿洲國」即是一例。此時國民黨把首都南京都丟了，倉皇逃到重慶。一九三九年七月，蔣介石即在演講中否認漢語穆斯林為「回族」、「回回民族」或「回教民族」，而從一九四〇年代初開始，蔣介石不再稱漢、滿、蒙、回、藏各族為「民族」，也不稱之為「種族」。



民國初年的政治宣傳漫畫。

既然滿、蒙、回、藏各族不能再稱為「民族」，更不能稱之為「種族」，那該如何稱呼呢？蔣介石稱之為「宗族」，他在一九四二年對一些非漢民族頭面人物說[23]：

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的一個整

體的總名詞。我們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說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族一樣。《詩經》上說，『本支百世』，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說明我們中華民族各單位融合一體的性質和關係。我們集許多家族而成宗族，更由宗族合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國父孫先生說：『結合四萬萬人為一個堅固的民族』。所以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其中單位最切當的名稱，實在應稱為宗族。

這就是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是國民黨針對異族的新統戰策略。蔣介石撰於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作為領袖著作印發全國。該書的主線就是「中華民族宗族論」，也就是說，五族不是各自獨立的民族，而是原本有著共同血緣的不同宗族。五族的生活、言語、風俗習慣各異，但都具有單一中華民族的相同血統。「異」的部分只是因為兄弟分散而居，逐漸演化而成。這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一再強調的中華民族即漢族完全不同。

抗戰期間，「中華民族宗族論」取得了正統的地位。不僅在學界，如羅家倫的《新民族觀》、俞劍華的《中華民族史》等著作，不愧是通經致用，將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觀解釋得頭頭是道。甚至在非漢民族中，也有人也支持蔣介石，如回族白壽彝。此人在江澤民時代主編了一套《中國通史》，受到官方的表揚。出身彝族的雲南軍政領袖龍雲，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多年後，還贊同「中華民族宗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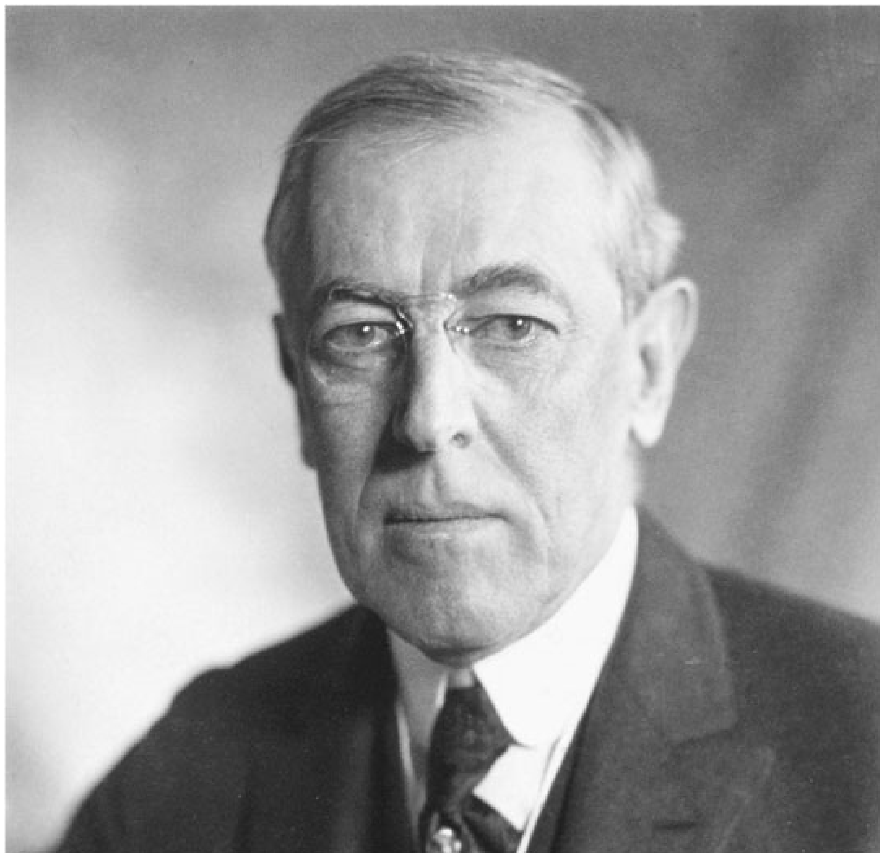
不過，共產黨此時正與國民黨爭奪天下，急需異族支援，趁機猛烈批判《中國之命運》是大漢族主義，也是法西斯主義。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抗日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這樣批判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他們對於各少數民族，完全繼承清朝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對於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殺事件，一九四四年對於新疆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件，以及對於甘肅回民的屠殺事件，就是明證。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

共產黨說蔣介石是法西斯，其實沒錯。國民黨要求全國人民信奉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這不是法西斯又是什麼呢？此時共產黨已經壯大，但畢竟還沒有坐天下，所以在民族問題上刻意大義凜然。

另外，國民黨沒有忘記他們的老祖宗黃帝開疆拓土的光榮革命史，炮製了南中國海「九段線」。由於菲律賓起訴，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海牙國際仲裁法庭正式判決「九段線」不合法。海牙國際法庭網站也因此遭遇癱瘓的報復。

拾阻止民族自決

自決權是西方的政治概念。在十七世紀英國學者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憲政思想中就提出過民族自決權的概念。之後的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將民族自治權的概念引入到國際法中。他提出全球中凡自認為構成民族的團體，都有組建自己國家的權利。威爾遜被尊為「現代自決原則之父」，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聯合國一向支持民族自決權。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兩公約（即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開放給各成員國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表述，人民自決是指特定領土上的全體人民—未必屬於同一個民族—共同決定解除其現有的國家從屬關係的權利。人民有自決權，民族當然也有自決權。


提倡民族自決權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一九一四年，列寧發表了《論民族自決權》一文，首次對民族自決權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提出了列寧主義的民族自決權概念：「所謂民族自決，就是民族脫離異族集體的國家分離，就是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從歷史的和經濟的觀點來看，馬克思主義者的綱領上所談的民族自決，除了政治自決，即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以外，不能有什麼別的意義。」「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決權。」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民族自決權」原則作為前蘇聯的外交政策在第一號法令中宣布之後，成為蘇維埃政府和平調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建立了第三國際，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曾做出決議，建議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以「符合時代精神」。其中「民族主義」的內容之一就是，「中國民族運動同受中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少數民族的革命

運動進行合作」，即「國民黨應公開提出國內各民族自決的原則，以便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軍閥制度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後，這個原則能體現在由以前的中華帝國各民族組成的自由的中華聯邦共和國上」。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內蒙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祝詞，「中國內各民族均有自決權」。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其宣言對滿足這樣的表述不再主張「弱小民族的自決、自治權」，強調弱小民族獨立建國易為帝國主義利用。受壓迫時呼籲民族自決，當權時推行民族同化。中國的德性如此。

共產黨一方，一向高調宣傳民族自決。早在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釗在他創辦的政治刊物《每週評論》第二十二期上，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目是《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他指出要有「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要「把這強盜世界推翻」。他提出了「三大信誓」，即是「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接著在《每週評論》第二十三期上，另一位作者以《五四運動的精神》為題，繼續闡述了李大釗同志的觀點，說明「這次運動，是民族自決的精神」。他強調說：「我們中國人，外受強國的壓制，內受暴力的壓制，已經奄奄無生氣了。當這解放時代不能自決，還待何時？！」

作為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在江西發動武裝部隊，建立蘇維埃政權，形成國中之國。蘇維埃發行的紙幣上還印有「武裝保衛蘇聯」六個大字。一九三一年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大會制定的《憲法大綱》就明確寫著：「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權，一直到承認各弱小民族有權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

經過國民黨的五次圍剿，中共被迫逃亡。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幾次會見外賓時的講話，還一再重申這一主張。中共因此還得到了實惠。例如紅軍在長征途中進入藏區，打出「興蕃滅蔣」的口號，支持藏族獨立，幫助建立了兩個藏族「共和國」，即格勒得沙共和國和波巴人民共和國，格勒得沙政府支援紅軍糧食約一千萬斤，牛、羊、馬、豬等牲畜約二十萬頭，波巴政府提供糧食四百五十萬斤。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說：「紅軍唯一的外債，是紅軍拿了番民的糧食而欠的債，有一天，我們必須向番民償還這筆債。」在《鄧小平文選》裡，還留下紅軍白拿原住民糧食的痕跡。

一九一九年七月和一九二〇年九月，列寧兩次在《對華宣言》中親自宣布，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地歸還中國。結果呢？不僅沒有歸還一分土地，還又從中國奪取一大塊。

蒙古人是大清帝國的締造者之一，滿洲貴族早在遷都北京之前就與蒙古貴族聯姻。當大清皇帝退位，蒙古人認為滿蒙聯盟也不存在了，順理成章地宣布獨立，拉開了「驅逐中國，恢復韃虜」運動的序幕。能征善戰的蒙古人最後皈依了藏傳佛教，甚至認為蒙古人的祖先也是從西藏來的。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一日，西藏和蒙古簽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獨立主權地位，「驅逐中國，恢復四夷」運動初具規模。

一九二二年，中共中央專門討論了蒙古問題，認為在國家組織之原則上，凡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言語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採用自由聯邦制，很難適用單一國之政制；在中國政象之事實上，「我們更應該尊重民族自決的精神」，不應該強制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言語不同之人民和我們同受帝國主義侵略及軍閥統治的痛苦；因此我們不但應該消極的承認蒙古獨立，並且應該積極的幫助他們推倒王公及上級喇嘛之特權，創造他們經濟的及文化的基礎，達到蒙古人民真正獨立自治之客觀的可能。

這是中共沒有奪取政權時的態度。對於已經坐天下的國民黨來說，希望領土越大越好，堅決反對蒙古獨立，學術界也加以配合。

古史辨學派的創立人顧頡剛先生，在抗戰時期，發起編輯《禹貢》雜誌，研究邊疆問題，形成禹貢學派。他就說，歐洲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歐亞之間驟然建立了許多小國家，這「民族」一個名詞又使我們全國人民得著一個新鮮的刺戟，五族之中，彼此就可設想：我們既可以「共和」，又何嘗不可以「自決」；既可自決為「共和」之合，又何嘗不可自決為「獨立」之分。他認為帝國主義偽造民族歷史，慫恿民族自決，鼓動收復失地，掀起邊民和漢人的惡感，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甜言蜜語，好像吊死鬼騙人遊花園，一上了套就是他們的了。顧先生引用了孫中山的民族同化論，煽情地說[24]：

所以我們應當用了團結的理論來喚起邊民的民族情緒，使他們都能知道世界上最愛他們的莫過於和他們同國數千數百年的漢人。雖是中國

還沒有解放，我們的中央政府一時還不能有多大的實力來幫助他們，究竟還勝於口蜜腹劍的帝國主義的欺騙；又使他們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中華民族，雖是由於交通梗阻，一家人不容易見面，然而一家人總是一家人，我們有不能遮掩的先天情誼在，有共同擔受的光榮和恥辱在；而且在現今風雨飄搖的局面之中，合則俱存，離則俱亡，更沒有別條路可走。如果能使每一個邊民都有這樣的覺悟，帝國主義者的分化工作就是再添些氣力也是打不進來的了。

在蘇聯的策劃下，外蒙古人民以全民公決百分之百贊成的投票結果，實現了形式上的主權獨立，獲得了國際承認，雖然「一邊倒」地淪為了蘇聯的附庸國，中共也是擁護的。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有這樣的評論：蒙古的獨立，就是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下，一個新國家的誕生，給世界的和平民主陣營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認蒙古獨立，不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指示，同時對每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值得歡呼的事。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獨立。

當時中共和蘇聯的關係，酷似現在朝鮮和中國的關係，中國還沒有反抗蘇聯老大哥的資本。

外蒙古的獨立，自然影響到內蒙古的獨立傾向。對於內蒙古的獨立運動，中國堅決鎮壓。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於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遭到清洗，波及上百萬人。中共現在也承認針對「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黨」的簡稱）的肅反運動是「擴大化」了。中國的網站也沒有完全封殺內人黨事件有關資料。關於蒙古族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屠殺的秘辛，有蒙古族楊海英教授的經典之作《沒有墓碑的大草原》。

民族自決理論也影響到新疆。自從清帝國倒台，新疆淪為漢族軍閥之手。一九四四年，艾力汗．吐烈（Elihan Tore，1885–1976）率領新疆人揭竿而起，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拉開「三區革命」的序幕。

毛澤東稱讚「三區革命」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和蒙古獨立一樣，「三區革命」也是由蘇聯政府一手策劃、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Beria，1899–1953）親臨邊境坐陣指揮。它打著推翻民族壓迫的自決旗號，引起不同民族的互相廝殺。這場革命匆忙創建的「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具有強烈的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色彩，史

達林擔心泛突厥民族革命在中亞各加盟共和國中泛濫開來，故此緊急剎車，終止了對「三區革命」的支持。


史達林時期掌管蘇聯情報工作的首腦人物貝利亞。

隨後東突革命領袖或被蘇聯誘捕殺害，或遭遇空難。剩下民族立場相對溫和的賽福鼎．艾則孜（Saifuddin Azizi，1915–2003）作為「三區革命」代表而加入了中共陣營，一直當到中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現在將「東突」列入恐怖組織。從二〇〇六年起，全世界謠傳在新疆出現了大批集中營，有人利用衛星定位，搜索出具體位置。有人從新疆政府的採購資訊上進行推算。美國情報部門推測的人

數多達三百多萬。中國剛開始堅決否認，後來承認是培訓轉化中心，目的是預防恐怖主義，並邀請了一些外國人到新疆採訪。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新疆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白皮書，將培訓中心的名稱確定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簡稱「教培中心」。

以前是中國派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人員到全世界解釋西藏問題，尤其是外界關注的一百五十多起藏民自焚事件[25]。現在，中國還需要派出人員向全世界解釋新疆的「教培中心」。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與中國人權研究會於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辦座談會，邀請中國人權研究會和中國國際交流促進會的專家學者，以及十多國家的常駐團，就新疆反恐和去極端化舉措、藏傳佛教活佛轉世，以及香港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等進行交流。

據中國央視新聞報導，出席的國家包括有巴基斯坦、古巴、委內瑞拉、朝鮮、白俄羅斯、尼加拉瓜、沙烏地阿拉伯、印尼、越南、蒲隆地、寮國、新加坡和喀麥隆。中國人權研究會理事、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主任許建英介紹新疆採取反恐和去極端化舉措的背景，並指出設立被外界稱為「再教育營」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等舉措，有效消除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滋生蔓延的土壤，切實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和發展權，保障了各族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幸福。

中國人權研究會理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格桑卓瑪則詳細介紹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強調活佛轉世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已經形成一整套嚴謹而嚴密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特別是必須經過中央政府的批准、認定。

中國國際交流促進會理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陳欣新則講述香港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的由來，強調修例是為彌補法律漏洞，彰顯社會正義，完善香港法治，是必要、正當和合理的。特區政府已宣布正式撤回修例，但激進暴力活動仍未停止，完全超出遊行示威的範疇，香港社會各界應團結一心、拒絕暴力，早日恢復和平穩定局面[26]。

二〇〇八年，以劉曉波為首的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宣布了《零八憲章》，劉曉波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可是中國政府將劉曉波判刑，諾貝爾領獎台上給他留了一把空椅子，劉曉波後來也死在牢裡。為了防止今後追求民主的人到他的墓地朝聖，他的骨灰被要求撒到海裡，不在陸

地留下任何痕跡。應當說，《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各自付出了代價。但是，《零八憲章》以追求民主為宗旨，依然捨不得承認民族自決，只是主張「中華聯邦」，意思是：中國如果變民主了，政府也就變好了，少數民族就沒有必要民族自決了。

其實中華聯邦共和國的思想，中共在一九二二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正式提出過，一九九一年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問題文獻彙編》，還收錄了這個文件。

也是在二〇〇八年，科索沃（Kosovo）通過「獨立公投」，脫離塞爾維亞宣布獨立。就是在當下的二〇一九年十月，蘇格蘭希望借助英國脫離歐盟的機遇，再次謀求從英國獨立。英國是資格最老的民主國家，別人依然想從它那裡獨立。可見獨立的原因有很多，不是僅僅一個擺脫專制的原因。

---

1.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第三卷》，頁八二三。
2. 鄭振鐸編，《晚清文選》（據生活書店一九三七年初版影印），上海：上海書店，一九八七年版，頁五四。
3.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第二卷上冊》，頁九三；白話道人，〈國民意見書〉，《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第一卷下冊》，頁八九三。
4. 「西伯利亞人種，自東方亞細亞北部，蕃殖北方亞細亞一帶……通古斯族。自朝鮮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地。秦漢時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唐時之靺鞨，唐末之契丹，宋之女真等，皆屬此族。今日入主我中國之滿洲人，亦由此族而興焉。」（鄒容，《革命軍》第四章）
5. 鐵郎，〈論各省宜速回應湘贛革命軍〉，《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第二卷下冊》，頁八四八、八五三。
6. 歐榘甲，〈新廣東〉，《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頁二七三。
7. 觀魯，《山東省討滿洲檄》，收入《民報》第拾貳號之後的增刊《天討》頁八一，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發行。本文據《民報》，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影印本，頁二〇一五。
8.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第二卷上冊》，頁八八。
9. 鐵郎，〈論各省宜速回應湘贛革命軍〉，《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第二卷下冊》，頁八五三。
10. 〈梁星海致黎元洪勸降書〉，載於《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頁一三六〇至一三六一。
11. 孫文，〈致陳炯明及中國同盟會電〉，《孫中山全集．第二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頁四六至四七。
12. 茉莉，《百年民族衝突之根源—談中華民國「五族共和」之歷史過錯》，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5/03/blog-post_18.html 。↩

13. 這一主題的最佳著作是楊向奎先生《大一統與儒家思想》。楊先生是老共產黨員，影響到他的立場。我參與了此書的整理，但不能改變他的觀點。↩
14. 胡漢民，〈排外與國際法〉，載於《民報．第七號刊》，頁二〇、頁三二。↩
15. 裴京漢，〈二十世紀初韓中之間的相互認識〉，《東北亞關係史性格》（中文版），東北亞歷史財團，二〇〇九年。↩
16.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第二卷上冊》，頁四四至四五。↩
17. 黃節，〈黃史．總敘〉，載於《國粹學報．一九〇五年》，頁四三至四五。↩
18. 孫文，〈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四七四。↩
19. 《辛亥革命十年間時論選輯．第一卷》，頁六六八。↩
20.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21.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22. 崔南善（최남선），〈北支那的歷史特殊性〉（北支那의 역사적 특수성），《六堂崔南善全集．第十三冊》（육당최남선전집），亦樂出版社（역락출판사），一九七三年，頁五六九。↩
23. 蔣介石，〈中華民族整個共同的責任〉，《蔣總統集．第二冊》，台北國防研究院，一九六八年。↩
24. 顧頡剛，〈內蒙盟旗要求高度自治問題〉，《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四》，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
25. 大陸人知道西藏自焚很晚，直到有一天《青海日報》發表與自焚做堅決鬥爭的文章，大家才如夢初醒。截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已經有一六三名藏民自焚。↩
26. 香港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以來，六〇〇〇多人被捕，大陸人一直在猜傷亡人數，直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香港官方公布：六至九月警方接獲的自殺案達二五六起，送院前或送院時死亡的數字則為二三五七起。這是保安局長李家超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提問，作上述表示的。這就不是小道消息了。↩

第肆章

即使有真漢族，也與春秋時代的華夏無關



北宋畫家李公麟之《免冑圖》，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免冑圖》描繪郭子儀（圖左站立者）率數十騎免冑(徒手不著盔甲)之戰士，孤軍前往回紇敵陣，回紇人敬佩郭子儀的勇敢，下馬拜見的情景。郭子儀是否為漢人，其實也有所爭議。

中國在一九五三年才開始討論漢族形成問題，並且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現在，學術界和政府已經有了統一的說法。即漢族自己標榜漢族的前身是先秦的華夏族，漢族在漢國正式形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官方網站「人口、民族與風俗」[1]欄目下，這樣介紹中國的民族：

夏、商、周至秦漢時期，在漢族的先民華夏族開發黃河流域的同時，各少數民族先民也開發了周圍的廣大地區：東胡、肅慎、挹婁、夫餘、烏桓等民族在東北三省的廣大地區，玁狁、狄、匈奴、鮮卑等民族在今蒙古草原和華北北部以及西北一些地區，龜茲、于闐、鄯善等「城郭國」的各族在今新疆地區，戎、羌、氐等族在今藏、青地區，苗、濮、武陵蠻、長沙蠻以及百越等各族在今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黎族和高山族的先民分別在海南島和台灣，越人的一支在今港、澳地區，等等，各民族祖先在各個地區，以他們的辛勤勞動，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文中錯誤百出，如說夏、商、周至秦漢時期，生活在台灣的是高山

族。對東胡等一連串少數民族的分布也經不起推敲，連「儼」字都搞錯，應該作「玁」或者「獫」。

關於漢族的起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官方網站是這樣講的：

華夏民族發展、轉化為漢族的標誌是漢族族稱的確定。華夏民族統一於秦王朝，其族稱曾經改稱為「秦人」，西域各國就有稱華夏民族為「秦人」的習慣。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國運，使「秦人」的稱呼很快被人們遺忘了。而漢王朝從西漢到東漢，前後長達四百多年，為漢朝之名兼華夏民族之名提供了歷史條件。另外，漢王朝國勢強盛，在對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稱漢朝的軍隊為「漢兵」，漢朝的使者為「漢使」，漢朝的人為「漢人」。於是，在漢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鮮、服西南夷、收閩粵南粵，與周邊少數民族進行空前頻繁的各種交往活動中，漢朝之名遂被他族稱呼為華夏民族之名。呂思勉說：「漢族之名，起於劉邦稱帝之後。」（《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二十二頁。）呂振羽則說：「華族自前漢的武帝宣帝以後，便開始叫漢族。」（《中國民族簡》，三聯書店一九五〇年版，第十九頁。）總而言之，漢族之名自漢王朝始稱。

堂堂的國家政府網站，錯字連篇還不說，活活地把《中國民族簡史》閹割成《中國民族簡》，呂振羽不是無名小輩，他是共產黨官方確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五大元老之一，下一章還要重點講他。

文中「漢兵」、「漢使」、「漢人」的意思不過是漢國的軍隊、漢國的使者、漢國人，斷然不是漢族軍隊、漢族使者、漢族人的意思。漢國建立之初，與匈奴在西北展開拉鋸戰。《漢書．匈奴傳》稱「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顏師古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言也。」習言等於說習慣的說法。匈奴稱中國人為「秦人」，等於說秦國人。同理，匈奴稱呼中國人為「漢人」，等於說漢國人。《史記．大宛列傳》：「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人計：『聞宛域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漢書．李廣利傳》在抄錄這段文字時，僅將「秦人」改為「漢人」。而「中國人」類似今天所謂「內地人」。

類似這種漢族前身是華夏族的說法在所有中國出版的書裡，都是連篇累牘。但如果問他們：夏國在哪？哪一年興起哪一年滅亡？在哪件文

物上寫著「夏」字，他們一定支支吾吾，回答不上來。於是中國政府在一九九五年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據說投資三千多萬元人民幣。二〇〇〇年結束之後，儘管全世界惡評如潮，中國政府還是繼續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先揚言做了為期三年（2001–2003）的預研究，二〇〇四年正式啟動。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發布會，宣布探源工程研究團隊以考古資料實證了中華大地五千年文明。也就是說，國民黨只是開動宣傳機器，宣揚中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共產黨則宣稱找到了實物依據。

為什麼恰恰是五千年呢？李學勤說，為什麼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從黃帝算起啊，剛好五千年。李學勤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負責人，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員。

通過中國政府的幾大學術工程，終於把黃帝從巴比倫奪回中國。但是，以五千年為開端，皇漢民族的祖先依然還是黃帝，與百年前的排滿運動還是一致的。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有漢族的人，不僅主張漢族形成於漢國，而且還不滿足，還要扯上兩三千年前的「華夏族」作為漢族的前身。

其實「華夏」根本不是族，而且與後世所謂「漢族」一點關係都沒有。

壹作為族名、國名的「夏」，本義指西部，匈奴就是夏族後裔

夏，自古以來理所當然地作為中國文化的第一塊基石，與商、周合稱「三代」，也就是三個朝代的意思。我們現在常說的夏朝、商朝、周朝，都是後人的追述，夏國人不會自稱夏朝，商國人也不會自稱商朝，以此類推。《論語．衛靈公》記孔子的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夏時是曆法方面的，輅是車，偉大的發明，是物質文明方面的，冕是帽子，是禮制方面的。孔子的意思是說夏、商、周都有可以取法的地方，值得繼承。孔子還說「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道而行，等於說連續發展。夏、商、周直線連續發展，也正是當今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思維定式。

受此影響，大家從不懷疑商文化必然以夏文化為基礎，在實際操作中，把商文化年代範圍以前的統統劃入夏文化。實際上殷禮以源遠流長的鳥夷文化為基礎，毋需以夏禮為基礎。而且考古學家至今也未能確定

夏文化，呼聲最高的河南洛陽附近的偃師市二里頭遺址，剛開始還只敢說是商的，後來有的考古學家主張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有的考古學家主張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近幾年才發現二里頭遺址的年代定得太早，現在認定的年代在前一七五〇年 - 前一五三〇年之間，只相當於夏的晚期。也就是說，夏文化的起源至今仍然一片茫然。

由於至今沒有發現夏有文字，許多人寄希望考古學一錘定音，不幸的是考古學家沒有吸收最尖端的歷史學成果，反而上了文獻的大當，被「夏，中國之人也」一句話害慘了，認為「中國」指中原，於是都往中原找夏文化，鎖定河南省偃師市二里頭遺址。

這句話出自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夏，中國之人也，從夊。從頁。從臼。臼，兩手。夊，兩足也。」頁是人頭。這一解釋幾千年來讓人費解：難道只有中國之人有頭、兩手、兩足嗎？其實清國的阮元已經指出「夏」與「頌」字義同，「頌」即「容」，通俗點說，就是「樣子」，具體點說，就是歌者、舞者與樂器一起表演的樣子。「夏」字的本義就是跳舞的人，舞者搖頭晃腦，手舞足蹈，因此「夏」字從「夊」從頁從「臼」。舞者經常用到夏翟（雉鳥羽毛）作裝飾，這種舞蹈因此得名「夏」。「夏」舞之得名是因為舞者手持彩色羽毛，與夏國、夏代、夏朝、夏禹、夏族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除了國名、族名，「夏」也是一個多義字，具有「中國之人」意思的夏，是一種舞蹈，不是夏朝的夏。

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字義相關，互相照應。例如孔子的學生司馬耕，字牛，因為古代用牛耕地，現在仍然如此。岳飛，字鵬舉，鵬舉是鳥飛的意思，照應「飛」。我追隨多年的楊向奎先生（1910–2000），字拱辰，奎是奎星，辰是北斗，都屬於星宿。春秋時陳國公子少西字夏，鄭國公孫夏字西，他們的名和字用夏、西對應，根據古人名和字相照應的規律，可以推知，在春秋時代，「夏」字的本義指西部，清人朱駿聲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2]，劉起釪先生也指出，「說明春秋時人的心目中也認為夏人原是處於中原以西的西土的」[3]。

不僅如此，後世尚以「夏」代表西北。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北有二門：西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北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三十七《隴西行》，一曰《步出夏門行》。顧頡剛先生據此指出古代即以夏指西北隅。或稱夏，或稱大夏，意思是一樣的[4]。一九四九年後，古史辨學派被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視為對立面，顧

先生的遠見卓識至今不受重視。

在馬克思主義學派方面，早在七八十年前，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第一冊雖然沒有斷定夏起源於哪個地方，但他指出中國西部地區稱為夏，是其卓識。他引據春秋時鄭國大夫子西名夏，證明夏有西義，又指出夏又含有雅、正、大義。宗周詩篇稱雅詩，《秦風》詩篇稱為夏聲，夏聲即雅詩，就是用西方人的聲音歌唱的詩篇。東方齊、魯、衛等大國諸侯本從西方遷來，因之東方諸國稱東夏，東西通稱為諸夏[5]。

《國語．周語》記載大禹治水，得到皇天的嘉獎，不僅把天下給了禹，還賜姓「姒」，賜氏「有夏」。 這是典型的「神聖家族」。《詩經．大雅．大明》記周文王在渭水迎娶姒姓之女，說明直到周初，渭水流域依然有姒姓，也就是夏族。

興起於渭水的周人是姬姓，自稱為夏（如「區夏」、「時夏」，後面有討論），從黃河下游西遷到陝西、甘肅的秦人，也稱「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春秋時吳國著名賢公子季札出使魯國，魯國人為他表演周王室的樂舞。魯國是周公的封國，保存周國的禮樂最全面。樂工「為之歌秦」，季札點評道：「這叫做『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這裡將秦國的音樂稱為「夏聲」，而且是「周舊」，說明周與秦所處者曾經都是夏境。周族發祥於西部渭水流域是確切無疑。《詩經．小雅．鼓鐘》篇所說的「以《雅》以《南》」也就是「以《夏》以《南》」，這個「《雅》」字也指夏地。戰國中期墨家著作《墨子》稱引「于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所引《大夏》在今《詩經．大雅．皇矣》，也可以證明夏、雅相通。這說明甘肅、陝西境內的渭水流域，正是夏、周、秦重要的活動地域。

一九七五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一百七十六號，《法律答問》記載：「『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何謂『去夏』？欲去秦屬是謂『去夏』。」一百七十七號至一百七十八號簡：「何謂『夏子』？臣邦父、秦母謂也。」離開秦國叫「去夏」，孩子的母親是秦國人才能稱為「夏子」，「夏」指秦國的意思十分明顯。此時的秦國正是在西部。

匈奴為夏族後裔。這是司馬遷鄭重寫入《史記》的。當代學者幾乎都不相信，他們認為，認定夏文化代表農耕文明，匈奴代表遊牧文明，二者不可能同源。近幾年，本人獲得了新的論據，要點是：夏族是姒

姓，「姒」字的本字是「以」，「允」字在金文中作 ，已經是族名，字形是把人、 （以）上下合寫，清國的王引之已經指出「以」和「允」相通。一九五一年，在山東省黃縣出土八件春秋時代銅器，銘文「慶其以臧」，其他的盨作「允臧」，證明以、允通用。夏族的姒姓實際來自禹的母親修己，己、以二字相通。 字關鍵部分就是上半部的「以」，字形有 、 等變化，是盤蛇的象形。「以」在小篆中作 ，還保留蛇的象形。由蛇進一步神化為龍，古人將龍歸為蟲類，認為是智慧的象徵（《左傳》：「蟲莫知于龍」）。

過去，魯迅等人將古史辨運動簡化為「禹是一條蟲」，加以諷刺，現在看來古史辨學派很超前。春秋時有一個民族被醜化為「允姓之姦」，欒調甫（1889–1927）先生已指出「允」為允人專字，是玁狁的同族。玁狁的後裔為匈奴，司馬遷寫入《史記．匈奴列傳》。玁狁的祖先就是夏族。國際學術界研究草原民族、草原帝國，無不追溯到匈奴，其實在我看來，還可以由匈奴追溯到夏族。

很多人誤以為「胡」是貶義詞。其實「胡」有「大」義。清國考據學大師王念孫（1744–1832）《釋大》云[6]：

宏，大也，轉之為夏。《方言》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詩》曰「肆于時夏」。又轉之為洪。《爾雅》曰：「宏、夏、洪，大也。」又轉之為夥為⿰言過。《史記．陳涉世家》：楚人謂多為夥。《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人語而過謂之⿰言過。《說文》曰，□□，齊謂多為□□。又轉之為皇。《白虎通》曰：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又轉之為匯。又轉之為賢。又轉之為胡。《儀禮》曰：永受胡福。《廣雅》曰：皇、匯、賢、胡，大也。又轉之為後。《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天、帝、皇、後、辟、公、廓、宏、溥、介、純、夏、憮、塚、晊、昄，皆大也。又轉之為扈。《禮記》：爾無扈扈爾。鄭注：扈扈，謂太廣。又轉之為華。又轉之為摦。又轉之為奃。《說文》：奃，奢奃也，從大，亙聲。又轉之為奚。奚，《說文》曰：奚，大腹也。從大，⿱爫絲省聲。又轉之為昊。《爾雅》：夏為昊天。郭注曰：言氣皓旰。《詩．黍離》傳曰：元氣廣大則稱昊天。

可見胡與夏都是褒義詞，且詞義相通。《漢書．匈奴傳上》記載匈

奴單于派遣使臣給漢國送去書信，信中說：「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匈奴自稱「胡」，「胡」必然不是貶義詞，而且匈奴本來就是夏族後裔，這可是司馬遷說過的。


匈奴銅飾「老虎食羊」，約西元前二世紀文物。

貳「華」、「夏」或「華夏」是統治集團，不是民族稱謂

（一）周人自稱「夏」

周人是興起於陝西西部的一支民族，他們的祖先有自竄於戎狄之間的傳說，「自竄」恐怕是託辭，很可能是那時周人的發展水準還相當落後，與戎狄無別，而陝西又是多民族的雜居地。周人的遷徙不定，也說明正處於比較低的階段。至文王時，已經積累下向東方擴張的資本。《尚書》、《詩經》屢見周人歌頌文王的豐功偉績，如：

《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尚書．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尚書．立政》：「我有夏式商受命。」

區夏、有夏都指周邦，「有」是語氣詞。周人認為是他們偉大的文王一手締造，《詩經》裡面連篇累牘地歌頌文王。清人牟庭（1759–1832）《同文尚書》解釋：「我區夏者，謂豐、岐間一區之國境也。」[7]牟庭之書埋沒已久，賴王獻唐（1896–1960）先生表彰，始得刊行，而利用者尚少。劉起釪先生取以證明周人自稱夏，是完全正確的[8]。

很多現代學者，如傅斯年先生，認為周族發祥於西部，相當野蠻，沒辦法和東部「有冊有典」的殷族相提並論，周族自稱「夏」是高攀，也是冒充。現在弄清了「夏」字本義是西部，發祥於今陝西西部的周族，當然有資格稱「夏」。「我有夏」等於說「我們西部國家」。古史辨學派主張，區夏就是夏區，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周人是以夏文化繼承者自居。這樣解釋也通。

《尚書．康誥》裡的西土和區夏照應。《尚書．酒誥》也說文王「肇國在西土」。《尚書．牧誓》記武王對前來參加伐紂的八國聯軍說：「逖矣，西土之人。」岐山是周人的發祥地，確屬「西土」。考古學家在這裡發掘出周原遺址。豐是文王的首都，在今西安市西南。

（二）夏、華字義相通

《左傳．定公十年》記載本年（500 BC）夏，孔子隨從魯定公與齊景公在夾谷會盟。夾谷在今山東省萊蕪縣夾谷峪。萊蕪是因古代的萊國而得名。萊國又被稱為萊夷，「夷」是個貶義詞。萊國是被齊國消滅的。有人建議齊景公：孔丘知禮而無勇，如果使萊人劫持魯侯，那麼齊國在會盟中會占上風。齊國本來就比魯國強大，就接受了這個違背外交禮儀的建議。孔子命令魯定公的衛隊抵抗萊人，說：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

「裔夷之俘」指萊人，因為他們是齊國的亡國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裔」與「夷」是同音字，意思完全一致。夏、華對文，字義相通。范文瀾先生認為，「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華以外的人[9]。范老此說可謂言簡意賅。會盟是要向神靈發誓的，如此兵戎相見，顯然不尊重神靈。齊侯自知失禮，馬上制止了萊人。

夏和華字義相通，劉起釪先生做過進一步研究。偽《古文尚書》的《武成．傳》：「冕服采章曰華。」有彩色紋飾的禮服叫「華」，保存到現在，還有「華麗」等詞匯。《文選．東京賦》：「龍丹華轙」注：「華，采畫也。」華也是指彩色裝飾。《文選．大將軍宴會詩》「遺華反質」注：「華謂采章。」「遺華反質」的意思是不要華麗的，回歸質樸的。今天還有「質樸無華」等詞匯。「奢華」則近乎貶義詞。《周禮．春官．巾車》講坐車講究等級，孤、卿、大夫、士、庶人五個等級從高到低：「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級別越高，車子的裝飾越華麗。鄭玄注：「篆，轂有約也。」轂是車輪的正中心，是插車軸的地方。「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篆爾。」轂外通常用革包起來，叫「約」，我們現在還有「約束」等詞匯。約之上，也可以彩畫。經過裝飾的約，就叫「五采畫轂約」。劉先生引用這些，意在證明華、夏二字皆可訓為采畫，義訓同。

劉先生又引五代時南唐徐鍇《說文繫傳》云：「郭璞又言江東呼華為荂，音敷。」郭璞（276–324）是東晉人，所注《山海經》沿用至今。清人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華，古音敷。……今江浙人語尚近古音。清人王玉樹《說文拈字》：「華，讀若敷。漢光武『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必得陰麗華』，亦當讀若敷也。華又音和，故今人呼華表為和表。」按《漢書．酷吏傳》「寺門桓東」注：「如淳曰：……『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又《史記．孝文紀》二年《索隱》引鄭玄注華表，北魏崔浩謂「又云和表」。是華字古音讀為敷、和。《詩經．皇皇者華》以「華」與「夫」協韻，知此音由來自古。「夏」，徐鉉（徐鍇之兄）音胡雅切。清人段玉裁以此切在古音第五部。林義光《文源》：「夏，模韻，音戶。」按《詩經．宛丘》以夏與鼓、下、羽韻，夏與下古讀同為戶。清國有名的音韻學家，如段玉裁《六書音韻表》，華、夏二字皆在古韻第五部，清人江有誥《廿一部諧聲表》則皆在古韻魚部。至於聲紐，則因華讀和，胡臥切；夏讀戶，侯古切：二字古音皆屬匣母。是華、夏二字古音聲紐、韻部全同，實讀同音。

遷至西域的「大夏」尚保存古音，故音譯時，《隋書》與《北史》皆譯作吐火羅（《北史》又承《魏書》有吐呼羅、都薄羅，疑一族分化或傳聞異譯），《大唐西域記》則譯作睹貨邏。「羅」為語尾，「吐」與「睹」則為「大」的對音（《尚書．大誥》篇中以「圖」為大，與此

同），「火」「貨」等字則為「夏」的對音，益足證字書及小學家所言「華」、「夏」二字古讀之不誤。

總之，劉先生認為華、夏二字實古語中一音之異寫，後來雖然寫成兩個字了，但原義實一，所以二字就可以互用，又可以組為複詞同用[10]。

吳銳按：《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秦始皇二十八年（219 BC），秦始皇東巡至琅邪，刻石紀功，誇耀秦之廣大，說是「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史記索隱》云：「協韻，（夏）音戶。下『無不臣者』音渚，『澤及牛馬』音姥。」《史記正義》：「杜預云：『大夏，太原晉陽縣。』按：在今並州，『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即此也。」唐人司馬貞看出《琅邪刻石》是「二句為韻」，那時候音韻學還不發達，「協韻」就成了他們解說古典的方便法門，直到南宋朱熹注釋群經，依然停留在「協韻」說階段。其實「夏」的古音就是「戶」，段玉裁注為胡雅切，古音在第五部[11]。都可佐證劉先生的結論。

甘肅臨夏市西北有一個積石山縣，民國時叫河源縣，因《尚書．禹貢》有「導河積石」之句而取名。積石山縣現在叫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縣城叫吹麻灘鎮。該鎮的西北有一個靠近青海省的鎮，叫大河家鎮，本人多次前去考察。李文實先生認為「大河家」即「大夏」古音的遺韻[12]。其說極是。李先生也是顧頡剛先生的學生。大夏河又叫大河，並不是說這條河的水量很大，而是「河」即是「夏」的同音字。後人不解，於是在「大夏」之尾碼以「河」字，正好比後人不解「海」是湖，乃在「青海」之尾綴以「湖」字。

（三）華夏連稱，不指民族

族這個字，在甲骨文裡已經出現了，字形如 ，由「□」和「矢」組成，「□」是旗幟，「矢」是箭[13]。弓箭聚於旗下為一族，明顯是軍事組織。直到清國統治時期，仍然有八旗。族這個字。我們研究所的著名學者張政烺先生推測，甲骨文裡的一族是一百人。由軍隊的族引伸為族屬、族類等概念，就接近我們今天的「民族」概念了。族類意識在春秋時代已經十分明確。可以舉幾個例子。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記載這一年（629 BC）冬，狄人包圍衛，衛國遷於帝丘（今河南省濮陽市），占卜說可以存在三百年。衛成公夢

見衛國的締造者康叔對他說：「相奪予享。」衛成公命令祭祀相。甯武子反對，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甯武子的意思是說，相是夏族的祖先，要祭祀也應該有夏族的後裔杞、鄫去祭，我們是周族，就不應該祭夏族的國王。

《左傳．成公四年》記載這一年（587 BC）秋，魯成公到晉國訪問，晉是強國，魯是弱國，晉景公接待得很怠慢，魯成公很生氣，打算和楚國交好，而背叛晉國。季文子反對，認為晉國雖然無道，也不能背叛。晉是大國，大臣和睦，再說魯、晉兩國都是姬姓封國，楚國是異族。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史佚相傳是西周的史官。聽了季文子的話，魯成公就放棄了背叛晉國的打算。「史佚之志」有可能是西周王室史官史佚的言論記錄，也可能是後人依託他的著作，但最晚不能晚於西元前五八七年。而且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巨變確實發生於西周。

楚國第六代國王熊渠說過：「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見《史記》卷四十《楚世家》。他以蠻夷自豪，不把中國放在眼裡。春秋時和晉國雜居的一支戎族，國王叫駒支，他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14]戎族有多個支系，因此說「諸戎」，「華」也就是夏、諸夏。可見早在春秋時代，人們已經明確提出了區分不同民族的特徵：飲食、衣服、言語。衣服類，如中國將披發左衽作為四夷的標志。言語方面，如《春秋．昭年》載本年（541 BC），晉國在大鹵打敗狄人。對於大鹵這個地名，《左傳》作大鹵，《公羊傳》、《穀梁傳》作大原。《穀梁傳》的解釋是：「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參因為周人自稱「夏」，周的分封國就稱諸夏、諸華

（一）諸夏

中國最早的王朝是東方鳥夷族建立的商國（商朝是後世的稱呼），最早的首都大概在今山東曹縣，西元前一〇二七年被西方周族征服，史稱建立的新王朝為西周。東方各原住民十七族不服，奮起反抗，西周的總設計師周公東征三年，血腥鎮壓，對原住民進行大清場，慷慨地把原

住民的地盤分封給王室的同姓國和結盟國，衛國、魯國、齊國就是這樣在原住民的血泊中誕生的。

衛國是直接在商國的首都朝歌（今河南省淇縣）建立的。魯國、齊國的地盤是鳥夷族。魯國是周公的封國，到任的是周公的兒子伯禽。魯國得到的賞賜最多，保持周文化最濃厚，首都是曲阜。齊國是太公師尚父的封國，他兒子丁公上任時，萊夷來爭奪營丘，營丘是齊國的首都，在今山東淄博市。

分封同時也是武裝殖民，以周王室的名義擴充地盤。例如唐叔虞被分封到山西南部，建立晉國，首都冀（今冀城縣東南），周圍都是戎狄。召公被分封到北方，建立燕國，首都薊，在今北京市最南端的房山區，一九六〇年以前屬於河北省房山縣，崇山峻嶺，以發現周口店北京猿人著稱於世。這裡也是鳥夷族的故地，夾雜多種民族。

太湖邊上的分封國吳國，原來也是鳥夷族的大本營。這裡在新石器時代形成了良渚文化，以精美的玉器著稱，上面的半人半神的紋飾，還露出鳥足。

南方封國則有「漢陽諸姬」，如隨、唐、厲等國，因為都是姬姓王室的封國，所以叫「諸姬」。陽指河流的北面。漢就是漢水。漢陽諸姬以隨國最大，在青銅器銘文裡又稱「曾」。這一帶位於桐柏山和大洪山之間，又稱隨棗走廊，隨即隨州，棗即棗陽，在隨州西北。隨州也因為古隨國而得名。（見右圖）漢陽諸姬是阻擋楚國北上的前線。楚國後來果然「問鼎周室」，把漢陽諸姬全部吞併。

周王室及其分封國在春秋時結為同盟，他們就自稱「諸夏」「華夏」。諸夏之交也有糾紛，不過屬於諸夏「內部矛盾」。周天子是諸夏名義上的盟主，因此諸夏聯盟可以稱為「周盟」。周盟的成員國多次會盟，見於《春秋》的記載就不少，同盟國與非同盟國之間的矛盾，就屬於外部矛盾，通常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左傳．閔年》載本年（661 BC）赤狄進攻邢國，邢國向齊國告急。邢國是周公第四子的封國，今河北省邢台市因古邢國得名。管仲是齊國的相，對齊桓公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豺狼指赤狄這樣的異族，諸夏指姬姓邢國和姬姓齊國這樣的周盟成員國。周盟有盟約，同盟國受攻擊，其他成員國有義務幫助。齊國是周盟的老大，當然義不容辭。於是

齊人發兵救邢。今天的歐美「北約」，不就是周盟這樣的組織嗎？



諸夏聯盟，各國分布圖。

《左傳．僖公十五年》載本年（645 BC）「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徐國本來是鳥夷族，在今安徽省泗縣西北。楚國和秦國是諸夏兩大強敵。此時與齊國通婚，就算接近了諸夏，引起楚國不滿。剛好此時魯國與宋國、陳國、衛國、鄭國、許國、曹國在牡丘會盟，魯國的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

《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載本年（639 BC）魯國討伐邾國。為什麼呢？《左傳》解釋說：任、宿、須句、顓臾邾四個國家，是風姓（「風」是「鳳」的通假字，也就是鳥夷族），保持著對大皡和濟水之神的祭祀，「以服事諸夏」。邾國本來也是小國，由於須句比邾國還小，邾國就滅了須句。須句國王逃奔到魯國，僖公的母親成風就是來自須句。成風對僖公說：「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蠻夷指邾國。須句與任、宿、顓臾都是風姓，「風」即「鳳」，也就是鳥夷族，鳥夷族是周族征服的對象，當然不能算作「夏」。但由於須句與魯國通婚，邾國滅須句等於打了魯國的臉面，這筆帳就算作「蠻夷猾夏」了，成為成風求情的依據。猾是侵擾的意思。

《左傳．襄公十三年》載本年（560 BC）楚國國王病重，囑咐大

臣，自己在位時，鄢陵之戰慘敗於晉國（魯成公十六年，575 BC），死後要採用「靈」或者「厲」這樣帶貶義的謚號。這年秋，國王真的死了，大臣準備採納帶貶義的謚號，國王的弟弟子囊不同意。他說「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南海，我主張在今丹江口水庫一帶。「以屬諸夏」，《國語．楚語上》作「訓及諸夏」，等於說「影響擴大到諸夏」。諸夏一貫視楚國為南蠻。「共」即恭敬的恭。

《左傳．昭公十九年》記費無極對楚平王說：「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伯即霸，稱霸的意思。晉國是最重要的分封國之一，主體在今山西省南部。它的東邊是衛、鄭等分封國，所以說它靠近諸夏。楚國遠在南方，因此說它辟陋。

《左傳．哀公二十年》載本年（475 BC）越國包圍吳國，晉國趙孟的家臣楚隆對越王句踐說：「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楚隆因為要穿過越軍包圍圈才能到達吳軍，才對句踐這樣說，實際上是反話。因為吳國是太伯的封國，如果按照輩分來說，吳國在姬姓國中地位最高，晉國與吳國也是結盟國。「諸夏之人」包括晉國等周盟成員國的人。

如果說戎狄與諸華是天生的冤家對頭，那麼南方的吳、越兩國也是一對冤家。按今天的地理來說，吳國大致在江蘇，越國大致在浙江。起初，吳國的實力要大於越國。吳國本來要滅越國的，越王勾踐放低姿態，假裝可憐，派人向吳國求情，逃過一劫。吳國轉而打算北上攻打齊國，申胥勸阻吳王夫差道：大王你不用拿水來作鏡子，何不拿人來作鏡子呢？過去楚靈王不像國君的樣子，不聽大臣的勸告，大興土木，修建章華台，拖垮了楚國。「不修方城之內，逾諸夏而圖東國」，又與吳國開戰，還想征服越國。楚國老百姓忍受不了饑荒和勞役，三軍叛亂，楚王眾叛親離，上吊自殺。這是《國語．吳語》的記載。「夏」聯盟不止一個國家，而是多個，因此又叫「諸夏」。此處的諸夏指陳、蔡兩國，東國指吳、越等國。楚靈王是在他死去之後才有的謚號，「靈」是一個貶義詞，專門送給犯大錯的人。申胥就是戲劇中經常唱的伍子胥，他本來是楚國的貴族，所以舉楚靈王的例子。他認為越王勾踐有「淫樂諸夏之國」的險惡用心，按現在的說法，就是麻痹吳國。吳國是姬姓，而且是太伯之後，是根正苗紅的諸夏之一。

還是這個楚靈王，《國語．楚語上》記他在滅掉陳、蔡、不羹之

後，認為國力大增，派人諮詢范無宇，說：「諸夏不臣服我國而獨事晉，為什麼呢？因為諸夏離晉近而離我國遠。現在我城三國，賦皆千乘，實力和晉國差不多了吧。再加上我們楚國，諸侯會來歸順嗎？」范無宇回答說：「古書上說，國家有大城，一點也不好。過去鄭國有京、櫟，衛國有蒲、戚，宋國有蕭、蒙，魯國有弁、費，齊國有渠丘，晉國有曲沃，秦國有徵、衙，都發生了叛亂。」晉是諸夏之一，楚國則被諸夏視為蠻夷。

以上提到「諸夏」的事例，諸夏都是指周盟集團。如果定義為「華夏族」，則無從理解。

我主張諸夏可以稱為「周盟」，也可以稱為「夏盟」。稱為「周盟」是因為周天子是名義上的盟主。稱為「夏盟」很好理解，因為周族是來自西部，「夏」即指西部。范文瀾先生早就指出，東方齊、魯、衛等大國諸侯本從西方遷來，因之東方諸國稱東夏，東西通稱為諸夏。

此外《荀子．正論》：「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楊倞注：「夏，大也，中原之大國。」秦晉之間的方言，稱呼大的為「夏」。因此，諸夏不完全是指周同盟國，僅僅指大國而已。

（二）諸華

由於夏和華是一個意思，諸夏又可以稱為諸華。

話說晉國剛分封的時候，周圍是異族的汪洋大海，這些異族泛稱為戎狄，晉國姬姓貴族自稱「華」。大臣魏絳因為處理戎華關係得當，晉國的國王就賞賜他女樂一八、歌鍾一肆，說：「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這裡的「和」是動詞。漢國與匈奴和親，唐國與吐蕃和親。魏絳把功勞推給國君，說：「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諸戎、諸華，「諸」是多個的意思。這是晉悼公十二年（562 BC）的事，記載於《國語．晉語》。

（三）華夏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失華夏」，指的是由於晉國在一次戰役中打敗楚國，晉國遂侵略蔡國，襲擊沈國，鄭國不敢與楚國結交。蔡國、沈、鄭國三國都是正宗的姬姓封國。「楚失華夏」等於說楚國失去

了這三個華夏國家。如果將「華夏」理解為華夏族，文義不通。因為楚國是華夏的勁敵，不存在失不失去的問題。

（四）滅亡的國家沒資格稱為華夏成員

西周建立之後，並不把商族趕盡殺絕，而是讓它們保留一個小兄弟宋國，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帶。這裡確實是商族的古老據點。同樣，讓夏族的後代保留一個小小的杞國。杞、宋兩國的存在，出於周人的開恩，這兩國國家就沒資格成為「諸夏」成員國。相反，什麼杞人憂天，什麼揠苗助長，什麼守株待兔，都是諷刺這些亡國奴的。

（五）稱夏稱華僅僅限於統治階級

華夏的主要成員是姬姓分封國，其他是與姬姓有關者，如齊國是姜姓，但長期與姬姓通婚，因此才能加入華夏俱樂部。前面提到的春秋時和晉國雜居的一支戎族，國王叫駒支，也是姜姓，他們的祖先四岳輔佐大禹治水，立下赫赫功勛。春秋時駒支的戎族淪為晉國的保護國，為晉國服勞役、打仗，是典型的四夷。鮮虞和鼓雖然都是姬姓，但屬於白狄，此外還有赤狄。

周盟統治者也不可能與被統治者分享「華夏」。《左傳．定公四年》記周公之子伯禽受封於魯，建立魯國，得到王室大量賞賜，包括殷民六族做奴隸。這六族是：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這些亡國奴被迫「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也就是被迫給殖民者賣命。康叔受封於衛時，得到殷民七族做奴隸。這七族是：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唐叔受封於晉時，得到「懷姓九宗」做奴隸。周盟統治者絕不會與這些異族奴隸認同「華夏」。

春秋時代，諸夏各國實行的是貴族統治，等級森嚴，即使不是異族奴隸，就是本國的人民，統治者與老百姓也不可能分享「華夏」。華夏既可指貴族統治集團，也可指由這些貴族統治集團管理的國家—諸夏。

（六）周盟比較鬆散

西周滅亡之後，周平王東遷，鄭國和晉國有擁立之功，最受周天子器重。鄭國動不動干預王室事務，平王越來越提防鄭國。雙方互相猜

忌，最後採取「周鄭交質」的辦法，平王將太子交給鄭國作人質，鄭莊公把太子忽交給王室做人質。這可以說把王室的威信掃地。發展到後來，鄭國明目張膽地派軍隊幾次去割王室的莊稼。到了周桓王十三年（707 BC），鄭莊公因為在王室的卿士一職被免除，不惜與王室兵戎相見，鄭國將領祝聃用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誰說太歲頭上不能動土！

肆「華」、「夏」或「華夏」指稱「中國」的分析

（一）洛陽為土中

西周由文王打下基礎，武王伐紂，武王的兒子成王當政時有叔叔周公輔佐，到成王的兒子康王，是歷史上的成康之治被後世儒家吹噓得無以復加。從康王七傳到厲王這個大暴君，老百姓衹好道路以目，國人暴動，將厲王流放到彘（今山西霍州市）。共伯和出來代行太子的職權。共是國名，伯是爵稱，和是共伯的名字。後人提煉「共和」二字，大致相當於西方的Democracy（民主），現代流行「共和國」一詞，取義於此。共和是中國紀年的開始，相當於西元前八四一年。共伯和執政十四年，於前八二七年將權力交給厲王的二字宣王。宣王和周邊的異族打了幾仗，在古人看來是了不起的功勛，史書上表彰為「宣王中興」。從此「宣王」成為褒義詞，歷史上被封為「宣王」的人物，可以列出很長的名單。例如為司馬氏篡魏建立晉國的司馬懿，就被追封為晉宣王。

可惜宣王的兒子幽王不爭氣，寵愛褒姒，廢黜姜后。姬姓王室世代與姜姓聯姻。失寵的太子宜臼投奔申侯，申侯一氣之下索性聯合犬戎攻入鎬京，在驪山腳下殺死厲王，西周結束。宜臼被諸侯國擁立，就是平王，時為西元前七七〇年。史書記為平王東遷，就是逃亡到東方，以洛陽為首都。這是赫赫有名的「土中」，也就是天下之中，因位於洛水之北而得名。



土中洛陽及週邊地勢圖。

洛水發源於殽山。古人動不動說「殽函之固」，殽即殽山，函即函谷關。早期所謂關東、關西，即指黃河邊上的天險函谷關而言[15]。洛陽東邊的偃師市二里頭遺址，是考古界寄希望尋找夏文化的所在。洛陽南面的伊水流域是陸渾戎聚居區，至今還有一個陸渾水庫的地名。

世界上各民族習慣以自己為中心，比較其他族群，例如歐洲人以自己為中心指稱遠東、近東。

古人誤以為太陽圍繞大地運動，北極不動。不同的族群向北極觀察，認為自己正好處於宇宙的中心位置。本人梳理出這樣的宇宙中心有：

（一）蔥嶺：蔥嶺即今帕米爾高原。

（二）岡仁波齊：在西藏。

（三）崑崙：有多處，與族群遷徙有關。最初在秦嶺。

（四）天山：在新疆，也有多處。

（五）祁連山：在甘肅省。

（六）岷山：在四川省。

（七）岐山：在陝西省岐山縣。

（八）咸陽：在陝西省咸陽市。

（九）洛陽：在河南省洛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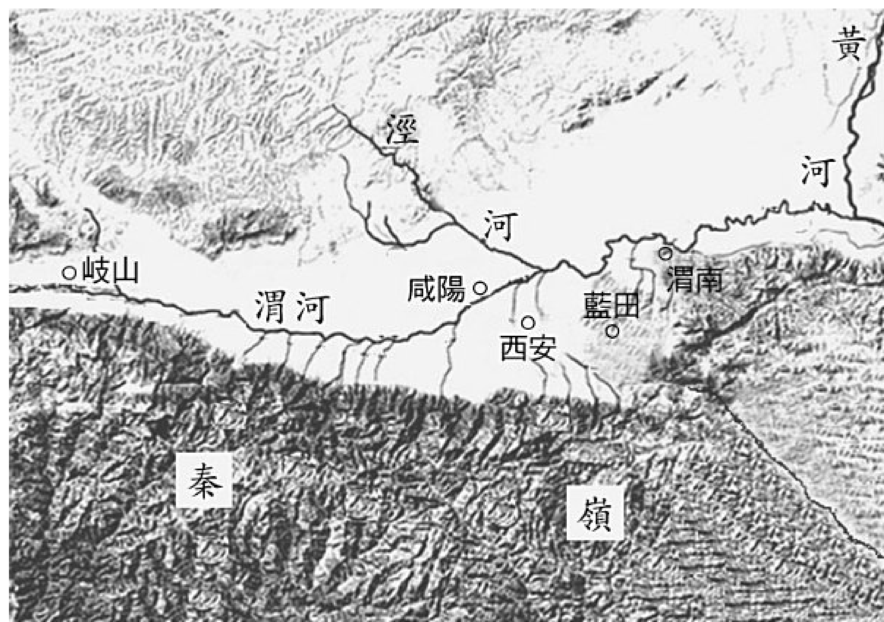
（十）中商：可能在河南省安陽市。

（十一）臨淄：在山東省淄博市。

如果反推回去，這些神秘中心背後代表的是不同的民族。

其中岐山在陝西省岐山縣西北，因山有兩岐而得名。《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曰岐山。」岐山縣因此得名。

周人至第十三世王古公亶父，遷都岐陽，即岐山之南。岐陽位於關中盆地，渭水之北，自然條件優越。《詩經．大雅．皇矣》說這是「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受命」即接受天命。《國語．周語》載周王室內史過的話：「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吉祥鳥在周族的發祥地鳴叫，預示著周族要興旺發達。



岐山在關中的位置。

岐山並不是很大的山，為什麼能夠成為名山？清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五《陝西四．鳳翔府》：「《河圖》云：岐山在崑崙東南，為地乳。《地志》：『岐山亦曰天柱山。』」《河圖》之類的緯書產生與西漢末年，「地乳」顯示岐山的神秘性。「天柱」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為宇宙的柱子（cosmic pillar）。岐山雖然不大，但由於是周人的發祥地，因而被奉為神山。他們可能還把這小塊地方視為宇宙的中心，因此岐山才稱天柱山，是一座可以溝通天地的神山。

（二）土中的象徵意義

從西周開始，土中觀念深入人心。如孫權稱帝（222）前後，黃龍、甘露、嘉禾、鳳凰各種祥瑞紛至沓來，大臣們認為應該舉行郊祀，以報答天意。郊祀是一種祭祀天地的大典，如今北京的天壇、地壇就是為祭祀天地而造的。不過在明國以前，祭祀天地是在同一個地方，而且最正宗的是在洛陽舉行。孫權也懂得這個道理，他說：「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大臣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孫權還算有頭腦，沒有聽從大臣的拍馬屁[16]。

鮮卑拓拔部征服中國，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乾脆把首都遷徙到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土中洛陽，建立起淮河以北的草原大帝國。

（三）「中國」指本國

周盟的成員國作為殖民征服者，正躊躇滿志，以「中國」自居。《尚書．梓材》記載周王的話：「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中國」一詞在文獻裡首次出現於此。周人把占領中國之地、統治中國之人的行為歸結為上天的賞賜，「受命」是接受天命的意思。古史辨學派認為這裡的「中國」指本國，是完全正確的[17]。把自己的居住地作為中心，是全世界的普遍習慣。

一九六五年，從陝西寶雞市一廢品收購站揀回的《何尊》，原是一九六三年在當地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銅器，銘文明確說到「宅茲中或」；「中或」，多數學者釋讀為「中國」，個別學者釋讀為「中域」。周人的發祥地岐山在寶雞東北，離寶雞很近。這個「中國」也是指本國（周國）。

（四）「中國」指首都

既然把自己的居住地作為中心，國家叫中國。首都又樹一國的中心，因此首都也可以稱為「中國」。我們把《詩經．大雅．民勞》每一章的第一段對照一下，就足以知道中國＝京師，京師與四方相對。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猜想他們之所以自稱「中國」，除了各民族以自己為中心區分地域的原因，大概還自認為住在宇宙的中心，因而自認為是文明人、高等人，而視「中國」之外的四方為蠻夷戎狄，認為它們全是野蠻人、低等人，也可以叫豺狼禽獸。

（五）中國與四夷

《左傳．昭公九年》載本年（533 BC）晉國與周王室爭奪土地，不惜率領異族陰戎（陰是地名）攻打潁（今河南省登封縣一帶），威脅王室。周景王派人責備晉國說：先王把壞人都趕到「四裔」這樣荒遠的地方，而晉國把陸渾戎遷到王室南面，「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前後文對照，諸姬等於中國，諸姬也就是諸夏，諸夏的敵人即為戎族。

魯莊公三十年（664 BC），齊國伐山戎。第二年夏六月，齊國向魯國獻山戎俘虜，《左傳．莊公三十一年》記為「非禮」，因為：「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也就是說，齊國和魯國同為中國，也是周王室的諸侯國，不能互相獻俘。假如齊國向周天子獻山戎俘虜，則是合於禮的。晉國就曾經兩次向王室獻狄國俘虜。

所謂四夷，是對蠻夷戎狄的總稱。古人機械地將異族與四方對應，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國與四夷，《禮記．王制》稱為「五方」，是當時的整個世界。四夷與中國相對，顯然中國等於夏、諸夏、諸華、華夏。周盟也可以稱為「中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以說是周盟的八字方針。

同樣，中國諸侯國之間打仗，如果抓住了對方的俘虜，也不能向王室獻捷。《左傳．成公二年》記載晉襄公打敗齊國，派鞏朔向王室獻齊國的俘虜，周定王不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

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

周天子的意思是說，蠻夷戎狄（四夷）不遵守王命，王室命諸侯伐之，如果抓到俘虜，則可以向王室獻捷。王室親自接受，還要慰勞諸侯，這樣做的目的是懲罰不敬的人、表彰有功的人。兄弟國甥舅國，侵敗王略，王室下令討伐，僅僅報告就行了，不獻其功，這樣做的目的是敬親昵、禁淫慝。叔父是對晉襄公的尊稱，都是姬姓。「余一人」是周定王自稱。齊國的受封者呂尚民間俗稱姜太公，是西周的國舅爺，屬於甥舅國。姬姓國之間，則屬於兄弟國。齊國和晉國都是王室的封國，同屬周盟，也就是「中國」，也都是「諸夏」，不能獻俘，這是舊典，齊國應該知曉。一席話說得鞏朔啞口無言。其實蠻夷戎狄都是獨立國家，憑什麼聽周盟的「王命」呢，周定王顯然是為侵略四夷找藉口。

中國與四夷的關係，可以簡稱為夏、夷關係。消極的辦法是華夏集團和四夷集團互不侵犯，「裔不謀夏、夷不亂華。」[18]積極的辦法是「尊王攘夷」：尊周王趕四夷。齊桓公就是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在周盟看來，「蠻夷猾夏」是莫大的「周禍」[19]，「猾」是侵擾的意思。

對周盟採取軟辦法，對中國的對立面四夷（蠻夷戎狄）則採取武力。《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載本年（635 BC）晉文公到王室朝見周襄王，請求死後以天子之禮安葬，晉文公雖有安定周室的大功，襄王也沒有答應，改為賞賜文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南陽指太行山以南之地。陽樊人感到淪為俘虜，不服這樣的屈辱，晉文公就動用軍隊把他們抓起來。陽樊人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晉文公聽後就釋放了這些俘虜。

此事《國語．周語中》是這樣記載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能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

是乎致武。此嬴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只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陽樊人為什麼感到奇恥大辱呢？原來是抱怨晉國不該動用軍隊，因為軍隊是專門對付蠻、夷、戎、狄的。陽樊人都是王室的父兄甥舅，沒有四夷人。裔指前面說的蠻、夷、戎、狄。我們陽樊人感念王室的恩德，不願臣服晉國。晉國給了我們什麼德政呢？現在晉國動用軍隊，將毀滅我們的宗廟，殺害我們的人民，我們當然不服！如果晉國真想統治我們，就該設立「丈夫機構」，而不是耀武揚威。最後，晉文公將被捕的陽樊人釋放。

陽樊人倉葛為了達到脫身的目的，所說也不完全是事實。例如他說陽樊人都是王室的父兄甥舅，就故意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混為一談。在西周初年，陽樊是司寇（法律方面的最高長官）蘇忿生的采邑，後來是周宣王的卿士仲山甫的封地。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20]可以說是周盟的口號。春秋時期，受四夷的夾攻，「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21]。此時中國（周盟）對周王室還有一點尊敬。四夷勢力太強大了，在春秋已經形成秦國（鳥夷族）和楚國（南蠻）兩大四夷強國。戰國時期，周盟瓦解，周王室威信掃地。中國與四夷混戰，周盟之間混戰，「戰國」因此得名。連周王室首都洛陽的周邊都是四夷。可見四夷才是中國境內的主要原住民。這點古人看得很清楚。南宋洪邁（1123–1202）《容齋隨筆》卷五《周世中國地》就指出：「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為蠻；淮南為羣舒；秦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楊拒、泉皋、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華夏的地盤既不相連，面積遠遠小於蠻夷戎狄，人數微不足道。

《容齋隨筆》是古代的暢銷書，毛澤東病危之際，還向工作人員索要《容齋隨筆》。可見僅僅百年來，經過國、共兩黨的不間斷洗腦，漢人拿國、共兩黨時期的漢族人口對以前幾千年的歷史反攻倒算，狂傲地宣稱先秦就有了漢族，而且還是多數民族，指稱蠻夷戎狄是少數民族，這是以今度古的典型案例。國、共兩黨時期的漢族人口又是以清末排滿運動「四萬萬皇漢民族」為基礎的，這個基礎根本就是偽造的。時至今日，中國人的歷史常識還不如宋國人，皇漢史觀害人之深，真是駭人聽聞！

至於稱「中國」，既有以自我為中心而方便指稱的原因，也有一點文化自戀的優越感[22]。如說中國得陰陽中和之氣，因而最聰明。這可以看作是古代的八卦，不必當真。

伍秦人鏟滅華夏

《孟子．梁惠王上》載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一」有統一的意思。孟子向齊宣王宣傳仁政，齊宣王推辭，自稱有「大欲」。孟子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可見齊宣王的最高理想是開拓疆土，當天下的霸主，讓秦、楚這樣的強國都來朝見，君臨中國，同時安撫四夷，而不是消滅它們。這是戰國中期的形勢。為了好記，我們可以取前三百年作為戰國中期的一個時間點。

西部秦國的崛起，將打破人們的幻想。

和商族一樣，秦族是鳥夷支系，發祥於山東，因為在西部渭水流域壯大，被「中國」人列為四夷中的西戎。秦族的嬴姓來自鳥的嚶嚶鳴叫聲，秦族的祖先神句芒是鳥身人面。秦祖伯翳，「翳」即「益」。在古史辨時代，童書業先生提出益為鳥神之見解。對目前的學術界來說，「鳥夷」還是新聞。商族建國、秦族統一六國，奠定了中國版圖的框架。

戰國晚期，面對秦國的強大攻勢，各國都想辦法自存。當時普遍的想法是向秦國表示臣服進貢財物，而保存本國的宗廟，如：

《戰國策．燕策三》，記載著名的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蒙嘉為荊軻言於秦王曰：「燕王……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也就是說，燕國願意整個國家都臣服秦國，像

秦國直接管轄的郡縣那樣，向秦國進貢。燕國所要保留的，不過是一個宗廟，以便祭祀列祖列宗。

《戰國策．魏策一》，著名辯士張儀遊說魏襄王，嚇唬他臣服秦國，果然奏效，魏王說：「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這是魏王所作的向秦國稱臣之後的打算。

《戰國策．韓策一》，張儀遊說韓王，韓王曰：「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也就是放下韓、秦兩國的對等關係，韓國向秦國稱臣，韓國的國土都獻給秦國，好比秦國的郡縣一樣。

《戰國策．秦策一》，張儀說秦王，主張：「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與是聯合，亡是亡國，臣是臣服，親是親近，伯王即霸王。伯王只是讓四鄰諸侯來臣服，而不是從肉體上消滅他們。戰國時人設想「定於一」不過是出現一個新盟主，也就是霸王。

然而秦國的政治家李斯卻不這麼看。《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載李斯遊說秦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

此時的李斯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郎官，但已經看出歷史的大趨勢在於消滅各國，一統天下，不能給各國諸侯國東山再起的機會。假如不及時消滅各國，等到他們強大並且聯合起來之後，即使黃帝再生，也無法挽救局面。李斯的話深得秦王之心。「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李斯升官了，計策更加歹毒：暗中派謀士用糖衣炮彈麻痹諸侯。對於那些名士，能夠收買的就收買，收買不了的就暗殺。君臣同心，遂成就史無前例的大帝國，大部分人「定於一」的幻想也宣告破滅。前二二一年，秦國一統天下，「中國」同盟完全被鏟滅[23]。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排滿家的偶像。王夫之就以《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黃帝東征西討的範圍作為華夏的地盤，排滿家是直接將華夏等同於中國。但是王夫之忘記了司馬遷在《五帝本紀》最後說的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史記》的作者都不相信黃帝的行蹤！不過，王夫之認為秦始皇的大一統使黃帝的家法淪喪、種類不分，有一定道理。種類不分也就是民族不分。從出土的秦國

簡牘可以看出，秦帝國中央向全國四處分布文告，全國各地雷厲風行地執行，沒有出現「政不出咸陽」的局面。經過秦人統一運動的掃蕩，原本數量有限的華夏集團未必有多少人苟延殘喘到秦漢。即使後世有漢族，也與先秦的華夏沒有關係。華夏本來就不是民族，把它作為漢族的前身不符合事實。

陸楚國復國，劉邦坐收漁翁之利

面對秦人的雷霆萬鈞之力，六國貴族被逼上梁山，只有復國一條路。如張良，其祖先是韓人，五世相韓，為韓國第一大貴族世家。韓國滅亡之後，張良家有僮僕三百人。他的弟弟死了，也捨不得花錢安葬，把所有家財用於尋找刺客，刺殺秦王，為韓國報仇。他本人也親身參與了刺殺行動。雖然沒有成功，但後來輔佐劉邦，以另外的方式為韓國報了仇。章太炎居然說這個韓國是朝鮮半島的古韓國，實為荒謬。

復國勢力最大的首推楚國。早在春秋時代，楚國和秦國是兩個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敢於問鼎周室。《國語．鄭語》讚揚楚國祖先祝融有「光照四海」的大功，預言楚國必然代周而興。楚國亡國之後，楚懷王的孫子一落千丈，淪為放羊娃，標準的「低端人口」。秦二世元年（209 BC）七月，陳勝等人於大澤造反，稱「大楚」。自立為王之後，號為「張楚」。「張楚」等於說張大楚國，等於說楚國復國。此時陳勝手下的葛嬰至東城（今安徽定遠縣），還不知道陳勝已經稱王，於是立襄強為楚王。這也是利用楚國為號召。陳勝封蔡賜為上柱國。上柱國也是楚國的官名，相當於丞相。

項氏世代為楚將，死於秦國的刀下，秦國成為項氏的世仇。項梁利用徵發徭役和辦喪事的機會，用兵法操練賓客及子弟，顯然是為復仇做準備。滅秦成功，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封劉邦為漢王。此前刺殺秦王未能成功的張良投奔劉邦，成為劉邦重要的謀臣。劉邦善於統戰復國力量，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雖然劉邦和項羽一樣都是楚人，但是劉邦的志向不在楚國復不復國，而是要獨吞天下。於是發生楚漢相爭，劉邦勝出，有勇無謀的項羽被迫自殺，年僅三十一歲。「張楚」沒有張大成功，卻讓「漢家」撿了便宜。

劉邦建國後，在很多場合都尊楚俗，行楚禮。官方推崇黃老之學，這也是楚國本土的學術思想。可以說，漢國就是楚國的復國。劉邦同時

也是無賴性格，對儒生沒有好感，一看見儒生就把他們的帽子取下來撒尿，真是有辱斯文。

柒「漢」字的本義是銀河，與漢族沒有任何關係

《詩經．小雅．大東》「維天有漢」，意為天上有銀河。因此「漢」又稱「銀漢」、「雲漢」、「天漢」。如：《詩經．大雅．雲漢》：「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屈原《離騷》：「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兮河鼓。」曹操《觀滄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離騷》又有「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之句，王逸注：「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天津即箕、斗二星之間的銀河。

居住在漢水流域的巴、蜀、楚等原住民崇拜他們的母親河，把它比作天上的銀河，「漢水」因此得名。巴人也曾經給劉邦賣命打天下，漢國建國後，宮廷還流行巴渝舞。渝即渝水，今嘉陵江，也是巴人的大本營。

史書有云：「劉邦始封『漢王』，初不欲就國。有進言曰，『漢中語曰天漢，其稱甚美，願大王王漢中。天漢者，天之所賜於漢也。漢水上應天漢。漢中，據有形勝，進可攻退可守，秦以之有天下。』劉邦乃就漢王。」劉邦取天下後，國號仍稱「漢」；武帝年號有「天漢」，蓋以苦旱連年，欲「天漢」降雨，因此取這樣一個吉祥的名字。

劉邦因為在今陝西之漢中起家，被封為漢王，所以建立的產業就叫漢國。漢中又因漢水流經而得名。也就是說，連劉邦的漢國之名也借自異族，而非華夏。

東漢末年，漢王室衰微，劉備趁機搞獨立，割據益州、漢中，諸葛亮等人勸劉備稱帝，列舉了很多符瑞，其中之一是說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玉璽潛於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24]意思是說，漢水是漢高祖劉邦的幸運星，在這裡發跡，用漢水的「漢」作了國號。您現在跟著漢高祖的軌跡，也興起在漢中。現在天子玉璽出現在襄陽，襄陽是漢水下游，這表明您已經繼承漢高祖的遺緒，授予您天子之位。這是上天顯示

祥瑞，不是人力能夠辦到。於是，劉備就在成都稱帝了。他本來是個賣草鞋的，打著「興復漢室」的旗號收攬人心而已。

捌儒生偽造劉漢皇家世系

在漢初受到冷落的儒生刮起「過秦風」，「過」是批判的意思，以漢文帝時賈誼《過秦論》最有名，中國的中學語文教材就有這一篇，酷似中共建國之後猛批國民黨。儒生們危言聳聽地宣揚秦國是不用儒術而亡國。他們目中無秦，把周國宣傳為「鬱鬱乎文哉」的太平盛世，主張漢直接繼承周，周是火德，火生土，漢應該是土德。恰好華夏經過秦國統一運動的掃蕩，灰飛煙滅，到漢國建立時形成了血緣上的斷裂。由《史記．高祖本紀》和《史記．項羽本紀》，我們得知出身低微的劉邦喜歡三樣東西：酒、色、財。這與普通人的嗜好並無不同。西漢儒生為給出身低微的劉邦塗脂抹粉，試圖修復這種血緣斷裂，偽造「漢為堯後」，堯為火德，漢國也該是火德。古史繫統也因此而延長。他們還鼓吹「存亡繼絕」，以抨擊秦國將六國的地盤改為郡縣。

到了西漢末年，讖緯盛行。《春秋握成圖》云：「劉媼夢赤鳥如龍，戲己，生執嘉。」乍一看執嘉即劉邦。但是對比《春秋握成圖》所說執嘉妻含始，游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如是說。則《春秋握成圖》之劉媼非是劉邦的祖母不可。《藝文類聚》九十八引《詩含神霧》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媼，劉季興也。」於此可見，漢武帝時的司馬遷寫《史記》時還不知道劉邦父母的名字，這個空白到了西漢末年就由方士化的儒生填補了：劉邦的父親叫執嘉，母親叫含始。《史記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含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又說《詩含神霧》亦云。則含始又升格為「后」了。

東晉的造假專家皇甫謐含糊其詞地說劉邦的母親「蓋姓王氏。」唐國時新出現劉邦之母為溫氏的說法。據說當時打撈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25]。這大概是非要扭曲《史記》之劉媼，劉媼等於說劉太太、劉媽媽、劉婆婆，沒有名字。如果把「媼」說成是「溫」之訛，「溫」就是名字。在宣傳者眼裡，劉邦的媽媽比自己的媽親，想盡辦法圓謊。

劉氏攀附上堯，堯又是從哪裡來的？西漢末年的緯書已有安排。

《初學記》九引《詩含神霧》云：「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清汪繼培《潛夫論箋》引《隸釋．帝堯碑》云（□為缺字）：「帝堯者，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生赤□□ □□□□□□□□□爰嗣八九，慶都與赤龍交而生伊堯。」又引《成陽靈台碑》云：「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遊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

堯眉八彩，見《淮南子．修務訓》：「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高誘注：「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冉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高誘注文來自緯書《春秋合誠圖》。緯書《春秋元命苞》也說：「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璿璣玉衡。」「曆象日月，璿璣玉衡」來自《尚書．堯典》。

堯和劉發生關係也見於緯書。《古微書》引《尚書中候》：「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于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於是劉累之所以氏劉之故也說明了。

綜合《左傳》和緯書的記載，顧頡剛先生畫出一個「漢為堯後的世系表」來[26]：

堯—監明—劉氏…豕韋氏 {唐氏
杜氏（杜伯）—隰叔…士會…劉氏…

豐公—執嘉（煓）—漢高祖

這是千呼萬喚始出的高貴血統！大家趕緊膜拜一下，劉漢皇家世系尚且在偽造之中，漢國怎麼會出現一個統一的漢族呢？

如果認為漢國一建立就有了漢族，分布全國各地，那麼十五年前還是秦國，是不是也得承認有個秦族，而且也是分布在全國各地？如果認為漢國一建立就有了漢族，那麼當它建立的時候，全國性的秦族哪去了？是消失了還是全部被漢族同化了？

玖偽造世系的接力賽

儒生偽造「漢為堯後」，漢國自食其果。因為按照漢國儒生重編的《尚書．堯典》，堯年老時，將帝位傳給了底層出身的舜，而沒有傳給自己的兒子。同理，漢國的天下也沒必要一定傳給劉姓皇族。果然，王莽如法炮製，高攀舜為祖先，利用堯、舜禪讓的傳說和周公稱王的故事，埋葬了西漢，古史系統也遭到一次大整編。

東漢末年，曹丕篡漢，先偽造說曹氏的祖先是舜，當年堯舜禪讓，現在該漢、魏禪讓了，因為早在西漢就有「漢為堯後」的輿論。曹氏的祖先就是比照這個量身定做的。果然，漢獻帝冊詔魏王曹丕，禪代天下，其中說：「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放勳是堯，重華是舜。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魏王登壇受禪，出席登基典禮的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多達數萬人。典禮結束之後，曹丕對群臣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27]

如果說魏「與舜同祖」還有點模糊的話，曹丕的兒子魏明帝景初元年（237）下的詔書最直截了當。詔書說：「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有虞氏就是舜。[28]以賣草鞋為業的劉備，其祖先可能是東漢初年的臨邑侯劉讓，因為謀反被光武帝劉秀誅殺，劉備不敢提這個家醜，轉而冒充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孫堅則是長江以北淮水、泗水流域的小土匪，冒充是春秋時期軍事家孫武的後代。相傳孫武的後代被封富春侯，孫堅也將老家偽造到富陽。

司馬氏篡魏，國號晉，攀附的祖先很特別，是楚人的祖先重、黎[29]。

《晉書．禮志》收錄了很多對大晉歌功頌德的詩篇，如「赫赫大晉，於穆文王。蕩蕩巍巍，道邁陶唐。世稱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遙遠的三皇五帝成了現今王朝的奠基石。這是三皇五帝「被創造」出來的部分原因。偽造世系的接力賽反過來使古史繫統得到凝固，影響至今。

我們研究歷史，實際花了大量精力在研究歷史被建構的過程，也就是歷史的流變，這也是上古史比中古史更複雜的原因。

拾秦人、漢人指秦族、漢族的假象

漢國建立之初，與匈奴在西北展開拉鋸戰，匈奴成為漢國最大的敵人。《漢書．匈奴傳》稱「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守之」，唐人顏師古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言也。」匈奴稱中國人為「秦人」，等於說秦國人。流傳到異域殊俗，梵文將「秦」的音記為「支那」，「支那」一詞輾轉傳播到日本，從大清國流亡到日本的留學生、亡命徒，紛紛自稱「支那」（見本書第三章），以撇清與大清的關係。但是現在中國的漢人認為這是日本鬼子對中國人的侮辱性稱呼，真是顛倒黑白。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亮曰：「若留外人……夷、漢初安故耳。」方國瑜先生（納西族）指出外人就是漢官[30]。夷、漢之漢，也不是漢族。常璩（291–361）《華陽國志．南中志》記霍戈：「撫和異俗，為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夷、晉和夷、漢用法相同，晉不是漢族，也不存在晉族。方國瑜先生指出瀚海本《華陽國志》在「夷晉安之」下注：「西夷以中國為晉。」晉以後，稱漢人改用朝代名號。《爨龍顏碑》說爨龍顏死後，「黎庶痛悼，宋、夷傷懷。」夷，阮福《滇南古金石錄》、王言《金石萃編補略》、汪硯山《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釋為「幾」，惟袁文揆《滇南文略》、師範《滇系．藝文》、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釋為「夷」。方國瑜先生同意「夷」字的釋讀是對的。本人曾經目驗價值連城的《爨龍顏碑》拓本，確信應該釋為「夷」字[31]。《爨龍顏碑》立於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碑文「宋」即指南朝宋而言。「宋、夷傷懷」的意思是無論是宋國人還是本地土著人都很悲痛。

由以上「夷漢」[32]、「夷晉」、「宋夷」的用法可知，漢、晉、宋只是國家之名，不是民族之名。學術界將國家名誤為民族名，進而認為漢族形成於漢國，將漢族歷史大大拉長。

住在中國的人，一向自我感覺良好，這裡舉一個的例子。王朗是東漢的小官，當過孫策的俘虜，後來被曹操請去，為魏國幾任皇帝效力，高才博雅，得以善終。當時有個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身處東漢末年混亂的局勢，曾經不遠萬里，逃奔交州，「周遊江湖，以暨南海」。南海、交州均泛指今廣州一帶。後來他接受劉璋的邀請，到了蜀地，當了巴郡、廣漢太守。劉邦在蜀稱帝，非常器重許靖，許靖的資歷也在丞相諸葛亮之上。王朗為了拉攏許靖投奔魏國，就寫信勸說：您與諸葛亮等一般讀書人，整天打交道的都是周圍的落後野蠻民族，永遠自

絕于華夏先進文明之地，連到先進文明的中國的機會都沒有。您連交州那麼遠的地方都去過，落後野蠻民族也看夠了，難道不懷念先進文明的華夏嗎？可是這位許靖不為所動，老死在蜀國[33]。

《三國演義》以蜀國為正統，貶低魏國，就安排了一個情節：諸葛亮罵死老匹夫王朗。

拾壹西晉亡國奴自我感覺良好

曹操的兒子曹丕於二二〇年篡漢稱帝，建立魏國，把首都從許昌遷到洛陽。魏國的司馬懿在東征西討中勢力坐大，二六五年，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篡魏，建立晉國，首都洛陽，史稱西晉。西晉亡於匈奴劉曜之手，劉曜攻破洛陽，俘虜晉懷帝，殺太子、宗室、官員及士兵、平民三萬餘人，發掘陵墓，焚毀宮殿，史稱「永嘉之亂」。晉國的倖存統治者向南方逃亡，標榜「衣冠南渡」（文明人南下解放野蠻人），鎮守建康（今南京）的琅琊王司馬睿（司馬懿家族後代）於三一七年重建晉國，史稱東晉。以建康為首都。

東晉占領的地盤最初屬於山越等原住民。吳國圍剿山越，據為己有。唐長孺（1911–1994）等大權威認為山越也是漢族，其實山越有鮮明的民族特徵。《後漢書》卷三十八《度尚傳》記載長沙太守抗徐最初在宣傳當小官，把深山老林的「椎髻鳥語之人」趕出來，這些人就是山越。椎髻是將頭髮挽起來成為一團，不僅南方有，唐帝國時北狄也流行。鳥語是形容當地四夷族語言像鳥叫一樣難聽。戰國中期的孟子是北方人，就挖苦南方楚國人許行「南蠻鴂舌」，鴂是伯勞鳥。語言和服飾是古人辨別民族的兩大標準，古代的「中國」人就是拿「被髮左衽」作為四夷族的標誌，並斷定如此穿戴的人肯定是野蠻人，和禽獸差不多。宣城在在今安徽省繁昌縣一帶，自古以來就是鳥夷的大本營，後來成為山越的聚居地。

在二八〇年西晉滅吳之後，原來在孫吳政權下的文武眾職一落千丈，也成了亡國奴。吳人此起彼伏的反抗被汙為「妖寇」。其實根本原因就是吳人的生存空間和生存手段被擠占，引起原住民的不滿。所謂「客主難久，嫌隙易構」。原吳國名士陸雲、陸耽兄弟被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致書淮南內史朱誕，痛惜二陸不該生於「暗朝」。陸雲的兄弟陸機是著名文學家，素來鄙視北人，稱北人為「傖父」。《世說新語》上

卷《言語》載吳郡蔡洪赴洛陽，洛中之人問曰：「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吳人亡國之痛可知。在這種普遍的社會心理作用下，陳敏起來造反，得到吳地大族顧榮等四十餘人的支持。但陳敏只是吳地廬江的寒族，難以成為顧榮等大族的保護傘，反而會連累顧榮等大族，因此遭到顧榮等大族的反戈一擊，終至失敗。

司馬睿徙鎮建康，吳人不附。《世說新語》上卷《言語》載：「元帝（司馬睿）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九鼎遷雒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顧驃騎即顧榮。商族經常遷徙，耿、亳都曾經是商國的首都。周武王克商人，將象徵商政權的九鼎遷於雒邑（今洛陽）。由於東晉採取各種措施籠絡吳人，顧榮、紀瞻等大族將司馬睿引為同類，因此歸附。

吳人無論如何受籠絡，都不可能與北人統治集團相提並論，因此義興人周勰打算起兵造反，他的父親甚至被氣死。直到南齊，吳興丘靈鞠對顧榮引狼入室痛恨不已，說：「我願東還，掘顧榮塚！」北人在槍桿子的支持下，鳩占鵲巢。

例如：永嘉亂後以至東晉末年，河南宗氏，河東柳氏，北地傅氏，京兆韋氏、杜氏、王氏，扶風魯氏，安定席氏，天水楊氏等司秦大姓、雍州豪強及諸位流人，陸續南出樊沔，在襄陽、漢水一帶安家，結果「舊民甚少，新戶稍多」。漢中也密集了秦、雍、涼、並諸州僑郡縣。襄陽一帶以及漢中都是土著蠻族的大本營 ，從來都不是中原人士矚目的膏腴之地，此時居然成了香餑餑。可見爭奪生存空間之烈。

北人南遷以東晉為最盛。北京大學田餘慶（1924–2014）教授有個很好的比喻：建康政權像是一間股份公司，東晉皇帝是名義上的業主，輪流執政的門閥則擁有最大的股權。門第是入股的必要條件，雖非股權大小的唯一依據。唐詩人劉禹錫作《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謝指東晉時王導和謝安，是左右朝廷的兩姓豪門望族。這些外來者不僅壟斷了政治權力，還膨脹出文化自戀，即以「文化人」自居，明明是一幫亡國奴流竄到江南，卻美化成「衣冠南渡」。南北朝愛標榜門第，門第的底氣是世家大族擁有經濟實力，文化上以繼承「漢文化」自命。這些貴族活像春秋時期的華夏集團，自認為是擁有先進文化的高等人。這些貴族的數量本來就有限，經過南北朝的戰亂，更是大為減少。

例如：南朝梁經過侯景之亂，貴族平民均遭掠殺，江左變為丘墟。隨晉國政權渡過長江的大族世家，居住在都城裡的人覆滅略盡。這類貴族到唐建國時已經沒有多少倖存者。更何況唐國是延續「關中本位」。更令人吃驚的是，東漢、魏晉、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從李唐最盛之時即玄宗之世，開始胡化，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王國，「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34]。根據陳寅恪先生的看法，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五百年間一脈相承；戰亂中，偏遠的河西走廊反而保留了「漢魏」文化。陳先生短小精悍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即發揮此說。

四二〇年，東晉大將劉裕取代東晉稱帝，國號宋，劉裕就是宋武帝，首都建康不變。宋在長江中下游與北魏對峙，存在了六十年。隨後有齊、梁、陳三個政權更迭，與宋合稱南朝。從三國時的吳國開始到東晉，再到宋、齊、梁、陳，都以建康（吳稱建業）為首都，合稱六朝。如果除去吳國，則是五朝。

由於與南朝對峙的是北方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占領了淮河以北，建立了龐大的草原帝國。後世修史者，從不同立場出發，稱北方攻擊南方是「島夷」，意思是住在荒山野島上未開化的野蠻人，南方攻擊北方是「索虜」，因為鮮卑族把頭髮盤成索條狀。

拾貳北朝為隋唐奠基，唐國亦非漢文化正宗

歷史常常有意想不到之處。夏國、夏族不僅與千年之後的華夏集團沒有關係（本書第三章），而且還是胡族的祖先。如果認為這是異想天開，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匈奴為夏之後裔是司馬遷說的，堂堂正正地寫入《史記．匈奴列傳》。山西是夏族的大本營，《左傳》等典籍記載的「大夏」地名有五個，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汾水流域。當西周的晉國分封到這裡的時候，他們發現處於四夷的汪洋大海。春秋末期，晉國被鳥夷族的趙氏篡奪，並最終分裂為趙、韓、魏三個國家。

這樣來看匈奴人劉淵在山西建立的漢國（304），就不是中國史學家張口閉口的搞分裂的割據政權，而是堂堂正正的復國。之所以採用了漢姓「劉」、將國號取為「漢」，是因為西漢長期與匈奴和親。而且劉備已經樹立了為漢復國的榜樣。

說劉淵是割據的，前提是認為劉淵的匈奴部族活該接受西晉的統治。古人還經常爭論得國正與不正的問題，即是否采取正當的手段建立

政權。那麼我們看魏、晉二國醜惡的篡國史：魏篡漢，晉篡魏，是典型的得國不正。劉備的蜀漢才是典型的割據。劉淵根據漢國與匈奴有過和親的歷史，因此用「漢」作為國號，也承認蜀漢的正統地位。

匈奴部族活該接受這樣一個得國不正的西晉政權嗎？不該成為西晉的掘墓人嗎？

與匈奴劉淵同時，鮮卑拓跋氏在北方興起，始祖神元皇帝三十九年（258），遷都於定襄之盛樂（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以南的和林格爾縣北），舉行祭天大典，其他部落君主前來助祭。穆帝六年（403），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山西大同市）以為南都。西晉為了拉攏穆帝（猗盧）以抗擊匈奴劉聰、羯胡石勒，於三一〇年封猗盧為代公，三一四年進封代王，割讓四個縣（都在今天的山西省）給他。西晉滅亡，拓跋氏壯大。登國元年（386），拓跋珪即代王位，改國號曰魏。以此拓拔國可以稱為代國，也可以稱為魏國。為了和中原曹丕建立的魏國區分，後世稱為北魏。天興元年（398），拓跋珪稱帝，即道武帝，稱太祖，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此時相當於東晉的安帝時代。其孫太武帝拓拔燾（世祖）統一了黃河流域，還打到淮河以南，與長江以南的劉宋對峙。太和十七年（494），孝文帝遷都洛陽，直接插入中國的心臟。因為洛陽是最著名的「土中」。孝文帝單刀直入，直奔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城市，真有點擒賊先擒王的架勢。或許如王仲犖先生所說，都洛陽，更能迷惑中原的一批醉心於「中原正音」的士大夫[35]。但與漢化無關。

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大帝國，奠定了北朝的歷史。

北朝是指與南朝同時並存的幾個政權：北魏（386–534），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陽；東魏（534–550），首都鄴（河北臨漳縣）；西魏（535–557），首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北齊（550–577），首都鄴（河北臨漳縣）；北周（557–581），首都長安（今陝西西安）。



鮮卑墓中的壁畫，壁畫中的鮮卑人物著胡服，手持弓箭。北魏為鮮卑人拓跋氏所建立的「外族」政權。

其中的遞嬗關係是：北魏歷經六鎮大動亂，爾朱榮乘虛而入洛陽，殺害朝臣一千三百餘人，最後被原部下高歡打敗，於五三三年自殺。高歡掌握了北魏大權，「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打算遷都鄴，遭到孝武帝元修反對。元修不願當傀儡，放棄洛陽，投奔關中的宇文泰，後來被宇文泰毒死。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十一歲的元善為帝，遷都鄴城，史稱東魏。高歡的祖先本是漢人，因犯法被移徙懷朔鎮。高歡「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36]。這又是一個漢地人認同四夷的例子。高歡的妻子婁氏是鮮卑人。五三三年，宇文泰擁立元寶炬作傀儡皇帝，史稱西魏。五五〇年，高歡的兒子高洋廢掉東魏主，稱齊皇帝，史稱北齊。高洋打算立李祖娥為皇后，遭到高德政、高隆的反對，理由是「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高德政、高隆在血統上是漢人，但已經鮮卑化，自認為是鮮卑人了。宇文泰在世時沒有稱帝，於五五六年病死，臨死托孤給侄子宇文護。宇文護暗示西魏主禪讓，宇文泰的兒子宇文覺稱周天王，是為北周閔帝。五七二年，北周武帝親手刺殺專權十五年之久的宇文護，於五七七年消滅昏君輩出的北齊，統一黃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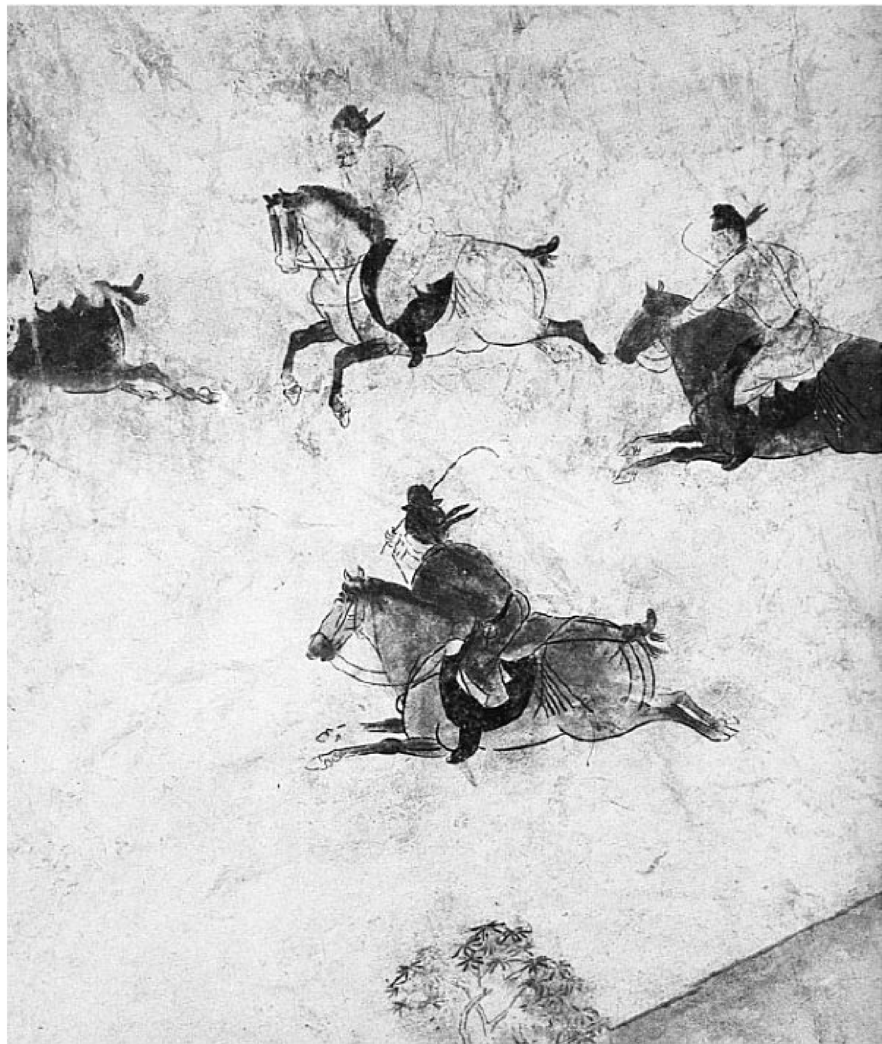
宇文泰的祖先是匈奴的後代，住在遼東鮮卑之地，逐漸鮮卑化，被鮮卑人奉為首領，北魏道武帝時遷武川，成為職業軍人。武川是北魏六鎮之一，在今內蒙古南部武川縣西南烏蘭不浪土城梁，以出武將知名，與多個王室有關。宇文泰控制的西魏實力不如東魏，與東、西魏鼎峙的江東蕭氏建立的梁，輿論上是正朔所在，也即正統所在。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胡人及胡化漢人割據關隴，果斷地將西遷有功漢將之山東郡望改

為關內郡望，別撰譜牒，紀其所承。又以諸將功高者繼承鮮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後，如李虎（李世民祖先）改為大野氏；凡改胡姓諸將所統領的兵卒也改從其主將之胡姓。這又是政治改變民族成分的顯著例子。再來看國民黨裹脅大部分中國人為漢族，真是手段通天！

經過宇文泰的改革。山東人與關內人混而為一，漢人與鮮卑人混而為一，組成一支籍隸關中、職業為軍人、民族為胡人、組織為部落式的強大軍隊府兵。府兵將領都有賜田與部曲（鄉兵），他們既是府兵將領，又是關中豪族。將領與關隴豪族也混而為一，陳寅恪先生首創「關隴集團」稱呼之。宇文泰用這支部隊於五五五年滅了梁，扶植後梁傀儡政權。

關中是建立西周的姬姓周人發祥地，《周官》（即《周禮》）相傳是西周設官分職、統治國家的大經大法，被認為是西周總設計師周公所作。《周官》分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寇（原缺，漢代以《考工記》補之）。西魏模仿六官，成立六軍。范陽盧辯累世儒學，宇文泰就讓他仿照《周官》建立西魏的六官，設置公、卿、大夫、士，並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府兵制是宇文泰的關隴物質本位政策，模仿《周官》是宇文泰的關隴文化本位政策。府兵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的[37]。這樣西魏在精神上也有了優越感。與攀附劉漢、曹魏不同的是西魏直搗巢穴，依託西周。

楊堅是北周的外戚（宣帝的岳父），實際掌握北魏的大權，下令恢復府兵的漢姓，表明漢化戰勝了鮮卑化，但關隴集團依然存在。楊堅於五八一年自立為帝，開創隋國，南下滅後梁、陳，逐漸統一中國地區。隋國祚短暫，迅速被唐取代。楊堅的皇后獨孤氏，是唐高祖李淵的從母，因此楊堅與李淵關係親密。


唐代章懷太子墓壁畫之馬球細節圖。

唐國的創立者李氏，本有胡族傳統。李虎在西魏是八個柱國大將軍之一。陳寅恪先生的開創性研究指出，李唐先世本為漢族，或為趙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戶」，或為鄰邑廣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即非華盛之宗門，故漸染胡俗，名不雅馴，迨李虎入關，東西分立之局既定，始改趙郡之姓望而為隴西，偽稱西涼嫡裔。又因宇文氏之故，復詭言家於武川。唐代帝繫雖出於北朝文化高門之趙郡李氏，但李虎、李淵之先世，則為趙郡李氏中，偏於武勇，文化不深之一支。李虎之妻梁氏有出自胡族之嫌疑，李昞之妻獨孤氏、李淵之妻竇氏、李世民之妻長孫氏則決然是胡族[38]。後人重新審察這一問題，認為李唐先世可考之始祖

是北魏李熙，李熙之孫遺元參預元愉之逆，其子受宮刑，其家逃竄北鎮得免，始偽冒隴西李氏。李氏入居北鎮後，遂與當地胡族社會融為一體。後因形勢變遷、子孫顯達之故，為避祖先宮刑之恥而受世人之譏，使其改托隴西更進一步，而偽稱西涼君主李歆之嫡裔[39]。

大唐統治者因為漢姓是「李」，相傳道教世祖老子也姓李，名耳。因此大唐自認是老子的後代，刻意推崇道教，引起佛教徒的不滿。和尚法琳著《辯正論》，譏刺皇帝的祖先老子，甚至當面告訴唐太宗，陛下不是柱下、隴西李氏之後，李氏本姓「拓跋達闍」。柱下指老子，老子是史官，在春秋時代當過周王室的柱下史，孔子還要虛心向老子請教。法琳等於說李氏是鮮卑人，也就是胡人，等於挖皇室的祖墳，惹得唐太宗「大怒豎目」，將法琳流放。

李世民的祖母獨孤氏是確定的鮮卑族，母親竇氏也為鮮卑族（竇氏，本姓紇豆陵）。唐高宗李治的母親長孫皇后也是鮮卑族。李唐有胡人血統是毫無疑問的。李世民立的太子李承乾雖然從小聰明過人，卻是個突厥迷，喜歡突厥語和突厥服裝，甚至樹起突厥民族的狼圖騰大旗，設帳篷，自己住在裡面；還裝死，讓手下安排突厥風格的葬禮。唐太宗惱羞成怒，將他廢黜。李唐家族的胡族文化傳統真是深入骨髓了。

唐太宗因為說了一句「夷狄也是人」[40]，在中國歷史上已算鳳毛麟角。可見歷朝歷代將四夷當人看待的是少而又少。而唐太宗這種「開明」，可能與家族出身有關。陳寅恪先生指出：「李唐皇室，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創業至高宗統禦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41]現在講到「漢文化」（或中華文化、華夏文化），均以漢、唐兩個王朝為正宗，從李唐的關中本位傳統，可以說明唐國絕非「漢文化」的正宗。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六《歷代三》載朱熹語：「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朱熹所謂禮義當然是指士族之禮，乃是華夏文化的象徵。例如兒子妻後母，是胡族風俗，但在中國則是亂倫。駱賓王就在其討伐武則天的檄文中攻擊武則天「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出身卑微、排擠皇后還關係不大，唐高宗（吾君）把父親唐太宗的女人（武則天）拿來享用，就犯了大忌。《禮記．曲禮上》：「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

麀。」麀是母鹿，幾頭公鹿共享一頭母鹿（或反之，一頭母鹿享受幾頭公鹿，端看你如何解釋）是自然界常有的事，但人類不能這樣，父子之親尤其不可以。

唐國的長孫無忌領銜撰文的《律疏》（後稱《唐律疏議》），永徽四年（653）頒行。其中卷三《名例》的「中華」一詞解釋如下：「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中華＝中國，自古皆然（見本書第三章）。著眼於文化方面界定中華，也是古意。

正是在與「蠻夷」的爭鬥中，即使有胡族血統的李氏王室，此時作為「中夏」的政朔代表（也即政權代表），也勢必強化「中夏」意識。我們可以想像，當唐國委曲求全地與吐蕃和親[42]，仍然未能阻擋吐蕃攻破自己的首都長安，給「中夏」唐國的刺激是多麼強烈！唐國修《晉書》，就把中原士族建立的西晉、東晉列入「本紀」；而把四夷各族建立的政權，如前趙（匈奴）、後趙（羯）、前燕（慕容鮮卑）、前秦（氐）等列為「載記」。這可以作為唐國向「漢文化」靠攏的標誌，目的是獲取自己的政權合法性。唐太宗命孔穎達等五儒臣撰《五經正義》，大量吸收了南北朝現成的經學成果，經修訂，於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布於天下，但不是獨尊儒家。唐國皇帝大多信仰佛教，又因為道教始祖老子又叫李耳，與皇室同姓，唐國也重視道教，對老子的封號高於孔子。「唐人」聲名遠播，現在已經作為「華人」的同義詞，但不能等同為漢族。否則外國的「唐人街」豈不等於「漢族的街」？

北魏不僅奠定了北朝的歷史，也為隋唐開基。關於北魏的巨大影響，正如羅新先生指出：柔然人在北魏滅亡之後還是用「Tabghatch」（拓跋）來稱呼他們的南方。直到唐，北邊的遊牧民族還用「Tabghatch」來稱呼南方。這個稱呼還傳給了突厥人。突厥人稱唐為「Tabghatch」。因此，後來中亞人也用「Tabghatch」來稱呼中國人。元帝國的長春道人丘處機帶著他的幾個弟子跑到中亞，發現當地人管中國人叫「桃花石」，而這個「桃花石」其實就是「Tabghatch」。不過，後來隨著波斯語對突厥語的影響，波斯語中稱呼中國的Cin（和China同源）慢慢把突厥語裡面的「Tabghatch」淘汰掉了[43]。

從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開始的安史之亂是唐國走向衰落的標誌。安史之亂的發動者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起家的營州（今遼寧省東部朝陽市）一帶，在開元年間就已成為粟特人的新家園。經過安祿

山的經營，河北地區成為粟特商胡的嚮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內的胡人南下，在天寶末年以前，河北已成為胡化之區。安史之亂後，唐國出現排斥胡人的情緒，許多粟特人蒙受打擊，紛紛向河北三鎮轉移（安祿山、史思明在當地仍然享有「二聖」的美名），尋求新的生存之地。大量粟特胡人遷居河北，進一步加強了河北的胡化傾向，也增加了河北藩鎮的力量。最後，加入到晚唐強勁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的粟特人，又成為五代王朝的中堅，甚至像石敬瑭那樣當上了皇帝[44]。

出身底層的朱溫，滅唐國而自己稱帝（907），是為梁太祖。「與其臣事異種之華盛頓，無寧臣事同種之朱溫」[45]，是清末排滿運動中的流行語。也就是說，我們漢族只接受漢族的統治，哪怕統治者是像朱溫那樣的壞蛋。即使有華盛頓那樣的英明領袖，因為他是異族，絕不接受。除朱溫的梁國之外，北朝的其餘四國均出自沙陀部李克用一系，而趙宋王朝就其統治者的「底盤」而言，亦與之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46]。

在唐國滅亡之後，中原有一個五代十國時期。五代（907–960）指梁（907–923）、唐（923–936）、晉（936–946）、漢（947–950）、周（951–960），梁、唐、晉、漢、周都是古已有之的國名。後世為了避免混淆，通稱它們為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後唐、後晉、後漢都是沙陀族建立的國家。郭威是後漢的開國功臣，九五一年取代後漢建立後周，定都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享國十年，被趙匡胤以同樣的方式取代。

經過五代的掃蕩，徹底摧毀了唐帝國的貴族，正好比戰國摧毀春秋的貴族一樣。

拾參宋、遼、金之間的戰爭強化了民族意識

宋國是趙匡胤搶奪後周政權而建立（960）。趙姓與嬴姓秦人一樣，在遠古都是鳥夷族，到宋國建立時這種歷史記憶恐怕已經完全湮滅。趙匡胤之父趙弘殷早年所跟從的王鎔，是出自回鶻部的軍閥。趙匡胤同母妹所嫁米福德，很可能是粟特人。趙匡胤娶的是有胡族血統的貴族為皇后。宋國初年的軍事將領中，具有沙陀、奚等外民族背景者絕非個別，史家因為宋初歷史記錄民族色彩淡出，「胡、漢」之類的區分絕少再被提及[47]。

但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真宗追崇神人趙玄朗為始祖，尊

號「聖祖」，謂其為軒轅皇帝降生，此後尊稱黃帝為聖祖。黃帝是華夏追憶的終極始祖，難說宋室沒有攀附華夏的動機。而且北宋（960–127）接受戰國鄒衍五德終始學說，以火德自居，因此大祭炎帝。

天禧四年（1020），大理寺丞董行父認為宋國對應的應該是金德而非土德：「陛下紹天統，受天命，心與天通，道與天廣，固當應天明統，紹唐正德，顯黃帝之嫡緒，章聖益之丕烈。……陛下紹唐、漢之運，繼黃帝之後……」董行父連鳥夷族的益也拉來，總算沒有數典忘祖。先秦的趙國締造者確屬鳥夷族。當然，到了宋，黃帝這個聖祖顯然只能由趙家天子獨享。董行父迂腐之極，因為宋太祖是搶奪後周政權而以恭帝禪讓加以文飾，周既然自稱是木德，根據「五德相生」的模式，宋非稱火德不可，否則政權合法性沒有著落。宋室深明此理，因此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均抓住火德不放。火德也是漢國的德運，更可以加強宋國的正統繼承性。

與北宋並存而且早於宋國崛起的是契丹族創建的遼國（907–1125），之後有黨項族創建的大夏國（即西夏，1039–1221），女真族創建的金國（1115–1234）。金國是女真人建立的國家，事實上存在著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奚人、漢兒和南人五個民族等級。《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八引趙子砥《燕雲錄》，說金國要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48]。學術界將漢兒解釋為原遼統治區的漢人，將南人解釋為原宋統治區的漢人。事實上，無論是原遼統治區還是原宋統治區，都不可能是單一的民族—漢族。北朝時，「漢兒」、「華人」等稱謂已經出現，雖然是用來標識族群身分，但不是受壓迫階層的專有名詞，到了金國就不一樣了。受到歧視的漢兒、南人，民族意識必然得到極大提升。

北宋向遼國奉獻絹、銀，聯金滅遼，因為爭地喪失了北中國，宋徽宗和宋欽宗被金國活捉，北宋滅亡。北宋亡國奴逃往臨安（今杭州），建立南宋（1127–1279），宋高宗對金國稱「臣構」。南宋第一個年號是「建炎」，即重建北宋火德之意。此時的經學家胡安國（1074–1128）撰《春秋傳》三十卷，鼓吹「尊王攘夷」，激發了華夏（中國）意識，有點像魯迅說的「精神勝利法」。宋孝宗在一一六五年乾脆對金國稱「侄宋皇帝」， 與兩百年前契丹的兒皇帝石敬瑭真是前後輝映。

拾肆蒙古人征服中國

蒙古源於七世紀居住在額爾古納河東岸森林中的蒙兀室韋。「室韋」一詞是蒙古語的譯音，原意為「森林」，用之為民族的稱呼是在唐國前後的中原史籍裡，泛指位於北方森林中的人們。「室韋」作為地名，現指額爾古納河東岸原始森林中的一個小鎮。額爾古納河現在是中國和蒙古國的國界線。

一二九七年，南宋軍隊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最後一個據點崖山（位於今廣東境內），與蒙古軍隊展開了一場生死戰，遭到慘敗，丞相陸秀夫背著宋國最後一個皇帝（年僅八歲）投海自盡。被蒙古軍隊活捉的文天祥，也是中國官方重點宣傳的民族英雄。明末清初錢謙益有一首詩，說：「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於是有「崖山之後無中國」之類的說法。意思是說中國是高級的農耕文明，蒙古是落後的遊牧文明。南宋的滅亡，標誌著文明被野蠻征服，是漢族不可接受的。

排滿運動期間，「漢奸」一詞大行其道。革命黨認定中國是漢族的中國，任何漢族到異族人建立的王朝做事，都是漢奸。革命黨編輯的《民報》發表過《崖山哀》之類的小說，就是諷刺漢奸的。革命黨認為儒學是中國的，儒生當然是漢族，應該信仰中國的儒學，不能對異族效力。元世祖忽必烈重用儒臣劉秉忠（1216–1274），革命黨創作的「革命小說」就以劉秉忠的口氣說：「一片丹心保蒙古，擾亂中原。」「生來門第本清高，兩代曾扶金與遼。不是傳家有秘訣，焉能今日事新朝。」這不就是文化大革命「大字報」的先驅嗎？附帶說，文化大革命也是盛行血統論的。劉秉忠世代在遼國做官，他本人也當過邢台節度使府令史，後來當和尚去了。一二四二年受海雲禪師推薦，入忽必烈幕府，因博通古今，備受忽必烈信任。一二五三年和一二五九年，隨忽必烈征雲南，伐南宋，贊以天地好生、王者神武不殺，元軍所到之處，不妄殺一人。現在的北京城也是他主持建造的，「大元」的國號也是他取的。對於這樣一個有貢獻的人，尤其是他勸阻蒙古人不殺漢地人，在革命黨的眼裡，都是漢奸。

蒙古人在鼎盛時期征服了整個北半球。在發揮蒙古族軍事特長的同時，善於做生意的穆斯林也受到重用。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也很寬鬆[49]。日本蒙古史專家杉山正明認為，忽必烈的新國家是個超大型軍事國家，也是超大型經濟國家，而且是以貿易立國的超大型國家。在某些方面也與現今的美國相似。



一個漢化的蒙古家庭，照片出自於一九三五年的《亞細亞》雜誌。

蒙古征服中國之後，將全體人民劃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個等級，蒙古族當然是第一等，色目人是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如欽察、唐兀、畏兀兒、回回等。漢人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國統治境內的漢、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較早被蒙古征服的雲南（大理）人，東北的高麗人也是漢人。可見這裡的漢人不等於漢族。南人為第四等，也叫蠻人、新附民，指最後被元帝國征服的原南宋境內各族（淮河以南的人民）。南人也不等同於漢族。

元帝國勢力遠達西亞、歐洲，顯然不能說元的勢力所到的地方，那裡的人都是蒙古族。

拾伍朱元璋利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搶奪蒙古人的天下

於是造反者以重建宋國為名，詐稱自己是宋王室的子孫，揭竿而起。如白蓮教徒劉福通、韓山童以「彌勒降生，明王出世」作號召，韓山童詐稱自己是宋徽宗的八世孫，不久韓山童遇害，劉福通於至正十五

年（1355）奉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自稱宋徽宗九世孫）即皇帝位，號「小明王」，國號「宋」，建都亳州（安徽亳縣），改元龍鳳。窮困潦倒的朱元璋投奔的正是劉福通一支，並最終篡權，將小明王沉之於江。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以吳國公即帝位於應天（南京），定國號為大明，建元洪武。吳晗主張「大明」國號源於明教經典，長時間成為定論。但是近年學界認為「明」之國號系出於白蓮教「明王出世」之說，「明王」系指阿彌陀佛，與明教之明王並無關係。由於朱元璋稱帝立國號為大明，其與宋之關係就此了結，而自漢以來朝野重視的王朝循環遞嬗統緒，亦自此中斷。

朱元璋在即帝位後，由於形勢改變，並無倡議討論德運、推定行序。從這時起，五運推移的理論便失去其政治的號召與功能。明國中葉後，由於正統十四年（1499）瓦剌族入侵，英宗率領的五十萬大軍在土木堡（河北懷來西北）遇伏，傷亡過半，而自己亦被擄北狩，逾年始獲釋，為明國歷史上最屈辱喪敗的戰役。這一事變激發起反蒙古與外族的情緒，而大宋名號再度成為伸張民族主義的標誌。

從這一時期開始，敵視蒙古和外族的名詞如「胡元」便出現於文字行間，而以宣揚大漢民族意識為重心的史學著作，便以改編《宋史》的形式，成為一時的主流[50]。丘濬（1421–1495）的《世史正綱》就很有代表性。該書寫於成化年間（1465–1487），認為蒙古對中國的統治，是中國最黑暗的時期。他還著有《大學衍義補》，無非是告誡大家要成為一個文明人，不要成為蒙古那樣的野蠻人。其中很重的篇幅是「馭夷狄」部分（《四庫全書》篡改為「馭外藩」），反覆強調華夷之別，「華」指的是中國，代表的是文明；「夷」指的是中國以外的所有異族，代表的是野蠻。用今天的話說，「華」指的是中國、朝鮮那樣的農耕文化，「夷」指的是蒙古那樣的遊牧文化。

朱元璋雖然利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搶奪元帝國的天下，「中華」是對春秋之「中國」的擴大，即中原，華夏的老根據地，不等於漢族。而且朱元璋是和尚出身，信仰的是佛教，佛教是外來文化，當然不是中國本土文化。

明國統治者以「中華」自居，「中華」人是怎樣看待四夷的呢？

《明史》最後部分是列傳，在人物列傳之後，分別是土司、外國、西域。土司又分湖廣土司、四川土司、雲南土司、貴州土司、廣西土司。土魯番、西寧、河州、洮州、岷州等列入西域，相當於今天甘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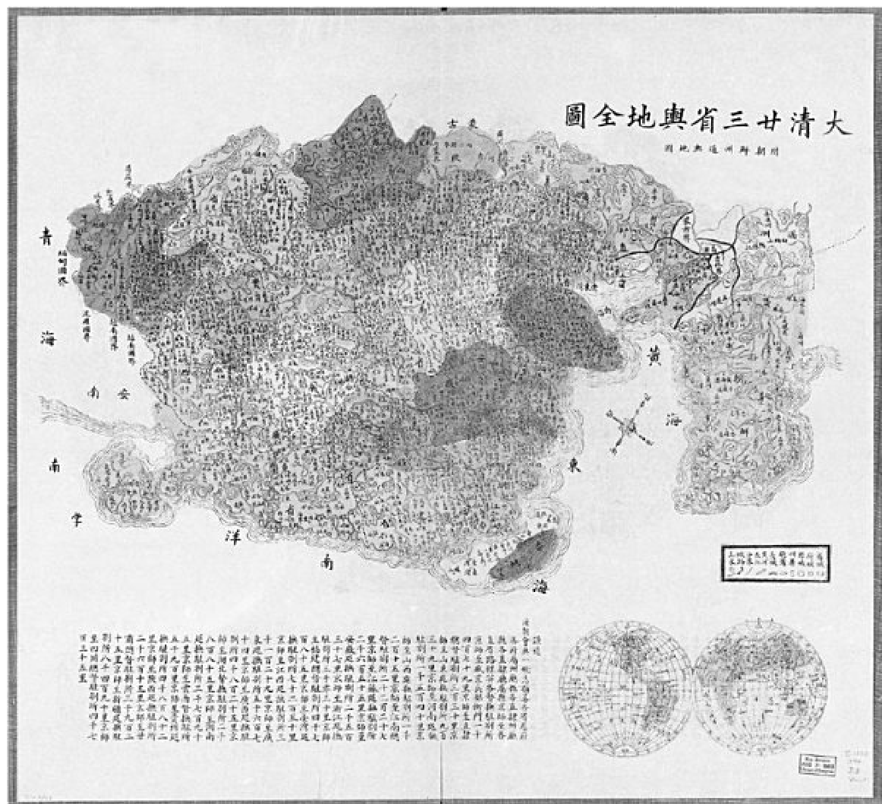
青海、西藏、新疆的大片區域。土司是名副其實的獨立王國，中央政府既不能向土司派官，也不能向土司移民。從西漢開始，匈奴將漢國的國土稱為「漢地」，此後四夷經常用「漢地」一詞指稱中國。土司把自己以外的地方也稱為「漢地」，土、漢之間立有界碑。明國是自稱「中華」的人打下的江山，尚且能容忍如此龐大面積的土司、西域，不強迫它們接受「王化」。

拾陸滿洲征服中國

現今中國東北在古代是很多民族的聚居地。女真族就曾經在這裡建立他們的國家—金國（1115–1234）。女真族發祥地在按出虎水，這條河就是今天黑龍江省阿城市的阿什河。因為這條河產金子，於是「金」成為女真族的國號。金國先滅遼國，並於一一二七年滅北宋。

元惠宗（順帝）時，蒙古人在中國的殖民地發生內亂，要飯出身的朱元璋打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從造反軍中勝出，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應天（中國江蘇南京）稱帝，定國號為大明。隨後攻入元帝國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惠宗倉皇逃往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多倫縣西北）。此後元帝國並沒有滅亡，只是往蒙古高原退縮而已。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族入侵，在土木堡（河北懷來縣西北，長城附近）打敗明國幾十萬大軍，活捉英宗，顯示了蒙古人實力猶存。一六〇三年，林丹汗繼位，蒙古各部基本上仍聽從於他的統一號令。

正當此時，女真人已從東北亞崛起。其建州部首領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於一六一六年在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即汗位，國號曰「金」，史稱「後金」。一六二六年，努爾哈赤去世，其四子皇太極即位。皇太極登基後，加快了征服蒙古各部的步伐，三征林丹汗。一六三四年，林丹汗病死，其子額哲被皇太極封為親王，並將皇女馬喀塔格格嫁給他。一六三六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個大小領主齊聚瀋陽，承認皇太極為汗，並奉上「博格達．徹辰汗」的尊號。同年，皇太極在盛京（瀋陽）即位，改國號為「清」，改元崇德。一六四四年進入山海關內，攻占京師（今北京），從此定都北京，直到一九一一年清國滅亡，蒙古族都是滿族最重要的盟友。



一八八五年繪製的《大清廿三省輿地全圖》，不含蒙古、新疆與西藏等地。

剛開始，清國的統治者強調明國亡於流寇李自成之手，後來坦然自認明國亡於滿洲王朝，因為滿洲王朝受到上天的眷顧。這種解說與西周初年的天命思想吻合。康熙皇帝大力提倡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使滿清取得「道統」（聖人之教），與「治統」（天子之位）銜接，論者多認為這是清國統治者主動漢化，我認為還應當考慮統治者以漢治漢的因素。滿族女作家德齡的著作《清宮二年記》裡有這樣一段話：她的父親小的時候教導她，滿人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的主人。這種心態非常真實。中國、四夷諸文化平等相待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裡可以套用恩格斯的話：「任何民族當它還是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51]「中華」壓迫「韃虜」是事實，蒙古族、滿族壓迫「中華」也是事實，因此文化上不能平等。

清國延續明國的土司制度。後來心理不平衡，改土歸流，只是改變土司地區的統治者，即有朝廷任命的流官取代通常是世襲的土官。但原土司地區的人民是不可能改變的，他們依舊是四夷。既不屬於「中華」，也不屬於滿族。

以上從古到清的討論，我以為已經成功地摧毀了革命黨險惡的預設：清國內除了五百萬滿洲人，其餘的都是漢族人。

---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官方網站，「人口、民族與風俗」，網址連結：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366.htm
2.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頁四五二。
3. 劉起釪，《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五二。
4. 顧洪編，《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五卷．上部》，頁二八〇四。
5.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人民出版社，一九四九年，頁一三三至一三四。此書原名《中國通史簡編》，初版於一九四二年。
6. 羅振玉輯印，《高郵王氏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八一。
7. 牟庭，《同文尚書．中冊》，齊魯書社影印清抄本，一九八一年，頁一〇七六。
8. 劉起釪，《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五一。
9.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頁一三四。
10. 劉起釪，《古史續辨》，頁一五四至一五五。
1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二三三。
12. 李文實，《西陲古地與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二八。
13.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七三四—七三五。
14. 《左傳．襄公十四年》記為「戎子駒支」。戎是民族之名，駒支是人名，子是對異族國王的貶稱，也就是拒不承認其國王身分。這種歷史書寫方式叫「春秋筆法」，儒家認為是孔子發明的，以一套特殊的遣詞用句方式含蓄表達自己的褒貶態度，是中國式影射史學的起源。
15. 黃龍元年（229），吳、蜀兩國和好，雙方乃約定兩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並、涼屬蜀。至於司州之土，則以函谷關為界，詳見〈吳書．孫權傳〉，《三國志》卷四十七。
16. 〈吳書．孙權傳〉，《三國志》卷四十七，裴松之注引《江表傳》部分。
17. 顧頡剛、王樹民，〈「夏」和「中國」〉，《顧頡剛全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一》，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頁六四五。
18. 《左傳．定公十年》。「裔」與「夷」在當時屬於同音字，意思也完全一致。
19.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蠻夷猾夏，周禍也。」
20.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21. 《公羊傳．僖公四年》。
22. 吳銳，〈試論中國文化自戀傾向的起源〉，《中國哲學史》，二〇〇〇年第四期。
23.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八日，有很多回族的甘肅鎮原縣，縣圖書館公開焚書，大家又想起主張焚書的祖宗—李斯。不妨再回顧一下他說的，至今令人不寒而慄，「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李斯的老家上蔡，因老百姓太窮賣血，交叉感染，成為聞名全國

的愛滋村，造成對整個河南人的地域歧視。

24. 〈蜀書．先主傳〉，《三國志》卷三十二。
25. 〈高祖本紀．索隱〉，《史記》。
26.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頁二九六。
27. 〈魏書．文帝紀》，《三國志》卷二，裴松之注引《獻帝傳》、《魏氏春秋》部分。
28. 〈魏書．明帝紀〉，《三國志》卷三，裴松之注引《魏略》部分。
29. 《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30. 林超民編，《方國瑜文集．第一輯》，雲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二〇八。
31. 《方國瑜文集．第一輯》，頁三二〇。
32. 《後漢書．西南夷列傳》對哀牢這個國家的描述，「建初元年（76），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肅宗募發越巂、閃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後漢書．章帝本紀》作「永昌、越巂、益州三郡民夷討哀牢夷。」方國瑜先生指出此「民夷」就是「夷漢」，可證「民」即「漢」，漢戶稱作民戶。詳見《方國瑜文集．第一輯》，頁三一七。
33. 《三國志．蜀書八．許麋孫簡伊秦傳》注引《魏略》，「王朗致許靖，『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足下周遊江湖，以暨南海，曆觀夷俗，可謂遍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系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
34. 〈史孝章傳〉，《新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35.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下冊》，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頁五四〇。
36. 〈神武紀上〉，《北齊書》卷一。
37.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黃山書社，一九八七年，頁三〇八至三二〇。
38.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三〇三至三〇七。
39. 張金龍，〈李唐出於趙郡李氏說〉，《北魏政治與制度論稿》，甘肅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一七三。
40. 〈太宗貞觀十八年十二月甲寅〉，《資治通鑒．第十三冊》，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頁六二一五。
41. 陳寅恪，〈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
42. 《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記載契丹述律後對後晉使者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
43. 羅新口述、徐曉東整理，《遊牧民族是如何參與中國古代的歷史進程的》新京報網：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19/10/30/643624.html。
44. 榮新江，〈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載於《暨南史學．第二輯》，暨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45. 柳亞子〈中國立憲問題〉，「吾聞近世愛國者之言曰，與其臣事異種之華盛頓，無寧臣事同種之朱溫。是亦民族主義之代表矣。彼其晊呻吟於異族之下，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較之呻吟於專制政權之下，其傷心慘目之情狀，殆尤有甚焉！」詳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第一卷》，頁五九五。
46. 樊文禮，〈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團．自序〉，轉引自鄧小南，《祖宗之法》，三聯書店，

二〇〇六年，頁八十。

47. 鄧小南，《祖宗之法》，頁九二至九九。

48.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冊》，書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七二五。

49. 鑒於元朝因「寬縱失天下」，朱元璋轉而採取嚴刑峻法，成為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 

50. 陳學霖，〈大宋「國號」與「德運」論辯述義〉，《宋史論集》，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三年，頁四八。

51. 恩格斯，〈論波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頁四一〇。

第伍章

國民黨將「中華民族」變成黑頭套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前，由哈爾濱北方商業印刷局出版的《中華民國人物輿地全圖》。本圖採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以圖形表現各地方民族的人物服飾及各種特色，如動物、建築、作物等。





左：西南局部。
右：東北局部。

壹梁啟超等民間人士使用的「中華民族」一詞，被政客利用

「民族」一詞，是在十九世紀末葉從日本傳入中國。但是古書有族類、種、種類等詞，與「民族」一詞相當。

一八九九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通過對歐洲世界史著

作的評介，破天荒地使用了現代意義的「民族」一詞。一九〇一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並將中國民族的演變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激烈之時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

由於「中國」一詞在春秋時代指「華夏」，等同「中華」，那麼「中國民族」也可以稱作「中華民族」，梁啟超也有過這樣的用法。一九〇二年梁啟超在「中國民族」的基礎上，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先對「中華」一詞的內涵做了說明。其云：「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

文中的「中華」指的是中國，並不是國、共兩黨刻意宣傳的將中國境內幾十個民族摶合為一個民族的「中華民族」。而且一九〇五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明確表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 它是「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由此可知，梁啟超認為中華民族就等於漢族，他將中華民族認定為漢族與其前身華夏，而不是認定中華民族為中國各民族的統稱。

但是在他隨後的文章中也提倡「大民族主義」，「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蹠於五大陸之上」，「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他的用意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清國原有的地盤。

繼梁啟超之後，晚清著名立憲派代表楊度也成為了「中華民族」一詞的早期使用者。一九〇七年，楊度在其所創辦的《中國新報》連載的《金鐵主義說》一文中，多次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中國向來雖無民族二字之名詞，實有何等民族之稱號。今人必目中國最舊之民族曰漢民族，其實漢為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即此義以求之，則一國家與一國家之別，別於地域，中國云

者，以中外別地域遠近也。一民族與一民族之別，別於文化，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親疏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不以血統言，可決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為何等民族，則於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於其中。與西人學說擬之，實採合於文化說，而背於血統說。」

他指出，「漢」是王朝名稱，不是民族名稱，是非常正確的。可憐當今的漢人連這個基本常識都沒有。他強調民族的區分應該從文化著眼，而不是血統。究竟如果從文化上把漢族區分開來，他也沒辦法。

貳國民黨：「中華民族是一個，都是黃帝子孫」

袁世凱於一九一二年三月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已經著手在全國進行了國會（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選舉。雖然很不完善，但已經向議會政治邁向了關鍵一步，中國破天荒有了民主氣息。

起源於幫會組織的同盟會，一開始就與日本右翼組織黑龍會密切勾結。我們不能忘記，同盟會有十大政綱，第三條就是種族同化。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遇刺，兩天後去世。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栽贓袁世凱，趁機於當年發動「二次革命」，當時就遭到全社會的唾罵，認為是用革命的名義綁架全國人民，「二次革命」持續了兩個月就以失敗收場，孫中山也去找日本爸爸去了。一九一四年七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要求所有中華革命黨的黨員，都必須履行一個向他個人表示忠誠的手續：宣誓絕對服從他的領導，並按一個手模印，以志矢忠，表示對此誓言負責，革命的同志必須絕對服從革命的領袖。

為了保證黨的骨幹分子優先執掌政權，該黨規定黨員根據入黨先後享受不同的政治權力：革命軍起義前入黨者是「首義黨員」，革命成功後稱「元勛公民」，享有「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革命軍起義後入黨者是「協助黨員」，革命成功後稱「有功公民」，享有選舉權和被

選舉權；革命政府成立後入黨者是「普通黨員」，革命成功後稱「先進公民」，只享有選舉權。這是孫中山開啟的「以黨治國」的新路子。

一九一九年十月，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成為中國國民黨，第二年占領廣東，隨即召集國民黨本部會議，制訂與頒布國民黨的總章、規約等一系列文件。其中，總章規定：自革命起義至憲法頒布之日為革命時期，「在此時期內，一切軍國庶政，悉由本黨負完全責任」，公然構建以一黨獨裁的政教合一政治體制。此時，只是割據一方、尚未完全得勢的孫中山，就猛烈批判他先前拋出「五族共和」論（五族即漢、滿、蒙、回、藏族），等於自己證明了「五族共和」論是騙人的權宜之計。「五族共和」可以看作是第一個黑頭套，「中華民族」是第二個，「黃帝子孫」、「炎黃子孫」是黑頭套的變種。

一九二七年，當年的排滿分子終於掌握政權。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隨即以官方名義編撰《綏蒙輯要》，此書編者，署名的是豐潤（今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陳玉甲，抗戰期間當過蒙古游擊軍第二區司令。「綏」是安撫的意思，「蒙」指蒙古人。在題為「中華民族」的開篇說明中，明確表達出國民政府對於「中華民族」源頭問題的新版主張：中華民族，都是黃帝子孫。因為受封的地點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為氣候懸殊，交通阻隔，而有風俗習慣之不同，語言口音之歧異，雖有漢、滿、蒙、回、藏等之名稱，如同張、王、李、趙之區別，其實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樣。因為我們中華，原來是一個民族造成的國家。孫總理說，中華民族，就是國族。

接著該書從歷史上論證「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比如說蒙古人就是古代的匈奴。《史記》說匈奴是禹的後裔，而禹是黃帝子孫。所以當今的蒙古同胞，和本部十八省同胞是同一個血統。


歷史學家顧頡剛，古史辨學派代表人物。

既然「中華民族是整個的」，當然只能是一個。那麼，非漢民族也必須接受「中華民族」這個黑頭套。此時以疑古名噪一時的顧頡剛先生華麗轉身，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寫下《中華民族是一個》，發表於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昆明《益世報．邊疆週刊》第九期，開頭如下：

昨天接到一位老朋友的一封信，他抱著一腔愛國的熱忱寫了好多篇幅，大意是說：「現在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撣族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某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志不在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決不能濫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禍。『中華民族是一個』，這是信念，也是事實。我們務當於短期中使邊方人民貫徹其中華民族的意識，斯為正圖。夷漢是一家，大可以漢族歷史為證。即如我輩，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的血統，南方人誰敢保證其

無百越、黎、苗的血統。今日之西南，實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粵耳。此非曲學也。」

暹羅即泰國，撣族就是傣族。顧頡剛先生的這位老朋友就是傅斯年，大學同室好友，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分子。還留學過德國，開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過北大校長，是中華民國最有權勢的學者。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傅斯年當過台灣大學的校長。抗戰時期，他對吳文藻和費孝通等民族學家非常討厭，認為他們雖然留過洋，但都是拿了帝國主義的科學當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來了此輩學者，不特以此等議論對同化進行打擊，而且專刺激國族分化。」注意這兩個「同化」。對於日本大法西斯來說，國民黨是小法西斯，然而在中國國內，國民黨不僅掌握了武力，還裹脅了幾億人充當漢族作為基本盤，無疑是老大，他要同化，弱小不堪的異族還能反抗嗎？

顧先生是怎樣論證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呢？首先，他說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

從文化來說，那時的文化中原高而地方低，所以那時的執政者期望用同化的方法：「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研究《春秋》的學者也常說「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孔子一方面稱讚管仲，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的是怕中原的文化墮落了下去；一方面又打算住到九夷去，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為的是想把邊民的文化提高起來。在商朝，西邊的周國本是夷人（或是羌的一部），但等到他們克商之後，承受了商朝文化而更把它發揚光大，於是不但周朝成了文化的正統，連商王的後裔孔子也要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了。他並不想說「你們是周民族，我們是商民族，我們應當記著周公東征的舊恨」；他卻愛慕周公到極度，常常夢見周公，以至於把不夢見周公當作自己精神衰老的表現。墨子也說：「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後來《禮運》的作者也把這話抄了進去。試想這都是何等的氣度，那裡存著絲毫窄隘的種族觀念！

孔墨的態度既是中國人一般的態度。春秋時許多蠻夷到了戰國都不見了，難道他們都絕種了嗎？不，他們因為文化的提高，已與中原諸國合為一體了，再沒有種族問題了。因此，到了秦始皇統一，「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就生根發芽了。從此以後，政權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漢

的版圖裡的人民大家是中國人了。」

其次，顧先生說：中華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漢人的生活方式所取於非漢人的一定比較漢人原有的多得多。漢人為什麼肯接受非漢人的文化而且用得這樣的自然，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種族的成見，「他們不嫌棄異種的人們，也不嫌棄異種的文化，他們覺得那一種生活比舊有的舒服時，就會把舊有的丟了而採取新進來的了。所以現有的漢人的文化是和非漢的人共同使用的，這不能稱為漢人的文化，而只能稱為『中華民族的文化』。」

豈但漢人文化不能稱為漢人文化，就是這「漢人」二字也可以斷然說它不通。從前因為我們沒有中華民族這個稱呼，在我們週邊的人們無法稱呼我們，可是說話時沒有一個集體的稱呼總覺得不方便，於是只得用了我們的朝代之名來稱呼我們，把我們喚作秦人、漢人、唐人。其中秦字衍變為支那，成為國外最流行的名稱；漢朝享國最久，漢人一名成為國內各族間最流行的名稱。然而我們何嘗自己開過一個全國代表大會，規定漢人或漢民族是我們的正式稱謂，我們應該承認這個名詞！

吳銳按：秦人、漢人、唐人等於說秦國人、漢國人、唐國人，的確不是民族稱呼，同樣，漢人也不是民族稱呼。顧先生這一段話是正確的。

我們被稱為漢人的，血統既非同源（可以說國內什麼種族都有，亞洲的各種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們只是在一個政府之下營共同生活的人，我們決不該在中華民族之外再有別的稱謂。以前沒有中華民族這個名稱時，我們沒有辦法，只得因別人稱我們為漢人而姑且自認為漢人，現在有了這個最適當的中華民族之名了，我們就當捨棄以前不合理的「漢人」的稱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邊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華民族一名之下，團結起來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我們的正理！也是我們的大義！

吳銳按：既然漢人不是漢族，顧先生突然冒出來一個「中華民族」，比「漢人」一詞還奇怪。

「我們既有這樣不可分裂的歷史，那麼為什麼還有『五大民族』一個名詞出現呢？」顧先生認為這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致有此以訛傳訛造成的惡果。

當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政府中就揭出「五族共和」的口號，又定出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來。這五色旗是再顯明也沒有了，全國的人民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深深地印在腦裡，而且把「紅、黃、藍、白、黑」和「漢、滿、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個國民都知道自己是屬於那一種顏色的。這種國旗雖只用了十五年便給國民政府廢止了，但經它栽種在人民腦筋裡的印象在數十年中再也洗不淨了，於是造成了今日邊疆上的種種危機。

吳銳按：五族共和是個大騙局，孫中山最初提倡，繼而揭破，見本書第三章第五節。

這惡果的第一聲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決」的名義奪取了我們的東三省而硬造一個偽「滿洲國」。繼此以往，他們還想造出偽「大元國」和偽「回回國」，自九一八以來，他們不曾放鬆過一步，甚至想用擺族作號召以搗亂我們的西南。此外也有別的野心國家想在我國邊境上造出什麼國來，現在不便講。倘使我們自己再不覺悟，還踏著民國初年人們的覆轍，中了帝國主義者的圈套，來談我們國內有什麼民族什麼民族，眼見中華民國真要崩潰了，自從戰國、秦、漢以來無形中造成的中華民族也就解體了。從前人的口中不談民族而能使全國團結為一個民族，我們現在整天談民族而翻使團結已久的許多人民開始分崩離析，那麼我們豈不成了萬世的罪人，有什麼顏面立在這個世界之上？

既然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就不能容忍民族自決。終於圖窮匕見！顧先生說：

當第一次歐戰以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喊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原要使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者的羈絆而得著她們的獨立自由。那知這個口號傳到中國，反而成為引進帝國主義者的方便法門。滿洲人十分之九都進了關了，現在住在東三省的幾乎全為漢人，然而這個好聽的口號竟

給日本人盜竊了去作為侵略的粉飾之辭了。德王在內蒙起先提倡高度自治，繼而投入日本人的懷抱，出賣民族和國土，然而他的口號也說是民主自決。我遊西北，剛踏進某一省境，立刻看見白牆壁上寫著「民族自決」四個大字。我當時就想，在這國事萬分艱危的時候，如果團結了中華民族的全體而向帝國主義者搏鬥，以求完全達到民族自決的境界，我們當然是大大的歡喜和欽佩；但倘使他們只想分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求達到自身富貴的私圖，對於我們統一的政府喊出這個口號來，那麼這位領袖人物就不免成為溥儀和德王的尾隨者了，這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嗎！唉，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這是我們全國人民所萬不能容忍的。

吳銳按：清末排滿幹將劉師培、章太炎、胡漢民、汪精衛都主張滿洲從中國滾回東三省，特別是劉師培，從《民報》第拾肆號（1907）起，化名韋裔，發表長篇大論《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章太炎明確提出滿洲和中國以山海關為界。再說，一貫勾結日本的正是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

另外，「民族自決」是普世價值，二戰結束後成立後，「民族自決」載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顧先生認為：

中國之內決沒有五大民族和許多小民族，中國人也沒有分為若干種族的必要（因為種族以血統為主，而中國人的血統錯綜萬狀，已沒有單純的血統可言）；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來分，我們可以說，中國境內有三個文化集團。以中國本土發生的文化（即在中華民國國境內的各種各族的文化的總和）為生活的，勉強加上一個名字叫做「漢文化集團」。信仰伊斯蘭教的，他們大部分的生活還是漢文化的，但因其有特殊的教儀，可以稱作「回文化集團」。信仰喇嘛教的，他們的文化由西藏開展出來，可以稱作「藏文化集團」。滿人已完全加入漢文化集團裡了，蒙人已完全加入了藏文化集團了。大家是中華民國的人民，大家涵濡於中華民族的文化之中，還有什麼畛域芥蒂可言。

顧先生勉勵知識青年：我們所以要抗戰的是要建國，而團結國內各種各族，使他們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實為建國的先決條

件。最後，顧先生以幾句口號來結束這篇文字：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裡，只有民族的偉大胸懷而沒有種族的狹隘觀念！

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且久已有了這個中華民族！

我們要逐漸消除國內各種各族的界限，但我們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風俗習慣！

我們從今以後要絕對鄭重使用「民族」二字，我們對內沒有什麼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

此文太符合國民黨的政治正確性，國民黨的喉舌重慶《中央日報》以及南平《東南日報》、西安《西京平報》以及安徽屯溪、湖南衡陽、貴州、廣東等地報紙紛紛轉載。一九四七年發表於《西北通訊》第一期。我引用的是《寶樹園文存》卷四， 二〇一〇年《顧頡剛全集》本。

傅斯年承認：「新疆本是我們侵略來的，現在該得放棄。」使得顧頡剛大為不滿。

我爲什麼要寫「中華民族是一個」？

顧頡剛

我個人耕作的園地一向在高文典冊之中，爲什麼這幾年中要軼出原定的園範而注意到邊疆問題，討論這現實社會？討論這「民族」名詞？這不是我的貪多務得，冒失從事，也不是我的忽發奇想，見異思遷，而完全出於時代的壓迫和環境的引導。

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商務印書館囑我編輯一部「初中本國史教科書」，那時我不願意隨便鈔書完事，很想在這部書裏給予中學生一些暗示，使他們增進對於自己民族前途的自信力。我們在清朝時，常聽人家稱中國爲「老大帝國」，表示其奄奄待斃的衰態。辛亥革命後，帝國取消了，但老大還是老大。如果中國眞老大了，那麼由衰病到死亡，爲期已不遠，我們只有坐以待斃而已，還存什麼希望，還能鼓起什麼工作的勇氣！因此，我想暗示靑年們，說中國正在少壯。這不是我杜造事實，實在歷史裏的證據也容許我這樣說。中國民族的生存年齡太長久了，爲什麼別的古老的民族早已亡卻而中國卻能支持下去，這一定有一個理由在內。我想起這應是常有淺化而强壯的異族血液滲透進去，使得這個已經衰老了的民族時時可以回復到少壯，所以整部的中國歷史的主要問題就是內外各族的融合問題。而這內外各族所以能常融合無間的原因，就爲中國人向來沒有很固執的種族觀念。明明是兩個不同的種族，明明是很有仇恨歷史的兩個種族，但只要能一起生活於一個政府之下，彼此就都是一家人，大家可以通婚，大家可以採取了對方的長處而改變自己的生活型式，因此中國民族就永遠在同化過程之中，也永遠在擴大範圍之中，也就永遠在長生不老之中。譬如商和周，一個起於東方，一個起於西方，決不是一個種族。商人在中原生息了一千多年，文化高了，大家喜歡享樂，俾晝作夜地喝酒尋歡，眼看他們是衰老了。周人乘其新興的銳勢把商朝打滅，論理周人出於西羌，儘有把中原文化大摧殘的可能，然而他們卻安然承受了商的文化，更把它發揚光大，捨短取長，這衰老的文化就得了新生命了。姬姜諸姓本非諸夏，但入據中原之後馬上成了諸夏，和向來住在中原的人民互通婚姻，於是這衰老的種族又得了新生命了。周人封建諸侯於四方，初意也只是鎮壓反抗，擴張勢力，只因他們沒有很固執的種族觀念，和當地人民日漸融洽，把諸夏的文化、語言和血統擴張到非諸夏的區域裏去，八百年之中把東夷、北狄、西戎、赤狄、白狄、羣蠻、百濮等等族類融化得乾乾淨淨，到秦始皇就不費大力氣把當時的「天下」統一了。秦朝雖倒而諸夏和夷狄所混合成功的民族則不倒，也絕不能見他們裏面再有什麼種族問題，可見秦皇所混一的只是幾個國家，所打倒的只是這幾個國家裏面的特殊階級，至於這幾個國內的人民是早就同化爲一個民族，早就自已統一起來了。秦漢以後，又有匈奴、鮮卑、氐、羌諸族的問題，似乎要把漢人壓倒，到了五胡亂華，中國土地失掉大半，用了偏狹的種族觀念看來，當然是中國的大不幸；但從大處着想，則漸漸衰老的中國民族又得了救星。因爲這班入據中原的雄主只是想搶地盤，並不是堅持了他們的種族觀念而想把漢人消滅或驅除。況且他們寄居內地已久，受中國文化的陶冶已深，所以和漢人雜居也不會發生什麼種族問題。不但不發生種族問題，而且他們還要竭力消弭種族問題。例如劉淵建國，不自稱爲匈奴而稱曰漢，表明他的國家是繼承劉邦的……代的；李雄建國成都，不自稱爲氐而稱曰成，其後李壽繼位，又改國號曰漢，表明他的國家即是劉備的蜀漢的後身。漢化最著名的要算北魏的孝文帝，他的一切政治設施都要上擬三代，先廢掉自己的姓拓跋，改姓爲元；又令其他的鮮卑族都把複姓改爲漢式的單姓；又令鮮卑人和漢人通婚；甚至强迫年輕的朝官「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改說中原的語音。這眞是有意識的……鮮卑人同化到漢人裏來了。漢人受了五胡的壓迫，許多有地位的人逃到南……，從長江以南直到南海就完全開發了，許多南方部族也就併入漢人隊裏去了。因爲有這樣的大混合，所以會有隋唐的統一，在種族上在文化上都大大地表現這返老還童的新氣象。此後，唐代有突厥、回紇、吐谷渾、吐蕃諸族問題，宋代又有契丹、女眞、西夏、蒙古諸族問題，但結果還是同以前一樣，有的全部併入漢人裏去了，有的也讓一部份併入漢人裏去了。近數百年中國人到南洋經商的極多，常有娶了當地女子成家的，所以馬來種中也已……

《我為什麼要寫「中華民族」是一個？》，顧頡剛發表於一九四七年的《西北通訊》。

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九月，顧頡剛應中英庚款董事會之邀前往甘肅、青海進行實地考察，輾轉於洮、岷、河、湟等地，當地人誤以為是國民黨的要員來啦，尊他為「顧老爺」。顧頡剛很注意與西北精

英聯絡感情。他看到一幅英國人畫的西藏地圖，很擔心西藏獨立，或者西藏與英國結盟。他認為，滿洲「自決」還不足畏，因為那裡漢人很多，倒是西藏非常麻煩，「這個大西藏國如果真的建立起來，稱為民族自決，是絕無疑義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文化和大塊整齊的疆土，再加上帝國主義做後盾，行見唐代的吐蕃國復見於今日，我國的西部就更沒有安寧的日子了。」

唐統治時期的吐蕃國為什麼讓顧先生擔心呢？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唐國發生突厥人主導的安史之亂，一代天驕赤松德贊於本年即位，趁機占領河西、隴右，今天的甘肅省皆成為吐蕃的國土。以此為據點，吐蕃經常打到關中平原，直接威脅唐國的首都。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吐蕃大將恩蘭．達扎路恭率兵大舉進攻唐國，攻下首都長安（今西安），扶持金城公主的侄子、廣武郡王李承宏當皇帝。為表彰達扎路恭卓越的武功，赤松德贊特意為達扎路恭立碑，該碑至今保存，位於拉薩市北京中路南側、布達拉宮廣場東北角，與布達拉宮隔北京中路相望，是現存最早的吐蕃碑刻。藏文史書《賢者喜宴》（1564）記載，赤松德贊統治時期，吐蕃「東達昴宿星升起之地京師萬祥門，南抵軫宿星升起的邊地恆河畔建立石碑之地。遂之統治世間的三分之二。」[1]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唐、蕃兩個大國在唐國首都長安會盟，第二年，唐國也派出劉元鼎到蕃國首都邏娑（拉薩）會盟，兩國各自立碑紀念。立於唐國首都長安和唐蕃交界處梅如（今甘肅省隴南市成縣及武都一帶）的石碑早已蕩然無存，長慶三年（823）立於拉薩的石碑至今矗立在拉薩大昭寺門前。關於會盟的主體，唐國自稱大唐，蕃國自稱大蕃，「大」是褒義詞，與國家的大小沒關係。「唐朝、唐代」這樣的稱呼出自後人，不是當時人的自稱。碑文又有「蕃漢二國」，「蕃」自然是指大蕃，「漢」自然是指大唐。這再次說明「漢」不是指民族。會盟確定的國界大致是從六盤山到隴山再到嘉陵江上游。在今天的甘肅省和四川省還保留幾個藏族自治縣，就是當年國界的殘餘。今甘肅隴南市在歷史上是藏區，前些年宕昌、文縣還發現了苯教古文獻。「厲害國」的愛國群眾動不動就說「自古以來」，如果按照長慶會盟達成的國界，中國的領土不過是從陝西到四川的一部分及以東而已。

顧先生草木皆兵，他甚至說「民族」二字帶有巫術性。在此回顧一

下顧先生對民族問題的探索歷程的非常有趣的部分。

一九二二年，顧頡剛先生的「層累說」已經形成，只是還沒有公布，他利用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專任編輯的機會，將這一思想滲透到所編的《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中，不提「盤古」，對「三皇五帝」只略作敘述，並冠以「所謂」兩字，表示不真實。顧先生行文謹慎、隱晦，但還是沒有逃脫官方的追查，該書被認為是「反動教材」。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北伐成功，建都南京，各省設參議會。山東參議員王鴻一據山東曹州重華學院院董叢漣珠、院長陳亞三（顧先生北大同學）等人呈文提出議案，彈劾這本《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說它「非聖無法」，應予查禁。戴季陶見此提案，認為：「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自信大家是出於一個祖先。」「學者的討論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書上這樣寫，否則會動搖民族的自信力，必於國家不利。」因為此書已暢銷至二十五萬冊，當時有人還主張對商務印書館處以巨額罰款，該館總經理張元濟請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出來說情，最後免去罰款，但書由教育部下令禁止發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今李學勤針對顧頡剛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口號，正是拿顧頡剛拋棄的黃帝一元史觀打顧頡剛。李學勤的口號還受到中國官方的支持。

這是一九二九年春天的事情，其時北平《新晨報）以《國府嚴禁反動教材發行》為題報導此事[2]。胡適為此寫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稱讚這是「一本很好的歷史教科書」，可是「曹錕、吳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終於不准發行了！」說明國民黨對思想的控制比北洋軍閥還有厲害，胡適認為這是否定了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3]。國民黨剛開始時吸收新文化運動的生力軍助其上台，上台後則對現存的和潛在的革命力量防備有加！針對一九二九年教科書事件主張禁書的達官所說：「學者的討論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書上這樣說，否則搖動了民族的自信力，必於國家不利。」顧先生後來回憶說：「我初聽得時，確是佩服這位達官的高見，惴惴栗栗，唯恐自己作了民族的罪人。」

民國二十一年（1932）三月十二日，顧先生與洪煨蓮書曰[4]：

弟意，改造中國歷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眾的歷史觀念。第一部史應為民族史。從前人說中國人全為黃帝子孫，這並非用開玩笑的態度假造古史，實有團結各個不同的民族為一個大民族之作用在內。現在這種

信仰已經不能存留了，我們應當造成一個合於理智的新信仰，為我民族團結之基礎。這個新信仰，我想了一下，約有下列數項：

（一）中國無所謂漢族，漢族只是用了一種文化統一的許多小民族。

（二）這許多小民族未統一時是互相仇視的，但統一之後則即一視同仁，不存什麼隔閡。所以如此之故，因為這一種文化是超於國家和種族而志在「平天下」的。

（三）因為中國有此文化，沒有偏狹的民族成見，故得吸收新興的種族（如五胡及遼、金、元等）的血液而維繫於不蔽，否則早該滅種了。

（四）中國的民族雖無褊狹的成見，但確有抵抗的精神。無論什麼外族必不能以武力壓服他們，即使得到一時的勝利亦必不能持久，當其武力衰退時，革命就起來了，國土就光復了。

（五）當革命勝利時，中國民族並無尋仇的成見，仍尊重被革命者之種族的存在。故明勝了元，仍容許元順帝在蒙古；革命黨成功，清廷退位，仍以滿族列為共和國之一部分。

（六）因此證明，中國民族是有自尊心的，故不為他種民族所屈服；中國民族是有和平性的，故不願以武力屈服他人。這兩點確足以表示其偉大的精神。

我想，如果能用此原則，編成一部通俗的民族史，使得一般民眾容易看，且高興看，如《三國演義》一樣，必能為我民族立一堅確的自信心，永遠不受外族的摧毀。

吳銳按：顧先生說「明勝了元，仍容許元順帝在蒙古」。不確，蒙古勢力只是撤出大都（北京）而已，後來蒙古在離大都很近的土木堡消滅幾十萬明國精銳部隊，活捉明英宗，顯示了蒙古的實力猶存。

十二月，顧先生為《古史辨》第四冊作序，強調「我們研究學問的，在現在科學昌明之世，決不該再替古人圓謊了」。這也是針對帝系代表的民族偶像而說。顧先生要「造成一個合於理智的新信仰」，就是要捨棄「中國人全為黃帝子孫」的舊信仰。那麼，三皇五帝真能喚起中華民族的愛國精神嗎？顧先生指出：

我們民族的自信力真是建築在三皇、五帝上的嗎？最明白的回答，

是我們漢族都承認是炎帝、黃帝的子孫，如果推翻了炎帝、黃帝，我們這一族就團結不起來了。然而使我疑惑的是，我們口裡常常說是「炎、黃神明之胄」，又常常說「炎、黃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為什麼我們這漢族老像「一盤散沙」，無論如何團結不起來呢？三皇、五帝，固然大家承認他們是最古的帝王，固然很少數的士大夫還在做好夢，可是同一班民眾有什麼關聯呢？有哪一個地方影響於他們的生活呢？世界上事，「千虛不敵一實」。以前學者對於三皇、五帝，竭盡能力去鋪張，裝了許多金身，畫了許多極樂世界，似乎可以吸收多少位信徒，但結果只落得貌合神離；反不如幾個民族英雄的慷慨悲歌使人感動。如果我們要團結這民族，那麼我們民族經過多少次的磨難，這磨難中的犧牲人物正可喚起全民眾的愛國精神。試看學校裡、戲館中、書場上，每一次講到演到楊繼業、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林則徐等，便洋洋有生氣，使觀眾為之泣下。誰曾聽說講演三皇、五帝而有同樣的感動呢？

另外，不宣傳三皇五帝會不會導致民族分裂呢？顧先生說：

至於說到漢族本身，我們可以說是許多小民族的大團結三代，總算是漢族的核心了罷？但商和夏不是一民族，周和商也不是一民族，周和楚、越又不是一民族；經過了千年的融冶，春秋時的蠻夷，到戰國時就看不見了，完全同化了。其間固然曾感受多少苦痛，但到現在竟真成為一族了，這一族是拆不開的了。例如我們顧家，本是東越，居於東甌，語言衣服都不與華同，給漢武帝用了武力遷到江、淮，經了數百年同化，就是漢族了。到三國時，還有未曾同化的越人，叫做山越，也常常出來擄掠，但經過吳國的努力開發，這些人又同化於漢族了。到現在，有哪一人出來組織越族同盟，想脫離漢族的？就使有這人出來，也絕無人響應，因為血統早已混合，分不清了。豈必遠溯秦、漢，就是遼、金、元、清各族，凡同化於漢人的也都為漢族了。既為一族，則利害所關自然一致，只要我們有方法團結就團結得起來，不必用同出一祖的空言來欺人。

吳銳按：三代指夏、商、周。山越是吳國用槍桿子鎮壓的，不是吳國努力開發出來的。山越在東漢末年還保留「椎髻鳥語」，沒有同化於漢族。見本書第四章第十節。

因此，顧先生強調：「我們的民族自信力應當建立於理性上。我們正應當把種種不自然的連絡打斷，從真誠上來結合。」相反，用空言欺人反而容易自食其果，「倘使藉欺詐而結合，那麼一旦民智大開，欺詐無法行使時，豈不是真把這個民族解散了嗎？」[5]

顧先生講這番話時是一九三六年，正值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刻，即使如此，顧先生也不用三皇五帝之類的民族自信力為團結民眾、抵禦外侮打氣。沒想到只過了三年，顧先生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拋出《中華民族是一個》。雖然國民黨的機關報轉載了顧先生的這篇文章，但是國民黨對顧頡剛的疑古路子非常警惕。在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很長時間內，顧頡剛的著作被宣布為禁書」[6]。「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古史辨》在台灣仍然是位於禁書之列，只能在流動的書刊上看到」[7]。因此我聯想到顧先生說，他寫《中華民族是一個》是受了老朋友傅斯年「懇切的來信，頓然起了極大的共鳴和同情」，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十多年來顧先生的學術活動都在推翻三皇五帝，當然也推翻了漢族的假祖宗—黃帝，威脅到中華民族的團結，國民黨準備收拾顧先生，幸虧傅斯年和國民黨高層交往比較多，聽到了風聲，提醒顧先生，顧先生「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今天一早就扶杖到書桌前寫出這篇文字」，向國民黨妥協。

有了國民黨的定調，中國歷史由中華民族創造遂成為歷史教科書的通行說法。如繆鳳林在一九四三年撰寫出版的《中國通史要略》中指出：

國史主人，今號中華民族，其構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稱漢族。自餘諸族，無慮百數，世或別之為五：正南曰苗族，正西曰藏族，東北曰東胡族，西北曰突厥族，正北曰蒙古族；或以葷粥、玁狁、東胡、匈奴、烏桓、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蔝鞨、女真、蒙古、滿洲等為北方國族，九夷、三韓等為東方國族，蠻、閩、哀牢、黎、苗、瑤、猹、擺夷、猓猓等為南方國族，氐、羌及西域各國為西方國族。中國史者，即漢族與諸族相競爭而相融合為一個中華民族之歷史也。

這種「中華民族＝漢族＋其他諸族」的模式沿襲至今，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裡，中華民族＝漢族＋少數民族。不過，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的制憲國民大會，中華民國憲法之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

等。」與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從法理上，否定了「中華民族」的法律地位。

在當時還招國民黨討厭的費孝通，在共產黨中國成立之後，積極參加思想改造，完成了華麗的轉身，一直當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晚年拋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受到官方的賞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和他當年反對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實質是一樣的。

參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論「中華民族」一詞的竊用

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五位元老，合稱「五老」，他們是：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范文瀾（1893–1969），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翦伯贊（1899–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呂振羽（1900–1980），湖南武岡（今湖南省邵陽縣）人；侯外廬（1903–1987），山西平遙縣人。其中命最好的是郭沫若、范文瀾，都得以善終。命最差的是翦伯贊，自殺死的。呂振羽在共產黨的牢裡坐了十餘年，不過活到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侯外廬在「文革」中也挨整，還好也活到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呂振羽。

一九二一年，呂振羽考入湖南工業專門學校（後改湖南大學工科），在校期間，他與當時湖南學生聯合會秘書長夏明翰相識。經夏指點，常去湖大法科聽李達講授新社會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一九二七年東渡日本，在明治大學攻習政治經濟學。一九二八年回國，在民國大學和朝陽大學任教。一九三四年，呂振羽寫成《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商時代的中國社會》兩書，論證殷以前為中國史的原始公社制階段、殷代是奴隸制階段、西周是初期封建制階段；還論定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中共官方史學至今仍然堅持的

觀點。

此外，他還提出了殷代奴隸制社會的生產工具是青銅器的論斷；探討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確認它發生於明末和鴉片戰爭之前。他與李達、黃松齡都被稱為「紅色教授」。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呂振羽的《中國民族簡史》一九四七年二月寫於哈爾濱，用作中共培養幹部的教材，一九四七年四月由大眾印書館出版；一九四八年九月由三聯書店東北光華初版；一九五〇年八月，三聯書店上海第一版（增訂版）；一九五一年六月，三聯書店北京第五版。二〇〇九年五月，人民出版社以人民文庫出版，並收入《呂振羽全集》第六卷。

呂先生一針見血地批判了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民族觀：中國民族問題，從來還沒有系統地研究過。「中華民族」或「中國民族」的用語，是從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的著作中譯來的，馬、列、斯這個用語的本來意義是「中華諸民族」或「中國的民族」。但中國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者，曾從大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竊用這個神聖的用語。他們顛倒黑白，歪曲歷史事實，無恥地只承認漢族是一個民族，說國內其他民族如滿、蒙、回、藏、苗等等，都只是所謂「宗支」或「宗族」。這不啻是對國內其他民族任意「侮蔑」，並證明了他們毫無科學常識。中國境內究竟有多少民族，他們的起源、歷史過程以及現狀怎樣，法西斯大民族主義者是完全無知的。他們敢於那樣大膽的武斷，不僅在企圖避免國內民族問題的正確解決，且正是臭名萬代的希特勒、荒木貞夫的民族優越論的翻版。這和馬列主義的民族問題的科學，自然正相反對，而與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也是不相容的；他們在這裡也「完全背叛了孫中山」，而「完全繼承滿清政府及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為」（毛澤東語）。

文中「中國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者」指國民黨。呂振羽的批判沒有冤枉這些法西斯。因為「中華民族」的基本意思等於「中華的民族」，也就是「中國的民族」，指的是中國境內所有的民族。正是這幫法西斯，有意混淆「中華民族」的意思，界定它是一個民族的混合體，好比一個托拉斯，大股東是漢族，小股東是滿、蒙、回、藏、苗等等，是大股東的「宗支」；由於小股東的份額小到微不足道，因此大股東總是告誡小股東：你們必須要聽大股東的，永遠！這種「中國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者」，正是馬克思主義痛斥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組成部分，

我們當然也可以稱為「法東斯」。呂振羽對人為製造的「中華民族」等提法開火，可以說觸及到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核心，以為這是國民黨法西斯強加給全體中國人的黑頭套。

那麼，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如何呢？

呂振羽說：我們共產黨的政策是怎樣呢？毛澤東同志在列寧、史達林的原則下，在其著名的著作《論聯合政府》又一次明白的教導過我們：「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上述孫先生的民族政策。共產黨人應當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這個政策而奮鬥；應當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繫民眾的領袖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吳銳按：孫中山的民族政策是指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其所著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裡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要注意，自決權和自治權根本不同。自決權的主人翁是「各民族」，他們自行決定是否獨立建國，不一定非要捆綁在中華民國裡面。當然他們還有權選擇何種社會制度。孫中山要求各民族都統一到中華民國裡面，等於否決了各民族的自決權。共產黨在起家之初，為了擴大統一戰線，曾經大方地鼓吹各民族的自決權。等到基本控制局面、快要建國的時候，就果斷地拋棄了自決權宣傳，改為宣傳自治。呂振羽繼續批判中國的法西斯：

從來的儒家學者，對中國人種起源的解釋，從開天闢地的道統觀出發，造出「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等謬說；因而他們便作出中國人種之單元論的結論。為著對這個結論的自圓其說，便又武斷的、牽強附會的，把中國境內乃至四周各民族，都臆斷為所謂「神農」、「黃帝」、「大昊」、「少昊」等人的子孫，這絲毫沒有歷史根據或任何科學成分，只是一種神學的臆斷。雖然，這種謬說，在兩千多年以前的商鞅等人就沒有同意，他們說：「天地設而民生之……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五四」以後的「疑古家」們也知道其

不對，而力加反對過。不圖這種早已不值一駁的落伍理論，反成了法西斯主義者大民族主義的重要根據。外國資產階級的學者，對中國人種和民族起源的解釋不論從其單元論、多元論或全元論出發，都是從帝國主義的侵略立場立論，則是一致的。……單元論者說，中亞細亞是全世界人類起源的「聖地」，中國人種也是由中亞細亞來的，領頭的就是「黃帝」；中國的文化，也都陸續從西方來的。這是說，中國人不會自己創造文化，文化的來源都要仰仗西方，所以他們那班來到中國的帝國主義分子，也並非什麼侵略，而是來宣揚文化的。這種理論，曾被墨索里尼匪幫最露骨的應用於阿比西尼亞。不圖這種不值一駁的侵略主義假科學理論，竟為中國法西斯主義者所販運，說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作為其大民族主義的又一個重要根據。因此大民族主義者不只在「侮蔑」國內其他民族，並同時在「侮蔑」自己的民族和祖先。解脫神學和假科學的羈絆，揭露法西斯主義者的大民族主義陰謀，科學的解答這個問題，以推進並達成國內各兄弟民族在新民主主義家庭中，共同來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並在將來共同過渡到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社會，是中國馬列主義者的責任。

文中批判的「中國人種也是由中亞細亞來的，領頭的就是『黃帝』」就是拉庫伯里的西來說。中共的宣傳機器以及像李學勤這樣的職業歷史學家都說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呂振羽早就斷定，這種大民族主義同時也是為侵略主義服務的假科學理論，是神學的臆斷，販運這種垃圾的就是中共的法西斯主義者。文中的「疑古家」，指古史辨學派。中共在建國之後，像胡繩這樣的老馬列，我們社科院的老院長，還稱贊古史辨學派的疑古辨偽具有反封建的意義。呂振羽承認：

漢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眾多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主要部分。中華民族四千年光榮的文明歷史，過去輝煌燦爛的封建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主流，對全人類的文明，也有著偉大的貢獻，而其主要創造者也是漢族。決定全民族命運的偉大抗戰事業，「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蔣介石匪幫的統治完成全民族解放的偉大神聖事業」，主要也由漢族在擔當。「但同樣不容否認，中國境內其他兄弟民族，對過去中國文化的創造也都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貢獻；對神聖民族抗戰和解放全中國的偉大戰爭也都有相當的功績。」但是，從華族本身的構成成分考

察，也並不是什麼「本支百世」的「文王子孫」；因此，「中國法西斯大民族主義的謬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胡說。」「中國各民族，根據歷史的簡單敘述和分析，事實勝於雄辯，並不如中式法西斯大民族主義者所說，都是什麼「炎黃子孫」或什麼「本支百世」的「文王子孫」，漢族是什麼「正統」，其他國內各民族都是什麼「宗支」或「宗族」。「這說明了法西斯主義的民族理論，並沒有任何歷史根據，只是根據中國封建宗法主義而演繹的。」

吳銳按：「本支百世」典出《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王指西周的文王。本，等於說本宗、嫡系。支，等於說支子、支系。

《中國民族簡史》一九五〇年增訂版序增加了這樣一段：「我們不止於達成各民族在法權上的平等，而是要達成真正的平等，以至於融合成一個統一的人類。」呂振羽還著重批判了「漢族獨有的同化力」：

中國各民族在長期歷史過程中，有著人種血緣的相互融合與滲透，作為人種血統看，民族的界限基本上確已不存在。但是，誰若想從人種血統上去理解中國各民族，那便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妄想，是死去的德、日法西斯血統優越論的殭屍作祟。而蔣匪介石在妄圖估算「中國之命運」時，狂妄地愚蠢地誇張了漢族的人種血統，說漢族不只是中國各民族中最優秀的部分，甚至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人種……但也不能說，因為人種血統界限的基本不存在，就認為中國各民族也「漢不郎」形成一個什麼「國族」了。事實上，中國今日存在著經濟、政治、文化乃至語言文字……情況各異的許多民族，內容的複雜，並不減於「十月革命」後的蘇聯──雖則不容公式主義地去處理問題。因此，曾從這個角度裡去叫囂的法西斯大漢族主義，也是完全不合事實的。他們曾企圖借這種叫囂去回避急待解決的國內民族問題，事實已證明他們是徒勞無益了。因此，那種根本違反科學和人類歷史動向的法西斯大民族主義的理論與企圖，不只立即就受到全國人民和國內少數民族的反對，而且為他們的革命行動打得粉碎。這種醜惡的民族論，是已經隨同蔣介石匪幫而一同滅亡了，然卻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個汙點。因此，遺老遺少與法西斯大民族主義者曾經大事誇張之「漢族獨有的同化力」、「中國文化的獨特力量」，是毫無根據的無知讕言，更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和規律。

最後兩句，一九五一年第二版修改的文本是：「並非漢族有什麼同化他族的獨特力量。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戰時期所宣揚的什麼漢族『獨有的同化力』，只是其投降主義的表現，也正是中國法西斯買辦性的『獨有』表現。」[8]

以上呂振羽把「中華民族」這個黑頭套扒了個精光，真是大快人心！

白壽彝先生認為：「呂振羽同志的話，說出了民族史的真實情況，也說出了我們歷史工作者在民族問題上應持的正確態度。」[9]白壽彝先生是回族歷史學家，他對少數民族的估計無疑是同情的。但即使在他主編的一大套《中國通史》，也無法全面貫徹呂振羽反法西斯大民族主義侵略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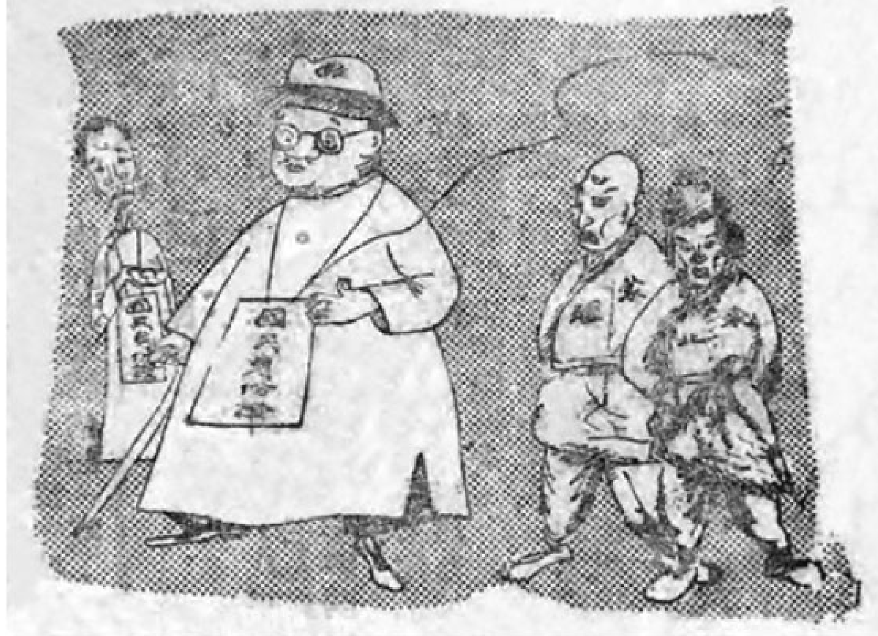
中國社會科學院既有呂振羽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搞「東北工程」的那些學者就在社科院，完全是與呂振羽對著幹，根本就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見本書下一章。

除了宣傳「中華民族」，國民黨開動宣傳機器，宣揚中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暗示是優等民族）、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這兩點至今被共產黨繼承。

中共幾十年如一日地宣傳說：爹親娘親都不如黨親。女歌手殷秀梅以一曲《黨啊親愛的媽媽》受到黨的栽培，賺到足夠的名利之後尾隨權貴階層，投奔美國，再也不認比媽還親的黨了。除了共產黨之外，其次比媽親的非「中華民族」莫屬。

北伐前夕，「反革命」這個詞在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階級中流傳開來。一九二五年九月，《現代評論》雜誌有文指出：「現在社會裡面—尤其是在知識階級裡面，有一種流行名詞『反革命』，專用以加於政敵或異己者。只這三個字便可以完全取消異己者之人格，否認異己者之舉動。其意義之重大，比之『賣國賊』、『亡國奴』還要厲害，簡直便是大逆不道。」「反革命」不僅在當時的民眾中是一個貶義詞，還被上升到了法律高度。

一九二七年，武漢國民政府推出了《反革命罪條例案》，意味著中國歷史上首次立法將「反革命」定為一種刑事罪名。說國民黨是法東斯，一點也沒有冤枉他們。



諷刺漫畫「炎黃正統」，出自於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海星》雜誌。

一九四〇年代，在國民黨治下的上海，儲安平公開發表了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言論：「若從歷史的眼光看，這個前後統治了中國二十年的政府，實實在在耽誤了中國的國運，它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其一切過失之中，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於它的缺德的統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國人民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治理下，除了極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 、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都已趨於取巧、投機、幸進、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強凶霸道、為劣作惡。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結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氣愈來愈壞。 」

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國民。在「法東斯」的逆向淘汰機制下，優汰劣勝，壞人當道，好人活不下去。就是這位儲安平，一九五七年六月響應中共「大鳴大放」的號召，在當局的「誠懇」動員之下，於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做了「黨天下」的發言，被打成右派，並

且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右派，至今沒有平反。

肆四夷各族擺脫「炎黃子孫」黑頭套的努力

中華民族是一個、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這是國民黨的定調。試看由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作詞、黃自譜曲的《中華民國國旗歌》：

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胄，東亞稱雄。
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
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
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
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

炎黃世胄也就是炎黃子孫的意思。青天白日滿地紅是中華民國國旗的顏色。

早在一九一七年，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分別發表《新中華民族主義》和《大亞細亞主義》兩文，認為今日世界之問題，不僅僅是國家之問題，而是民族之問題。而今日民族之問題，尤其不是苟活殘存之問題，而是更生再造之問題。針對日本人宣揚的以日本民族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他提出了中國人應激發出一種以各民族融合為基礎的「新中華民族主義」，向「吾新中華民族少年」大聲疾呼，當仁不讓地承擔起「興亞」的責任。



李大釗，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他說：「以吾中華之大，幾於包舉亞洲之全陸，而亞洲各國之民族，尤莫不與吾中華為鼻祖。今欲以大亞細亞主義收拾亞洲之民族，舍新中華之覺醒，新中華民族主義之勃興，吾敢斷其絕無成功。」他認為「五族共和」的各個民族、文化已經逐漸趨向一致，而又隸屬於一個自由平等的共和國體之下，「凡籍隸於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矣。」今後國家的之政教典刑，都應當根據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統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義，即新中華民族主義。必新中華民族主義確能發揚於東亞，而後大亞細亞主義始能發揮光耀於世界。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驅，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之後，並沒有理睬「新中華民族主義」，中華民族是一個、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國

民黨的這個定調被共產黨全盤繼承。尤其是對台灣的統戰需要，「炎黃子孫」、「血濃於水」是耳熟能詳的口頭禪。八十年代，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歌名叫「龍的傳人」。「龍的傳人」也就是炎黃子孫，也是中華民族。

一九八四年，政協六屆二次會議上，一個名叫米暫沉的回族委員寫了一個提案，不同意用「炎黃子孫」指代中華民族。他認為炎黃子孫只是漢族的祖先，少數民族各有自己神話和歷史傳說中的祖先，所以這個提法不利於民族團結。第二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就此事下發文件，寫道：「今後對此詞使用的意見是：在黨和國家機關文件及領導人的正式講話中，還是用『中華民族』代稱中國各族人民更好一些。鑒於『炎黃子孫』一詞今天在港台同胞和海外僑胞中有積極作用，今後這個方面的個人署名文章、一般性談話以及對台宣傳中，仍可沿用。」

一九九〇年，對於這個用法在少數族中引起的不滿，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特意說，鑒於部分少數民族對『炎黃子孫』等提法提出不同意見，「可以研究在國內用『中華民族』、『中華兒女』這樣的詞，以加強對各族人民的感召力。」到了一九九三年，當時的政協主席李瑞環提出就用「中華兒女」或者「海內外中華兒女」。

進入九十年代，一些少數族群代表繼續對「炎黃子孫」問題提出不同意見。例如八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貴州省台江縣的代表張明達等提出《請中央通知有關部門，不要再用「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一詞取代憲法規定的「中國各民族」的提法，以利民族團結的建議》。這個建議把這個問題提到了憲法的高度，因為憲法規定了「中國各民族」的提法。中宣部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答覆了這個議案。《貴州政協報》全文刊登了中宣部的覆函，《貴州民族報》也作了相關報導。據報導，貴州各少數民族看到後受到很大鼓舞。

由於中宣部的文件對這個用法的廣泛流行毫無約束力，八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張明達等代表又一次鄭重提出議案「請中央行文通知全國各地的新聞出版單位和各廣播電視部門，不要再使用『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一說，以利民族團結的建議」。

到了二〇〇二年，廣電總局發出《要求切實把握好民族宗教宣傳的正確導向的通知》，其中第二條說：「宣傳中華文明史要多提『中華民族』的概念，慎用『炎黃子孫』的概念，注意表明是各民族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

二〇一〇年一月，《中國民族報》發表題為「拜年活動的民族象徵意義」的文章，對教育部宣導全國學生在網路上開展「給祖國母親拜大年」的活動之內容提出不同意見。教育部的宣導中，第一拜是拜壯美河山，第二拜是拜炎黃始祖。文章認為「關於『炎黃子孫』的敘事，是漢族的祖先想像。對於漢族學生來說，祭拜炎黃或可說是天經地義，但對於少數民族學生來說，這樣的活動內容就不適宜了，因為這可能與他們的祖先想像有衝突。」

在二〇〇九年一次有關族群和邊疆問題的重要討論中，北京大學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馬戎教授提醒說：「我們在當代構建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的前提下，要充分考慮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歷史演變的複雜性。近些年來，炎黃文化成為中國學術研究和媒體宣傳的熱點，『炎黃子孫』在許多漢族人的觀念裡似乎已經成了『中國人』的代名詞。我們必須面對如何劃定中華民族民族認同範疇的問題，即『炎黃子孫』的稱呼是否適用於中華民族全體成員？今天我們使用『炎黃子孫』、『龍的傳人』作為『中國人』的代名詞是否合適？」更有少數族知識分子尖銳地提出，「把炎黃子孫等同於中華民族的全體，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民族。這種傾向不利於民族團結，不利於國家安全。」

二〇一二年初，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10]發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被認為是新的民族政策的一個信號。這是一篇很長的文章，其中只有一處提到「龍的傳人」和「炎黃子孫」的說法「不科學」。就這一句話，卻引來很多漢人的反對，網上可以見到很多。更重要的是，《環球時報》很快專門發表評論員單仁平的文章，題目是《民間提「炎黃子孫」無妨》。

這是自八十年代有關「炎黃子孫」的爭論產生以來，尤其是官方最高層對這個說法從慎用到否定的態度越來越明確的時候，由官方媒體發表的為「炎黃子孫」辯護的公開和系統的言論。

單仁平的文章說：「有熟悉民族事務的官員近日撰文稱，漢族人喜歡說『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等，但這些稱謂不科學，含『狹隘民族意識』。提出這個觀點，顯然是為了照顧少數民族的感受。」單仁平認為「炎黃子孫」和「龍的傳人」在「社會的籠統觀念裡，並非漢族的專屬概念。它們甚至不是民族概念，而是文明概念」。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這些概念迄今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凝聚力，遠遠大於它們帶來的副作用。」

朱維群和單仁平的文章發表後，網上支持用「炎黃子孫」指代中華民族的人可以說難以勝數。最極端的言論是：「因為那幾個不聽話不安分的貨色，十億漢人都要對其退讓，是什麼道理？」「民間無妨就是說官方有礙，漢人的訴求誰來保障？如果民族團結因為漢人稱自己是炎黃子孫被妨礙了，那所有漢人都是生來有罪的。」

「炎黃子孫」和「龍的傳人」是究竟僅僅屬於漢人，還是也屬於其他族群的有關他們的祖先和起源的概念？這個問題本質上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現實生活中的用法賦予一個概念的內涵和不同的人對它的解讀。一般來說，認為這個說法可以泛指中華民族的基本上是漢人，而且其使用場合都涉及「中國人」或者「中華民族」的認同，而反對它的人不是非漢族就是學術界人士或者政府主管族群事務的官員。這種分別本身就很說明問題。生活的常識是：我的身分不能由你說了算。當我自己不認可這個說法的時候，你怎麼可以說它代表了我的身分呢？何況我並沒有說不讓用這個概念，而是說它可以代表漢族，但不能代表中華民族。

重要的是，單仁平的文章強調的是這個說法的「凝聚力」，就是說「炎黃子孫」這個說法有重大的意識形態功能，國家不能輕易放棄，尤其是不能因為少數族對這個說法（加上「龍的傳人」）有意見，國家就做出妥協和退讓。

令人深思的是，反對用「炎黃子孫」指代中華民族的人，把這個問題提到民族團結甚至國家安全的高度，而單仁平也把堅持這個提法提到「凝聚力」的高度—所謂凝聚力，當然是有利於國家統一的力量或者向心力。

一個很簡單的提法，在一派眼裡有損族群團結和國家統一，在另一派眼裡卻正是國家凝聚力的來源。對「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理解和如何鞏固這個多族群的國家，在一個簡單的提法上就有如此針鋒相對截然相反的立場，這個事實提醒我們：在一些基本的共識還沒有達成的情況下，中國族群關係的和諧之路還很漫長[11]。

上面提到的馬戎，是一位據稱對民族問題憂心忡忡的學者。他雖然是回族，但最關心的是中華民族。他認為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中國在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都進行了革新並取得進展。遺憾的是，在非常重要的民族問題一節，卻基本上因循舊路。如果不理清中國民族問題的癥結，可以預見不僅會影響到國內社會的穩定，也會對中國的外部崛起帶

來極大隱患。他認為必須重新審視當時合理現在卻嚴重滯後的「民族」理論，重新建立「中華民族」和五十六個「族群」的關係。並且，需要警惕近年來個別「民族理論」的權威學者提出應廢棄「中華民族」這一提法[12]：

關於這些學者要求進一步強化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甚至要求設立民族區域制度的全國性常設機構等提議，中央必須非常慎重。因為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三六年的蘇聯憲法規定，每個「民族」都有獨立的權利，每個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都有自己獨立的議會和憲法，在體制上都有各自的總統及內閣部長們。所以蘇聯是一個多重政治結構，第一層是蘇聯，第二層是各加盟共和國，第三層是自治共和國，第四層還有自治區和邊疆區。蘇聯憲法明確規定，聯盟是「各擁有平等權利民族的自願聯合」，「每一個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在蘇聯的新體制下，各族接受了現代「民族」理念及其政治含義，「民族意識」不斷加強。同時，蘇聯憲法也為這些「民族」脫離蘇聯並成立獨立國家提供了法律依據。在戈巴契夫不負責任的改革過程中，蘇聯原有的意識形態紐帶、經濟秩序、政治凝聚力都遭到破壞，於是那些已建立「加盟共和國」的「民族」因勢轉變為獨立的「民族國家」。直到今天，一些已建立「自治共和國」的「民族」（如俄羅斯聯邦的車臣自治共和國、喬治亞的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自治共和國等）仍在為獨立而戰。

蘇聯在民族理論工作和民族制度實踐中的經驗與教訓，我們應當仔細研究和借鑒。由於改革開放前中國民眾很少有機會在國際事務中直接體會到「中國公民」的現實意義，而在國內日常生活中由於各種民族制度與優惠政策使少數民族身分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結果在客觀上把「中華民族」虛化和架空了。我們幾十年來一直在報刊和講堂上宣講馬列主義民族理論，介紹史達林的「民族」定義，介紹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這樣宣講和教育的結果，就使包括漢族在內的國民把對「民族」的認識定位於五十六個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國人的「中華民族」，並把現代政治觀念的「民族」意識介紹給各「民族」的知識分子與民眾。

因此，在馬戎看來，目前中國民族問題的癥結就在於一九四九年建國後，我們參照蘇聯史達林的民族理論（「民族」定義）、民族制度和

民族政策，在中國進行了「民族識別」，客觀上把中國建成了一個「多民族聯合體」，這一結構使有些原來並不具有現代「民族意識」的「民族」精英開始接受這樣的意識，並萌發潛在的獨立願望。從理論上講，只要一個群體被本國政府、外國政權，以及本群體精英集團認定是一個「民族」，那麼，無論是根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的「民族自決權」理論，還是根據列寧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自決權」原則（「無條件地、堅決地維護每個民族的政治自決的權利，即分離的權利」），這個「民族」都會非常自然地萌生出通過自決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願望。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派遣出國的留學生和來到西部旅遊和交流的境外人員，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催生民族主義思潮的媒介。

馬戎重提他在二〇〇四年提出的針鋒相對的解決辦法：把中國的民族分界、民族身分「文化化」，也就是「去政治化」的思路，建議保留「中華民族」的概念，並在這一思路下重新開始「中華民族」的「民族構建」，以「中華民族」為核心認同，建立一個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國家」，同時把五十六個「民族」改稱「族群」（簡稱××族），在這樣的概念框架下強化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逐步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識。

對於馬戎的高論，我覺得有必要正名。畢竟名不正則言不順。就「夏」指「中國」區域而言，「夏」與「中」相通，所以「中華」二字意義相同。可見「中華民族」四個字不能涵蓋非華夏族。馬戎如果非要製造一個「中華民族」，那麼請把四夷除開。因為中國境內所有的民族並不能用「中華民族」指代，本文已經作了簡要的回顧。馬戎承認，「漢族民眾和青少年普遍缺乏關於我國少數民族的基本知識，在他們思考問題時有意無意地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民族』。」「北京等大城市和漢族地區發生的針對藏族、維吾爾族人員的整體性歧視行為（計程車拒載、旅店拒住、機場歧視性安檢等）卻反映出漢族整體性的大漢族主義態度。」我以為揮舞「中華民族」的麻袋要把「少數民族」往裡裝，正如宣揚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強迫給少數民族安裝祖先一樣，正是「大漢族主義態度」。

馬戎主張取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完全違背《世界人權宣言》和《土著人民權利宣言》，不值一駁。另外使馬戎感到氣憤的是：「民族優惠政策造成大量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混血兒一律填報少數民族，漢族人口直線下滑，主體民族缺失，對國家之穩定不利。」我知道了他的苦

心：不確立漢族的人口優勢，「中華民族」就像一個癟口袋，豎不起來。換言之，「中華民族」就是要鞏固漢族老大的地位。就依馬戎等絕大多數人所說，漢族形成於漢國，其先人是先秦的華夏族。華夏族在先秦的人數必然是少數，為什麼到現在發展到十二億多人，占據了國內的大部分生存空間和生存手段，這算什麼倫理？漢族還讓全世界頭暈目眩，感覺中國的龐大人口就像三峽大壩，有時刻潰堤之虞，這就是中國對全世界的貢獻嗎？

偶然翻看我們社科院主辦的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報》第三版，是新疆「七一五」事件之後的民族問題專版，第一個就是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的高論，題目是《加強中國民族國家的構建》，他說：「中國在建設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必須首先明確，建立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如果是正確的，就要採取一切有利於培養所有公民的『中國人』民族認同政策。凡是不利於或破壞個人形成『中國人』民族認同的政策，都要進行修改。」閻學通的「一個凡是」，意思無非是說，只要對國家有利，即使「中華民族」是個黑頭套，也必須給少數民族帶上。馬戎，你是回族，請先自己戴上！[13]

伍由炎黃子孫上溯北京猿人

二〇〇九年，著名編導王鵬博的《北京猿人的原始之戀》一經推出，聽說已經成為經典劇目[14]。至二〇一七年，連續第八年在北京上演[15]。這齣戲廣告詞所渲染的是「性愛，博愛，忘我的愛，直到燃燒自己」。該劇編導對劇情這樣介紹：這部戲描寫了北京猿人之間的生死愛恨和他們與大自然以及野獸的頑強搏鬥。猿人中的家長，名字叫「根」，他為了繁衍子孫，搶了幾個女人，進而與年輕的猿人—名字叫「山」—結下了仇。當根發現自己與女人生的孩子非呆傻即死胎，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經不能繁衍出健康的後代，便把女人託付給了曾經的情敵—山。當一家猿人陷入絕境，快要凍餓而死之時，根踏雪殺虎，反被虎咬成奄奄一息。彌留之際，他點燃了自己，讓家人食用，進而使全家活了下來！為了子孫後代，根這位壯士，雖九死而不悔！

創作這齣戲的初衷是為了宣傳北京猿人，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博物館的隗主任說：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在世界文化遺產中的重要地位勿庸置疑，但其重要地位和知名度還有差距，尤其是在國人心目中還缺乏應有的認知，每年慕名而來的有很多外國朋友。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就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正是為了使更多的國人了解祖先的生活，所以我們博物館和北京一九九八國際青年藝術劇團共同打造了這部話劇。

這齣戲塑造了一個「中華民族」在直立行走的猿人時期的英雄超人，最後以自我犧牲成全集體的延續，與官方宣傳的集體主義高於個人主義價值觀非常吻合。為「中國崛起」創下了又一個「世界之最」，增強了文化自信。編這個戲的目的是「為了使更多的國人了解祖先的生活」。戲的海報上寫著「感謝祖先！」「中華民族」的祖先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向前推了大約五十萬年， 主人公的名字叫「根」，毫無疑問，這個「根」就是中華民族的「根」。

無獨有偶，我們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和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了一百集《中國通史》電視紀錄片，二〇一三年在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CCTV–6）試播。《中國通史》開篇叫「中華道路」：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偉壯觀的錦繡山河，孕育著無限生機，誕生了一個偉大的國家—中國。這是一片廣袤的土地，悠久輝煌的古老文明，承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塑造出一個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在這片神奇而廣袤的土地上，一場場歷史大劇不斷上演，無數的曲折與坎坷，考驗著這片土地上的民族與眾生，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勇於探索、敬守家園、愛好和平，深入中國人的血液。無論風雨飄搖、困難重重，中國人都能迎難而上、頑強奮鬥、渡過難關，尋求到解決問題的真理。無論煙霧瀰漫、障礙重重，中國人都能堅韌不拔、沉著冷靜，選擇出適合自己的道路，締造中國與人類的幸福。這就是中國的歷史，豐富而多彩，曲折而燦爛，綿延而不斷，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綻放，演繹出無數的傳奇往事。這些古老的歷史，是我們寶貴的遺產，歷久而彌新，它像一座燈塔，照亮著我們的復興之路，它像一位母親，守護著我們夢的搖籃。

第一集《中華道路》相當於總論，第二集《中華先祖》一口咬定北京猿人和元謀人是中國人的祖先。主講人吳新智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研究所的院士。他說，要是北京猿人到了北京王府井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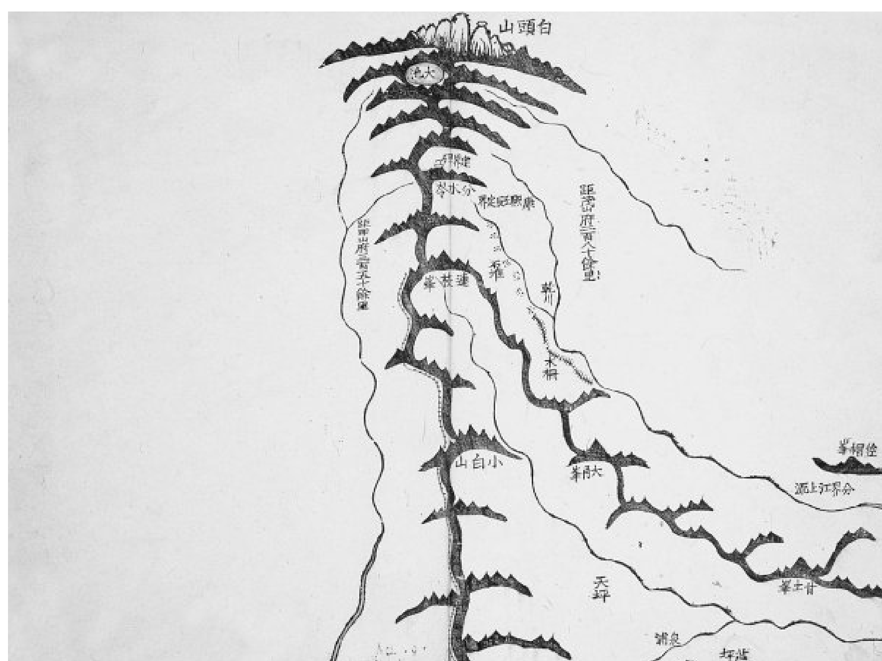
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要不說話，別人可能也不覺得他是一個猿人。需要指出的是，就是這位吳院士，先說北京猿人的眼眶是方的。沒過幾年，他又說是圓的。另外，他和我們歷史所前所長李學勤都是中央重大課題—反邪教課題組成員。邪教主要是指法輪功。

---

1. 此處引自黃顥對《賢者喜宴》的選譯，《西藏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三年第一期，頁五七。
2.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七八至七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3. 《新月》第二卷第六、七號合刊，新月社，一九二九年。
4. 顧洪編，《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三至四。
5. 顧頡剛，〈三皇考．自序〉，《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年，頁二○六至二○八。
6. 艾蘭（Sarah Allah），〈考古學的世紀回顧與展望〉，《考古》，二○○一年第一期，頁四至五。
7. 張立東、任飛編著，《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大象出版社，二○○○年，頁一一六。
8. 此處所引之《中國民族簡史》段落，載於《呂振羽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二○○九年，頁一九至二二。
9. 白壽彝主編，〈導論〉，《中國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一至三二。
10. 二○一五年十二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降邊嘉措在網絡發表兩篇文章—《葉小文現象批判》、《朱維群同志應該把話說清楚》。葉小文時任國家宗教局局長，朱維群時任全國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降邊嘉措指控這兩名漢族高官出賣「活佛」指標謀利，特別批評了朱維群動輒就揮舞「反分裂」這根大棒，對待藏族同胞。
11. 詳見程映紅，《有關「炎黃子孫」一詞的官方爭議》，綜覽中國，網址連結：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1446。
12. 馬戎：〈當前中國民族問題的癥結與出路〉，《領導者》第二六期，二○○九年二月。
13. 以上反駁馬戎的內容，於二○一一年發表在中國網路。
14. 《著名編導王鵬博作品〈北京猿人的原始之戀〉連續8年常演不衰》，網易網，網址連結：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CSN3AQ3N05179T1C.html。
15. 《〈原始之戀〉首將北京猿人形象請上話劇舞台》，新浪網，網址連結：http://ent.sina.com.cn/j/2010-08-25/18073064231.shtml。

第陸章

「自古以來」魔咒：東北工程



一八六一年，朝鮮地理學家金正浩所繪製的《大東輿地圖》細節，清楚標誌出朝鮮民族神話發源地「白頭山」。中國稱「白頭山」為「長白山」，此地也是滿人的傳說發源地。

漢族形成於漢國，其前身是春秋時代的華夏。這已經成為中國官方的定調。華夏又來自古老的夏國。再往前，可以找到漢族的老祖宗黃帝。近些年，更是將中華民族「尋根」，一直尋到周口店北京猿人、雲南元謀猿人。

對於四夷各族，就是儘量否定他們獨立建國的歷史，把他們獨立建立的國家說成是大一統之下的地方政權，「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東北工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工程的核心是否認韓民族和高句麗的歷史聯繫，認為高句麗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權。



歷史學家金毓黻。

二〇〇二年，旨在「研究中國東北邊疆歷史上的疑點問題以及理論上的難點問題」的「東北工程」正式啟動，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與東三省聯合組織，歷時五年，預計投入資金總額為一千五百萬人民幣。在討論東北工程之前，有必要認識金毓黻先生。

壹金毓黻與《東北通史》

金毓黻先生（1887–1962）是遼寧省遼陽人，屬漢軍正紅旗，這樣的旗人在當今中國的網站上被罵作漢奸。他留意鄉邦文獻，彙編《遼海叢書》，主編《奉天通志》，都是貢獻卓著的。我追隨多年的劉起釪先生，還受過他的關照。金先生因為撰寫《東北通史》，被推崇為東北史研究的第一功臣。此書上編共六卷於民國三十年（1941）初版於東北大

學。當時的東北大學逼迫遷往四川三台縣，我追隨多年的楊向奎先生也曾在這裡教書。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曾經再版《東北通史》。吉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於一九八〇年翻印過《東北通史》。中國在翻印、翻譯書籍時，經常篡改原著，本文採用的是台灣洪氏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1976）翻印本，以下引用該書只標注頁碼。



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的中學歷史課本所記載的東北邊疆失地圖。

金毓黻在抗戰期間已經有擔任中央大學、東北大學教授的資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公有制的思路下，一切都要國有化，於是成立中國科學院，囊括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當時從全國各地延請了一批學者，一九五二年金先生調到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就是今天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可以說發揮了他的專長。當時中國科學院有兩班人馬編寫《中國通史》，一個是以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為首的班子，一個是歷史研究所的班子，掛名郭沫若主編。范文瀾早在延安時代就投奔共產黨，建國後居然沒被清洗，這樣的例子在全國也是罕見。郭沫若是中國科學院的院長，還兼國務院副總理。金先生參加的是

范文瀾的寫作班子。但他自一九五〇年起就患腦病，多年不能工作。老先生幸運地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去世。否則，他在滿洲國和革命黨政府都當過官的「歷史問題」，任何一條都足以被置於死地。

無論是先前傅斯年等人撰寫的《東北史綱》還是金先生這本《東北通史》，都是「求用」而非「求真」的急就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金先生的家鄉被日本人侵占。和傅斯年等先生相比，金先生對日本人的個人感情更複雜。金毓黻在一九三二年任「滿洲國」奉天公署參事官。不久改任偽滿奉天圖書館副館長。一九三三年任偽日滿文化協會理事，兼協會《滿洲學報》主編，發表過不少論文，如《〈大元大一統志〉考證》。

他與臧式毅關係不錯，臧式毅是積極推動滿洲國成立的人物。金毓黻在一九三四年任奉天通志館總纂，也是臧式毅的邀請，那時候臧式毅已經是奉天省的省長。一九三五年，金毓黻隨臧式毅赴日本。一九三六年投奔國民黨，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兼任行政院參議。一九四三年，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授。一九四五年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抗戰勝利後，他於一九四六年隨東北視察團前往東北，兼教育部輔導委員會委員，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東北區代表，視察東北文物。第二年任國史館纂修，被教育部任命為瀋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主任。

而金毓黻的民族歸屬也值得玩味。新浪網友淺絳軒多次訪問金毓黻的出生地—遼陽市八家子村。據金毓黻日記，他老家在明末清初之交，大概已經荒蕪，初來創墾戶是邱、梁、夏三姓，向來稱此三戶曰「占山姓」。今村中無梁、邱之姓，有夏姓則為後來，與創墾之夏姓無涉。此三姓如果不是絕嗣，就是遷徙他處，已經無法考證。今稱朱、李、佟、蘇、金為五大戶，大抵皆於康熙末年移來，有金先生家舊存金廷貴領名購石姓房基可證。朱姓、佟姓皆移自河洪堡，金毓黻所在的家族則移自東京城（今遼寧省遼陽市），蘇、李二姓不詳。或者以邱、梁、夏合後來之五戶而稱八家，亦未可知。有後八家子就有前八家子，而前八家子正好在三〇四國道南面，與後八家子隔道相望。

據一九四八年金毓黻親手排定的《金氏世系表》，金氏於清初投隸漢軍正白旗，一世祖金自德，二世祖金有興，原居遼陽東京城，卒後均葬於東京城東門外。三世祖為金廷富、金廷貴兄弟兩人。後金廷富遷居遼陽城北後八家子，而這三世祖也就成了居住在後八家子一枝之始祖。

後八家子金氏老祖塋即以先三世祖立祖。後來，金廷貴也移居後八家子，稱為泡沿金家。而且金家的三世祖金廷富原不姓金，而是徐氏子，從小即跟隨他的姑姑成為金姓後人。這樣說，大概金廷富原本是金毓黻二世祖的妻侄，後來做了他的養子，改為金姓。據金毓黻分析，可能「先二世祖無子，即取徐氏子為子，後又生子為泡沿一枝之祖。果爾，則泡沿一枝乃真金氏正傳也」。如此說來，溯本求源，金毓黻倒是徐氏一脈了。其他網友進一步推測金毓黻實姓舒穆祿氏，遼陽東京陵人，與老舍同姓同宗[1]。

舒穆祿氏是正宗的滿族姓。滿洲八旗的旗主只能是滿族貴族，將領和士兵則哪裡人都有，包括蒙古人，朝鮮人，當然也有「漢人」。這些「漢人」實際上是因為來自漢地，未必真是漢族，確切地說，應該是「未定族」。滿族東征西討，急需的是兵源，八旗漢軍正好在戰爭時期開疆拓土，和平時期駐防全國各地，鎮壓反叛。辛亥革命前，將滿族宣傳為殺人不眨眼的魔鬼；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滿族遭到屠殺，只有實在無法抵賴的名門望族才被迫承認自己是滿族。或許金毓黻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滿族，而且八旗漢軍是不是滿族也確實在疑似之間，就要看個人的認同了。

金毓黻在滿洲國任過職，無論在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看來，都是很大的政治問題，因此我猜想金毓黻寫《東北通史》大概有戴罪立功的動機。而且國民黨作為一黨獨裁的法西斯政黨，也是要求學者堅持官方認定的正確政治立場。你日本人不是堅持「滿蒙非支那論」嗎？那好，我就針鋒相對地拋出「東北自古以來屬漢族論」，既然屬於漢族，也就屬於中國。

《東北通史》開宗明義地指出「東北史者，東北民族活動之歷史也，無東北民族，則無所謂東北史，故述東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頁五二）也就是要解決東北到底應該歸哪些民族所有的問題。金毓黻將東北民族分成四系：漢族、肅慎族、扶餘族和東胡族，在其敘述中實際上是以漢族為中心。該書第五十三頁圖示這四大族，漢族有：朝鮮（金毓黻自注：箕子所建，漢族有隨往者）、先史時代（金毓黻自注：石器時代）、漢以後移住（金毓黻自注：遼東郡建置以後）說他們「同為構成中華民族之一分子，則任何人不能有異議者」（《東北通史》，頁六二）。

在石器時代就有了漢族，這種偽造手段與四五十年前偽造皇漢民族

的祖先黃帝來自巴比倫，有些不同，尤其是批上考古學外衣，偽造手段顯得精緻一點。因此，金毓黻反對漢族西來說（《東北通史》，頁九〇）。

石器時代之後就好辦了，堯舜禹等聖人出場了。

金毓黻說：「吾國舊說，多謂東北區域之建置，始於虞夏。見於《尚書》。近人之疑古者，多謂《尚書注》、《史記正義》，皆漢人以後之說，不足置信。然如《周禮》則曰東方曰幽州，山鎮曰醫巫閭山，《山海經》亦曰東方之美者，有醫巫閭之珣玗琪，醫巫閭山在今遼寧省北鎮縣，而三代人所撰之書，已道及之，且以屬於幽州，則其建置始於虞夏為可信，明矣。或又謂《周禮》為戰國時人所撰，又經漢人竄亂，《山海經》亦出漢人所作，由此言之，則吾國之古書，將無一可置信者。縱謂所紀之真偽，尚有可商，亦必多為最古之傳說，不得謂毫無一顧之價值也」（《東北通史》，頁六五至六六）。

《舜典》，金毓黻自注：《古文尚書》作《堯典》。這是錯誤的。《堯典》是《今文尚書》，偽《古文尚書》將《堯典》一篇割裂為兩篇，還在《舜典》增加了二十八個字。金毓黻批評的「近人之疑古者」，指顧頡剛先生創立的古史辨學派。金先生相信《周禮》所記的幽州是虞（也就是舜）的建制，但無法回答這樣一個矛盾：如果《尚書．禹貢》是記錄的夏代九州的建制，為何沒有幽州？而千年以後周公作的《周禮》反而有幽州？舜雖然是古代十全十美的聖王，但是屬於鳥夷族，與漢族毫不沾邊，更何況那時候還沒有漢族。

在清國末年的排滿怒潮中，造反派自稱革命黨，他們認定黃帝發祥於帕米爾高原，一路向東武裝殖民，征服中國的土著民族—苗族，建立帝國。一九〇五年，排滿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卷前所附黃帝的圖像，黃帝身披介胄，手執斧戟，完全是武裝殖民的帶頭大哥形象。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創刊號扉頁印的是黃帝像，稱為「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偉人黃帝」，圖像下注明：「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

到了金毓黻的時代，漢人知識分子變得更加狡詐。他們發覺把自己的老祖宗黃帝說成是來自國外的武裝殖民頭子，不太光彩，與日本人侵略中國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於是他們放棄了黃帝西來說，《東北通史》就這樣轉變風向。對於以前偽造的漢族悠久的歷史，《東北通史》並不鬆口。

在國民黨的時代，頭等大事是搶奪天下，消滅異己，石器時代考古發現少得可憐。一九四九之後，塵埃落定，石器時代考古遍地開花，這些都成為漢民族的資本。為什麼呢？因為石器文明都是漢民族的先人創造的。

李治亭主編的《東北通史》，是中國邊疆通史叢書之一，屬國家社科基金專案。這套叢書由馬大正作總序，此人於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一年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2]的主任，儼然成了中國邊疆問題的代言人，主張在研究過程中需本著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原則。李治亭最近幾年以炮轟美國「新清史」學派出名，他因為斗大的英文字母都不認識，聽說「新清史」學派頻繁使用Empire（帝國）一詞，就一口咬定「新清史」學派是「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東北通史》第一編第三章青銅光輝照東北，第三節漢文化奠基東北，是為東北史定調的。

漢文化是何時為東北奠基的呢？《東北通史》說是早在石器時代。「紅山文化是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最為發達的一種文化。這一文化不僅顯示出與中原的華夏群體—漢民族的先民的文化相類似的特徵，同時在某些方面已領先於同時期的中原文化，反射出中華民族的『文明曙光』」。清國末年哄抬出來的「中華民族」提早到了石器時代，真是滃歟盛哉！如此優秀的文明真是東北人的福氣啊！因此該書又寫道：「漢民族的先人所創造的文化，始終是東北區域文化的主流，並帶動著東北社會經濟和文化的不斷進步，因此說，在漢民族形成之前，漢民族的先人已成為推動東北社會前進的主導力量，不管他們人數多少，也不論他們占地廣大與否，這一歷史事實是顯而易見的。」

漢民族的先人真的是像播種機，將高等文明的種子撒在東北，生根發芽？如果你不承認這點，你就是弱智，因為這麼「顯而易見的」你都看不見，還好意思活在世上。因此，該書特別強調，紅山文化以其「象徵中華文明曙光」而理所應當地成為漢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同時也成為漢文化奠基東北的一個重要內容。

那麼創造紅山文化的民族是誰呢？李治亭等人說是締造商國的古商族的先人。「古商族的先人活躍於東北西南及其西北地方，正是他們成為創造紅山文化的主導力量」，因此，「紅山文化是商先史」。古商族當然是漢族先民，因而，創造紅山文化的這部分人類群落，應即是漢族先民的一部分。雖然中國的考古界也愛吹牛，但還沒有人敢吹找到了商

文化的源頭，更沒有人敢說紅山文化是商族的先人創造，而這些考古界的懸案都被李治亭等人磨磨嘴皮子就解決了。

紅山文化之後該誰上場了？當然是箕子。李治亭等人說，殷人（也就是商族）是東北土著，周初箕子率眾北遷，也進入了遼西地區，喀左北洞村出土的箕侯器驗證了這一點。這之後不久，箕子又東走朝鮮，而其一部分部眾很有可能遺留在遼西之地。因此，創造這一地區青銅文化的人群理應視為漢民族的先人。也就是說，在李治亭等人看來，在西周初年，也就是前一千年左右，遼西之地已經有了漢族的先遣隊。箕子又率領漢族東走朝鮮，等於漢族把朝鮮解放了。李治亭等人特地引用了金毓黻《東北通史》的話：「箕氏朝鮮為漢族所建之藩國，實占漢族開拓東北史上重要之地位。」什麽是藩國？就是對中央政權有進貢義務的地方政權。周武王克商在前一〇二七年，西周最北的分封國是燕國，首都在北京市最南端的房山區琉璃河鎮，西周初年的勢力不可能達到東北亞。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是是漢國人為了掩蓋漢武帝侵略朝鮮而編造的。

東北如此受漢族眷顧，不僅有漢族這個播種機，還有漢族這個加油機。李治亭等人說，戰國時期燕國的人民已大量遷入東北南部地區和朝鮮半島北部地方。他們所帶來的中原文化與東北土著的漢民族先人所創造的文化互為融合，並與中原地區的漢文化競爭相發展，成為華夏文化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支系。這一文化領先於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的文化，確立了在東北區域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因此，我們認為這部分屬華夏文化，為未來的漢文化在東北奠定基礎。這裡仍需指出的是，這一文化是歷經漫長悠久歲月，在東北本土孳生的文化。雖然在某些方面與中原文化有所接觸和交流，但其主體卻為東北所固有。「換言之，朝鮮半島西北部地區實為周時期中國東北的一部分漢文化所奠基的東北地區應包含今朝鮮半島地區。」[3]

經過李治亭等人的轉彎抹角，漢族成了東北的多數民族，其他的民族都不過是少數民族，少數當然應該服從多數。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老百姓，動不動就說「自古以來」。經過李治亭等人的論證，朝鮮半島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中國隨時有理由出兵朝鮮，收復故土。而中國確實在一九五〇年出兵朝鮮，可是由於實力不濟，沒能把整個朝鮮半島打下來，被阻擋在朝鮮半島北緯三十八度附近。想必將來國力強盛了，一點要雪恥報仇。中國網路上對朝鮮喊打喊殺聲，早已不絕於耳。如百

度貼吧「故明吧」[4]：

滿韃子現在不是主要戰鬥目標！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彼高麗賤種！戮盡此賤種方可除去一個噁心的毒瘤！

「故明」指的是故去的明國，中國漢族心目中最正宗的漢族王朝，他們認為明國被滿洲韃子征服是最大的不幸。這些漢族不僅在中國的各個網站鼓噪，甚至還翻牆到國外網站宣揚。把這種論調簡化一下，可與他們的革命先輩鄒容相互輝映：

中國漢族：戮盡彼高麗賤種（殺光野蠻的高麗畜生）！

鄒容《革命軍》：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殺光五百多萬野蠻的滿族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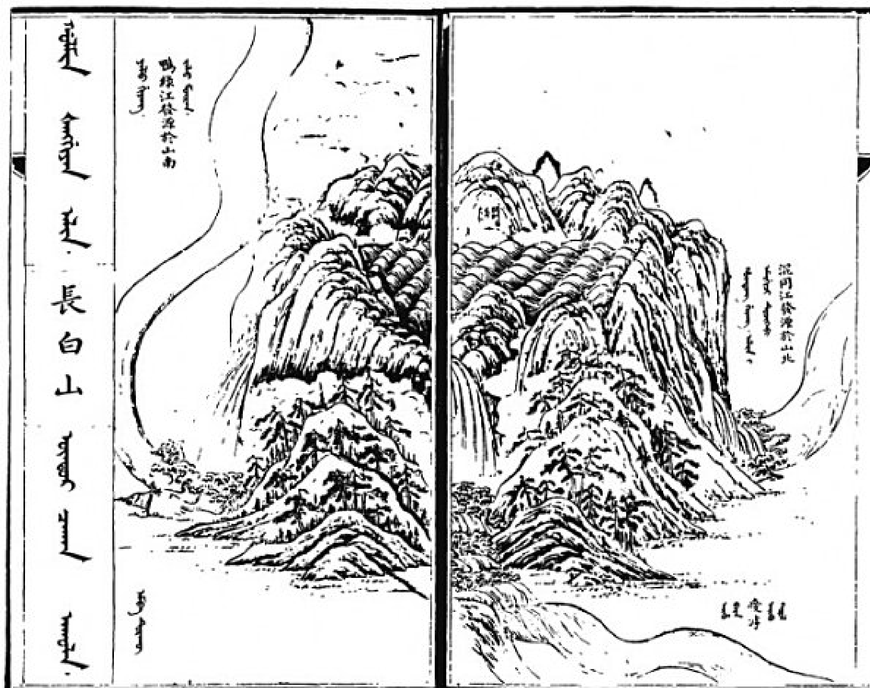
那個中國漢族所說的「高麗畜生」好像是專指韓國人，朝鮮國畢竟是中國扶植起來的，並且一直在保駕護航。不過，韓國人口現有五千七百萬，要殺光的話也需要很多天。有時候，中國漢族所說的劣等民族是包括韓國人、朝鮮人一起的。

確實，當今中國流行的動不動就要進行種族滅絕的思潮，與辛亥革命前後的民族主義一脈相承。由漢族的復國運動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公然提出要向「民族帝國主義」階段提高，叫囂由假漢族同化非漢族，本書第三章已經談到。

李治亭與東北亞有關的還有他對吳三桂的評價。吳三桂為明國末代皇帝崇禎的遼東總兵，鎮守山海關要塞。為打擊「闖寇」李自成，於一六四四年不惜向剛建立不久的清國投降，得以在山海關大戰中大敗李自成，被封為平西王。後來又殺掉打著明國旗號的南明永曆帝，晉封為平西親王，與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廣東平南王尚可喜並稱三藩。

在清末革命黨眼裡，明國是漢族之國，吳三桂投靠異族，無疑的漢奸。中國共產黨自認為與歷代農民起義一脈相承，李自成代表農民起義的頂峰，吳三桂膽敢屠殺農民起義，當然是罪大惡極。不料風水輪流轉，一九九〇年李治亭出了本《吳三桂大傳》，說對吳三桂的評價「即不能站到明朝的立場，也不能站到清朝的立場」，而要站到「中華大一統」的立場。為什麼呢？因為歷史要為現實服務。李治亭認為吳三桂的

降清是「順應歷史潮流，促進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壯舉，應該予以肯定」。我們不要忘記，「中華民族」正是在清國末年發明出來，最初還遵守「中華」二字的本義，如實地將中華民族等同於漢族；隨後則悍然篡改「中華」二字的本義，將四夷各族都綁架到中華民族裡充當人質，目的是既要推翻滿清的統治，卻又想霸占清帝國的領土。



一六三五年完成，以滿、漢、蒙文書寫，記載滿清皇家歷史的《滿洲實錄》，第一部裡的插圖「長白山」。

貳從「東北工程」看學風的倒退

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厲聲說：「以前我們沒有提過這樣的觀點，現在提出來了，他們的反應非常大。」這是在炫耀「東北工程」的創新之處嗎？不由得看看他們集體撰寫的《試論高句麗歷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發表在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也就是說，東北工程剛上馬，他們早已結論在胸。

他們署名「邊眾」，意思是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眾人，該文的核心是論證「高句麗是我國東北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列舉了五大論據。

第一個論據是「從高句麗民族起源看，我國學者目前研究情況儘管存在一些分歧，大體上有穢貊說、夫餘說、高夷說、商人說、炎帝說

等，但無論何種說法，都充分肯定高句麗民族的先人的活動範圍在周秦之際就在我國東北地區之內。周人一直認為『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左傳》昭公九年）。由此可見，周武王克商以後，周人對東北地區的經營是很明確的，勢力已超越今日東北的範圍。」

「肅慎、燕、亳，吾北土也」這句話是周景王在周、晉兩方爭奪閻田時，對晉國人說的話，表示西周初年疆土很廣大。時為前五三三年。當兩方發生爭執時，大家難免要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周景王這些話並不可靠。首先，武王來不及東征和北征就死了。即使在武王之後，因為東方各族風起反抗西方來的周族殖民者，周公不得不東征三年加以鎮壓，血流漂杵，還根本顧不上東北。在東征之後，才騰出手來，始封召公之子於燕，國名來自當地山名—燕山。這是後人津津樂道的西周大分封，實際上是以國家的名義派出的武裝殖民隊，至於能夠圈多大的地，就要看被委任人的實力，國家只是承認其合法性而已。

燕國受封的地點在今北京及河北中北部，史書也稱為「北燕」，首都在「薊」。一九八六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大墓出土的青銅器，銘文記載周王「命克侯于燕」，這個「克」字到底是動詞還是燕侯的名字，學術界還沒有定論，但總算弄清楚了燕國始封地位於今北京房山區琉璃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這個地方屬於河北省房山縣，民國時期以發現周口店猿人著稱於世。房山縣是山區，稱得上崇山峻嶺，大山腳下的溶洞足夠行船。琉璃河一帶則是平地。隨便舉例，從北京房山區琉璃河到河北省山海關長城老龍頭（長城起點）有三百五十公里。如果說，「周武王克商以後，周人對東北地區的經營是很明確的」是謊言的話，那麼，說「勢力已超越今日東北的範圍」就是夢話了。

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記載：「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莽曰下句驪。」漢武帝元封四年相當於前一〇七年，玄菟郡是漢國侵略朝鮮以後新設的。王莽是西漢王朝的終結者，他將「高句驪」改為「下句驪」，帶有貶義，等於是羞辱。東漢末年的應劭注釋班固《漢書》，說玄菟郡就是過去的真番、朝鮮「胡國」，高句驪就是過去的「句驪胡」。可見漢國習慣稱高麗、朝鮮為「胡」。由於西漢最大的威脅是匈奴，所以「胡」這個字，如果是狹義，就專指匈奴；如果是廣義，泛指北方、西方的民族。而且「胡」這個字的意思是「大」，就是「大韓民國」的「大」，是一個褒義詞。無論是狹義還是廣義，「胡」

都指的是異族建立的國家，也就是外國。如果高句麗真是中國管轄的少數民族政權，會有胡、胡國這樣的稱呼嗎？

「邊眾」說：「高句麗民族的先人的活動範圍在周秦之際就在我國東北地區之內。」這句話大體上不錯。從清國官方編纂的《大清一統志》來看，其中的「奉天府」條目下記載：遼河就是古代的句驪河，句驪河又寫作「拘柳河」，清國時叫巨流河。這是高句麗在今遼河流域活動過的最佳證據。

遼河的名稱，由來已久。西漢《淮南子．地形》認為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列舉了六條大河：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其中的赤水、黑水多次出現在《山海經》裡，不知道在哪裡（我懷疑是陝西省的丹江和褒河）。不過將遼水與黃河、長江、淮河並列，說明在西漢人的心目中，遼河還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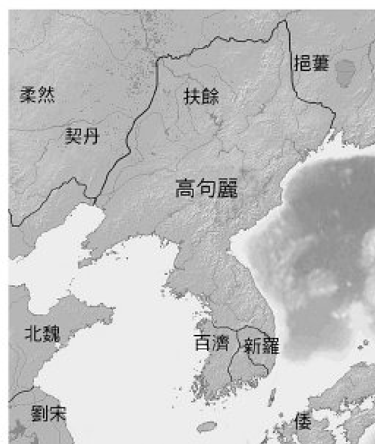
遼河全長一三九四公里，流域面積二十點一六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韓國大。遼河不僅滋養大半個遼寧省，「遼寧」也因遼河而得名。遼河西部的支流發源於河北省、內蒙古，這一帶是東北亞的西界，最南端的山海關，也是明萬里長城的起點（中國官方已經將明長城的起點修改為遼寧省丹東市虎山）。後世所謂「出關」等於說從東亞進入東北亞，「入關」等於說從東北亞進入東亞。遼河東部的支流發源於吉林省，吉林省和黑龍江省南部、遼寧省中北部過去是夫餘的國土。高句麗是從夫餘分化出來的。因此可以說，整個東北亞都有夫餘、高句麗活動的足跡。


位於東北中韓邊界，中國吉林省集安市出土的高句麗角抵墓壁畫。

「邊眾」說：「高句麗民族的先人的活動範圍在周秦之際就在我國東北地區之內。」因此，倒推到古代，「高句麗是我國東北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這種邏輯真是駭人聽聞！戰國（475–221BC）屬於東周（770–221 BC）的一個階段，以各國互相打仗而得名，還顧不上東北亞。即使秦帝國（221–206 BC）完成了統一，勢力也只達到遼東，這也是秦長城的起點。當秦帝國崩潰之後，大批難民逃往東北亞。夫餘、高句麗是獨立發展起來的，不可能是東亞某個國家的分封，也不可能屬於東亞某個國家的地方政權。

「邊眾」之所以有膽量否認夫餘、高句麗在東北亞曾經獨立建國，是因為現在東北亞的三個省已經是中國的領土，再根據「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大一統的」這類虛假的歷史理論，最終的目的就是否認四夷各族獨立建國的歷史，這是赤裸裸的民族主義。古史辨學派在艱難的政治形勢下，依然沒有放棄對它的批判。一九六四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兩年，顧頡剛先生在日記中記載：聽說有人正在寫中國歷史，竟然要抹殺少數民族建國，揚言中國少數民族無建國事，顧先生痛斥這是「主觀唯心論」！顧先生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日記有一則記載，很值得注意，他說：趙樸初[5]的文章有一句「自女真族統治中國以來」，有青年批判他，說女真族就是滿族前身，而滿族為中華民族構成一分子，不應當挑撥民族感情。顧先生評論道：「這話太奇怪了，真的是要改造歷史！」顧先生在一九六五年聽說有人提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的大國」之說，已經感覺非常驚駭詫異，現在竟然演變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

統一的大族」，簡直要一腳踢翻二十四史，真是大膽啊！將顧先生的日記和東北工程對比，東北工程不就是要鼓吹「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大族」，進而否定四夷獨立建國的歷史嗎？對於「文化大革命」，官方溫和地稱為「十年浩劫」，民間認為就是法西斯。那麼在二十一世紀復活的「文化大革命」歷史觀，是不是法西斯呢？請參與東北工程的人對號入座。這種低級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政府支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經有充分的暴露，東北工程更加露骨而已。



西元五世紀，高句麗鼎盛時期的版圖。

「邊眾」的第二個論據是：「從高句麗政權建立情況看，國內外學者大都認同西元前三七年（西漢元帝建昭二年）建都於紇升骨。今遼寧桓仁縣城附近有一座平原城下古城子，還有一座山城五女山城，考古調查與發掘證明，這裡是高句麗的早期都城，當時屬漢玄菟郡管轄範圍。」

「邊眾」的邏輯是：高句麗屬於漢國玄菟郡管轄範圍，高句麗因此理所當然屬於中國。但是，我們要進一步追問：好好的高句麗為何落入漢朝之手？是侵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不管是不是照顧朝鮮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總之中國官方還敢於承認漢入侵高句麗，古史大師顧頡剛先生這樣寫道：漢武帝一生，除了對付匈奴是由於正當的自衛外，其他對越南、西南夷等等的設施無不出於擴張領土的野心。尤其是對朝鮮，他不但破壞了兩地人民的深厚友誼，而且把漢人的不良行為輸送到朝鮮，可以說是千古的罪人。漢武帝憑藉武力，東辟四郡，為了他們的官僚集團和商人們唯利是圖[6]。

顧先生是中國最傑出的上古史大師，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輩學者。

第三個論據，「邊眾」說：「自漢至唐，我國歷代王朝，包括分裂時期的各王朝都認為高句麗是邊疆民族政權。高句麗居地在商末至漢初是箕子朝鮮的轄地，而箕子朝鮮是周朝的地方諸侯，進入漢代之後為衛氏朝鮮取代，但依然是漢朝的藩屬。元封三年（108 BC），漢滅衛氏朝鮮設置樂浪等四郡，在包括朝鮮半島中部以北地區實行了和中原地區相同的統治方式。」

吳銳按：箕子與朝鮮的關係，可能就是漢國為掩蓋其侵略惡行而自導自演的，不要再拿來作為統戰工具。

「邊眾」接著說：「自漢至唐，儘管各王朝對高句麗的管理方式不一，但歷代的統治者都認為高句麗的活動區域是中國的傳統領土。」列舉的例子有：

（1）隋的統治者認為「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於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世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隋書．裴矩傳》）；

（2）唐太宗也認為：「遼東舊中國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師者四，喪律而還，殺中國良善不可勝數。今彼弒其主，恃險驕盈，朕長夜思之而輟寢。將為中國復子弟之仇，為高麗討弒君之賊。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將士之餘力，平蕩妖寇耳。然恐於後子孫或因士馬強盛，必有奇決之士，勸其伐遼，興師遐征，或起喪亂。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遺後人也。」（《冊府元龜．帝王部．親征二》）

「邊眾」評論說：所謂「舊中國之有」、「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無疑反映著唐太宗視高句麗地區為中國的傳統疆域，實現對高句麗的統一是完成「九瀛大定」的最後一項使命，這也是隋唐兩朝不惜傾全國之力完成統一高句麗的重要原因之一。

吳銳按：隋國的統治者和唐太宗都是垂涎高麗的人，他們的話竟然能夠拿來證明高麗自古就是中國的？「邊眾」諸位，假如你的東西被盜被搶，你去找強盜論理，會有什麼結果呢？強盜可能矢口否認，也可能說被盜的東西本來就是他的。唐太宗說高麗人是妖寇，請教「邊眾」諸位，這是哪種妖哪種寇？

在河北省盧龍縣、遼寧省喀左縣出土帶銘文的青銅器，有人認為銘文是「孤竹」二字，尚且不能肯定。說高麗之地本來就是孤竹國的地

盤，純粹是胡扯。「邊眾」大概想說這位「隋朝的統治者」就是隋煬帝，可能是因為煬帝以荒淫著稱，名聲太壞，不方便提及。而且「邊眾」引用的那段話也不是煬帝說的，而是他手下的吏部侍郎裴矩（547–627）說的。當時很多西域諸國的商人來到張掖，與中國做生意，大業元年（605），煬帝命裴矩掌管其事。他很善於揣摩煬帝好大喜功、垂涎西域的心思，於是採訪這些西域商人，讓他們敘說本國的風俗地理，撰成《西域圖記》三卷，獻給煬帝，謊稱西域各國「引領翹首，願為臣妾」（伸長脖子想給大隋當奴隸），煬帝非常高興，賞賜裴矩五百段，還每天把裴矩找來，諮詢西方之事。

裴矩以厚利引誘西域諸國到中國來捧場，極大地滿足了煬帝的虛榮心。煬帝故意在外國人面前擺闊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侵略高麗，也是為了滿足皇帝的虛榮心，用裴矩的話說，就是：「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好好的文明之境，怎麼能仍舊處於落後狀態？）煬帝的父親文帝打高麗號稱二百萬軍隊，結果輸得很慘。如果煬帝能把高麗打下來，豈不證明兒子比老子厲害？煬帝也以為小國軟弱可欺，可以一舉入侵，殺雞儆猴，哪知道三次侵略都遭到慘敗，國內已是烽煙四起，自己也死得很難看。自五八一年北周外戚楊堅篡權建立隋國算起，到六一八年煬帝被殺，前後不過三十八年。

關於隋國四次侵略高麗，金毓黻認為太偉大了：隋征高麗，前後凡四次，煬帝足以召亂致亡，論者因咎征高麗之不當，此殊不然。煬帝之時，內開運河，以通南北之郵。北築長城，以鞏邊防。外撻四夷，以揚國威於域外，雖皆出於好大喜功之一念，而其有功於中華民族後世，則為不可掩之事實，而征高麗，亦其一也，蓋基於攘外之一義言之，遼東舊壤必須恢復，高麗野心之必須膺懲，主中國者應視為天經地義刻不容緩之圖。至其出師無功，又別有其原因。以此為咎，何異懲羹吹齏。世多以成敗論人，其此之謂歟。（《東北通史》，頁三一三）

在金毓黻看來，只要是能擴大中華民族的地盤，揚國威於域外，都應該視為天經地義，而且刻不容緩。即使是出於好大喜功的初心，也是很高尚的，他苦口婆心地提醒：千萬不要以成敗論英雄啊！

隋末唐初之際，亞洲最強大的國家是突厥。唐高祖李淵曾經稱臣於它，太宗引為奇恥大辱。突厥長年累月在今山西一帶攻擊唐國，威脅長安。唐高祖派人到今天的湖北襄樊、鄧州一帶考察，做遷都的準備。貞觀四年（630），唐國名將李靖率領十餘萬大軍，活捉頡利可汗，將東

突厥擄掠一空，又打敗了回紇鐵勒薛延陀，一部分回紇也歸順了，唐國的北部邊境安寧了，西北各國給李世民上「天可汗」的尊號。「可汗」是草原民族特有的最高稱號。唐太宗很高興，認為自古以來沒有人能夠降服匈奴，太了不起了，於是下了一道詔書誇耀，說是上百萬的異族歸順大唐，由遊牧變為農耕，加入郡縣制；從前披頭散髮，現在帶上帽子穿上農耕民族的衣服。這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沒有過的，所以唐太宗非常得意。

但是唐太宗得意得太早，一代天驕松贊干布領導的吐蕃崛起，松贊干布在貞觀十二年（638）親自率領二十餘萬大軍，駐紮在松州西境（今四川松潘一帶），威脅唐國邊境。要知道，即使有最先進的越野車，從西藏拉薩到松州也絕非易事。兩國真刀真槍地打了幾仗，互有勝負。最後唐太宗權衡厲害，派文成公主進藏，被動和親。文成公主是貞觀十五年（641）正月從長安起程，公主走過的路就是後來著名的唐蕃古道[7]。公主進藏時十七歲，只與松贊干布一起生活了三年，也沒有孩子。守寡三十六年，舉目無親，於六八〇年孤獨地去世，享年五十六歲。


西藏大昭寺松贊干布（左）與文成公主（右）塑像。

高麗對身邊這個惡鄰高度警惕，一邊進貢修好，一邊修長城備戰。

古代流行將敵人的屍體堆起來築成紀念塔，以炫耀戰功，稱為「京觀」。為紀念打敗隋國侵略軍，高麗也建造了「京觀」。貞觀五年（631）唐太宗派人到高句麗，收埋隋王朝戰士的遺骨，祭祀這些遠道侵略的「烈士」，並毀掉了高句麗立的「京觀」。這不是故意挑釁嗎？唐國就是造隋國的反而建立的，假如你李家對隋國感恩，不造反不就得了？拆了「京觀」還不滿足，受了吐蕃窩囊氣的唐太宗乾脆在貞觀十八年（644）攻打高麗，沒想到又遭到失敗，不由得發出了「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長歎，「為中國復子弟之仇」的大願只好留給以後的侵略者，這句話也恰好證明了高麗本來就不屬於「中國」。


古代為炫耀武功，聚集敵屍，封土而成的高塚，稱之為京觀。

唐高宗時派李勣、薛仁貴領兵攻打高麗，六六八年滅高麗。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滅高麗的名將薛仁貴率領大軍與吐蕃大軍在大非川（青海湖南面切吉草原，圖十一）展開激戰，唐軍大敗。唐、蕃第一次正面較量以大唐的失敗告終。此後雙方時戰時和，吐蕃在軍事上顯示出優勢。

對於薛仁貴滅高麗，金毓黻也有評論：高句驪一族，本出夫餘，為吾中華民族成分之一部，且其立國於今東北域中最久，與後來之王氏高麗李氏朝鮮含有別種來源者不同。故其亡也，實等於吾族向外繁殖勢力之中斷，雖至末葉以後，不恤本族，略取遼東，又遷都朝鮮半島，淪於夷化，為中土人所深惡痛絕，然究屬同根之萁，未可終於歧視，故其世系，亦不可不述也（頁三四四）。

不管是什麼民族，只要在中國的疆域生活過一天，那就要被套上中華民族的黑頭套。膽敢不接受中土人的統治，搬到其他地方，那就是放下高貴的身分，自甘墮落，與低賤的少數民族同流合汙，成為淪陷區了。這種不接受王化的行為，中土人深惡痛絕，金毓黻當然也是中土人，自然恨得牙癢。他把高句麗看作是中國向外擴張的先頭部隊，先頭部隊陣亡了，真是心痛。



大非川之戰，唐軍與吐蕃軍進軍路線圖

大非川大捷之後，吐蕃攻陷唐國在安西的四鎮：龜茲、疏勒、于闐、碎葉，唐國在西域的勢力範圍終結。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吐蕃大將達扎路恭率兵大舉進攻唐國，攻下長安（今西安），唐代宗倉皇出逃，任命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郭子儀的部下才二十騎，只好強取民家畜產，以充實軍隊，唐國的外強中乾暴露無遺。為表彰達扎路恭卓越的武功，吐蕃赤松德贊特意為達扎路恭立碑，該碑至今保存在西藏首府拉薩市，與布達拉宮隔路相望。吐蕃最盛時，東邊國界從賀蘭山向隴山延伸，陝西以西都屬於吐蕃國土。為了對付吐蕃，唐國不得不聯合老對手回鶻。就是這樣一個強大的吐蕃，照樣被中國媒體宣傳為「唐朝的地方政權」，把兩個獨立國家的關係，歪曲為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的關係，這不正是「邊眾」的思路嗎？

「邊眾」第四個論據，說高句麗也沒有「自絕」於中國之外。「在長達七個世紀的時間裡，高句麗稱雄東北邊疆地區，但給自己的定位都

是中央王朝的邊疆地方政權」，請問你們這些斗大的韓文字母都不認識的所謂專家，高麗人在哪裡「自己定位」的？你們看見了？摸著了？所謂冊封、納貢、納質，都是高麗的敵人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寫的。高麗不幸與惡霸為鄰，不得不採取一些委曲求全的措施，絕不表明對敵人的認同，修建長城防備敵人的入侵就是最好的證明。

古代除了官二代、富二代，底層出生的人從軍不過是一種職業，沒有人要求他們維護國家統一大業的政治標準。最早春秋時代，唯楚有才，晉實用之，難道是楚國人為了維護晉國的統一大業而支援晉國？匈奴人金日磾來到漢國是為了維護漢國的統一大業？現今到韓國找工作、求學的中國人上百萬，難道他們也是為了維護韓國的統一大業？

「邊眾」第五個論據，說：從滅亡後高句麗人的流向看，六六八年（唐高宗總章元年）高句麗滅亡後，高句麗族人約有七十萬人，遷居中原各地近三十萬人，投歸新羅的約十萬人，投奔靺鞨（渤海）的十萬以上，散奔突厥萬餘人，凡五十多萬人。再加上散居遼東等地「遺人」，戰爭死亡人，總數與高句麗族人數基本一致。其中只有投入新羅、留居半島今龍興江以南的約十萬餘高句麗族人融入半島民族，而大多數都融入了漢族人中。「從這一點看，把高句麗民族作為東北歷史上的邊疆民族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這又自相矛盾了：如果融入了漢族，高句麗族人的民族特性就消失了，還能算作「邊疆民族」？東北亞與漢地人的關係，無非是接納了大量難民、罪犯，這些從漢地來的人並非一定是漢族。漢族最起碼要信仰儒家，將大量「未定族」裹脅為漢族，是清末革命黨的宣傳統戰策略。

「邊眾」第二個論點是說王氏高麗並不是高句麗的繼承者，這也是拾人牙慧，老調重彈。前面我引用金毓黻評論薛仁貴滅高麗，也有這種陰陽怪氣的論調。幸好在中國境內還有三百萬人證，那就是說朝鮮語的朝鮮族。不管高句麗、王氏高麗有什麼不同，那只是最高統治者的不同，占人口最多數的老百姓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都知道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勾踐父親的名字是「允常」，「允」即允姓，也即「以」姓，也即姒姓。《史記．越世家》說「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並沒有錯。越國的統治者是姒姓夏族，被統治者還是鳥夷等族。

上述「邊眾」的文章出籠之後，韓國一片譁然，中國的記者也進行了採訪。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厲聲透露，「東北工程」立項的初衷更多的是考慮到當時東北作為老工業基地，面臨很多諸

如大規模下崗、礦業城市資源枯竭等嚴重社會問題，「要解決現實問題，把歷史問題搞清楚也是非常重要的。」厲聲說，這種思路在「東北工程」的全稱（「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中亦有體現。而以巨大的課題經費支撐經濟並不景氣的東北地區的科研力量，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另外學者認為，此次的中韓尷尬事件，與大陸學術研究自身存在的問題不無關係。改革開放後，國內學術界與外界經濟聯繫日益緊密，學術研究往往存在較為嚴重的「趨利傾向」。無論是課題經費還是社會關注度，經濟學、法學等學科在社會上「獨占鰲頭」，一些MBA老師年薪達幾十萬，一些著名法律學者擔任律師可以獲得五十萬元的律師費。而諸如歷史等學科，很多學者則需要自費出版研究成果，出現所謂「研究越多，學者越窮」的現象。這直接導致了研究人才分布的「貧富不均」。

本次採訪中記者發現，在國內尋找高句麗問題專家相當吃力。「我們對『高句麗』的研究遠比不上韓國。」國內一位常年從事東北亞問題研究的學者無奈地說，「他們一位學者寫過幾十本研究中朝邊界的書，而我們的情況是以前的老學者已經逐步退出研究，繼承者又非常少。人才匱乏，立志坐冷板凳的人太少。」

一位參加了「東北工程」的學者向記者透露，在「東北工程」中，研究高句麗時間在五年以上的人極少，但由於國家立項投入了課題經費，這一研究變得相當「熱鬧」。「這種做法不僅會養成一批學術『追星族』，也會讓國外誤解我們，誤以為有什麼政治背景。」此次「高句麗」爭議事件印證了這種擔憂 。

以上中國記者的採訪，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中國學術界貧富不均，沾歷史邊的最窮，學者迫切需要通過課題經費脫貧，尤其需要照顧日益落後的東北學者。二是「在國內尋找高句麗問題專家相當吃力」，他們斗大的韓文字母都不認識，為什麼偏偏要研究高句麗呢？不打自招還是為了錢。網友評論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高句麗歷史爭端純屬無中生有，如果高句麗歷史都能成為爭議，那等於是宣布『史書是一堆垃圾』。有誰可以承擔這個風險？ 高句麗爭端除了讓某些『東北工程專家』騙騙經費之外，毫無意義。」

參韓國的回擊

「東北工程」引發的爭論，中國國內略有報導，內容如下：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九日，韓國古代史學會、韓國考古學會、韓國近現代史學會等十七個學會在漢城歷史博物館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國應立即停止把高句麗史編入中國歷史的歪曲歷史行為。」

漢城大學教授李成珪「不無擔心」地認為：「如果古朝鮮、扶餘、高句麗和渤海等歷史作為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編成『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部分，那麼有可能引出韓國史只是沒有被中國吸收的支流，是沒能參與『中華文明』的野蠻落後的集體歷史而已等各種觀點。」而韓國漢陽大學教授慎鏞廈甚至撰文稱之為「『歷史帝國主義』工作。」

對於韓國學術界這次「抗議」給予極大關注的韓國「第一大報」《朝鮮日報》，發表了所指更為深遠的社論，矛頭直逼「東北工程」：「有分析認為，中國之所以這麼做是要重新確認與朝鮮族居住的東北地區的關係，並以此為基礎，製造介入朝鮮地區的理由，隱含高度的戰略意圖。」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韓國二十五名議員向國會提交了「敦促中國停止歪曲歷史的決議案」，認為韓國政府應提出強烈抗議，並與朝鮮共同提出對應方案。該決議案內容基本得到韓國政府官員肯定性回覆。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韓國國務總理高健主持的會議決定，將針對中國研究東北地區的古代史問題成立「高句麗史研究中心」，加強對高句麗史的研究工作。

中國國內學術界和其他媒體亦未見公開針對韓國有關方面的態度做出評論，但香港與台灣媒體則表示了極大關註 。

這個記者說「中國國內學術界和其他媒體亦未見公開針對韓國有關方面的態度做出評論」，是因為中國沒有不受政府支配的媒體；「香港與台灣媒體則表示了極大關注」是因為香港、台灣的媒體很難由政府支配。

在韓國駐中國大使館的中文網站上，有一個「高句麗」專題，雖然「高句麗」三個字是用中文顯示的，但一點開內容，卻是英文[8]。中國的網路審查非常嚴，可能是中國政府不讓韓國大使館用中文顯示，以免更多的中國人知道真相。僅僅從這一點上說，「東北工程」這場由學者為邀功請賞而演的戲，徹底演砸了。針對這次試探性入侵，韓國奮起反

駁，並向中國政府抗議，釀成外交事件。

針對中國政府資助從事「東北工程」，韓國成立了東北亞歷史財團，不惜與虎謀皮，與中國的北京大學合作召開了幾次學術會議，用中文和韓文出版了一系列論文集。東北亞歷史財團網站報導了韓國政府對中國的一系列抗議：隨著全體韓國國民對「東北工程」的關注程度不斷提高，憂慮逐漸加深，韓國政府也制定了長期應對策略，並向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相關問題。二〇〇四年八月，韓中達成口頭諒解協議，為要求中國糾正歪曲高句麗史問題提供了依據。

具體來說，有下列五個問題：一、中國政府注意到高句麗史問題已成為兩國之間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二、防止因歷史問題損害韓中友好合作關係，努力發展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三、謀求公正解決高句麗史問題，採取必要措施防止問題政治化。四、中方就韓國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關注的高句麗史相關記述表示理解，並採取必要舉措防止問題複雜化。五、儘快舉行學術交流予以解決。

然而，儘管中國最高領導人在口頭上做出了承諾，歷時五年的「東北工程」研究也已結束，但所有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儘管存在爭議，歷史學仍將相關研究成果納為重要資料，發表的研究論文也長期保存並產生了影響。

「東北工程」的研究成果並不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中國民眾也開始傳播「東北工程」式歷史意識。高句麗和渤海遺址的解說文字、博物館的展示說明、大學教材等都反映了「東北工程」式的認識與邏輯。二〇〇六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吉林省委員會建議通過的《吉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出了利用「中華名山長白山」、「世界文化遺產集安高句麗遺址」等吉林省的豐富資源，積極發展旅遊產業的計劃。在將有關遺址開發為旅遊景點的過程中，「東北工程」式認識更深入、更快速地擴散。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中國人對韓國與中國之間的歷史糾葛不甚了解，但「東北工程」以後，對此感興趣的網民大大增多。不少人還流露出嫌韓情緒。因此，韓中之間的歷史爭議可能更趨惡化。從專家擴散至普通人的「東北工程」走向非學問、非常識性方向。

東北亞歷史財團認為東北工程是「中國假借歷史名義應對韓半島局勢變化的國家戰略」。它們的網站分析了中國政府實施「東北工程」的目的，主要原因在於政府認為有必要阻斷今後韓半島局勢變化所帶來的

政治性、社會性影響及衝擊，以穩定中國東北地區，積極應對東北亞國際秩序的變化。

為此，中國試圖將國家主義歷史觀，尤其是強調各民族團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論」適用於東北地區，實現歷史認同。同時確立朝鮮族作為中國公民的認同感，防止出現動搖或脫離。中國試圖將「古朝鮮、夫餘、高句麗、渤海＝中國史」的理論一般化，以應對「滿洲為韓民族的故土」、「古朝鮮、夫餘、高句麗、渤海＝韓國史」等韓國歷史認識，否定韓半島與中國東北地區之間的歷史關聯性。

中國還認為，如果「古朝鮮、夫餘、高句麗、渤海＝韓國史」的理論持續下去，可能會造成類似問題，如蒙古將元史、中亞部分國家將西域史、越南將秦漢時期百越和南越的歷史分別主張為本國歷史。這樣一來，中國的歷史、民族、國家穩定就會出現問題。因此，中國認為有必要積極應對周邊民族國家的歷史理論，以確立歷史、民族、國家認同感。

果然，中國初中教科書《中國歷史》就將渤海被刻畫為唐的少數民族政權。顯然，「東北工程」超越了「學術問題」的範疇，是與今後韓半島局勢變化直接相關的戰略問題。因此，單純地把「東北工程」視為「中國奪取高句麗史專案」是一種錯誤的認識。「東北工程」反映了中國政府對今後韓半島局勢變化與東北亞國際關係變化的預測和制定相關對策的積極意圖。從這一點上來看，「東北工程」與韓民族的現在及未來直接相關。

可以說，「東北工程」是一個代表，即中國出於「現在」的需求，試圖重新打造過去的形象，探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淵源，完成國民統合和領土統一。「今天位於中國領土內的各民族所進行的歷史活動均為中國史」這種為現在服務的歷史觀；「曾在現今中國領土內活動的所有民族當然都是中華民族、中國民族」這種民族觀；將近代以後形成的「領土」概念或「國境」概念追溯到前近代時期，以現在的觀點任意劃定模糊領域這種領土觀等。從一切均以「領土」為標準這一點來看，「東北工程」可以說是「領土至上主義」歷史認識的產物。

「東北工程」以朝貢、冊封關係為依據，將朝貢國定義為中國的「附屬國」，擴大中國的實際支配空間。從這一點來看，該專案實施的背景為強烈的「愛國主義」、「中華民族形成論」等「國家主義（中華優越主義）」。中國打著「統一多民族國家論」的旗號，蠶食周邊民族

國家的歷史文化，體現了文化霸權主義。從這些方面來看，「東北工程」的理論中隱藏著具有膨脹主義性質的中華民族主義。

與其說「東北工程」的歷史理論立足於史實，以周邊國家之間的學術交流、有關遺址的共同調查等為基礎，不如說是出於國家戰略性目的，以緩解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因此，「東北工程」的歷史理論未能得到有關鄰國的認同，導致了中國與韓半島之間的文化、政治矛盾。

東北亞歷史財團網站也提到了中國政府實施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試圖以史實證明中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在黃河沿岸修建了關於炎帝和黃帝的大型遺址公園等，試圖將虛構的歷史打造成實際存在的「史實」，並在全國各地開展了相關活動。對於中國的東北工程這一國家戰略，韓國該怎麼做呢？東北亞歷史財團認為[9]：

第一，對有關「東北工程」已出版和將出版的研究結果進行持續的檢查，防止「東北工程」式主張的擴散。

第二，深化相關研究及理論，使全世界接受古朝鮮、夫餘、高句麗、渤海歷史屬於韓國史的嚴正事實。由學術界牽頭進行研究，不斷從科學、學術的角度糾正中方的錯誤。

第三，致力於培養高句麗史、古朝鮮史、渤海史研究者。表面上看，「東北工程」以後該領域的研究者似乎增多了，但令人意外的是，新研究者人數並沒有增加。中國的新研究者人數增多，我們也應當致力於培養新研究者。

第四，有必要將我們的研究成果廣泛告知於國際社會。對韓國史不了解、不感興趣的外國人，很有可能接受中方單方面的主張。因此，要擴散我們的研究成果，樹立正確的東亞歷史觀。

第五，加強歷史教育，使下一代長大後對外交流時，能夠切實守護我們的歷史。因為認同感很容易喪失，而重新樹立，則需要漫長的時間與極大的努力。

第六，也要在外交方面加強努力。歪曲歷史既是學術見解的差異，也是國家之間的外交問題。「東北工程」本身就不是局限於學術的項目，我們也應從政府層面進行持續的、系統性的應對。歷史爭議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需要付出毅力和耐心。最後，全體國民應當關心並熱愛韓國歷史。不了解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只會在情感上抗議，是無法守護自己的歷史的。

據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韓國《中央日報》報導，韓國京畿道教

育廳最近發行了反駁中國東北工程及歪曲歷史行為的教育資料集。雖然這些並非正式教科書，但由教育廳出面編制應對東北工程的教材在韓國國內還尚屬首次。本月初，這些資料集開始被分發給一線初中和高中，將被用作歷史課與特別活動時間的教育輔助資料。

據京畿道教育廳在同年六月二十日的介紹，這本資料集名稱為《東北亞和平教育資料集》。有二十餘名歷史教師執筆參與了資料集的編著工作。編著過程中參考了東北亞歷史財團等民間學會和歷史學者們發布的論文等，共參考了六十餘類文獻資料。一百四十頁的資料集主要由反駁中國歪曲韓國歷史的資料組成，對韓國國內歷史教科書中一筆帶過或省略的內容進行了詳盡敘述。舉例來說，對於中國認為「渤海是靺鞨族國家，是唐國歷史的一部分」的主張，資料集反駁道「渤海自己曾使用『高麗國』這一稱號，與新羅一起構成了南北國時代，是韓國史的一部分」。

另外，為了提高學生的理解度，資料集還針對每個主題增加了討論、UCC製作、小組學習等多種多樣的互動學習指南。教育廳相關人士表示「應著力讓學生自己找出對歪曲歷史的行為進行反駁的理由，並加以理解」。

資料集稱，東北工程是中方為切斷韓半島統一後朝鮮族要求獨立的可能性，意圖通過事前工作來掩蓋韓半島統一後可能產生的領土爭端而推進的專案。另外，資料集還分析稱，中國此舉還意圖在朝鮮崩潰的時候，能夠通過東北工程對朝鮮領土提出主權主張。中國主張「高麗不是高句麗，而是繼承新羅的國家」，赤裸裸地暴露了東北工程的目的所在。

京畿道教育廳的李正仁（音譯）表示：「我們認為，為應對中國歪曲歷史的行為，有必要按照東北亞歷史的真實史實進行教育，所以編著了這本資料集。」「這本資料集的意義在於，它告訴人們，只有從正確的歷史認識出發，才能實現東北亞的和平。」道教育廳印刷了二千部資料集，分發給每所學校各兩本[10]。

韓國人不愧是有血性的民族，經過韓國朝野的反擊，東北工程和夏商周斷代工程一樣，讓中國在國際上沒有加分。面對韓國人的質疑，參與這些工程的專家，當年打著國家級工程的旗號，神氣十足，現在悄無聲息了。

中國曾經向東南亞窮國，如印尼、馬來西亞、柬埔寨輸出過革命，

特別是中國支持的紅色高棉屠殺了上百萬無辜群眾，由聯合國與柬埔寨共同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以戰爭罪、反人類罪、酷刑、謀殺罪和種族滅絕罪，判決了一批紅色高棉前高官。也許是為了挽救以往的聲名狼藉，中國宣傳軟實力，把以前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孔子抬出來，向全世界輸出了五百多個孔子學院。當西方國家發現孔子學院沒有孔子、只有紅色中國的意識形態，紛紛關閉了孔子學院。東北工程大概也是中國的軟實力計劃，但效果適得其反。

---

1. 〈老舍祖籍遼陽考〉，網址連結：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49434a20100oee2.html?md=gd&wm=5
2. 現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3. 李治亭主編，《東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四四至四七。
4. 下面三則網路留言由作者提供之截圖而來。
5. 趙樸初（1917–2000），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6. 顧頡剛，〈三監的結局〉，中華書局主辦《文史》第三十輯，一九八八年，收入《顧頡剛全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十（下），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
7. 學界對於唐蕃古道的具體路線有較大爭議，筆者親自考察的情況詳見拙作《西藏聶榮縣歷史遺產與自然遺產》，中國言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頁八六。
8. Concerning the “Northeast Asia Project”，網址連結：https://www.mofa.go.kr/eng/wpge/m_5436/contents.do
9. 東北亞歷史財團，〈「東北工程」留下的問題及我們要做的事〉，《正確認識韓中歷史遺留問題》之四，網址連結：http://contents.nahf.or.kr/chinese/item/level.do?levelId=iscd_004c。
10. 俞吉龍報導，〈京畿道教育廳發行專門應對中國東北工程的授課資料〉，《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版》，網址連結：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3230

第柒章

萬物並育，還我民族



敦煌莫高窟內的壁畫局部，中央的舞者隨著音樂翩翩起舞，舞者周圍的演奏者們，使用琵琶、 箜篌等各種胡人樂器。

壹以國學的名義排滿

清末革命黨既然將排滿作為「無理由之宗教」，排滿等於革命，革命等於道德崇高。為了實現崇高的目標，一切手段都可以運用。他們就真的這樣不擇手段，以革命的名義，偽造了漢族的祖先黃帝，本書第二章已經列舉了偽造黃帝的編年史。

革命黨雖然將皇漢民族的祖先扯到黃帝，但是黃帝在中國古書裡的記載都有限，連章太炎都承認，與巴比倫拉上關係更是洋人的孤證。如果黃帝真有那麼偉大，為什麼歷史上被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族和滿洲打得頭破血流，中國也淪為殖民地？因此，如果務實一點，勉強能將漢族找點依靠的只有明國。

革命黨也正是從明國下手，將朱元璋打扮為「攘異」的太祖高黃帝，頂禮膜拜，時不時去孝陵向朱元璋匯報排滿的成果。朱元璋排元，光復漢族。革命黨也要排滿，光復漢族。一九四二年由重慶正中書局出版的《中國史》，只有一百多頁，作者金毓黻盛贊朱元璋建立明國是「漢族的復國運動」，「明太祖推翻了蒙古人的統治，為漢族重光，所

以他也是我們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此書作為青年基本知識叢書，多次再版。此時的國民黨，已經敗退到重慶，苟延殘喘，官方很需要這樣的書給漢族打氣。用現在的話說，叫弘揚主旋律。

呂思勉（1884–1957）先生是一位舊派學者，對國共兩黨都不摻和，古史辨學派的標誌性著作《古史辨》一共出版了七冊，第七冊就是他和顧頡剛的弟子童書業（1908–1968）合編。他著的《中國通史》第四十六章，講元明鼎革，題目是《漢族的光復事業》。呂思勉因為沒有黨派意識，他寫的《中國通史》最近二十年在红色中國非常暢銷，遠遠超過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和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他還單獨寫有《中國民族史》，也帶有排滿運動和民國時期的痕跡。

但是，早在華夏集團打出「尊王攘夷」口號的春秋時代，中國與四夷交錯雜居的局面無法改變。即以明國而論，經歷了蒙古人的統治，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早期的明國大臣如方孝孺（1357–1402）談到，宋國的時候，看見胡服、聽到胡語，還覺得奇怪。到了元國，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都被蒙古同化了。

丘濬 （1402–1495）是一個對蒙古恨之入骨的明國人，還是大官。他說：「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莫甚於胡元。」（《大學衍義補》卷一四四）因此，他特地寫了《世史正綱》三十二卷，寫於成化年間（1465–1487），可以說就是為了詛咒蒙古。他證實，歷經蒙古人的統治，中國之人逐漸沾染了蒙古人的習俗，天天受其同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語，家其倫類，忘記其身之為華，再也沒有衣冠禮樂仁義道德。有多少中國人被蒙古同化呢？丘濬說是「十室而八九」，換言之，大部分中國人已經蒙古化。

即使按丘濬所說，有朱元璋橫空出世，朱元璋面對的依然是蒙古化的中國人。而且朱元璋是和尚出身，總不能說佛教是最正統的中國文化吧。而且他安排讓他的孫子建文帝延續大宗，迅即被朱棣起兵打亂。起兵造反不僅是大逆不道，而且朱棣是以小宗身分篡奪了大宗，破壞宗法制，在過去就是滅絕倫理，比起兵奪權還嚴重。因此遭到方孝孺等大臣的反對，朱棣惱羞成怒，對方孝孺誅滅十族。

後來的嘉靖皇帝更過分，以藩王的身分當上皇帝（1522），逐步抬高其生父，再次篡改皇室的宗法。明國的皇帝大多數是短命鬼，性情乖張，有的對道教著迷，有的對藏語著迷。如果說儒家是中國文化的正

統，明國皇帝並不真信。官方編了《性理大全書》，和當今夏商周斷代工程之類的政府工程差不多，以垃圾著稱。蒙古人統治中國時期，採用寬鬆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並不強制同化。還得感謝蒙古人在中國征服區推行科舉考試，內容是關於儒家經典，總算留住了一部分儒生。當嘉靖皇帝破壞宗法的時候，還有幾百人勇敢地站出來捍衛儒家教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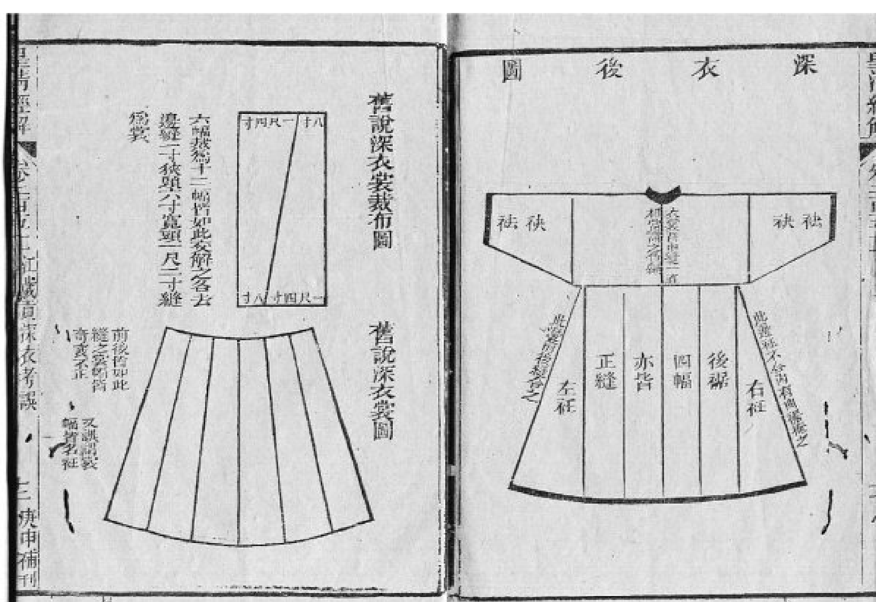
明國滅亡（1644）後，滿洲異族對中國的強制同化程度，是丘濬想像不到的。例如留辮子，是專門破壞中國禮教習俗、考驗對滿洲的忠誠度，因此遭到抵制。但是在留髮不留頭的威脅之下，中國人最後不是都乖乖屈服了嗎？到了排滿的時候，革命黨才紛紛剪辮子。

皇漢民族為什麼是優等民族呢？他們自己說因為有禮教。滿洲為什麼是劣等民族？革命黨說是因為沒有禮教。而禮教是儒家幾本經書規定的，是漢族了不起的財產，因此叫「國故」，也叫「國學」。像章太炎這種既排滿又懂點儒家經書，就是了不起的國學大師了。

排滿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清政府廢除了科舉（1905），儒學為書生提供工作機會的途徑被打破，僅僅用來「發揚種姓」（發揚民族精神），用來粉飾皇漢民族是高等民族。當時流行的說法是清國共有人口四萬萬，也就是四億，滿洲賤種只有五百萬，造反派自稱代表四萬萬皇漢民族，這就自相矛盾了：四萬萬高等皇漢民族減去五百萬滿洲劣等民族，就只剩三億九千五百萬。還有體貌獨特、信仰各異的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三億九千五百萬也要縮水。

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國學驅逐假漢族

排滿成功之後，中華民國成立，國學作為打人的工具已經不需要，引領學術新風氣的胡適等人，將國故僅僅看作一堆史料，國故不再具有神聖性，也不再有發揚種姓的功能。



深衣圖解，出自於清代的《皇清新解》。

章太炎的弟子錢玄同，年輕時也到日本留學，與魯迅等人一起聽章太炎講古典。他積極參與排滿，認定滿洲政府是我們惟一的仇敵，排滿是我們惟一的天職。排滿成功之後，就應該光復舊物，包括服裝。《禮記》有一篇的篇名就叫《深衣》。深衣是古代老百姓穿的衣服。古代上衣下裳，深衣是上下相連，和長袍差不多，由此叫「深」。中華民國成立之後，錢玄同穿上深衣，戴上玄冠，去浙江軍政府教育司上班，引起大家的哄笑。後來，他從信古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自號「疑古」，一變而為古史辨學派的引路人。他說研究國學等於揚糞，讓大家知道國學裡那些臭烘烘的東西不再害人。

共產黨自稱既反帝（帝國主義）又反封（封建主義），在建國之初對國學非常敵視，認為國學必然包含封建主義，因此連「國學」這個名稱都消失了。一九五四年古史辨學派創始人顧頡剛先生攜帶大批古書，奉命調入北京，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尹達對顧先生說：「我看你就害在這幾百箱書上了！」顧先生將自己的工作計劃和積稿送給尹達，尹達竟未看，而且將顧先生以往幾十年的工作只評為「大而無當」。有一次，顧先生給歷史所提一個建議，尹達說：「我們所中的事情你不要管。」尹達警告顧先生，別想把歷史研究所變成國學院。因為顧先生在「解放前」當過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尹達才這樣敲打顧先生。直到一九八九年，我們社科院的院長胡繩（1918–2000），都不喜歡「國學」，

因為他是個老馬列。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全世界譁然，中國陷入空前的孤立。官方最初叫反革命暴亂，後來溫和一點，叫「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從此對「革命」的宣傳降溫了，好像一提到革命就想起五四運動；一提到五四運動，就想起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於是保守主義、國學紛紛登場。直到一九九五年，中國舉辦的大一點的國際活動只有世界婦女大會，在長安街邊上專門蓋了一座婦女活動中心，離社科院只有幾百米，實際就是一個賓館。

國學是中國獨有的，外國人如果要研究國學，總得到中國來吧？像中國人民大學，前身是陝北公學，真正是共產黨扶植起來的，堪稱第二中共中央黨校，二〇〇五年率先成立國學院。中國支援的第一所孔子學院也在韓國首爾揭牌，此後孔子學院向全世界擴張。現在又有「漢服運動」，讀經運動，國學熱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各種國學家異常活躍，據他們講，國學就是儒學，特別是經學。如靠批判孔子、朱熹起家的李學勤，現在轉而提倡國學。他說：「在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儒學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響都特別大，而經學又是儒學的核心。」國學是漢族的專利。國學現在還擔負這樣一個重任：中國不走西方民主的路子，照樣很好。

我的看法，國學的範圍就按照國學家大吹大擂，限定為儒學。四夷各族有各自的宗教傳統，不摻和國學更好。國學是不是漢族的專利，尚可討論，我認為不失為一個區分真假漢族的方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說國學是漢族的，國學的核心是儒家思想，那麼不信仰國學的就不是漢族。

國學家主張，從尊重學術史的既成習慣的角度說，「國學」應該保留其原來的本義，即漢民族的古典學術和文化。由此推論，是否可以說，讀儒術，並且用儒家倫理約束自己，是真漢族。不受儒家倫理約束，打著國學騙課題撈經費，是假漢族。好像漢族也感覺假漢族太多，才提倡漢服運動。我們樂觀其成。

在建國之初就以反帝反封建為名，對儒教進行了清洗消毒，並通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把信奉儒教倫理的殘餘分子，從肉體上消滅了。現在，中國是否還有漢族？有多少？這個問題，大概只有真漢族才能回答。

參皇漢民族是虛，黃族是實

排滿的時候，造反的人越多越好，人多力量大；清國越分裂越好，造反的阻力就小了。等到排滿成功，貪圖滿、蒙、回、藏的土地，希望地盤越大越好。為了排滿，造反派自稱「漢種」或者「皇漢民族」，偽造了自己的祖先黃帝，是從巴比倫一路殺到中國，趕走苗族等土著。當時的梁啟超就使用了「黃族」這個詞，說相當於「漢種」，但與漢國沒關係，所以還是使用「黃族」好。《民報》上也有漢族自稱「黃裔」。梁啟超也是最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指的是漢族。排滿運動前後的黃族，可以稱為「黃族第一代」，簡稱「黃一代」。

「黃一代」有兩大筆桿子：章太炎、劉師培，並稱「二叔」，因章太炎又叫枚叔，劉師培又叫申叔。「中華民國」這個國名就是章太炎設計的，「中華」百分之百等於皇漢民族。「黃一代」主張的只是漢族排除滿族對中國的統治權，滿族退回東北亞發祥地，仍然有在東北亞建國的權利。

排滿勢力中，以同盟會最大，同盟會演變為國民黨，為了擴大統治基礎，同化異族，也極力鼓吹漢族，直到一九四九年敗退到台灣。在三十八年中華民國統治時期，大量族屬不明的人被裹脅為漢族，國民黨宣揚的漢族實際上是「黃族第二代」，簡稱「黃二代」。「黃一代」不掌權，無論宣傳什麼，了不起篡改一下歷史，為害的程度還有限。「黃二代」則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輕而易舉地從戶籍制度上把四萬萬皇漢民族落實到戶口名簿上。現今中國的人口統計，漢族占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漢族的基本盤是國民黨打造出來的。

國民黨綁架台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變本加厲地延續在大陸的白色恐怖，台灣人記憶猶新，不少受害人還健在。我專門去過綠島，參觀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遺憾的是，國民黨裹脅漢族的史實則完全被遺忘了。

可是，所謂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國民黨的頭子蔣介石和他的老婆宋美齡，都是信仰耶穌的。排滿可以拿國學做武器，排滿成功就不需要這個勞什子了。

肆紅族

在奪取政權之前，中共強調，從來不存在一個抽象的「民族」；任

何有關民族本質的討論，首先要回答「誰是民族主體」這一問題。中共指出：中華民族是由「絕對大多數的工農群眾組成」，勞苦大眾才是民族的主體，因此「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1]。人口最多的勞苦大眾才是民族的主體，那麼這個主體民族非漢族莫屬，中共就是漢族的救星，其角色相當於排滿運動中的黃帝。

在奪取政權之後，中共針對青海省的循化暴動，於一九五八年指示：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一定性從此成為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取消此一說法。當時，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冀春光便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一再強調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強調加強宗教工作只是為了爭取信教群眾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後消滅宗教。」

趕走中華民國的中國共產黨以外國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黃二代」中的小部分是否已經進化為「紅族」？本書不敢妄議。中共的教義就是以消滅私有制為目標的《共產黨宣言》，簡潔明了，馬恩列斯毛的道統清清楚楚，中共黨員現在已經發展到九千萬。他們是中國的領導力量，寫進了憲法，可以稱為「紅一代」，時間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九年。二〇〇〇年開始，允許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共產黨的構成發生了大變化，「紅一代」發展到「紅二代」。中國網路上，「紅一代」、「紅二代」的提法很多，說明是經過官方審查、政治合格的。平民百姓無緣進入統治階級，只好繼續當「黃二代」。

七十年間（1949–2019）「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黃二代」中的大部分進化為「黃族第三代」，簡稱「黃三代」。紅族以抵制普世價值為特徵，主張主權高於人權。黃族也認同這一點。「紅一代」打江山的時候，中國人大部分是漢族的觀念在國民黨手裡已經確立了。「紅一代」順勢將「漢族」作為榮譽分配給底層人民，一如打土豪分田地。

網路興起以後，像百度百科之類的中國網站，利用編寫、拼湊、盜版詞條的機會，給大部分古人強加民族成分，也就是漢族，這不和「中華民族」這個黑頭套很像嗎？例如百度百科「大汶口文化」詞條，說少昊氏是漢族先民首領。少昊氏是以鳥為圖騰的民族，稱為玄鳥族、鳥夷族、鳳族都可以，但是和漢族沾不上半點關係。所以中國一定要將Google、Twitter、Facebook之類的網路巨人擋在中國之外啊，不然一切都露餡了，百度、騰訊加油吧！

伍粉紅族

網上還有「粉紅族」的提法。「多維新聞」被公認為親北京媒體，它的網站上甚至還有「小粉紅崛起」專欄，討論「離岸愛國主義」。

中共過去輸出革命，主要在東南亞。現在輸出愛國主義，則是世界性的。先看一看最近十年來的中國人抵制外企事件。

二〇〇八年，抵制法國家樂福超市。原因是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的奧運聖火傳遞到巴黎的時候，遭到抗議，凡是參與抗議的，都被認為是藏獨分子。抗議本來是民主國家的家常便飯，政府無權干預，中國人無法理解這點，反而責怪法國政府保護不力，進一步栽贓法國政客及部分企業贊助藏獨分子。

二〇一二年，抵制日本一切商品。抵制日本最常見，已經成為間歇式發作。原因是自一八九五年以來中國老是打不過日本。

二〇一四年，抵制馬來西亞旅遊，因為馬來西亞航空一架飛機離奇失蹤，至今沒找到殘骸。

二〇一五年，抵制美國的肯德基、麥當勞。同年還抵制了菲律賓的香蕉和旅遊。

二〇一六年，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中國不抵制美國卻抵制韓國，從那時起到現在取消了中國到韓國的團體旅遊。韓國藝人也不能到中國開演唱會。又因為部署薩德的土地是韓國樂天集團的，中國人乾脆連樂天也抵制。二〇一九年十月，美國著名音樂學校與中國簽約預定十二月分在中國數個城市巡迴演出，但團隊中有三名韓國籍學生因中國抵制薩德案而無法獲得自美國赴中國簽證，學校被迫取消去中國演出。也就是說，即使韓國人到了美國，要想從美國進入中國，那也要看中國的心情。此時，幾十萬中國留學生正在韓國享受獎學金。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德國奢侈品牌菲利浦．普萊因（Philipp Plein），因畫了一個留辮子的人，讓愛國群眾聯想到清國人的辮子，被抵制。

二〇一七年三月，德國品牌Speradshirt因為畫了一個中國人吃田雞的圖片，被抵制。

二〇一八年四月，法國品牌巴黎世家，因為中國人購物為排隊和當地人打了起來，接著就上升到了民族歧視，最後又被抵制。

二〇一八年，因為印度咄咄逼人，抵制。

瑞典是諾貝爾獎的故鄉，中國人想諾貝爾獎都想瘋了，很多人給諾

貝爾獎評委馬悅然寫信，說只要你讓我得獎，獎金就歸你。可是當達賴喇嘛和劉曉波得獎之後，中國和瑞典不斷隔空交火。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文關注中國遊客瑞典「受辱」一事，稱曾姓一家人處於弱勢一方，被部分中國民眾斥為「撒潑耍賴」，「巨嬰遊客」是不合理的。文章反問，部分中國民眾還為當事酒店、瑞典警方、瑞典政府的行為方式尋找「合法性」，是不是屁股坐錯了地方？《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稱，那些咒罵曾姓一家人的民眾從骨子裡都被西方奴化了，連瑞典這樣的北歐小國都能給他們當精神上的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瑞典筆會向瑞典籍香港書商桂敏海授獎，再次惹怒中國。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義大利品牌DG因為廣告裡面，用筷子吃披薩被抵制。

二〇一九年二月，西班牙麥時尚（McFashion）品牌 Zara因為化妝問題涉及辱華，被抵制。罪名是故意醜化中國模特，滿臉都是雀斑。

二〇一九年十月七日，美國高檔珠寶商蒂芙尼（Tiffany）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張模特用右手遮住眼睛的照片後，遭厲害國愛國線民揭發，這個動作讓他們想起了香港抗議活動的另一個象徵：一名女性在示威活動中被警察用豆袋彈射傷眼睛，引起全世界的報導，中國官方「人民網」說是被豬隊友打傷。儘管蒂芙尼上傳的這張照片拍攝於五月分，當時香港抗議還沒有開始。現在，Tiffany不敵中國線民怒轟，遮眼廣告急急下架。幸虧這個模特是中國人，如果是外國人的話，黃族們更要瘋了。有內地網民在微博留言：「我曾是你們的忠實粉絲，但現在我以支持中國的立場優先，我愛我的國家，我不容許我的國家受到任何誹謗或侵犯。」很快，美國超模梅菲（Carolyn Murphy）拿著一個Tiffany藍色珠寶盒遮蓋自己右眼的廣告也被中國線民翻出來，成為他們指控Tiffany公司蓄意「辱華」的另一個證據。

二〇一九年十月，蘋果公司發布了一款地圖應用程式HKmap.live，可以用來追蹤香港警察的動向。《人民日報》質問蘋果「為暴力亂港之徒大開中門，是有意要做『幫兇』嗎」？蘋果連忙下架了這款地圖APP。

二〇一九年十月，美國NBA有人在網上發言支持香港，騰訊等公司爭先恐後抵制。愛國線民還拿出看家本領—盜版，以「不讓NBA賺國人一毛錢」為名，向受眾提供盜版連結。十四日淩晨，中國網友發現，騰

訊已悄悄地恢復了轉播。中國社群網站新浪微博對此議論紛紛，稱：「好像只是短暫的愛了一下國。」

《蝙蝠俠》是美國DC漫畫公司推出的漫畫作品，從一九四〇年連載至今，蝙蝠俠已成為家喻戶曉的英雄形象，在中國的網路上隨處可見盜版。DC在Instagram貼出一張將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推出的新作品《黑暗騎士歸來：黃金之子》的宣傳照，照片中一名身著黑色蝙蝠裝的角色，手中拿著燃燒的汽油彈，舉起手準備朝遠方丟去，背後的文字則寫著「THE FUTURE IS YOUNG」（年輕世代就是未來）。這張圖片在經過審查的中國網路也能看到，我也立此存照。

沒想到這張宣傳照意外成為香港反送中延伸戰場，有網友留言「感謝支持香港」，中國網友則群起攻之「你TM的有病啊？」「為什麼要這樣做？」、「你是腦殘還是甚麼了，DC？你不想在中國混了？不想在中國混了？」、「你的意思是蝙蝠俠是暴徒？」「如果你支持香港，你就明明白白寫上支持，別邊捨不得錢一邊罵人傻逼。」「不要玩火、快刪了！」

該名角色為首位女羅賓—凱莉（Carrie Kelley），在《黃金之子》中，她成為新的高譚市守護者「蝙蝠女」，由於內容講述凱莉與超人、神力女超人之女萊拉（Lara Kent），以及同父異母的兄弟強納森（Jonathan Kent）抵抗邪惡勢力的故事，有世代傳承的意味，才會以「THE FUTURE IS YOUNG」為副標題。但面對氣勢洶洶的特殊材料製成的中國愛國者，DC還是將該張照片刪除。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國網路號召網民抗議抵制足球明星厄齊爾（Mesut Özil），至於具體抵制什麼內容不能說。

以上是中國人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愛國」抵制，姿態優美，好像誰也管不著。

當中國人走出國門的時候，時刻沒有忘記要把愛國主義帶向全世界。二〇一九年二月，一名加拿大籍藏人拉莫（Chemi Lhamo）於上週得以當選多倫多大學士嘉堡分校（UTSC）的學生會會長，但卻遭受該校的中國留學生抵制，理由與她支持藏獨有關，還號召近萬名中國學生上網聯署，要求學校取消拉莫的當選資格。在拉莫當選之後，她的Instagram帳戶曾在一天的時間裡收到大約一萬條評論，許多評論包含人身攻擊、種族主義誹謗，以及其他英文和中文的粗暴的辱罵，並指責她不忠於中國這個她從未生活過的國家[2]。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我是台灣人」、「我是香港人」這樣的話隨時會惹禍，因為你有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險惡用心。

香港近些年經常爆發大規模抗議，如二〇一四年的雨傘運動，以及正在發生的「反送中運動」。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表電視講話，承認香港「反送中」不是暴動，可是連自己的房子都沒有完整產權的厲害國老百姓，爭先恐後喊打喊殺，巴不得把香港原住民趕走去霸占人家的房產，有的說把香港人打跑了我就可以去香港包小三了。分布在全世界的香港人，人數哪裡比得過海外如汪洋大海般的愛國群眾。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七日，在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用豪車隊干擾民主國家合法的示威，在現場播放非常大聲的音響，結果因此違反加拿大法律，一部分豪車後來被警察吊銷了車牌。他們罵香港留學生是「窮逼」、「操你媽逼」（簡稱CNMB），視頻在網路上熱傳。有網友披露，領頭的幾個豪車車主，是山東省前部級官員們的第三代。從此，中國小年輕就以CNMB聞名世界，成為自身的標誌。可見黃族也是在不斷進化，粉紅族就是從黃族而來，似乎也可以叫「戰狼」族。

陸考量各族精神文明高低的三個標準

明國人王守仁（世稱王陽明，1472–1529）在《〈大學〉問》裡說：「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韓國嶺南大學崔在穆教授對此深有研究。我很喜歡「靈明」一詞，借用這個詞，我認為精神創造實在是人類文明的靈明，精神文明使宇宙活起來。中國文化的靈明不在四大發明，而在於她的精神文明。附帶說，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也是在排滿運動鼓噪出來的，目的是給皇漢民族臉上貼金。



王守仁，明代政治家、哲學家。

考量各民族精神文明的高低，我以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群道的標準

「群道」是戰國晚期最傑出的思想家荀子提出的。與孔子、孟子正統的性善論不同，荀子認為人的本性是惡，《荀子》一書專門有《性惡》篇，開門見山就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是本性，是與生俱來的；「偽」是人為，是後天形成的。荀子認為人性是惡的，絲毫不是貶低人的尊嚴，相反，他認為人是天下最尊貴的，而這又是以人類懂得「群道」為前提的。荀子說：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而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人的力氣不若牛，走路不若馬，而牛馬為人所用，何也？曰：人能群，牛馬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沒有別的原因，得分之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什麼是君？能以使下謂之君。君就是善於「群」的人。如果善於使用群道，則萬物皆得其所宜，六畜皆得其所長，群生皆得其命。

「人最為天下貴」，這是荀子提出的一個偉大命題。人之所以有這麼偉大，荀子「能群」的解釋同樣是巨眼卓識。如果說人類早期的信仰是處理天人之際，「群道」就是處理人人之際。

首先，「群」有群居的意思，現代人類學的研究表明，學會群居是人類進化的重要標誌，直立猿人的先驅南方古猿（四百萬年至一百萬年前）已經學會群居。荀子明確提出「群居」的概念，《荀子．榮辱》：「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群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桀是夏國的末代國王，壞人的代表。跖，又叫盜跖，乾脆就是強盜頭子（中共把他說成農民起義領袖，我小時候的課本就是這麼寫的）。芻豢稻粱是好吃的，糟糠是不好吃的，縣就是懸殊。因此，荀子提倡「群居和一之道」。

其次，人類需要團結協作，才能組成社會群體。人多力量大，才可能使比人力氣大的牛、比人跑得快的馬為人類所用。荀子這位兩千年前的先哲已經明確認識到人類不能不「群」，他也多次講到「分」，認為人君的責任就是管好「分」[3]：

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

為了防止紛爭，荀子認為必須建立一套禮義系統，已經接近我們現

在所謂「制度建設」。荀子偏向法家，並培養了韓非、李斯兩個法家鉅子，與此很有關係。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開放時代，人們對物質等需求超過了物質生產的速度，導致你搶我奪，荀子認為，解決的辦法就是「明分使群」[4]。

荀子也多次講到尚賢使能，使無德不貴，無能不官[5]。中國古代沒有當今森嚴的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的鴻溝，在位者發現一個賢者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他提拔上來。學如荀子，也沒有找到一條可以尚賢使能的操作方法，即群道的遊戲規則，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古希臘人找到了「群道」，那就是民主。其他文明只解決了信仰，沒有解決群道原則。任何政府的合法性，全世界公認只有普選一個辦法。早在一九四四年，在野的中國共產黨就向執政的國民黨呼籲：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6]。中共在坐天下之前，也在基層做過普選試點。這說明一人一票的普選，乃是「群道」的不二法門。

其次，四夷都有宗教信仰，相信宇宙萬物、人類社會都是有秩序的。要建立良好的秩序，必須有規則。《詩經．大雅．烝民》早就這樣歌頌：「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第三，四夷都有尚武的傳統，這也是尊重個人才能、淡化個人出身等先天因素，與民主的遊戲規則暗合。古希臘人就是尚武的民族，他們發明的奧運會是民主社會的副產品，其本質就是確立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獎牌是次要的。中國對奧運會很熱心，對奧運精神依然隔閡。

尚武與建立遊戲規則也不矛盾。《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本年（597 BC）楚國打敗晉國，潘黨建議楚莊王將晉軍的屍體堆起來做成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京觀」就是將敵人的屍體堆成山，慶祝勝利，炫耀戰功。

楚莊王說：「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7]。」武是什麼呢？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古者明王討伐不敬的人，取其罪大惡極者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現在楚、晉兩國的軍隊都屍骨盈野，晉國的戰士為遵守國君的命令不惜戰死，怎麼能拿他們做京觀呢？」

「京」在甲骨文、金文的字形，確實如《爾雅》、《說文解字》所說，是高丘。「觀」是闕形。「京觀」重在指山形，又可單稱「京」。楚莊王認為，「京觀」本來是懲罰壞人的，兩國交兵，各為其主，戰死的士兵是無辜的，因此不能用「京觀」炫耀武力。楚莊王認為「武有七

德」，他將「武」這個字拆成「止戈」，戈是武器，「止戈」等於說戢兵（把武器藏起來），等於說化干戈為玉帛，真是偉大。楚國是華夏族最看不起的南蠻，《左傳》、《公羊傳》等解釋《春秋》的書始終將楚莊王寫為「楚子」，以示鄙視。

總之，在群道的探索中，四夷與漢族都不成功，但四夷比較容易接受遊戲規則的特點，略勝一籌。四夷在族群內部比較容易發揚原始民主，但一旦打下天下，與漢族一樣執著於「管得越多江山坐得越久」的思維，可謂一丘之貉，清國就是典型。清國的壓迫，引起皇漢民族的瘋狂報復，可以說滿族連累了所有的非漢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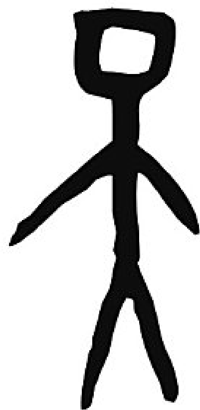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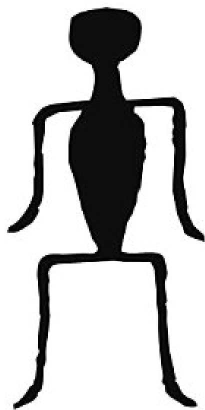
（二）信仰的標準

精神文明，顧名思義，當然是相對於物質文明而言。如果這樣劃分空間：



包括人類在內的宇宙萬物都有各自的存在空間，而精神空間則是人類所獨有。精神文明來自精神空間。早在沒有文字的時代，人們嘗試用種種方法與外界溝通。如果沒有這種溝通，那真是萬古如長夜，愁也愁死了。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有豐富多彩的紋飾，正是中國先民的探索精神空間留下的足跡。新石器時代雖然沒有文字，但不是沒有思想。中國先民認為在自己生活的現實空間之外，還有一個獨立的精神空間—天，上帝就住在天裡。

中國最早的文字出現在商國的後期，有的刻在龜甲、獸骨上（甲骨文），有的鑄在青銅器上（金文），商國已經有了非常明確的上下觀念，也有了明確的天和上帝的觀念。「天」的本義是頭頂，因此甲骨文、金文中的「天」就是畫一個人的形象，頭頂以上的就是天，圖示如下：

左：甲骨文中的「天」。
右：金文中的「天」。

「上」是神的住所，「下」是人的住所；「上」是精神空間，「下」是現實空間。這是中國先民早期的宇宙觀，也是他們的信仰。

在現實生活中的人不會僅僅滿足於現實空間，而且另外構想精神空間，必然產生宗教。長期以來，中國的宣傳機器把宗教渲染得猙獰恐怖，最近幾年全國各地都在拆教堂，拆寺廟，毀道觀，其實我們看西周的統治者認為自己之所以能統治天下，是因為得到了天命。這算是宗教吧。可是西周統治者同時強調，天命不是一勞永逸的，有德者得之，無德者失之。這又很有「人文」色彩。西周統治者戰戰兢兢地敬畏天命，一再告誡貴族們要「明德慎罰」，不能欺負鰥寡孤獨（弱勢群體）。這是何等的「以人為本」！

春秋時代首次出現鐵器，生產力發展很快，思想也在變革，人們將「神」定義為：「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8]這種「神學」實質是「人學」。這也可以反駁流行的說法—宗教壓抑人性。「依人而行」的意思是：行善得福，行惡遭報。這種觀念雖然質樸，但構成了中國宗教發生學的基礎，而且與幾乎所有的宗教教義相通，為中國人接受道教、佛教乃至更晚的耶教奠定了思想基礎，也使得幾千年來普通老百姓相信天理，恪守天地良心，充分體現了宗教的教化作用。這種「神學」實質是「人學」。

《左傳．襄公十八年》載晉平公準備伐齊，將渡過黃河之前，晉國的中行獻子禱告：「齊桓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杜預注：「神主，民也。」「陵虐神主」等於說壓迫人民。《國

語．周語上》也記載周王室的內史過論神降於莘，說：「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周惠王派太宰等人到虢祭神，內史過跟從，虢公也派祝、史請土。內史過回來向周惠王報告說：「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對神不真誠祭祀，只知道求福索取，神必然會降下災禍。國君不知道愛惜民力只知道搜刮老百姓，老百姓必然反對。這可以看作是神「依人而行」的注腳。

中國先民最早分出上、下，上是天下是地，天是圓形地是方形，地有中心（「極」）。人處於天地之間，組成「三才」。因而人為萬物之靈、最為天下貴的思想至遲在戰國已經被響亮地提出了。因此我們還應當看到宗教弘揚人性的一面。宗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們又常常批評宗教是專制統治的工具，這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古代統治者利用宗教的例子當然很多，可是在早期的神權社會，要成為首領必須顯示非凡的才能，這種才能放大到極致就是神性，沒有神性的人不配作首領，通常是公平競爭，這恰恰帶有民主色彩。例如號稱中國最早的史書《尚書》首篇《堯典》記載帝堯在位日久，向四岳諮詢誰可作繼承人，四岳推舉舜，堯對舜進行了一系列考驗，其中一項是：「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幾千年來，經師們對這幾句話有不同的解釋；堯把舜放在山林中，去經受各種極限情況的考驗，看起來有些不盡情理。其實這並沒有什麼不盡情理之處。在神守時代，最高領袖被認為是半人半神的人物，像選擇接班人這類大事，焉能不作種種考驗，以證明受考驗者具備非凡的神性。

我們看巴人的祖先廩君是如何當上首領的。根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的記載，巴郡南郡蠻本來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未有君長，俱事鬼神」。約定向石穴裡擲劍，能擲中者，奉以為君。結果只有務相一人獨中，大家都嘆服。又約定各乘土船，看誰的船能漂浮起來，結果也只有務相的船能浮，其他四姓的船都沉了。於是四姓共立務相為王，號稱「廩君」。

首領地位雖高，但責任也大。《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一》載五代之際，契丹是最大的夷狄。部落中有一個較大的部族叫大賀氏，大賀氏後來又分為八部。部的首領號大人，推舉一個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當「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推舉新的盟主。

「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約」就是習慣法。可見成為一名首領並非易事，也有相當大的風險。這種推舉制度雖然有神權的光環，但還是比較民主的。

至今的西藏達賴喇嘛轉世制度也是用神來選擇、試驗靈童。以現在印度流亡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為例，他出身平民家庭，一旦證明是靈童轉世，他就被藏民奉為最高精神領袖，頂禮膜拜。藏民抱怨警察經常到他們家搜查藏民有沒有供奉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照片。警察當然不理解信仰的力量。藏民認為轉世制度是民主的，中共也認可這個傳統。

卓越的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名著叫（《金枝》（*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書名的取義是這樣：在某個部落，若一名行將被處死之人，能夠進入聖林並從聖樹上摘下槲寄生，從而獲得「金枝」，他就有跟最高祭司挑戰的權利，並可以在勝利之後取而代之。也就是說，如果首領的神性被證明減退甚至消失，首領就要讓位。

很多人又說，科技越來越進步，最終將消滅宗教。這是一種非常狂妄的想法。

首先，宗教不屬於「科學」的某個門類，既不能用科學的手段證明其真，也不能用科學的手段證明其偽，你如何去消滅？《莊子．齊物論》不是說過嗎？「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其次，科技進步主要影響我們所說的現實空間，對精神空間的影響是間接的、微弱的。

第三，科技進步凸現了精神空間的重要性，刺激對精神空間的需求。時至今日，大陸七十年的無神論教育已經大見成效，認為宗教就是愚昧，因而需要洗腦成為主流意識。我在一本研究道教起源的書中指出：「在宗教的精神空間裡，極樂世界有千萬重，非世俗幸福所能比。這本質上不是高下之別，而只是方式不同。對於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最好保持敬意。」[9]而且我只想問一句：人家信宗教哪點把你害了？四夷和黃族的重要區別就在於宗教。四夷很少有人不信宗教，黃族很少有人信仰宗教，並以此為榮。

人類在探索外部世界時，必然要探索精神空間。宗教是精神空間的重要內容，不屬於「科學」的某個門類，既不能用科學的手段證明其真，也不能用科學的手段證明其偽，也不可能徹底根除。如果視宗教為鴉片，難於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在那麼長的時間心甘情願去嘗試此種

「鴉片」。

人們往往拿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被燒死的例子作為宗教有害於社會的證據。這個歷史悲劇的教訓在於：宗教只應當管精神空間的事，不能粗暴干涉現實空間。在布魯諾被燒死二百八十九年之後，即一八八九年，羅馬宗教法庭為布魯諾平反，可見宗教也可以修正錯誤。宗教本身也在變革，它順應歷史潮流，主動與民主社會融合。如今，一個國家是否有宗教信仰自由已經成為判斷該國家是不是民主社會的公認準則。

需要強調的是，信仰未必一定要是宗教。百年來，與排滿運動平行的是，「科學」一詞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正確性，「不科學」等於錯誤。紅族正是從這個角度批判宗教的鴉片，黃族也是從這個角度對宗教不屑一顧。那好，還有非宗教的信仰，那就是道家。《莊子．秋水》說：「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人為了使喚牛耕地，需要從牛的鼻子裡穿一根繩子，以便牽拉。人為了騎馬，需要給馬套上籠頭。但是莊子說：這樣不對，人為干擾了牛馬的天性。莊子的意思是說，牛有不被穿鼻的權利，馬有不被套籠頭的權利。如果將莊子（可能和包括莊子後學）的意思推廣到人類，就是天賦人權理論，超前的普世價值思想。這是前三百年左右，道家學派明確提出的主張。在莊子之前，老子已經提出「道法自然」，推想應該包含了「無以人滅天」的思想。道家這個學派與楚文化關係密切。總之，無論從宗教的角度還是非宗教的角度，四夷各族與紅族、黃族等民族的區別就是信仰普世價值。

儒學也不是宗教，雖然它起到了宗教般的作用。

儒學的創始人大家都知道是春秋晚期的孔子（551–479 BC）。從地域上說，孔子是魯國人；從族系上說，孔子是宋國人的後裔。孔子的先世為宋國貴族，後來流亡到魯國。到孔子這一代，已經是「貧且賤」，「貧」是沒錢，「賤」是沒有政治地位。宋國是從哪來的呢？原來周武王滅亡商國（1027 BC），建立西周，並沒有對原來的商國統治者趕盡殺絕，而是將他們安置在宋地（今河南省商丘市），延續商族（古書多稱為「殷人」）的香火，以示尊敬，對這種亡國者有一個專有稱呼叫「恪」。「恪」這個字的基本意思是恭敬，就是從西周來的。可見宋國人乃是商人的嫡系，而殷人為鳥夷（見本書第一章）。西周的總設計師是武王的弟弟周公，孔子最佩服他，經常夢見。宗周的禮樂文明遂成為

儒學的源頭。儒學既超越了民族隔閡，也超越了貧富貴賤，所以叫「有教無類」。孔夫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已經很高明，中心思想就是一個：不僅自己過得好，也要讓別人過得好。

五經中有一種叫《周易》，本來作占卜之用，一些內容來自商末周初。戰國時代，有人對《周易》作解釋（現在通稱《周易大傳》，簡稱《易傳》），主張「生生之謂『易』」，「天之大德曰生」。宋國的理學家復興儒學，將「仁」解釋為杏仁、核桃仁之類能生長的種子，儒家的「仁」學從此「萬紫千紅總是春」，成為有生命力的東西。我認為中國文化最精華的就是這種偉大的「生生」哲學。由它可以引申出很多道理，比如自由（你憑什麼不讓別人生長？），平等（難道就因為別人的生長與你不同，你就要滅之而後快？），博愛（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10]）。古人甚至還講：「伐一樹，謂之不孝」，可見「生生」哲學要引申到一切有生命的東西。我們今天才想起來保護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真是數典忘祖。可見漢族絕不是沒有信仰的民族，儒學就是他們的信仰。

可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官方一手反帝，一手反封，認為孔子還在與政府爭奪群眾，於是對孔子及儒學極盡侮辱之能事，現在又向全世界推廣孔子學院。本人二〇〇八年初在台灣拜訪孔子後裔孔德成先生，八、九十歲的老人還在給研究生上課，真正是一代宗師的氣象、漢族的典範。真漢族們，加油啊，假漢不驅逐，真漢且滅絕。

（三）歌舞的標準

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發生於一萬年前左右，結束於四千年前左右，即相當於西元前八千年至前二千年。在新石器階段，出土了笛、磬、鼓、庸、塤、哨、角、鈴等多種樂器，這些樂器當然無法與某個特定的民族對應。

按照近代皇漢史觀對古代的反攻倒算，漢族歷史最久人口最多文化最高。在楊蔭瀏（1899–1984）傑出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也能找到酷似的段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雖然漢民族居於比較重要的地位，但漢民族與少數民族，從很早時期開始，就有著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接觸，而且這種接觸，越到後來，越加頻繁。這樣，在中國就引起了少數民族彼此之間，和他們與漢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而以漢民族文化為中

心的中國文化，實際上也就含有少數民族的許多貢獻。約在前二〇一五年左右，有一個叫做方夷的部族，曾向夏王獻出它的樂舞。到前一七七四年左右，又有許多邊疆民族到夏國來表演舞蹈。在商國也有許多地方的貴族子弟，到商的都城遊學；學習的科目是《戒》，其內容可能包含著習武和習樂兩方面。[11]

當然，這種說法並不是楊先生一個人如是說，事實上在所有音樂史論著裡，都是連篇累牘。但如果問他們：夏國在哪？哪一年興起哪一年滅亡？在哪件文物上寫著「夏」字，他們一定支支吾吾，回答不上來。

其實容易與夏國沾邊的是籥和夏舞，但與漢族無關。籥，又作「龠」，是像笛子一樣的樂器，古人有的說是三孔，有的說六孔，也有說七孔的。中原最有代表性的樂器是琴。著名的湖北隨縣出土戰國早期曾侯乙墓隨葬有十弦琴，湖南長沙五里牌戰國晚期楚墓也有出土。這兩處遺址當時都屬出國，楚國一向被華夏集團視為蠻夷。又如庸這門樂器，起源不詳。但是古代有庸國，位於陝西、湖北邊境，中心在今湖北竹山縣一帶，與楚國為鄰國，當然也是中國眼中的南蠻。湖北當陽季家湖出土有庸王鐘，藏湖北省宜昌市博物館。傑出的建築學家、巴文化研究者張良皋教授指出，經歷海水侵蝕之後，最早的文明在沼澤地發生。自河南方城縣城東北部的方城埡口至廣西靈渠，直線距離九百公里，是一條漫長的古代淡水海岸線。湖廣盆地西岸有無數的小河谷形成盆地，其中開發最早的應當數江漢之間、神農架以北的堵河和南河盆地，孕育了古代的庸國，在產鹽、制陶、鑄金、築城、宗教、文字、文學等多方面，都優於周邊[12]。因此，有可能庸這種樂器是庸族發明的，並把它作為國名。

其他像錞于、銅鼓這些具有濃厚地域色彩的樂器，也與華夏或者中國無關。

漢國是胡樂器大量傳入的時期，胡樂器當然不是漢族的。《後漢書．五行志》載東漢末年，漢靈帝喜歡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爭相效仿。史學家認為刮起的這股「胡」風，導致「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官掖，發掘園陵」。





左：錞于，古代樂器，興盛於春秋戰國時期，圖為青銅製的虎紐錞于。
右：箜篌，又稱為胡箜篌，起源於波斯的弦樂器。

《晉書》卷二十七《五行志》載：泰始（265–274）之初，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煮貊炙，羌煮是一種煮肉的方法，栢炙是一種烤肉的方法。貴人富室必畜其器，燕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280–289）中，又流行在頭巾、衣服上以氈作裝飾。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291–299）中，氐、羌互反。永嘉（307–312）後，匈奴劉淵、羯胡石勒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唐國的安祿山造反，唐國人歸結為中原士女不該穿胡服，造成「服妖之應」。

音樂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高級體現，胡樂成風，反襯漢國音樂太貧乏。中國的樂器體系，明顯不是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現在舞台上離不開的琵琶、二胡、笛子之類，在中國成為「民族樂器」，究竟是哪個民族，含含糊糊的，應當正名為四夷樂器。四夷族無不能歌善舞，如果說中國有一個龐大的漢族，那麼請漢族們指出樂器、歌舞有哪些？我有一次看中央電視台音樂頻道，在介紹新疆「木卡姆」時，說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於是原住民維吾爾族獨有的文化就輕鬆易主了。

柒萬物並育，還我民族

黃族動不動標榜五千年文明史，其實還沒有香港族資格老。香港一八四二年割讓給英國，此時清末革命黨還沒出生。香港接受了西方民主、法治、自由，普世價值成為香港人最核心的價值觀，從而與大部分

中國人區別開。香港接受了中國幾百萬難民，這些人也同化到民主社會中去。一九五九年前後，中國發生大饑荒，據中國大陸及外國學者研究，餓死三千六百萬或者四千多萬人。廣東及十二個鄰近地區的大陸人最幸運，他們漫山遍野的跨境從陸路湧入香港，香港居民熱淚盈眶的帶著乾糧飲料到邊界去接濟他們，甚至引領他們到市區，還抗議警察的抓捕，而殖民地政府抓到難民遞解回大陸前，也會給他們吃一頓熱飯。亞洲首富李嘉誠，就是從廣東逃到香港的難民。沒有香港的民主機制，他永遠只能當「低端人口」，他的財富之路也是難以想像的。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在四川成都「二〇一八全國名師工作室聯盟年會暨第十二屆全國中小學名師工作室發展論壇」上，中共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做了「關於南海（專題）博弈」演講，特別談到香港問題。這位少將說：香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即香港原住民和他們的後代，三分之二的香港人是從中國逃來的，所以都對共產黨充滿蔑視，懷有刻骨仇恨。因此，他認為「香港社會基礎是中國最壞的，比台灣都壞」。他認為香港回歸後一個大失誤，就是沒有去殖民化。二〇一九年，多維新聞刊登一個從中國移民香港的人為中共獻計：設立叛國罪，將大棒伸向香港，營造紅色恐怖。向麥卡錫參議員學習，在輿論中將西方勢力及意識形態汙名化、營造微妙地恐怖氣氛，讓反共人士焦慮。

無論是徐焰，還是從大陸移民到香港的中國人，內心裡都把香港人看作異族，但絕不承認有一個香港民族存在。客家人自己主動從漢族中獨立出來，難道也是大逆不道？其實，文化認同才是判定民族成分最重要的依據。中國近幾年高調批判普世價值，自己把中國與朝鮮、俄羅斯等國劃為一個陣營，即反普世價值陣營。美國等西方國家是普世價值陣營。普世價值者主張人權高於主權，反普世價值者主張主權高於人權。大陸人漢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幾乎都沒有信仰並以此自豪，幾乎都是普世價值反對者，與香港人、台灣人的腦子完全不一樣，怎麼可能是一個民族？儘管台灣人與香港人的普世價值觀一致，但香港人有自己的母語粵語，與台灣人還是不同的民族。

舊的民族死亡，新的民族誕生，本來就是很正常的現象。

《中庸》是儒家「四書」之一，它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番話曾遭到大力批判，我們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斥為「假惺惺」[13]。從民族上看，看不出增加民族數量的壞處。民族越多，正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每個民族各有其價值觀，正好「道並行而

不相悖」。

漢族、黃族都對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異常熱心，商國以前無法證實，特別是夏。既然這麼熱心夏，夏國在哪裡也找不到，為什麼不先恢復夏族呢？《史記．夏本紀》把夏族的後代寫得很清楚：「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這些姓氏到現在大部分還存在，恢復夏族不難。

夏國以後，商族、秦族都是鳳族分支。鳳族才是中共人口最多的族，不會是漢族最多。鳳族之下還可細分，如革命黨宣傳過墨子，墨子也是鳥夷族。十六年前，我在《中國思想的起源》已經講了。

楚國是與秦國早在春秋時期並駕齊驅的兩個超級大國，建立起泱泱大國的楚族難道消失光了嗎？沒有，老百姓都知道屈原，相傳端午節就是紀念他。他就是楚族。劉邦、項羽不知道是什麼族，但都是楚地人。項羽家族有的當過楚國的將軍。如果按照專家和官方漢族形成於漢國的說法，建立北魏的鮮卑族在漢國之後，更應該形成民族啊！北魏南邊的國界達到淮河，如果漢國就有漢族的話，這些漢族在北魏生活在什麼地方？

以此類推，可以恢復很多五十六個民族以外的民族。

中共現在提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口號，中華民族是指中共境內所有的民族，也就是所有的中國人。本人擁護這一口號。一九五三年國家進行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我主張用「四夷」取代）自報民族成分有四百多個，資料應該還在。民族認定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認同。老百姓自報民族成分，就表明了文化認同的態度。如果能夠撥亂反正，把這些民族都恢復起來，萬物並育，對任何人都沒有壞處，那才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

---

1. 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解放社，一九四三年，頁六。陳伯達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前後共達三十一年，堪稱中共之文膽。
2. 關於拉莫事件的相關英文報導，可參閱《多倫多警方已對多大分校學生會會長拉莫遭網路欺凌一事展開調查》（Toronto police investigating online abuse of student leader at U of T），https://www.cbc.ca/news/canada/toronto/toronto-police-investigating-online-abuse-tibetan-canadian-student-chemi-lhamo-1.5038517 。
3. 《荀子．富國》。

4. 《荀子．富國》：「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持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
5. 《荀子．王制》。
6. 《新華日報》社論，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
7. 杜佑，《通典》，卷一八三。
8.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魯莊公三十二年即西元前六六二年。
9. 吳銳，《神守傳統與道教起源》，台灣東大圖書公司，二〇〇八年。
10. 《孟子．梁惠王》。
11. 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冊），人民音樂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二二。
12. 張良皋，《巴史別觀》，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五章。
13. 李學勤，〈朱熹「四書集注」反動思想體系的批判〉，《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四期。此人不僅批朱熹，舉凡孔子、羅振玉、王國維、法輪功、死人、活人，無不在他的火力之下，就這樣從一個臨時工當上了我們歷史研究所所長。

你不可能是漢族

—百年民族魔咒大破解

作者｜吳銳

總編輯｜富察

責任編輯｜涂育誠

企劃｜蔡慧華

封面設計｜許紘維

內頁排版｜宸遠彩藝

社長｜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曾大福

出版發行｜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86671065

客服專線｜0800-221029

E-mail｜gusa0601@gmail.com

Facebook｜facebook.com/gusapublishing

Blog｜gusapublishing.blogspot.com

法律顧問｜華洋法律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出版｜2020年5月

初版一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歡迎團體訂購，另有優惠。請電洽業務部（02）22181417分機1124、1135

◎本書言論內容，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或意見，文責由作者自行承擔